帝国的背影⊕

拜占廷简史

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英] 乔纳森·哈里斯 _ 著
(Jonathan Harris)

庞国庆 吕丽蓉 陈悦 _ 译
陈志强 _ 审校



拜占廷简史
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拜占廷简史

作者:[英]乔纳森・哈里斯

译者:庞国庆 吕丽蓉 陈悦

ISBN:978750868221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题记

谨以此书纪念梅布尔（Mabel，1896—1966）、埃塞尔（Ethel，1892—1974）和格雷格（Grag，1900—1992）

推荐序

我们眼前的这本《拜占廷简史》（*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是由乔纳森·哈里斯于2015年完成的。哈里斯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历史系教授，还任职于该校希腊文化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拜占廷帝国中后期历史研究，尤其关注拜占廷帝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拜占廷人与人文主义者之间的联系、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灭亡拜占廷帝国后的希腊人流散等问题上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自1993年其处女作《14世纪西欧的希腊难民和移民》问世以后，他几乎年年都有学术成果问世，20多年来可谓著作等身。这位专业拜占廷研究者没有忽视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工作，我们手捧的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读者需知，这本书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读者展卷阅读。这里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有几个不同于其他拜占廷类书籍的特点。

首先，作者的用语通俗化，表述生动，引人入胜，全书很少见到枯燥难读的专业叙述。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在几乎所有拜占廷类书籍中都是正面形象，即便对其出身和显赫世家子弟的说法有些争议，但也不会像此书这样表述。作者借佐西姆斯（Zosimus）之口说“君士坦丁本人是一个私生子，是其父与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一夜情的产物”，其父死后，“士兵迅速宣布年轻的君士坦丁——一个娼妓之子”为皇帝。至于君士坦丁的性格，作者还是借佐西姆斯之口说，“年过五旬的君士坦丁，身为世上权力最高之人，再无必要隐藏自己‘邪恶的天性’”。笔者推测哈里斯采用这些通俗表达方式，意在贴近读者，扩大读者面。这是将拜占廷古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必要选择，哈里斯这位拜占廷研究专业里手一定是有感于多媒体、自媒

体时代人们交流方式的变化而为。放下学者的身段，使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接地气，哈里斯为众多拜占廷学家树立了榜样。请看他是如何描述拜占廷历史上另一位重要皇帝查士丁尼的，他借同时代作家普罗柯比[注]（Procopius）之口说，“查士丁尼是个对臣民福祉漠不关心的饭桶”，在写到皇帝接见隐士萨瓦斯时说，“查士丁尼从其宝座上跃起，脸颊上淌着泪水，跑去拥抱、亲吻萨瓦斯”。其语言形象生动，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介于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表述方式非常符合大众普及作品的需要，描写不僵硬枯燥，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其次，作者对史料的选择独特，很多描述依据的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结论的信息，正如他在引言中明确宣称的，“本书不可避免地抛弃了其他作者可能论述的内容，也增添了其他作者认为次要，甚至无关的细节”。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原则下，作者独具慧眼地选择了对君士坦丁一世和当局抱有深刻成见的佐西姆斯提供的信息，全书开章明义，引导着读者跟着这位具有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古代作者步步前行，让读者看到了那个充满邪恶暴力与人性堕落的古代世界，要知道那也许是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样，在对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战役的简短描述中，作者给出的几个关键数字就能透露出其史料选择的良苦用心。例如，作者认为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陆地城墙的人数为8万，而没有采用40万、30万、20万之说，是因为他比较倾向于英国学者们的意见，特别是那位赫赫有名的英国拜占廷研究大师仁西曼（后者的史料来自土耳其文献）的说法，后者的分析可能更为合理。在众多记载不同的原始史料中，采用更符合人们思维常理的推测信息，而舍弃夸张的说法，这也是解读古史所必需的。

再次，作者对拜占廷历史与文化持有的基本观点很值得回味。全书最后的“尾声”引语就很有意思。作者引用了巴肯伯爵戴维·斯图尔特·厄斯金（David Stuart Erskine，1742—1829）的一段话，

“对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土耳其人毁灭了腐朽的希腊帝国更加幸运的了……”其中既有对拜占廷帝国灭亡幸灾乐祸式的嘲讽揶揄，也有对这个千年帝国全盘否定的批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生活在欧洲启蒙运动中那些笃信理性万能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其中以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最具代表性，因此他的那段名言也被哈里斯引用为第一章引语，“我曾经描绘过野蛮与宗教的胜利”。确实，在反对宗教盲从和专制主义的启蒙时代，拜占廷帝国是欧洲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批评的对象。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史学发展后，人们虽然对拜占廷帝国历史与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启蒙时代给拜占廷研究沉闷气氛带来新鲜空气的振奋感，仍旧是今天读者需要了解的。哈里斯秉持吉本以来的传统认识，让我们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拜占廷学界形成的“一言堂”中看到另一种独特的见解。我们在这本书中确实看不到被国际拜占廷学界公认的一流学者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和瓦西列夫对拜占廷帝国灭亡的那种惋惜之情，也看不到近年来拜占廷学界涌现出的那些专家对这个早就逝去的中古文明的“爱恋”，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理性主义是如何解读古代历史的。历史研究可能更需要冷静的观察者，尤其在我们这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通过一本普及读物，让读者在广泛阅读并获取主流观点的同时，更多地了解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观点，不是更好吗？这本拜占廷学界的另类作品一定会令你们眼前一亮，一定会引发你们进一步思考，激发你们开展更广泛深入的阅读。相信你们会在这本书的阅读中做出独立判断，并在掩卷思考中得到更多乐趣。

最后，要提到的是这本书的几位中译者，他们都是拜占廷研究专业人士，都有海外学习的经历，有的还取得了海外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在翻译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方面都具有深厚的功底。在他们严谨工作的努力下，其中文译本的质量得到了保证，也使审校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在阅读中获得满足感。

陈志强

2017年夏于南开园

---

1. 普罗柯比，拜占廷历史学家，著有《战记》《秘史》等。——编者注

序兼致谢

在拜占廷历史上，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也有一些人与事让笔者久久沉迷于其中。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有了本书的创作。换句话说，本书是笔者探索拜占廷历史长河的一次旅行。笔者重点探寻的问题是：拜占廷帝国在面临不断威胁其生存的动荡和入侵时，为何依然可以延续久远？在最终灭亡时，又为何消失得如此彻底？遵循这一思路，本书不可避免地抛弃了其他作者可能论述的内容，也增添了其他作者认为次要，甚至无关的细节。这一思路也延续到了文末的“延伸阅读”。当然，“延伸阅读”涵盖并不全面，它甚至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观点，而且仅限于大众可以接触到的英文作品，事实上学术界存在大量的相关作品。此外，在涉及拜占廷的人名时，本书试图真实地按照希腊语原文进行转译，但也并没有死板地坚持这一原则。因此，本书中使用了福卡斯（Phokas）、坎塔库镇努斯（Kantakouzenos）、希拉克略（Heraclius）、“生于紫色寝宫的”（Porphyrogennetos）等用法。某些希腊语名字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英文转译，笔者也一律接纳，因此在本书中，君士坦丁（Constantine）替代了康斯坦提努斯（Konstantinos），约翰（John）替代了雅尼斯（Ioannis）。书中的拼写如封面、延伸阅读上的，都是笔者本人的选择。

不管笔者如何将拜占廷帝国视为“遗失的世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仍然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其他学者的深刻影响。近期，两位不知名评论者对本书持认可态度，再加上耶鲁大学出版社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和雷切尔·朗斯代尔（Rachael Lonsdale）的评论，使本书获益匪浅。利兹·霍恩比（Liz Hornby）对书稿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安德鲁·萨金特（Andrew Sargent）从非学术的

角度通读了全书，帮助笔者避免了大量的前后矛盾、文法错误、疏忽遗漏等问题。笔者在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学院的工作也对本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笔者没有在“拜占廷帝国及其周边国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课程上试图将观点呈现给本科生的机会，那么也不可能写成本书。学生的反馈、问题、对立观点等，都促使笔者阐释清楚、重新整合观点，甚至有时需要全盘重新思考。笔者还要感谢学院的三位领导：乔纳森·菲利普斯（Jonathan Phillips）、萨拉·安萨里（Sarah Ansari）和贾斯廷·钱皮恩（Justin Champion）。他们对笔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感谢佩内洛普·马伦斯（Penelope Mullens）和玛丽-克里斯蒂娜·奥肯登（Marie-Christine Ockenden）在行政事务方面让一切都进展顺利。最后，能够在如此宏大、多样的学术性学院中书写历史，这是笔者的莫大荣耀。

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2015年1月

引言

世界上许多地方依然保存着灿烂的古代遗迹，但人们仍然禁不住思索：为何留存下来的如此之少……

——奥吉尔·吉塞林·德·布思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q，1555—1562年神圣罗马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在16世纪中期，奥斯曼苏丹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它的人口迅速增长，超过了40万，因而大街小巷一片熙熙攘攘。奥斯曼帝国从克里米亚绵延至阿尔及尔，而首都是这个庞大帝国的中心。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伊斯坦布尔，不过它的官方名称为君士坦丁堡。它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年在位）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而且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因此这座城市自诩拥有300座清真寺，以此来彰显其宗教和世俗的权势。在城市中央的小山丘上，人们正在兴建一座宏伟壮丽的新清真寺。按照设计蓝图，它将拥有4座尖塔，成为兼有学校、浴室和医院的建筑群。人们将它命名为苏莱曼清真寺，以此来纪念下令修建它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当时宗教界的领袖、伊斯兰世界里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所在地来说，这样一座清真寺是相得益彰的杰作。

1544年，一位叫皮埃尔·吉勒斯（Pierre Gilles）的法国人来到了这座皇都。吉勒斯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是热忱的自然主义者。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搜寻古代手稿，以便装点位于枫丹白露的皇家图书馆。但最终，他所逗留的时间远超过预期，这是因为弗兰西斯一世在1547年去世，吉勒斯的使命也

惨遭遗忘。他发现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况，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盘缠返回故乡。三年后，为了糊口度日，他不得不成为苏丹军队中的一名雇佣军，并一路向东与波斯人作战。与此同时，在滞留君士坦丁堡的日子里，他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在了解了它的布局结构之后，他对这里渐生亲切之情。然而，激起他兴趣的并非眼下这座城市。他认为，所有宏伟的新清真寺都只会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卑微。他是一位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文人，所以他在寻找这座城市被叫作“拜占廷古城”时的历史遗迹。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古典时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不过吉勒斯很快发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沉迷于这座古城此后数百年的历史，那时，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帝国的首都，而非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官方语言是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同时代的人告诉他，这个不复存在的政治实体被称作拜占廷帝国[注]。那时距离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仅仅只有一个世纪，因此吉勒斯看到的古迹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多。于是吉勒斯竭尽所能，迫切地去寻找这个遗失帝国的残存遗迹。他徘徊于城中最明显的拜占廷建筑周围，即从前基督徒的圣索非亚（意为“圣智”）大教堂。这座教堂如今依然矗立于城市中央，正对着苏丹的托普卡帕皇宫。在大教堂外面，吉勒斯不慎滑倒，掉进了沟渠中，意外发现了其中的7根神秘的石柱。有人告诉他，那是拜占廷皇帝的大皇宫的残迹，但他坚信，它们应该是城市中心奥古斯都广场周围的柱廊遗迹。他到街道的地下继续探索。他乘着一只小船，穿梭于地下蓄水池中昏暗的柱廊之间，拱形的屋顶在闪烁的火把中忽隐忽现。他爬到用于标记大竞技场最东端的柱廊上，拜占廷人曾经聚集于大竞技场观看战车比赛。借助于有利地形，他甚至可以看到海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跳跃、戏水。

他发现，发掘拜占廷的过去并非易事。他对古代遗迹抱有太大的热忱，以至引起了当地人的怀疑。城中居住的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一样，也对他怀有敌意。吉勒斯沉迷于测量估算之中，结果被当作间谍告发到当权者处。按照习俗，如果有人受到此种不怀善意的盯梢，摆脱他人恶意的唯一方法是给每个人都送一些酒。参观防御君士坦丁堡

西侧的陆墙十分容易实现，因此吉勒斯可以用步子测量出内外防御工事之间的距离。想要参观圣索非亚大教堂则相当困难，因为它此时是圣索非亚清真寺，并不欢迎非穆斯林游客。吉勒斯混在人群之中，从而得偿所愿，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观察了教堂内部高耸的穹顶。为了精准地测量，他只得收买一个土耳其人为他效劳。

吉勒斯对这些古迹极为痴迷，但他仍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过是君士坦丁堡过往辉煌中的一抹余晖。在他阅读的大量文献中提到的许多教堂、修道院和皇宫，此时都已经烟消云散。他知道，在靠近陆墙的布拉赫奈曾经存在第二个皇宫，但他无法准确定位。他试图寻找仅次于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圣使徒教堂，但无法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哪怕是地基。他亲眼看到一座古代丰碑被拆卸。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外，他偶然看到从一堆废弃物中伸出一截巨大的黄铜腿。他想去测量，但不敢，因为他害怕引起注意。不过不用测量，他也能目测出这条腿比他还要高。他看似无意地多看了几眼这堆废弃物，发现了一个大约20厘米长的鼻子，以及一匹马的腿和蹄子。根据读过的文献，吉勒斯已经准确判断出这是什么文物。他是最后一批亲眼看到这件伟大作品的人之一。这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的骑马雕像，它曾经矗立在君士坦丁堡中央广场上的一根高耸石柱上达上千年。皇帝骑坐在腾跃而起的骏马上，右手狂妄地抬起，指向他的敌人，左手则抓着宝球。但此时，他的雕像被堆放在地上，等待着最后的销毁：工匠们已经开始将这些碎片送至铸造厂，准备将其铸造成大炮。吉勒斯总结道，土耳其人一直都仇视雕像，甚至是所有建筑设计和装饰。考虑到这些宏伟建筑背后的含义，此等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全身心地关注着古代遗迹及其规模，对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及其民众并不热心。当他离开时，他发誓再也不会回来。

几年后，吉勒斯在罗马生活，并将自己的经历写入《君士坦丁堡古物》（*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一书。这本书在其死后于1561年正式出版。拜占廷帝国曾是如此强大、如此繁盛，却失去了如此多的实物遗存，由此，吉勒斯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拜占廷君士坦丁堡曾经强盛的基督徒统治者是如何失去一切，最终为“异教徒”所奴役的？他总结道，这只是那个世界特定地区的气候所造成的性格问题：

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君士坦丁堡看似由政府建成，但它的民众既没有受教的行为礼仪，也没有严格的纪律准则。他们的富裕导致他们懒散懈怠……并且在面对从四面八方将其包围的蛮族时，完全没有抵抗力。

吉勒斯显然不是第一个将拜占廷的灭亡归因于懒惰和道德放纵的人，当然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大约两个世纪后，爱德华·吉本再次涉猎这一主题。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他强调了“希腊人”的“懦弱和内耗”，和许多人一样，他更愿意称拜占廷人为“希腊人”。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观点认为，拜占廷人存在某些缺失，导致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当需要装备军团去击败无数的敌人时，他们却忽视政治和经济现实，转而重视礼拜仪式、尚古情怀、教义争端和教堂装饰。正因如此，在现代人看来，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学校课堂中，拜占廷帝国却被极大地忽视了。

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又表明拜占廷帝国不应该如此轻易就解体了：如果拜占廷民众真的是如此懒散、凄惨以致无力抵御外敌，那么为何他们的社会能够延续如此长久？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些转瞬即逝的强权势力，比如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匈奴人阿提拉（Attila the Hun），他们依靠强大的军事征服建立了强大的王

国，但随着缔造者去世，王国分崩离析。拜占廷帝国以330年君士坦丁堡的落成为起点，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为终点，其历史长达1000多年。考虑到拜占廷帝国多次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幸免于难，这一纪录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类不断迁徙，逃离压迫或者躲避自然灾害，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或者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去征服、掠夺。有些时候，这种迁徙会在某种程度上减缓。公元前31—公元180年，罗马帝国正是受益于这样的形势，才得以保全宽广的边界，从未在多处同时受到侵犯。拜占廷帝国在很多方面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却没有如此幸运。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处于亚洲诸平原、阿拉伯半岛上各部族向西迁徙的冲击末端。

正是这一因素决定了拜占廷帝国的发展脉络和命运。它独特的社会和精神正是为了应对边境地区巨大而频繁的压力而形成的。在面对外敌侵犯时，单纯的军事威力不足以完全应对。拜占廷帝国在战场上击败了一方，可能又会出现几个新的入侵者。于是帝国内出现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寻求消除威胁的方法，如整合定居、贿赂收买，其中最非凡的方式是：建立视觉上的巨大冲击来震慑敌人，进而将他们变成朋友和盟邦。拜占廷帝国经常遭遇灾难，却依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幸存下来并实现复兴。如果拜占廷文明中的这些层面没有得到完全的呈现，那么拜占廷人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也难辞其咎。在他们的文献、艺术和礼仪中，他们成功缔造了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他们把展现出来的社会定位为对过去的绝对的延续。正因如此，直到帝国灭亡，他们依然坚持将自己描述为“罗马人”，似乎从古代起一切都未曾变化。但在现实中，面对无穷无尽的威胁，拜占廷在不断地进化和适应。基于此，现代人很容易接纳拜占廷人自己所呈现出来的情景，而忽略了拜占廷社会的准确本质。所以，吉勒斯、吉本以及其他所有探寻拜占廷消亡原因的人都问错了问题。真正的问题并非它为何走向灭亡，而是它在面对压倒性的外部势力时，为何总是能够幸存下来，甚至一度更加繁盛壮大。

1. 当时称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是后来德国学者的创造。——审校者注

第一章 上帝的曙光

我曾经描绘过野蛮与宗教的胜利。

——爱德华·吉本，1776年

在16世纪40年代，拜占廷帝国灭亡的100年之后，君士坦丁堡城中那些破碎的纪念碑并非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历史遗迹。在整个西欧，国王、君主和枢机主教的图书馆中都充斥着希腊文版本的宗教和古典典籍的手抄稿，它们由拜占廷抄写员仔细抄就。随着帝国的消亡，土耳其人认为这些留存下来的书籍没有什么用处，高高兴兴地将其出售给了像皮埃尔·吉勒斯这样的公使。他们把这些书籍带回了祖国。其余书籍则由难民带出了土耳其。这些古抄本几乎包含了从福音书和赞美诗到古希腊哲学家珍贵著作的所有内容，而几个世纪以来，西欧对其一无所知。注

其中一本手抄稿《希腊文献156号》，现在依然保存于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梵蒂冈保存着数百本拜占廷手抄稿，但是这一本与众不同。它的新主人是一位神职人员，不希望这本书被公之于众。直到19世纪中叶，所有人都被严令禁止去接近这本书。不知何时，当中有几页还被刻意而仔细地剪掉，上面的内容永远地遗失了。然而作为颠覆和反对当权者的呼声，这本著作能够留存下来已经非常令人惊奇了。这本《希腊文献156号》的日期可追溯至10世纪，它实际上是一本用希腊语写的关于5世纪希腊历史记载的抄本。其作者名为佐西姆斯，是一位不知名的官员，关于其生平我们一无所知，但他是罗马帝国向拜占廷帝国转变的一位重要见证人。

佐西姆斯是失势一方的见证人。他描述了410年之前的帝国历史，但他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讲述的是帝国衰落和分崩离析的故事，而这一帝国已今非昔比。在他写作之时，帝国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西部行省脱离了皇帝的控制，由被佐西姆斯和他的同胞蔑称为“蛮族”的日耳曼部落所瓜分。北非由汪达尔人所统治，西班牙落入西哥特人之手，高卢被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占领，不列颠被盎格鲁人、萨克森人和朱特人控制。即使是意大利和帝国旧都罗马城也脱离了帝国，被东哥特国王掌控。取而代之的东部城市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其余行省（巴尔干、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首都。帝国形势为何会发展到这一步？佐西姆斯对此有着自己的笃定见解。他宣称，一个国家触怒了众神，其国事必然衰落，因为帝国抛弃了曾经在伟大时期带给罗马繁荣与胜利的奥林匹亚诸神，而转向了时髦的基督教信仰。

佐西姆斯毫不犹豫地指出谁应对背弃传统信仰与帝国随之而来的衰落负责：他的记载直指306—337年在位的皇帝为“帝国当前毁灭的根源与开端”。他的名字就是君士坦丁——一个突然发迹的人。的确，其父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曾经做过皇帝，但佐西姆斯不无讽刺地说道，君士坦丁本人是一个私生子，是其父与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一夜情的产物。这个孩子不知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皇宫，逐渐骗取了其父的宠爱，这种宠爱甚至超越了其父对自己婚生子嗣的宠爱。在那些时日里，罗马帝国的疆域从东南的叙利亚一直延伸至西北的不列颠，当君士坦提乌斯出兵保卫帝国的北部边界时，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也跟随其后。[注]君士坦提乌斯最远到达了约克郡，却于306年死在了那里。其麾下的士兵迅速宣布年轻的君士坦丁——一个娼妓之子，如佐西姆斯所称——成为下任皇帝。虽然一切进展顺利，但在帝国内部仍有众多觊觎这一最高权力的人，所以不久之后，君士坦丁便陷入与竞争对手接连不断的战争之中。312年，他在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桥战胜了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成为罗马和西部行省的主

人；324年，他废黜了先前的同盟者李锡尼（Licinius）。佐西姆斯充满遗憾地记载道，最终，整个罗马帝国都落入了君士坦丁一人手中。

佐西姆斯继续叙述道，年过五旬的君士坦丁，身为世上权力最高之人，再无必要隐藏自己“邪恶的天性”。佐西姆斯声称，当他开始怀疑自己年轻的妻子福斯塔（Fausta）与其前妻之子克里斯珀斯（Crispus）有染时，他性格中的这一面便逐渐显现。克里斯珀斯被立即处死。君士坦丁为福斯塔设计了一个更为悲惨的结局：他命人将浴室的温度升到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然后将福斯塔关在里面直到她窒息而死。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君士坦丁突然开始体会到内疚带来的痛苦。在战场上杀敌是一回事，结束自己妻儿的性命则是另一回事。也许他害怕诸神会向他降下可怕的惩罚，正如神话中诸神曾经对坦塔罗斯（Tantalus）所施加的惩罚一样，坦塔罗斯正是谋害了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Pelops）之人：那个无情的父亲被判永世站在齐颈的水中，遭受着极度口渴的痛苦，一旦他低头想要喝水，那清凉的水就会立刻退去。君士坦丁极度希望避免这样的命运，便向祭司和贤人请教，但他们给他的是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的裁决：如此骇人的罪行永远无法得到宽恕。

这时恰好有一位埃及基督徒出现在罗马。在4世纪早期，基督徒在帝国还是绝对的少数派，教会只在一些大城市中拥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对这一不断壮大的信众队伍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在303年发布敕令，命令拆除教堂，毁掉《圣经》手抄本。帝国高官中的基督徒也被降职，并被迫以死向诸神献祭。尽管这一敕令并未得到全面执行，还是有大量基督徒为信仰而死，不过总的来说，教会仍然保存了下来，甚至一些皇室成员也仍是基督徒。正是与皇室中这些基督徒的相识使这位埃及的造访者获准觐见君士坦丁，他向皇帝保证，基督徒的上帝即使对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也会加以宽恕。据佐西姆斯所述，君士坦丁中了这一圈套。他改变了戴克里先制定的政策，结束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开始公开支

持基督教会而忽略了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佐西姆斯对君士坦丁的不虔敬和其对祖先信仰的背弃感到惊骇。

事情还不止这些：佐西姆斯对君士坦丁提出了第二项指控，即对耗尽了帝国的人力和财力建造一个全新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城市，君士坦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佐西姆斯所述，皇帝信仰的转变并未使其得到罗马居民的拥戴，尤其是当他试图禁止在卡匹托尔山（古罗马七丘之一）上举行传统的祭祀仪式时，于是他决定向东迁都并将驻地搬迁到那里。最初他选择在位于小亚细亚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特洛伊城附近建造一座新城，但在几年之后改变了想法而继续选址。最终，他选定了拜占廷古城。为使这座城市与他的身份相匹配，他决定彻底重建，并在此复制罗马城中所能找到的所有宏伟建筑与纪念碑：一座元老院、一个被称作奥古斯都的中心广场、一个战车竞技场、一座宏伟的皇家驻地——大皇宫。同时，他将建造许多教堂，包括一座献给神明的上帝的主教教堂——圣索非亚大教堂，不过君士坦丁做了两手准备，确保城中保留着传统信仰的神庙。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新都城被重新定名为君士坦丁堡或君士坦丁之城。佐西姆斯极其反对整个计划，并对为支撑这一计划而向帝国其他行省收税和勒索巨量资金的行为充满了愤恨。他说，君士坦丁堡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帝国各地渴望获得皇室庇护的定居者。城中居民的数量不断激增，各条街巷也变得极度拥挤。建筑用地变得如此稀缺以至城墙之外的郊区不断涌现，建筑桩基深入海中以支撑用来建造更多房屋的平台。在佐西姆斯的眼中，这座城市早晚有一天会爆裂，成为向外喷血的肿胀的溃疡，它是一座由君士坦丁的虚荣与奢侈堆砌而成的纪念碑。

除了背弃对传统诸神的信仰和建造一座完全无用的城市之外，佐西姆斯又发起了对君士坦丁的第三项指控。尽管君士坦丁在消除帝国内部对手方面效率颇高，但在与聚集于帝国边界的蛮族打交道时就不那么成功了。佐西姆斯声称，当遭遇入侵罗马境内的大约500个蛮族骑兵时，君士坦丁只是火速地逃窜了。持有虔诚的传统信仰的戴克里先

通过在边境沿线要塞驻扎士兵确保边境的防卫，而君士坦丁则决定将军队一分为四，驻扎在城中。这样做不仅使边境不设防，而且削弱了帝国的尚武精神，让军队变得慵懒和自我放纵。在佐西姆斯看来，基督教信仰加速了这一进程，削弱了曾经以提升世人的纯洁与克己为新理想而使罗马变得伟大的美德。即使帝国边境在君士坦丁统治结束之后100年才被攻破，佐西姆斯还是因帝国的衰落和西部省份的丢失对其进行强烈的谴责。“当我们的灵魂富饶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他总结说，“当灵魂的贫瘠占据主导之时，我们就会陷入当前的困境。”

佐西姆斯对于君士坦丁与帝国衰落的深刻成见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不足为奇的是，基督徒对于这位拯救基督教会于迫害之中，并将基督教纳入帝国官方宗教的人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当中最先向君士坦丁表达感激之情的是欧西比乌斯（Eusebius），一名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主教。作为君士坦丁的同代人，他亲身经历了戴克里先的恐怖迫害。然而，迫害一结束，他便匆忙在以奉承口吻写就的《君士坦丁传记》中歌颂新的政体。皇帝的身世被小心地避过，他的叙述开始于已进入皇宫的年轻的君士坦丁。欧西比乌斯声称，正直的精神使君士坦丁具备了周围多神教教徒所不具备的美德。的确，他优良的品性与漂亮的外表在宫中激起了嫉妒，以至被迫逃到不列颠去追随他的父亲。于是上帝安排君士坦丁在其父临终时在场，自然他就被推选为继任者。当需要为他从政敌手中攫取权力而申辩时，上帝同样惠顾了他。312年，当他在罗马郊外安营扎寨准备发动与马克森提乌斯的战争时，据称，君士坦丁看到了一个刻着“以此克敌”字样的与太阳重叠的十字架幻象。欧西比乌斯写道，那天晚上，基督本人向君士坦丁显灵，命令他制作一件他在天空中所看到的影像的复制品，并将其置于军队的前方，作为自己的标志。正是这一标志带领着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并自此促使他支持基督教会，颁布敕令结束对基督徒的迫害。欧西比乌斯未提及克里斯珀斯与福斯塔之死，也

未提及君士坦丁是出于因杀害他们而产生的内疚才投入了教会的怀抱。

在欧西比乌斯看来，君士坦丁于324年独揽帝国大权的成就使其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来展现自己慷慨与虔诚的本性。他重建拜占廷，使之成为君士坦丁堡，并非浪费钱财与资源，而是出于对基督的热爱。新城市被设计成未受多神教信仰污染的基督教风格——佐西姆斯提及的多神教神庙并未出现在欧西比乌斯的描述中。同时，这位善良的主教还坚称君士坦丁并未忽略帝国边境而造成蛮族的入侵。相反，他使蛮族归顺了罗马的统治，而非罗马人向蛮族进贡，是蛮族谦卑地把礼物置于君士坦丁的脚下。君士坦丁不是帝国的毁灭者，而是帝国的救星。

很明显，君士坦丁属于那类在其臣民中要么激起热爱，要么引起愤恨的领袖。更客观地说，君士坦丁的统治既非十足的灾难，也非一段黄金时期的开始，更多的是一个帝国适应周围新的、更加危险的世界而进行转型的过程。正是在君士坦丁时期，拜占廷文明的典型特点开始显现：一座宏伟的坚不可摧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信仰、强调皇权但又对其加以约束的政治理论、对禁欲修行精神的崇拜、强调宗教的视觉表现、在单纯的军事行动之外寻找应对边境威胁的其他方法。

在某些方面，佐西姆斯有理由对新的、快速膨胀的君士坦丁堡发出自己的抱怨。在500年左右，这里已经严重拥挤，城市变得危险而动荡。只需一个小小的借口，暴乱就有可能在街巷中爆发。在5世纪早期，城中的大主教“金口”约翰[注]（John Chrysostom）变得大受欢迎，其激情四溢的布道总是吸引着大批信众。不幸的是，他未获得阿卡狄乌斯（Arcadius，395—408年在位）的妻子、皇后欧多西亚（Eudoxia）的喜爱。“金口”约翰曾批评她随意攫取君士坦丁堡的财产而不顾及财产主人的权利，并在布道中匿名谴责了这名位高权重但

诡计多端的女性，因而严重冒犯了她。404年6月，“金口”约翰被流放，他的支持者做出了报复行为，在确定无人主持“金口”约翰的主教职位后，他的大批支持者冲进了圣索非亚大教堂并将其点燃。到了第二天早晨，教堂只剩下一堆冒着余烟的灰烬。

在拜占廷帝国初期的君士坦丁堡，激起民众热情的并不限于宗教事务。竞技场中举行的战车比赛吸引着蓝党和绿党两派大批的支持者。得胜的驾车手深受欢迎：为了向其表达敬意，人们创作了各种诗歌；这些驾车手在公共场所的雕像与皇帝的雕像一样宏伟。敌对的支持者之间常常爆发冲突，但真正使帝国当局恐慌的是蓝党和绿党的合作。498年，几个绿党的支持者因投掷石块而被捕。他们的同伴举行集会，要求年迈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491—518年在位）释放被捕者，但遭到了断然拒绝，并且被派来的军队驱散。这在当时挤满观众的竞技场中激起了巨大的暴动。民众开始向宫廷包厢内投掷石头，而皇帝当时正坐在其中主持比赛。一个黑人所投的一块大石头险些砸中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的贴身护卫冲向这位作恶者，用剑将其砍碎。此时，竞技场的出口已经被封，民众不得不纵火将大门点燃，以致竞技场及其周围的建筑遭到了极大破坏。最终，在几个主犯遭到逮捕和惩罚之后，秩序得到了恢复，但这是一个教训，从中可见一个拥挤的城市可能随时会转变为战场。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脆弱，佐西姆斯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在其他方面，他未能认识到这座新城市的价值。事情并不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出现并不仅仅源于君士坦丁逃离罗马的需要与其自身异常的虚荣心。当时，在此地建造一座新城有充分的理由：皇帝已有多年未在罗马驻留——这一旧都距离受威胁的边境过于遥远，因而需要寻找新的前沿驻地。在帝国的西部，最熟悉的是米兰和特里尔，而在东部，安条克与尼科米底亚则符合这一需求。君士坦丁试图寻找地方建造自己的另一驻地，但他想要一处与永存的帝国相匹配的城址，所以，在他选定了拜占廷后，便不遗余力地以罗马的宏

伟建筑来装饰这座城市，以使人们看到它就能够回忆起罗马。君士坦丁并非随意地选中了拜占廷，尽管佐西姆斯提到他最初更倾向于特洛伊城，但他还有自己战略上的考虑。君士坦丁堡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的绝佳位置，位于多瑙河与美索不达米亚边界之间的地带，鉴于边境的压力，它比罗马的地理位置更为实用。此外，即使是佐西姆斯也不得不承认，它所在的岬角位于大海与世界上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之一——金角湾之间，狭窄而又易守，可以作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君士坦丁通过在这座城市的陆地一面建造防卫城墙而使其更加坚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一套新的防御工事——狄奥多西城墙，或称陆墙——被建造而成，把更多的土地圈进城中。由石灰岩石块建造的城墙厚达4.5米，有效地保证了君士坦丁堡陆地一面的安全。在海角向海的一面也建造了单层的城墙，有效地保护了城市免于海上敌对舰船的攻击。如果说这一驻地仍有缺陷，那就是淡水供给的匮乏，但这可通过建造饮水渠和蓄水池进行弥补。佐西姆斯永远无法知晓的是，当困境来临，帝国被包围时，君士坦丁堡将成为最伟大的要塞，一次又一次幸免于围城与封锁。即便是最耀眼的建筑与开阔的广场也被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它们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陈列橱窗，通过帝国的财富与权力给造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以此宣称其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尽管打造君士坦丁堡意义重大，但基督教信仰的普及无疑成为拜占廷帝国区别于古罗马世界的最显著因素。在古罗马时代，众多的地方神灵与祭祀活动和官方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并存。在拜占廷，只有一个信仰，而只有接受这一信仰，一个人才能成为帝国皇帝忠实的臣民。不论欧西比乌斯与其他基督教作家想要暗示什么，这一变化并非一夜而成。虽然君士坦丁个人的皈依并未立即促使整个帝国信仰的转变，但开启了一个渐进的基督教化过程。312年，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获胜之后，凯旋罗马，建造了一座拱形建筑以庆祝自己的胜利，但是除了一个模糊的表述，说胜利是“在神的启示下”获得的之外，

没有任何专门对基督教的提及。313年，他发布宽容敕令，结束对基督教的迫害。后来，在其统治期间，又将星期日定为公共假日，并与基督教主教保持着友好的书信往来，还开始用公共财政补贴基督教会。不过，皇帝也未正式宣布对旧有诸神的崇拜为非法，他们的庙宇和神殿一如既往地开放。即便是在337年君士坦丁离世之后，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将基督教强加于所有帝国臣民。其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337—361年在位）的确下令关掉了一些神庙，但他的许多措施又被下一任皇帝——多神教者朱利安（the pagan Julian，361—363年在位）取消了。朱利安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试图恢复对诸神的信仰，但在其意外死亡之后，所有的皇帝都成了基督徒。即使在那时，他们也行事谨慎，对所有信仰都抱以宽容的态度。

直到4世纪末，推出积极持久的反多神教措施才变得安全起来。随着皇帝与宫廷都接受了基督教，皈依的速度不可避免地加快了，基督徒在很多城市都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基督教经过黑暗甚至偶有残忍的历程成为国教，始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登基之时。起初，多神教神庙被一个个拆除，到了391年，狄奥多西一世觉得时机成熟，便颁布法令，宣布作为多神教崇拜重要组成部分的献祭活动完全非法。

这一法令在现实生活中被如何解读取决于各地的情况。在很多地方，既然基督徒已占人口多数，多神教祭祀的消亡也就没有引起混乱。君士坦丁堡的情形的确是这样，但在当时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情况则完全不同。4世纪的亚历山大港拥有大约30万人口，属于多神教教徒、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将近400个。其中基督教团体增长迅速，声称福音传教士圣马可（St Mark）为其教会创始人。他们的大教长被看作基督教等级制度中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仅次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位列第三，是以“大教长”自居的5个职位之一。此外，亚历山大港还拥有一个充满生机、昌言无忌的多神教团体，而且，作为古典学术的中心，它以拥有

重要性仅次于雅典学院的哲学院和一个藏有49万卷希腊古典文学纸草书卷的图书馆而著称。城中有众多宏伟的庙宇。提差昂神庙献给幸运女神，恺撒里乌姆神庙是为祭祀去世已久的皇帝而造。其中最为宏伟的是塞拉皮雍神庙，它巨大的柱廊大厅中有一座塞拉皮斯神（Serapis，古埃及地狱之神）的雕像。

这两个团体之间迟早会爆发冲突，而导火索通常是基督徒企图将神庙改为教堂。361年，亚历山大港大教长乔治决定将一座被弃的密特拉斯（Mithras，古波斯光神）神庙拆除，改作基督教教堂。在拆除工作中，发掘出了一些遗骸，当一群基督徒不恭地将其示众时，一场骚乱爆发了。多神教教徒捣毁了基督教大教堂，把不幸的乔治从里面拖出殴打至死。当然，最终获胜的是基督徒，仰仗帝国官方的支持，他们几乎不可能失败。391年，另一大教长狄奥菲鲁斯向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申请拆除城中的多神教神庙。皇帝欣然准许，狄奥菲鲁斯便带领一队支持者开始了工作。听闻此消息后，一大群多神教教徒携带武器袭击了基督徒。在多神教教徒冲进塞拉皮雍神庙并把他们自己关在里面之前，巷战持续了很久。直到帝国宣布只要暴乱的参与者立即撤出塞拉皮雍神庙就会得到特赦，对峙才逐渐缓和。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一条件，于是基督教暴徒蜂拥而入。其时，拆除工作已经结束，著名的建筑被彻底捣毁，圆柱被放倒，高耸的塞拉皮斯雕像被粉碎。这座宏伟的建筑几乎未留下丝毫遗迹。

巴勒斯坦加沙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这座繁荣城市的主要地标是一座巨大的圆形神庙玛纳昂，是祭祀地位相当于希腊神祇宙斯（Zeus）的当地农业之神玛纳斯（Marnas）的中心。神庙中由昂贵的大理石铺成的石板路面看上去庄严神圣，人们被禁止在其上踩踏。与其他地方相比，多神教信仰在此似乎更为安全，因为在这座拥有2万人口的城中，基督徒只占了一小部分。395年，一位意志坚定的修道士波菲利被加沙的基督徒选为主教，但他遭到了当地多神教教徒的冷遇。他们用长满荆棘的灌木堵在通往加沙的道路上以阻碍他的行程，直到深夜，

他才最终得以进城。基督徒常常在街巷中受到攻击和暴打。波菲利被这些挑衅激怒，向帝国当局抱怨此事，并得到裁决可将加沙的庙宇全部关闭。但加沙当地官员无疑也害怕惹事，所以未执行命令，于是玛纳昂神庙继续开放。对此，波菲利所能做的就只剩一件事：前往君士坦丁堡向皇帝本人请愿。

到了皇宫后，这位主教及其随从人员发现觐见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即现任皇帝阿卡狄乌斯十分困难。不过，他们还是设法见到了同情他们的皇后欧多西亚，皇后允诺将说服她的丈夫同意拆除玛纳昂神庙。然而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阿卡狄乌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当欧多西亚把他逼入困境时，他便抗议说自己从加沙富裕的多神教教徒那里得到了可观的税收收入，所以无意与他们为敌。波菲利没有气馁。他等了几周，直到皇后生了皇子。洗礼日当天，在皇后的默许之下，他设法带着请愿书站到了大教堂门外，将其交给怀抱皇子的一位仆从。这样，当皇宫聚会开始时，皇帝肯定会收到这一请愿书。皇帝知道自己遭到了算计，但仍然软弱地妥协了。就在第二天，波菲利收到了皇家的书面命令，带着一位负责此事的官员基奈尤斯出发返回加沙。

402年5月，刚到加沙，基奈尤斯就集结了一队士兵向玛纳昂神庙进发。多神教教徒不愿轻易妥协，他们在神庙沉重的大门内设障，于是士兵和当地的基督徒转身去袭击其他未设防的庙宇，施以劫掠、焚烧。10天之后，他们再次共商夺取玛纳昂神庙这一“大奖”的最佳办法。计划确定后，他们便向这座神庙进发，在神庙的大门上涂了沥青、硫黄和猪油。在这些易燃混合物被点燃之后，大门便燃起熊熊火焰，大火迅速蔓延至整个建筑。日暮之时，玛纳昂神庙只剩下一堆灰烬。当灰烬与激情都平息下来时，波菲利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将用皇后欧多西亚提供的资金在这里建造一座基督教教堂。新建教堂将与旧的神庙拥有完全不同的外形与设计，所以神庙旧址必须被完全清除。5年之后，新教堂落成。根据波菲利的命令，在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大理

石石板被铺到集市上，以供所有人和畜生（包括猪、狗等）行走踩踏。然而，即使经过一代人之后，许多多神教教徒仍绕开这个市场以免将其玷污。

这些戏剧性的情节标志着在拜占廷公开表达多神教信仰的终结。423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认为多神教复兴的可能已变得如此遥远，所以可以宽容一些，便颁布法令，声称只要多神教教徒不再公开献祭，就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撇开这一和解的姿态不谈，基督教化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仍充满了政治迫害。到了5世纪初，多神教教徒成了被围困的少数群体，常成为被野蛮迫害的受害者。415年，亚历山大港发生了令人无比震惊的事件。哲学院中有一位名叫希帕蒂娅（Hypatia）的女教师，被基督教和多神教学生推崇为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希帕蒂娅本人未皈依基督教，加之她拒绝像当时的传统女性一样压抑自我，所以遭到了亚历山大港教会中一些成员的憎恨。一天，当希帕蒂娅坐着马车穿过亚历山大港的街道时，遭到了一群基督徒的袭击。他们把她拖到一座教堂里，在祭坛旁脱光了她的衣服，将她活活打死。这虽是一个孤例，多数基督徒同多神教教徒一样对此感到惊骇，然而该事件揭示了基督教化过程中异常丑陋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佐西姆斯作品中的仇恨情绪，以及其对博学正直的哲学家因信仰而遭遇迫害的控诉。

宗教改革中受害的不只是多神教教徒，支持非官方信仰的基督徒也遭到了攻击。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并未意识到教会会因一系列议题而分裂。其中最严肃的问题是：耶稣到底是谁？他与上帝是什么关系？争议出现于向来易怒的亚历山大港，并不断升级。一位名叫阿里乌的教士曾宣扬耶稣为上帝所造，其地位仅次于上帝；其他基督徒则认为基督的神性与圣父等同。325年，为了结束争议，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基督教全体会议。大约有300名参会主教签署了信条，否定了阿里乌的神学观点，认为耶稣与上帝同质。

然而争议并未结束。阿里乌及其支持者继续宣扬其神学观点，君士坦丁在其统治后期也开始对他们抱以同情。君士坦丁死后，继任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及其之后的几位皇帝更倾向于阿里乌派。这意味着那些支持“尼西亚信经”的人成了持异端邪说者并遭受迫害。他们的领袖是率直的亚历山大港大教长阿塔纳修斯，他曾三次被流放到帝国寒冷偏远的地区。4世纪末，风向又转向了另一端。坚决反对多神教信仰的狄奥多西一世也曾是“尼西亚信经”的忠实信徒。380年2月，他颁布法律宣布以后所有基督徒都应追随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确定的信仰，如此才能成为普世教会的成员。几个月之后，他将这一敕令付诸实施，废黜所有阿里乌派主教，取而代之的是“尼西亚信经”的支持者。次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以强化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的神学决议。“阿里乌派渎神行为的毒药”被宣布为非法，这两次会议所确立的信仰在451年的查尔西顿会议上被再次强化，此后一直是拜占廷帝国存续期间的官方信条。悲哀降临于所有异端信仰者身上，从此，所有与阿里乌派一样认为基督的神性次于上帝的人都被判定为异端邪说者。

与多神教教徒和对基督教持异端者一道的还有犹太人，他们是另一个难以适应这一新的、包罗万象的正统信仰的群体。犹太人的身份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70年和135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叛乱遭到镇压之后，他们就开始持续大规模地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迁出，以至到了佐西姆斯时期，帝国各地，尤其是在埃及和叙利亚，出现了庞大而繁荣的犹太人社区。这些犹太人通常能与他们的邻居和睦相处，但是随着基督教成为多数人的信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地教士开始注意到许多新基督徒对其信仰与犹太教的区别并不十分了解，乐于同时参与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活动。他们开始布道，指出如何通过确认基督的神性来区分基督教和犹太教。其中最著名的布道者是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金口”约翰。386—387年，他在安条克传布的关于这一问题的8个系列训诫获得了雷鸣般的掌

声。为了哗众取宠，“金口”约翰还强调正是犹太人造成了基督的死亡，所以他们没有“赎罪、豁免和辩解的机会”。

散布这些观点有时会导致群众中的紧张气氛，使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不时发生类似于基督徒和多神教教徒之间的冲突。490年左右，安条克的一群基督徒暴民烧毁了一座犹太会堂，并在其墓地中挖出了几具尸体。413年，在亚历山大港，事态演变为大型冲突，当时，城中被基督徒激怒的犹太人决定一致响应。有消息称，犹太人要在手上戴上粗糙的棕榈树皮戒指以便在黑暗中相互辨认。一天夜晚，他们穿过街道，叫喊着有个基督教教堂着火了。当基督徒从四面跑来灭火时，被犹太人残忍地伏击了。第二天清晨，在屠杀景象大白于天下后，亚历山大港大教长便带领其信众穿过街巷摧毁了犹太人的房屋和会堂。几天后，亚历山大港所有犹太人社区都被迫迁移，犹太人的大部分财产也被基督徒掠夺。

基督教帝国官方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很矛盾。亚历山大港总督对犹太人被驱逐震怒不已，无疑，失去城中如此众多而富有的人口必然会严重减少他的税收。自425年起，皇帝出台了专门保护犹太人的法律，以防止他们的房屋和会堂遭受攻击。然而，即使在社会上层，教条主义也开始渗透。犹太人被禁止担任帝国官方职务。388年，狄奥多西一世还立法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531年，官方宣布，犹太人今后不能在法庭上针对基督徒出庭做证。虽然犹太人社区最终在拜占廷得以幸存，但是任何非官方信徒或多或少都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

在早期拜占廷社会，拥有不同的信仰并非被边缘化的唯一原因。基督教信仰提倡独身，并将性行为严格限制在一夫一妻的男女关系当中。那些性倾向逾界的人则会处于危险之中。在古罗马帝国，同性性行为并不违法，尽管大众普遍认为罗马公民在这种性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是不体面的，但即使是皇帝也公开拥有男性情人。随着基督教日益成为帝国的官方信仰，当局就原本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开始立法。

正如处理多神教信仰一样，皇帝的行事谨慎而缓慢。342年，皇帝颁布了一项措辞模糊的法令，禁止男性之间通婚，但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将近50年之后，才颁布另一部法律禁止同性卖淫行为。533年，立法明确禁止男性之间的性行为，许多公众人物遭到检举、折磨或流放。奇怪的是，他们全都是基督教主教。此后，一位当时的编年史学家写道："那些对同性怀有欲望的人生活在惊恐之中。"

到目前为止，罗马帝国向拜占廷帝国的转变看似一幅令人压抑的景象，政府和立法机构都将对异端的排斥奉为神圣。在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看来，这些变化足以令人产生不快。但对生活在1945年之后的人而言，对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和同性恋遭受的迫害有着恐怖而熟悉的回忆，尽管这一对比似乎并不合适。20世纪30年代上台的德意志政权宣称会持续1000年，却只维持了12年。相反，拜占廷帝国却获得了成功，因为在拜占廷宗教与文化的狭隘之外，还有其他方面保留着人们的想象力，激发着人民的忠诚，吸引着外来者的敬畏与崇拜——这些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会在以后得到证实。以下4个方面足以说明这一切的缘由。首先，基督教为拜占廷引入了一个观念，即政教合一的统治利于保持政权的稳定。其次，拜占廷统治者的地位需要臣民的拥护，其与臣民保持着惊人的密切关系。再次，它提供了能够满足臣民大多数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提升出一种能够俘获他们心灵与意志的精神气质。最后，它发展出一种新的艺术与建筑风格，以求通过视觉形式来表达精神与宗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审视一下统治者的地位。拜占廷政治理论深受235—284年罗马帝国危机的影响，当时一系列军事灾难导致政治动乱。皇帝似乎无力保卫边境，各个行省出现了无休止的反叛与篡位。统治者毫无规律地更迭，大多数帝国的在任者仅仅统治了几个月。一些皇帝为了提升皇权的威望，将自己与神灵联系在一起。过去，只有已故的皇帝

才被封为神祇，但在3世纪70年代，统治罗马的奥勒利安（Aurelian）声称其生来就是“主与神”。戴克里先则较为谦逊，声称自己为众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在人间的代表，但其意图与奥勒利安一样：打消那些认为仅仅凭军事力量就能篡夺皇位的念头。

现在，尽管皇帝皈依基督教后摈弃了自诩为神的理念，但政教合一的趋势依然在继续。《君士坦丁传记》的作者欧西比乌斯的作品中充满了溢美之词，与佐西姆斯的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凯撒里亚主教，欧西比乌斯对君权神授这一基督教观念的产生负有责任。336年，作为君士坦丁登基3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欧西比乌斯当着皇帝的面用一场谄媚的演讲表达了这一观点。令人吃惊的是，他完全乐于承认罗马皇帝的职位即便被多神教教徒所占据，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与众不同的。毕竟，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向其信众提议“恺撒之物当归还恺撒，上帝之物当归还上帝”，意即基督徒对罗马皇帝正如对上帝一样负有义务。欧西比乌斯继续争辩道，这也不仅仅是巧合，基督恰好诞生于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31—公元14年在位）统治期间。很明显，上帝从一开始就计划让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并将其变为一个所有基督徒居住的国度。随着君士坦丁的皈依，皇帝成了基督徒，所以当时他的职位甚至比耶稣时期更重要。拜占廷人称他们的皇帝为“巴赛勒斯”（意为军事首长），皇帝被认为是真正的统治者、万能的上帝在尘世统治基督徒臣民的代表。

这种关于帝国官职的新观念将对皇权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多神教时期，尽管皇帝曾担任大祭司，但其并无责任去管辖众多的神庙与祭祀仪式。而作为上帝的基督教代表，当然有义务保证教会受到庇护，并能够繁荣发展。这就意味着需要用国库收入来补贴教会，阻挠并彻底镇压多神教信仰，以及处理其他更多事宜。当关于教义的争议出现之时，皇帝会被卷入其中，君士坦丁在325年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其继任者也主持了之后的宗教大会。皇帝在教义阐述上所起的作用颇有成效，而这原本应该是基督教教士与神学家的工作。因此，在4

世纪，皇位在人们眼中变得越来越神圣。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所提及的都是“神圣的皇帝”，君士坦丁的肖像也被加上了一道光环。

在现代世界，人们普遍认为代议制民主是理想的政府形式，而宗教信仰则是与对国家的忠诚毫无关联的个人问题，因此神权政体也许仅仅是专政与狂妄的外衣。还有什么比将自己置于宗教的光环之中，并谴责其他所有政治对手为异端，从而控制民众更好的办法吗？此外，我们也应该记得这种政治形式产生并适应于一个危险、动荡的世界：拜占廷的边境时刻都处于压力之下。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内部社会的稳定，尽管拜占廷历史中有那么一些时期，皇帝在政变与反政变中频繁更迭，但政府的威望没有减弱。篡位者除非看上去能够安坐于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中发挥自己在众多宗教仪式中的作用，否则不会被接纳。夺取首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叛乱在其首领失败后都不了了之了。

拜占廷帝国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其具有宗教神秘性的政府不断真诚地吸引民众的忠诚，而民众在新皇帝的就职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任者将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能容纳10万人的竞技场的皇宫包厢中，民众会致以欢呼，同意新任者继位。皇帝对于普通臣民而言也非常容易接近。大皇宫中的花园在黎明之后便向公众开放至上午9点，下午3点之后又重新开放。节庆日的游行期间，观众可以向皇帝提出请愿。369年，一位叫作贝蕾妮丝的寡妇就提出了请愿，她申诉说，一位名为罗德诺斯的有权有势的法官诬告而夺取了她的财产。调查之后，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364—375年在位）在竞技场聚集的人群前处死了罗德诺斯，并将其财产全部赠予贝蕾妮丝。也许最重要的是，拜占廷皇帝并非一个权力不受限制而为所欲为的专制君主。赋予其权力的宗教理念同样也对其加以严格限制，教会可以在皇帝逾越界限时对其施以约束。390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带领军队到塞萨洛尼基时遇到了暴乱，因为当地居民拒绝为士兵提供食宿。被激怒的皇帝等待复仇时机：直到民众聚集到当地竞技场观看比赛时，他才命令军队

向人群射箭，几千人被射杀。心满意足之后，狄奥多西一世继续西行，但到米兰后他受到了惩罚。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听闻塞萨洛尼基事件后，拒绝让皇帝进入教堂受领圣餐。僵局持续了几天，直到皇帝表示悔过，颁布法令，给予那些被判处死刑或没收财产的人30天的宽限，以便让他们提供无罪的证据，狄奥多西一世才被准许进入教堂。拜占廷式的神权政治也许不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口味，但对帝国而言行之有效，并在帝国整个漫长的历史中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罗马帝国向拜占廷帝国的转变还在第三个领域造福了它的臣民。基督教会在定义帝国政治理论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多数城市人口公共福利的来源。在罗马帝国处于和平稳定状态的时日里，市政府的职责由库里亚（*curia*，原意为“大氏族”）或元老院中的富裕市民所承担。这些库里亚成员（*curiales*）负责收税，却争相在城市浴室、引水渠等公共建筑与服务上面慷慨解囊。3世纪危机之后，富裕阶层人数锐减，富人便不再愿意为公共利益舍弃自己的钱财。一些人企图搬到乡下的别墅以减轻这一负担，另一些人则通过担任享有豁免权的罗马元老或君士坦丁堡元老以逃避为市政府提供服务。与此同时，人们纷纷从乡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许多人都成为街巷中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帝国当局对此毫无作为，而基督教会除了慈善捐助之外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在大城市中，教会组织了大规模的食物救济，据估算，仅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救济点就有75000多人接受施舍。城市中的教堂不再是独立的建筑物，其周围常常附有提供各种免费服务的建筑设施，包括向穷人提供的旅社，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衣物和食宿，没钱时还会得到免费的医疗救助。380年在安条克针对犹太人发布煽动演讲的“金口”约翰，在398年成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后就在城中建造了几所医院。

君士坦丁堡以东大约611千米的小亚细亚的凯撒里亚，在这方面尤其拥有良好的服务水准。作为一个富裕且忠诚的基督教城市，其居民在4世纪60年代前就毁掉了城中所有多神教庙宇，并于370年选举瓦西里为他们的主教。这位新任者出身于当地一个杰出的家庭，是一位尼西亚信经的信徒，所以与君士坦丁堡中支持阿里乌派的皇帝瓦林斯（Valens，364—378年在位）的关系十分紧张。据称，当皇帝决定流放这位令人讨厌的主教时，签署命令的笔断了三次，所以瓦林斯最终放弃，瓦西里得以保留职位，并实施计划改善其教区居民的生活。在凯撒里亚城外，他建造了一群建筑以满足各种慈善活动的需要，包括一个给穷人的旅社、一个供旅行者居住的旅社、一个麻风病患者的避难所和一所医院。医院配备了医生和护理人员，治疗疾病和各种外伤。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服务对象仅限于基督徒。有记录说，当瓦西里于379年离世时，哀悼的人群中除了同教派的人之外，还有多神教教徒和犹太人。

当然，提供救济院和医院仅仅是基督教慈善活动的一个延伸，基督教主教的活动不仅限于此。随着私人财富的缩减和帝国政府关注焦点的转移，主教们发现他们承担起了各种职责。423年，担任叙利亚希鲁斯城主教的狄奥多莱承担了其整个主教教区公共浴室、桥梁和引水渠的修缮维护工作，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做这些。在亚历山大港，主教教区拥有为城市运送粮食和供给品的船队。这就是教会深入人们全部生活的整个过程。

这些也许会让人认为，基督教会通过施舍来收买人们的依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的信仰所激起的虔诚与热情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但不得不说的是，不仅仅是基督教会及其主教，有时甚至是那些苦行者和圣徒在激发人们的热情。即使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前，许多基督徒就已感到一个人仅信仰基督是不够的，还应在行动上追随基督，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予穷人。这方面的先驱者是一个名叫安东尼的埃及人，在300年左右，他放弃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走进了沙漠。他在尼罗

河东岸庇斯比尔的一个废弃要塞中躲了20年，过着禁欲和沉思的生活。然而，出乎安东尼意料的是他的例子所激起的崇拜。随着他在要塞的生活逐渐被人知晓，一些坚定勇敢的人设法到那里模仿他。之后，追随者越来越多，以至这片沙漠变成了一个小城，安东尼的名声也传遍了整个帝国，连君士坦丁都写信向他请教。由于渴望完全隐居的生活，安东尼便继续向沙漠更深处退避，然而他再也无法完全逃离他的声名。在罕有的一次对亚历山大港的参观中，他发现街道挤满了他的崇拜者，包括基督徒和多神教教徒。

安东尼的追随者们被称为“monarchoi”，意为“那些独居的人”，从这个词中派生出了英语单词“monk”（修道士）。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当中许多人渐渐喜欢上生活在社区或修道院里，但在拜占廷世界中，只有孤独的隐居才被看作最高使命。有些隐居者因其克己的生活方式而著名，享有现代电影明星所拥有的名声。在所有苦行者中最著名的是修道士“高柱”西米恩（Symeon Stylites）。他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在叙利亚照料家族的信徒，由于对宗教怀有强烈的热情而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道士。他在那里待了大约10年，但那并非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在修道院里，由于他在遵守教律方面过于严格，所以并不受欢迎。当他的伙伴们斋戒两天时，西米恩会禁食一个星期。最终，由于他太过苛刻，修道院院长要求他离开。如同沙漠中的安东尼一样，他在叙利亚的乡间游荡了一段时日，直至最终找到一块荒凉的地方，把自己用铁链束于一块岩石之上。然而，很快他就遇到了与安东尼同样的问题：他的神圣盛名吸引着大批群众去追寻他，打扰了他所向往的孤独。他们常常聚集在他的周围，试图触摸他。此外，在埃及的安东尼还可以向沙漠深处退居，而在叙利亚则不可能这样，那里没有埃及那样大片的沙漠。

由于无法逃离，西米恩便向上躲避。大约412年，他在远离安条克的地方找到一根孤立的9英尺[注]高的古代圆柱。它可能来自某个被拆除的多神教神庙。西米恩设法登上柱顶并待在那里，没有任何遮风避

雨的保护。他的众多门徒就在柱底驻扎，通过绳索给他递送食物和饮水。毫无疑问，这种怪异的生活方式必然会造成伤害。由于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站着，其左脚出现了恶性溃疡并渗出脓水，最终整个左脚都烂掉了。腿上也滋生出蛆虫，有时蛆虫会掉落到圆柱底部。西米恩的门徒会虔敬地将它们拾起，再重新置于他的身体之上，以便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如同安东尼一样，西米恩的盛名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群众。圆柱周围的区域成为一块永久的露营地，每天都会出现数以百计的访问者。据说有一次参观者达到了1244人之众。为了防止人群太靠近圆柱，不得不建起了围墙。西米恩在柱顶停留了40多年，最终于459年离世，死时仍然站立，身体僵硬，长满尸斑。后来，人们在圆柱的遗址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教堂，以招待那些不断远道而来的祈祷者。

从现代时空与文化角度来看，这种对于修道士的痴迷正如对拜占廷皇帝半宗教身份的崇拜一样令人感到奇怪。然而，民众认为圣徒提供了一系列的精神与物质的益处。西米恩一类的圣徒由于做了禁欲的斗争，所以比软弱的人类（包括普通的教士）更接近上帝。因此，他们能够成为神恩的通道，发布忠告，通过祈祷求情，最终获得救赎，而这仅仅依靠星期日去教堂是无法达到的。同时，他们还能够带来巨大的好处。许多到圆柱那里的拜访者带着病人去让西米恩治疗，据西米恩传记作者所称，西米恩常常治疗病人。农户则去那里恳求他祈祷好天气，让他们能够获得丰收。人们有时还就看似完全世俗的事务向西米恩咨询。当地各个村落的代表常常成群结队地拜访他，要么让他调解法律诉讼，要么就作物播种的合适时间向他征求意见。西米恩与其他圣徒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可能是穷人和弱者对抗政府当局高压手段的保护者。在一个沟通低效且不稳定的世界里，帝国官员在自己辖区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足够的机会去滥用权力。为了正义向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甚至安条克或亚历山大港的总督提出的上诉似乎不会被理睬，更好的办法就是向当地的圣徒寻求帮助。当一群代表去找西米恩，就一个当地官员敲诈穷人和弱者钱财的行为向其申诉时，西米恩派人送信给这个官员：“不要用强权抢夺不属于你的东西。”当然，

这个官员毫不理会，但次日当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没有人认为这只是巧合。这类戏剧性的结果无疑并不常见，但是这位圣徒在面对权势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是完全无懈可击的。对没有任何财产并自愿让自己的身体承受折磨的人来说，没收财产与暴力威胁都毫无用处。像佐西姆斯这样在城市里久经世故的人也许不喜欢修道士，但对于穷人和受压迫者而言，他们是捍卫者和保护者，他们是群众表达意见和心声的另一渠道，也是对帝国声称其存在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与利益这一说法的认同。

这一时期的一些事件也许反映出早期基督教会反对知识与艺术的庸俗态度。像谋杀希帕蒂娅、毁坏塞拉皮雍神庙与玛纳昂神庙等古建筑的暴力事件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象——狂热和汪达尔主义[注]。佐西姆斯满怀恐惧地记录了404年夏天君士坦丁堡的暴乱，一些武装的基督徒烧掉了圣索非亚大教堂、元老院以及用无法再采集到的大理石雕刻的缪斯雕像。他悲叹道，其损失反映了对于艺术与美的集体蔑视。从对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的态度上也能够发现同样的立场。像安东尼、西米恩这样的宗教名人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只会说他们当地的科普特语或叙利亚语——他们不懂任何拉丁语或希腊语。许多基督徒认为阅读荷马、阿里斯托芬和琉善关于诸神与英雄的故事是不合适的，信徒只应该阅读《圣经》和其他具有启发性的书籍。在基督教化过程中，一些文学作品似乎也遭到了与多神教神庙一样的命运。

文化的湮没并未发生，因为当一种文化传统被侵蚀时，就会逐渐产生另一种包含许多旧文化特征的新文化。古典文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具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比如凯撒里亚的瓦西里就认为，这些古典作品优美的语言与文风值得研究，这样的观点十分流行。当帝国处于基督教化过程中时，希腊古典作品并未被扔到篝火里烧掉，而是被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在整个拜占廷时期不断被研究。宗教艺术也是如

此，这是拜占廷文明第四个典型的特征。尽管塞拉皮雍神庙与玛纳昂神庙已经被毁，但君士坦丁堡街道两旁多神教诸神的大理石雕像被保留了下来。基督徒对这些雕像能够因其美感与艺术价值而幸免于难感到十分高兴，前提是它们不会成为崇拜的对象。多神教艺术有时也会被巧妙修饰以适应当时之需。当君士坦丁需要一个自己的雕像来装饰君士坦丁堡的中央广场时，他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他没有命人制作一个新雕像，而是从小亚细亚的神庙里偷来一个太阳神阿波罗的雕像，只留下了雕像头上散发的7道光芒。

旧古典文化与新基督教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建筑艺术上。当基督教还是一个小的受迫害的教派时，其信徒不得不在室内进行秘密集会。“教堂”一词的希腊语是“ekklesia”，原意是“集会”，即基督徒的聚会。随着基督徒数量的迅速增长，需要宽敞的、专门的建筑在星期日容纳他们。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建筑应采用什么样的风格，因为当时还未形成可利用的基督教建筑传统。尽管有各种多神教的神庙，但基督徒希望将自己的教堂与其区别开来。加沙的波菲利坚决反对直接将玛纳昂神庙简单改造后当作基督教教堂，他认为在建造新的教堂之前，这一地方应被彻底毁掉、铲平、清理干净。基督徒进而转向另一种被称为“巴西里卡”（古罗马长方形会堂）的古典建筑，这种宽敞的公共建筑保存于帝国的各个城镇，为法律诉讼或觐见总督提供场所。它们的建筑式样简单：长方形布局、平顶天花板、尖耸的屋顶，有时还设有侧廊。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提供一个宽敞的室内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和听到。早期巴西里卡风格的基督教教堂中，有一座是4世纪20年代在罗马圣彼得墓地上为了纪念这位圣徒而建的；另一座据说是君士坦丁在耶路撒冷，即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所葬的墓地上建造的，被称为圣体安置所。随后又建造了许多基督教教堂，包括360年落成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

现在教堂的规模和外形已经确定，又该如何进行内部装饰呢？墙壁肯定不能完全裸露，因为建筑需要表现震撼与美感，以达成其最初

的建造目的。所以，早期的基督教教堂常常由田园生活的场景、树木与各种植物所装饰。不久之后，一些人开始争辩说，装饰不应保持中庸，而应有一些宗教训诫的内容，画像应反映基督教受迫害时为信仰而放弃生命的殉道者的生平，或者福音书中展示基督的神迹、教导、被钉于十字架上和复活的故事。但这种观点在某些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它具有偶像崇拜或崇拜装饰多神教神庙的诸神雕像的意味。394年，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斯主教埃皮法尼乌斯在去往巴勒斯坦的朝圣途中，惊恐地看到一个教堂的窗帘上画着基督像。他愤怒地将其撕毁，之后便继续前行。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埃皮法尼乌斯不得不面对会众的申诉，他们提出，如果他的确不喜欢这块窗帘，至少可以发发善心自付费用换一块窗帘。

不论怎样，埃皮法尼乌斯最后败诉。到了5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用《圣经》中合适的景象来装饰教堂以鼓舞和引导信众。这一新宗旨在罗马的圣母马利亚大教堂中得以体现，这个教堂在432—444年得到了重建和装饰。其内部由一系列镶嵌画装饰而成，其中的肖像由几千块小彩色大理石块组成。教堂中殿的一排嵌板描绘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的全套故事，画中的先知与天使就像罗马元老一样炫耀他们的袍褂，清晰地反映了新旧传统的融合。所以，尽管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伴随着暴力、迫害与破坏，也不论佐西姆斯如何认为，艺术与文化并未终结。如果在500年时，帝国没有失去它的半壁江山，也许像佐西姆斯这样的批评者就会理解君士坦丁一手打造的形象工程以及其对宗教的奇怪选择。多神教教徒将责任归咎于君士坦丁及其基督徒继任者，但是这次，他们并非十分公正。4世纪与5世纪的基督教皇帝所面临的绝非新问题，他们的多神教前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不是十分成功。

问题的根源是，到了200年时，罗马帝国的边界线已变得过长。公元元年后的头200年中，罗马人只需要对付边界上零星的攻击，所以问题还不大，他们甚至可以自夸已经建立了所谓的“罗马和平”。然而

形势在3世纪期间发生了巨变。在波斯——罗马的东邻，衰弱的安息王朝被野心勃勃的萨珊王朝取代，后者想把波斯帝国扩展到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罗马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最终于260年，因迫害基督徒而著称的罗马皇帝瓦列里安（Valerian）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I）俘获囚禁，从此再未能返回罗马。与此同时，波斯人夺取并洗劫了安条克的主要城市。东部的失败已足够悲惨，但更为糟糕的是，北部边界在此时遭到了另一敌人的袭击。251年，被称为哥特人的日耳曼人部落席卷了多瑙河，彻底歼灭了那里的罗马军队及领军的罗马皇帝，日耳曼人向南突袭了小亚细亚，在那里他们烧毁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帝国的存续处于危难之中。但自3世纪60年代起，精力旺盛的罗马皇帝们成功地将帝国形势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消除了波斯与哥特的威胁。佐西姆斯的英雄戴克里先与波斯人达成了一项条约，暂时稳定了东部边界。随着秩序的恢复，戴克里先推行了一系列内部改革，使帝国更加适应新的危险和不稳定的环境而生存下来。他认为帝国疆域过于广袤，一位皇帝无法统治，于是开辟了一项新的制度，即帝国由东西两位皇帝共治。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找到一个解决北部边境威胁的长期办法。那里的敌人不是萨珊帝国那样的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众多独立的“蛮族”部落。他们对罗马边境的袭击也不像波斯人那样带有领土扩张的目的。蛮族人要么是寻求战利品，要么是在被其他部落向西南驱赶的过程中寻求安全的居所。因此，皇帝们早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获得战争胜利并缔结条约能解决的问题。打败并大规模地屠杀蛮族人只能是最后的手段，并不能消除长期的威胁：他们迟早会被其他的蛮族替代。所以，只能想办法使新来者成批定居于帝国内部。280年，皇帝普罗布斯（Probus）将多瑙河以北的巴斯塔奈人安置于巴尔干半岛，这样的安排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在一个人力匮乏的世界里，这些定居者被要求在必要时进行军事服役，这使他们形成外籍军团或者盟邦，支撑着帝国的防卫。他们被安置于荒弃的土地上，在

那里耕作，提供剩余农产品和税收。不论佐西姆斯如何诋毁君士坦丁的军事才能，君士坦丁似乎完全在沿用前任皇帝的方式处理蛮族的威胁。佐西姆斯所叙述的君士坦丁在面对蛮族时仓皇而逃的故事并无佐证。相反，4世纪20年代，君士坦丁成功地平息了多瑙河边境的战事，并在河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使罗马军队能够向哥特人的领地推进。332年，一支被称为特维吉人的哥特部落被迫投降，并与罗马帝国缔结条约，同意无论何时，只要皇帝有需要，就会提供4万人的部队供其调遣。

佐西姆斯所哀叹的不仅仅是他声称的君士坦丁的懦弱，他还认为，君士坦丁以温和的基督教代替古代充满男子气概的尚武信仰，用宦官而非刚健的实干家来管理帝国，瓦解了罗马的军事精神。然而，如果仔细考量的话，他的指控没有一项能站得住脚。尽管一些基督徒如凯撒里亚的瓦西里认为，即使为了保卫国家疆土而进行的杀戮也是罪恶的，但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基督徒阿塔纳修斯写道，在战争中杀敌是值得嘉奖的行为，值得为这样做的将士竖立纪念碑加以纪念。当然也没有迹象表明基督徒不愿意在帝国军队中服役。早在2世纪60年代，一支基督徒分遣部队就在多瑙河前线对抗马科曼尼人。314年，阿尔勒会议宣布批准基督徒加入军队。到了4世纪末，军队士兵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基督徒。此外，一种新的军事精神开始显现，其在许多方面比旧传统更为强悍。考虑到帝国当时正经历不同于波斯与蛮族的快速基督教化，保卫罗马帝国的边境就是保卫教会。这一观念在军队的徽章和旗帜中有明显的体现。欧西比乌斯声称，君士坦丁把自己在312年的战争中所看到的十字架幻象带到了对战特维吉人的战场上。战旗上装饰着耶稣基督的标志，那是由基督的希腊语名字前两个字母构成的图案，这一图案也被刻在了钱币之上。所以，保卫基督教帝国的使命值得嘉奖，所有为获得胜利而采取的行动也都是正义的。358年，君士坦丁的儿子、基督教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袭击了萨尔马提亚人和夸地人，他们都曾是罗马帝国的盟邦，却开始攻击巴尔干地区。帝国军队

在战场上征服他们之后，又袭击了他们的村庄，把平民驱赶到一起，杀掉了一些人，把另一些人卖为奴隶。

至于长期受到鄙视的宦官，因其有着无法胜任皇位的天然优势，所以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已出入帝国宫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政府中的角色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命运。事实上，好几个成功的军事将领都是宦官出身，包括6世纪60年代在哥特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纳尔西斯（Narses）。所以，佐西姆斯提出的基督教剥夺了帝国的尚武精神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西半部疆域的丢失并不能怪罪于基督教皇帝的无能或军事技术的衰落，而是几千里之外中亚草原上被称为匈奴人的游牧民族西迁的结果。作为凶猛的骑兵，匈奴人擅长在高速骑行中搭弓射箭，他们的到来使日耳曼部落中弥漫着惊慌与恐惧。376年，大规模的哥特人到达帝国多瑙河边境。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瓦林斯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以服军役来换取在罗马帝国境内远离匈奴人的荒地上定居。瓦林斯很高兴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补充人力，所以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前提是哥特人交出他们的武器。他答应在作物丰收之前向他们提供粮食。于是哥特人理直气壮地进入罗马境内，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问题。负责移民的官员贪污了大量本该提供给哥特人购买食物的钱财，并从新来者那里收受贿赂允许他们保留武器。不久之后，一群饥饿的、武装的哥特人开始肆虐于巴尔干地区。瓦林斯被迫集结罗马东部军队，试图使这些劫掠者就范。378年8月9日，他拒绝等待帝国西部援军的到来，轻率地在君士坦丁堡西北的阿德里安堡袭击了哥特人。他的冲动是致命性的。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2万人被杀戮。伤亡者中也包括瓦林斯本人，但是无人知晓他在何时何地去世，一直以来，这都是个未解之谜。

阿德里安堡的灾难标志着罗马人对持续侵袭其北部边境且日益增加的入侵者失去了控制。经过4年的战斗，哥特人最终被征服，但是他

们得以以半独立的身份停留在帝国境内。395年，他们在首领阿拉里克的带领下发动叛乱，并向意大利挺进，于410年洗劫了罗马。与此同时，匈奴人带来的压力导致罗马边境承受着更多的迁徙浪潮。406年12月，由于西罗马帝国皇帝已无力抵抗，莱茵河边境彻底崩溃，汪达尔人、苏维汇人等进入帝国境内并开始自由定居。据称，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尤利乌斯·内波斯（Julius Nepos）于480年被暗杀时，其统治的所有行省都已被新主人占领，即使他们当中部分人在名义上支持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474—491年在位）的权威。

考虑到佐西姆斯的出身，他看待当时及前代人事件的方式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哲学与信仰已经被边缘化，他所认为的与文明世界相提并论的国家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他必然要找寻一个抱怨的对象，而君士坦丁则是他所厌恶和鄙视的一切代表。[注]时空给予我们一种不同的视角。信仰选择的错误、腐败的天性、道德的堕落似乎与4世纪和5世纪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关系。更确切地说，帝国的统治者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新的、危险的环境中，并勇敢地进行应对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帝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基督教替代了传统宗教，君士坦丁堡替代罗马成为帝国最重要的城市。新的宗教渗透于战争、政治思想、公共服务与视觉艺术等各个生活方面。总之，在500年左右，罗马帝国已经转变成拜占廷帝国。

---

1. 据目前的研究证明，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初期，拜占廷人保留下的珍贵古希腊文献就大量流入西欧。——审校者注

2. 此处存在表述错误。因为当时君士坦丁是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戴克里先的东方行宫的，直到其父去世才私下潜行回到高卢地区。——审校者注

3. “金口”约翰，原名约翰·克里索斯托，口才出众，善于雄辩、演讲和布道。有人说他的话语比黄金还贵重，故称之为“金口”约翰。——编者注

4.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5. 汪达尔主义，意味着对物质或文化进行毁灭性的破坏。——编者注

6. 对君士坦丁的描述不能仅仅依据带有偏见的佐西姆斯的作品，还要参考更为重要的欧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记》等。——审校者注

第二章 帝国的前哨

他本质上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喜欢那些完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怀揣着攫取整个世界的欲望……

——普罗柯比

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知名人士很少去拉韦纳，但那里的克拉西斯港口是亚得里亚海北部重要的海军基地。这个城市本身并非一个重要的定居点，房屋都建造在桥桩之上，被荒凉的沼泽包围，但在402年，这个偏僻落后的地区突然变成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皇帝霍诺留（Honorius，395—423年在位）对罗马的暴乱感到愤怒与惊诧，于是将其抛弃，带领整个宫廷去了拉韦纳。他的一些挑剔的家臣必然对其新居所的条件感到沮丧，但是霍诺留的选择不无理由。沼泽使这座城市难以由陆地方向靠近，而将其与6千米之外的克拉西斯海港相连接的河流又浅得无法通航海船。尽管可以通过小船向城市供给物品，但也得等到涨潮时小船才能浮起漂到城墙边上。在拉韦纳，霍诺留可以免受臣民暴乱与哥特人入侵的伤害。

随后的政治动荡进一步强化了拉韦纳作为新都城的地位。当西罗马帝国失去皇帝时，意大利的新统治者奥多亚塞（Odovacar）继续驻扎在这个遍布沼泽的城市，也像霍诺留一样尽量避免去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芝诺对这一现状十分不满，但也束手无策，因为他没有多余的军队去远征收复意大利。最终，他诉诸拜占廷惯用的手段：面对正面打击难以取胜的强敌，就收买其他人来对付。芝诺设法与东哥特部落首领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取得联系。多年来，东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出现并不受欢迎。严格来说，他们只是帝国的外籍军团，

而且他们常常不满于帝国的雇佣条件，并袭击这一地区的拜占廷城市。488年，芝诺与狄奥多里克达成协议，希望以此解除东哥特人的威胁，并在其治下收复意大利。东哥特人将向西挺进，废黜奥多亚塞，然后以芝诺的名义统治西罗马帝国。狄奥多里克于次年到达意大利，他在战场上轻松地驱除了奥多亚塞的军队，但之后其对手撤退到拉韦纳的安全地带，继而是漫长的僵持。狄奥多里克控制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却无法打破奥多亚塞根据地的防卫。受挫三年之后，经过拉韦纳大主教的调解，狄奥多里克最终接受了一个谈判解决方案：狄奥多里克与奥多亚塞正式同意共治意大利。493年3月，狄奥多里克的军队最终获准进入拉韦纳。毫无疑问，这一协议并不可行，确切地说，它只持续了10天。狄奥多里克以庆祝他们的友谊为借口宴请奥多亚塞，然后在欢宴中刺死了他。

于是，狄奥多里克开始在拉韦纳驻扎。不得不说，尽管他夺权的手段不甚光彩，但其治下的城市和整个意大利都开始繁荣起来。他自称东哥特国王，并谎称自己的统治得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允许。尽管他本人是阿里乌派基督徒，但他并未试图干涉其多数臣民的查尔西顿派信仰，人们接受了尼西亚会议与查尔西顿会议所定义的信条，即耶稣基督的神性等同于人性，两者不可分离。他认为所有基督徒在拉韦纳都应和平相处，并为同派别信徒建造了一座主教教堂和一些普通的教堂，以确保阿里乌派教堂与查尔西顿派教堂一样辉煌。当他下令为救世主耶稣建造一座宏伟的新教堂（后被称为圣阿波里内尔教堂）时，耗费巨资用于其内部的镶嵌装饰。同样，在拉韦纳，两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别还有各自独立的浸礼堂，以便按照各自的仪式为自己的孩子洗礼。

然而，并非所有原罗马帝国西部地区都享有这种宽松与宽容的统治。在汪达尔人统治下的北非，查尔西顿派教徒就不时被迫改信阿里乌派。但在意大利，生活更像是依旧在罗马皇帝而非拉韦纳哥特人国王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元老院的会议照常召开，罗马主教不受干扰

地主持着教会的活动，尽管遵循着君士坦丁堡的官方教义，但他本人是一位坚定的查尔西顿派的支持者。即使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也是源于取得了君士坦丁堡权力的新皇帝而非东哥特人。但之后发生的喧嚣事件将拉韦纳从东哥特意大利的首都变为拜占廷帝国重要的前哨地带。

491年，皇帝芝诺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皇位由一位文官阿纳斯塔修斯继承，他娶了芝诺的遗孀阿里亚德妮（Ariadne）。其时，这对夫妇年事已高，未能生育。所以据称，在518年，当90岁的阿纳斯塔修斯去世之时，皇位同样也无人继承。由于没有更好的人选，官员们接受了皇宫护卫队队长查士丁（Justin）成为新的继任者。身为一个士兵与进取心十足的人，查士丁在某些方面还挺适合皇帝这一职位，但他同样也已年长，并且从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因此，他既无法阅读也无法签署呈阅的文件。后面一个困难可以通过使用印章来克服，但他还需要一个可靠的人为他解读文件的内容。这也是他如此依赖代替他担任皇宫护卫队队长的侄子查士丁尼的原因。查士丁尼十分聪慧，不仅为其叔叔解读文件，甚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和颁发文件。最终，这一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被任命为共治皇帝，在其叔叔死后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

查士丁尼一世是我们能够通过书面描述与真实肖像推断出其容貌的少数拜占廷皇帝之一。其同时代的人说他有着中等身材，圆脸，面色红润。保存于拉韦纳圣维塔利教堂中的查士丁尼一世镶嵌像也证实了这一描述，像中是一位戴着镶满珠宝的皇冠的面容严肃的中年人。总之，新皇帝其貌不扬，但他的统治对帝国而言将是意义重大的。

正是在查士丁尼时期，自君士坦丁统治以来帝国发生的各种转变趋势，尤其是基督教化过程，逐渐达到了高潮。在查士丁尼继位之前的几十年间，像佐西姆斯这样的多神教教徒还能够在帝国境内过着平

静的生活，而新皇帝一上台就企图消除旧信仰的最后残余。他把打击目标对准多神教教徒仍有影响力的地区。他们被排除在法庭之外，在教会中自然也失去了立足之地，但他们在以希腊古典作品为基础的高等教育领域仍有很大的发言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在雅典教授哲学，结束了可追溯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的学术传统，剥夺了众多多神教知识分子的生计。

绝望之下，一些知识分子便开始以渴望的眼神凝望帝国境外的非基督教世界。他们曾听说萨珊王朝的新国王库斯鲁一世（Chosroes I）的伟大事迹，据传闻，这是一位如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一类的理想的统治者。据称，在库斯鲁仁慈的管理之下，波斯没有犯罪行为：值钱的东西丢在街上也不用看管，因为没有人会动它。于是，大约531年，7位博学的多神教学者越过边境，来到库斯鲁在泰西封的王宫。一到那里，他们就失望了。库斯鲁尽管热情好客，但并非他们所期待的那样是一位对哲学充满热情的学生，而且波斯境内充满了各种犯罪行为。统治阶层贪婪、傲慢和暴虐，远非超然的哲学家。而真正令这些挑剔的知识分子震惊的是，即使允许一夫多妻，男人们仍旧会犯下通奸的罪行。在波斯停留了两年之后，这些哲学家决定返回祖国，不论等待他们的是何种命运。那时，查士丁尼尽管未对他们的归来报以热烈欢迎，但已经变得温和了一些。这些人通常还是能够过着不受干扰的生活，但帝国当局时不时来找麻烦倒是真的。559年夏，一群知名的多神教教徒被逮捕，他们的书籍、雕像和画像被堆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大广场上烧掉了。但这类事件在当时已经很少了。西里西亚的辛普里丘（Simplicius of Cilicia）是一位从波斯归来的侨民，仍然能够继续他的研究，以及关于亚里士多德作品影响力的一系列评论写作，直至560年去世。但他们是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代多神教知识分子，且他们当中多数人已经改信基督教，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在帝国中，如果不与大多数人的信仰保持一致的话，日子就会过得十分艰难。

在这些名义上的基督徒中不得不提的是普罗柯比。表面上，他是一位依附于宫廷的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如同君士坦丁时期的欧西比乌斯一样，他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演说，吹捧在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建筑计划，并向其听众保证“只要皇帝保持虔诚，上帝就不会远离人类”。他还长篇论述了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所发动的战争，但奇怪的是，书中很少提及皇帝本人。一直以来，普罗柯比都在准备一部自称为“秘史”的作品，这部作品在其生前从未公开发表。他在书中倾吐自己的真实情感，就像佐西姆斯对待君士坦丁那样对查士丁尼及其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大加谩骂。普罗柯比认为查士丁尼是个对臣民福祉漠不关心的饭桶，而且他对宗教异端的迫害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但作品中尖锐的表达只是垂死的反抗，在普罗柯比这一代多神教教徒离世后便后继无人了。

查士丁尼基督教化的热情造成的压力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最后一代多神教教徒。正是在其强硬的基督教统治之下，针对同性恋的严苛立法颁布了。对于被看作基督敌人的犹太人，其态度也模棱两可。保护犹太人生命与财产的帝国立法依然有效，但查士丁尼忍不住要干涉。根据他所颁布的法令，如果哪一年逾越节恰好在复活节前，犹太人只能在基督徒的节日后庆祝自己的节日。这一措施也许不久就被搁置，或者根本从未实施，却反映了查士丁尼对信仰多元化的厌恶。然而，最令查士丁尼愤怒的是拒绝接受尼西亚会议和查尔西顿会议规定的正统基督教教义的那些人。528年，皇帝颁布法令，规定如果案件诉讼当事人是查尔西顿派基督徒，则持异端者不得担任证人。在此，这里的“持异端者”指的似乎不是阿里乌派基督徒，尽管西部许多蛮族统治者属于这一教派，但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帝国境内的重要力量。查士丁尼担心的是所谓一性论的观点。

在帝国东部各省，尤其是亚历山大港，许多教士与神学家对尼西亚会议关于基督神性所陈述的定义并不满意。他们认为会议未能就与基督人性相对的神性进行充分的强调。到了5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港大

教长狄奥斯库鲁斯争辩说，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它们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整体。451年的查尔西顿会议曾试图通过宣称“耶稣既是完美的人，也是完美的上帝”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其系统的阐述并未使狄奥斯库鲁斯的拥护者满意，他们认为基督的神性居于主要地位，人性只是其中从属的一小部分——这被称为一性论。如果这仅仅是神学家之间的争吵，帝国当局也许会听之任之，但不幸的是，情况远非如此。到5世纪末，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东部行省的多数居民都支持一性论派的观点，教派分歧激起了他们的不满，使他们与君士坦丁堡查尔西顿派皇帝渐渐疏离。

在皇帝芝诺与阿纳斯塔修斯治下，为了调和查尔西顿派与一性论派的对立曾做了各种尝试。查士丁尼对此则毫不理睬。当其叔叔于518年刚取得皇位时，他就立即联系反对调和政策的罗马主教，许诺将支持查尔西顿会议所确立的正统教义。那些拒绝接受正统教义的人的日子变得愈加艰难。在埃及、叙利亚等一性论盛行的中心地带，开始出现零星的迫害，一些持“异端”的主教被赶出他们的教区，被查尔西顿派主教替代。一性论派教士与修女被强行逐出修道院。然而，查士丁尼很快发现，强行的统一是有限度的。诸如同性恋、犹太人和少量剩余的多神教教徒等少数派可以被任意摆布，但是一性论派人数如此众多，以至采取高压手段起不了作用。被罢免的主教暗地里继续照料他们的信众。就连在坚信查尔西顿派的君士坦丁堡也有反对的呼声，因为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本人就是一位一性论者。她成功召回了一些被流放的主教，甚至在533年设法任命一位一性论者，即特拉比宗的安塞米乌斯（Anthemios of Trebizond）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安塞米乌斯的真实信仰一被公开，就被免去了职务，但他仍然秘密地在狄奥多拉的宫廷内继续度过了12年。连积极的查士丁尼也不得不承认失败，重新寻求调和的可能。

尽管查士丁尼无法强行统一所有教义，但毫无疑问，此时的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信仰正影响着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欧西比乌斯与其他理论家早已确立了一个观念，即罗马皇帝是上帝的代表，帝国边界即为基督教信仰的边界。的确，在帝国大部分历史中，其居民自称为罗马人，“拜占廷人”一词只是一个现代称呼。考虑到皇帝职位在神学上的重要性，公共典礼必然具有宗教意义。几个世纪以来，皇帝重返首都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庆典。559年8月，查士丁尼在色雷斯待了几个星期，视察防御工事的建造。当他返回时，君士坦丁堡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他在城门受到了高级文武官员和其他城市名流的欢迎，并在色彩斑斓的队列护卫下沿着主街梅塞大道行进。但是游行队列到达圣使徒教堂时突然停住。皇帝下马进入教堂祈祷，当他再次出现时，庆典才继续进行。教会仪式与帝国庆典越来越相似，相同的圣歌在两个不同的场景回响。

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日后区别于西欧基督教的拜占廷基督教信仰的各个方面开始清晰显现。其中之一便是对个别圣者的强烈崇拜，这是查士丁尼与其大部分臣民共有的一种情感。530年春，皇帝听说生活在耶路撒冷附近沙漠里的修道士领袖萨瓦斯正在赶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这位隐士曾经拜访过首都，但当时的门卫官员瞥见他的长袍脏兮兮的，还补满了补丁，就把他打发走了。查士丁尼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派遣帝国军舰去护卫萨瓦斯船只的最后一段航程，在船停靠码头之后，这位隐士与其同行者被安排在大皇宫住下。当他们在大厅被引见时，查士丁尼从其宝座上跃起，脸颊上淌着泪水，跑去拥抱、亲吻萨瓦斯。查士丁尼在同意于耶路撒冷修建一所医院和一座圣母教堂后，接受了这位圣者的祝圣。然而这位圣者明确指出，祝圣的对象不包括对一性论派抱有同情的狄奥多拉。只有圣者才能既享受此种待遇，又敢于冒着令皇帝不快的风险而免于惩罚。

查士丁尼对待萨瓦斯的方式是那一时期的典型做法，但其统治也反映了拜占廷宗教的发展。尽管受到埃皮法尼乌斯等人的反对，基督教为了训诫其教徒还是有意识地用耶稣及其使徒的画像装饰礼拜堂，

以此区别于犹太教。然而，对基督的描绘还有着特定的含义。毕竟基督是上帝的化身，艺术家描绘基督也就是在描绘上帝。所以，如果被光环环绕的皇帝形象受到尊敬与崇拜，那么基督像当然也应受到尊敬与崇拜。耶稣像不再以镶嵌画的形式展示在教堂的墙壁上，而开始被画在木头上以便于携带。他们不再描绘基督在福音故事中的场景，而是描绘脸朝外、眼睛直盯着观察者的基督个人。这些圣像只能用于私下的、情感崇拜的需要。如果有人担心这种对于木制画像的崇拜会导致偶像崇拜，查士丁尼时期流传的故事则有另一种说法。叙利亚的埃德萨人声称他们拥有所谓的“耶稣面像”，一个不是出于艺术家之手而是出于神迹的耶稣像。几百年前，他们城市的统治者阿伯加（Abgar）写信给耶稣，请求耶稣来埃德萨治愈他的痛风。耶稣当时无法离开巴勒斯坦，就用一块布压住脸，将自己的面容印在了上面。耶稣派人将其送给阿伯加，立即治愈了他的痛风。在小亚细亚的卡姆利亚纳居民声称他们也有这样一块印着耶稣面容的布。查士丁尼命人带着这块印有耶稣面容的布在这一地区的各个城市巡游，以便每个人都能瞻仰它，574年，它最终抵达君士坦丁堡。这些神迹的存在似乎能够证实，基督圣像被世人敬仰，而且拥有神圣的权威。

查士丁尼的统治标志着早期宗教倾向的持续，同时，他也不得不应对自3世纪危机以来存在于帝国边境的威胁。普罗柯比热衷于展示查士丁尼在应对帝国敌人方面的完全无能，但这绝不是公正的评判，尤其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萨珊王朝仍然在东部边境虎视眈眈，伺机入侵并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530年，在达拉斯，一个世纪以来，拜占廷首次重创了波斯军队。次年，波斯人又入侵拜占廷东部行省，击溃了卡里尼库姆（Callinicum）的防守部队，但遭到了巨大损失以至除了议和别无选择。532年，两国同意自此维持“永久和平”。

当然，这类军事与外交的应对之策无法解决其他持久的威胁，即那些生活在帝国多瑙河边境的部落。迁移的人群一拨接着一拨不断到来。453年，匈奴帝国首领阿提拉（Attila）去世，此后匈奴人便不再

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力量，但很快被斯拉夫人和讲突厥语的库特里古尔人、阿瓦尔人等少数民族替代。为了寻求土地与战利品，他们就像之前的哥特人那样突袭拜占廷。548年，斯拉夫人到了色雷斯，占领并彻底毁掉了托皮茹斯。558年，库特里古尔人越过多瑙河，在被击退前，几乎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试图通过在这一地区周围建造防御城墙，比如在多瑙河南岸建造一系列要塞来遏制袭击。然而，如同其前任一样，他知道这些军事方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还有一个办法。如前所述，几个世纪以来，皇帝们允许少数蛮族在帝国境内定居，要求其在必要时作为同盟者服军役，以此来消除他们的威胁。378年阿德里安堡灾难之后，对这些定居者的控制变得越发困难。那些在巴尔干得到土地的哥特人最终开始叛乱并向帝国发动了战争。于是，帝国统治者精心策划，使这些部落首领相信只有与帝国和平相处和结盟才是最理性的办法。381年年初，狄奥多西一世邀请哥特人首领阿萨纳里克（Athanaric）访问君士坦丁堡。尽管阿萨纳里克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勇士，但他之前都是在行军途中或狭小的村落中度过的，毫无城市生活经验。巨大的公共广场、竞技场和大皇宫都令其惊叹不已。他曾经听说过这些奇迹，但没想到它们竟然真的存在。据称，他曾惊呼皇帝定然是人间的上帝，如果有任何人胆敢与其作对，那就是在找死。这种心理冲击力成功说服蛮族人与帝国同舟共济。

有很多关于皇帝向顽抗部落支付“年金”的委婉说法。5世纪60年代，每年需要向由维拉莫（Valamer）领导的哥特人支付300磅[注]黄金。查士丁尼也向阿瓦尔人支付同样数目的黄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支付仅是收买潜在威胁的贿赂，而邀请阿萨纳里克访问君士坦丁堡这样的方式也在起着同样的作用。年金以拜占廷金币诺米斯玛来支付，其重量超过了当时流通的任何钱币。金币上刻有皇帝肖像，非常漂亮，就像首都的纪念碑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据说，斯里兰卡的统治者仅仅通过比较金币就断言拜占廷皇帝要比波斯皇帝更加伟大。那些

拥有拜占廷金币的人了解它的美丽与声誉：它们常常作为陪葬品伴随强大的首领进入其最后的安息之地。



图1 刻有皇帝希拉克略头像的金币诺米斯玛

尽管查士丁尼并非最先使用这些手段的人，但他的确将其又稍加推广。512年，阿纳斯塔修斯将赫卢利部落安置于辛吉杜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附近，以此作为条件换取他们在拜占廷军中服役。他们的确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但仍然是拜占廷巴尔干地区一个难以驾驭的存

在，常常在其周边劫掠。528年，其首领格莱佩斯（Grepes）受邀访问君士坦丁堡，随行的有12位亲属与一些重要的随从。毫无疑问，他将如同阿萨纳里克一样对帝国首都充满敬畏。他接受了慷慨的馈赠，并再次允诺无论何时受到召唤，都会为拜占廷皇帝效力。与381年阿萨纳里克访问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格莱佩斯及其随行人员在一次公共庆典中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查士丁尼本人成为他们的教父。赫卢利部落因接受官方查尔西顿派信仰而不是阿里乌派信仰，从而被更紧密地纳入拜占廷的势力范围之中。这一举动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不论格莱佩斯如何许诺，其他赫卢利人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劫掠他们的拜占廷邻人。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嘲笑查士丁尼对赫卢利人的慷慨赠予耗尽了帝国国库，却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收益。然而，528年的造访是赫卢利人被帝国同化的开始，也意味着其不再是威胁帝国的一个民族。将正统基督教与对帝国造成威胁的民族联系起来，这一策略在之后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

查士丁尼想吸引蛮族为帝国提供服务的强烈欲望与其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接一个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通过竖立纪念碑或新建筑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狄奥多西一世[注]曾从埃及运来一座800吨重的大理石方尖碑，矗立在竞技场中央高地的一个柱基上，碑上刻有观看比赛的自己与家人的雕像。查士丁尼打算给这座城市的外观留下更为深刻的标记，而他极其幸运，既拥有财富也拥有行动的机遇。

财富来自节俭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赠予，他在临死前给国库留下了32万磅黄金。查士丁尼并未打算将这笔钱留给后人。532年1月，机会来了，蓝绿两党团结起来在竞技场示威，要求释放之前因滋事被捕的成员。很快，事态逐渐明朗，暴乱甚至比498年阿纳斯塔修斯所面临的要严重得多。人群涌入奥古斯都广场，伴随着抢劫和激烈的打

斗，大火燃起并发展成一场火灾。火焰蔓延到一所医院，许多病人被烧死在病床上。查士丁尼站在大皇宫的窗边观望着事态的发展，据称，当他决定坐船逃离时，勇敢的狄奥多拉说服他留下来进行战斗。直至军队被派往竞技场将暴乱者包围，秩序才逐渐恢复。在随之而来的屠戮中，大约3万人被杀，随后几天，死寂降临于这座城市，人们都在思索刚刚发生的暴行。城中大部分雄伟的纪念碑现在变成了阴燃的碎石堆。通往大皇宫的主要入口的黄铜大门已经不见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元老院。404年，在被“金口”约翰的支持者烧毁之后重建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再次被烧成一片瓦砾。

查士丁尼并没有被吓倒，暴乱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就有工人开始清理现场，说明皇帝肯定在灰烬消失之前就已开始制订计划。考虑到现在教会与帝国之间已完全相互认同，首要的任务是新建一座大教堂，但查士丁尼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复制品。在这一地基上的前两座大教堂都是毫无想象力的长方形的巴西里卡风格，尽管第二座大教堂的柱廊曾令人印象深刻。新教堂必须是极具冲击力的，将使诸如阿萨纳里克与格莱佩斯等造访者惊叹于拜占廷皇帝的超人力量。于是，查士丁尼选择了建筑师安塞米乌斯（Anthemios of Tralles）的正方形(注)而非长方形的革命性设计，并在其上搭建巨大的穹顶。因为查士丁尼在这一项目上挥霍了大量钱财，建筑以惊人的速度顺利进行，共50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轮岗，花费巨大。仅神殿的装饰就耗费了4万磅白银。新圣索非亚大教堂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建筑，但每一分钱都花得物有所值。当它于537年12月27日最终落成时，的确是一个奇迹。它的穹顶有55米高，高耸于街巷，几英里之外就能看到，连远在海上的船只也能望见它。建筑内部更加威严，其规模与空间都给人以压倒之势。建筑的效果因覆盖整个穹顶的镶嵌装饰而得到提升，红色、紫色、绿色等颜色的大理石圆柱支撑着柱廊。阳光从环绕着穹顶底部的40个小窗户照射进来，在一天的不同时刻以不同角度弥漫于整个大厅，透过穹顶窗户照射进来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金色的镶嵌画和大理石

圆柱。查士丁尼无疑对他的新教堂感到非常满意。据说，他甚至自诩胜过了《旧约全书》中在耶路撒冷建立神庙的所罗门国王。

新教堂只是查士丁尼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计划甚至延伸到532年暴乱未能触及的城市各个角落。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教堂是安葬君士坦丁的圣使徒教堂。到了527年，这座教堂已经年久失修，查士丁尼决定将其彻底修缮。新设计是一个低矮的长方体上有着4个小圆顶，聚集在一个中心的大穹顶周围。整个城市中还有另外23座教堂被新建或重建，全部采用了新的穹顶设计，从而使君士坦丁堡拥有了经典的城市风貌：众多柱廊点缀的穹顶。查士丁尼的目的是提升帝国尤其是其个人的威望。通往大皇宫的入口被重建，并饰以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的壮观的镶嵌像。不远处的奥古斯都广场上矗立起一座顶端为查士丁尼骑马雕像的圆柱，这正是吉勒斯后来看到的那座雕像。如往常一样，普罗柯比准备进行冷静的评论，嘲笑查士丁尼对其建筑计划事无巨细，除了没有考虑花费。然而，查士丁尼美化君士坦丁堡并增加其神秘光环，的确有助于帝国在未来的岁月中幸存下来。

尽管查士丁尼统治的许多方面都预示了拜占廷帝国的未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过去的罗马帝国发出的最后呼声。一些古罗马的机构诸如元老院，在其任内消失了，但其他方面被有意识地保留了下来。查士丁尼本人说的是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所以帝国的法律文件经编纂与整理，最终以拉丁语发行。查士丁尼的任何决策都不如他发动一系列战争收复被日耳曼部落占领的西部帝国那样，使其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罗马人。也许他听到佐西姆斯等多神教教徒批评罗马帝国自皈依基督教后开始衰落而感到不安，或者仅仅是考虑到自己可支配的巨大财富，他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他也梦想着一个由不列颠延伸到叙利亚的帝国。不论其确切的动机为何，这是一场不同

于拜占廷以往的且不会再有的战役，最终，战争的结果变成了一场灾难。

查士丁尼首先关注的是北非地区。多年以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能无助地观望着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不时地迫害那里的查尔西顿派居民。468年，一支舰队被派去重新征服失去的行省，没费多大周折就占领了的黎波里。然而，汪达尔人通过达成和平协议拖延时间，等待顺风的到来。当天气变得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在莫库里乌姆港口让点燃的船只漂到拜占廷舰队中去。许多拜占廷船只被烧着，其余船只则被趁乱进入港口的汪达尔人袭击。受到重创的幸存者撤退到西西里岛。据说，这次灾难耗费了拜占廷国库的大量资金，几乎有查士丁尼后来建造圣索非亚大教堂所浪费的那么多。

这次失败令人感到如此耻辱，以至君士坦丁堡里之后的两代人都不敢再提及要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北非，直到查士丁尼上台。530年，汪达尔国王被推翻，他的侄子盖利莫（Gelimer）登上了王位。查士丁尼对此公开表示惊恐，致函盖利莫要求他交还王位。当接到公然反抗的回应时，查士丁尼便召集顾问，提议发动战争，但顾问们不是很积极。有人立即提到了468年的灾难，还有人反对说，刚刚结束的波斯战争使军队已经开始厌战。此外，还有军费问题，而且也不能保证取胜。听到这些争辩，查士丁尼本人也有片刻的动摇，但恰好在这时，有一位主教来到宫廷，请求觐见皇帝。他宣称上帝在梦中指使自己为北非阿里乌派统治下的查尔西顿教徒向皇帝请愿。事情因此得到了解决：查士丁尼决定开战。

查士丁尼之所以如此自信，不顾及大臣们的意见，是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与378年阿德里安堡被哥特人屠杀的笨拙迟缓的队伍相比，拜占廷军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快速移动的敌人，骑兵现已成为军队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于装备一个骑兵花费高昂，一些骑兵部队事实上已成为富有将领豢养的家臣。这些富有的将领对于查士丁

尼来说更为重要，与君士坦丁、瓦林斯和狄奥多西一世不同，查士丁尼从未亲自带兵出征，因此需要找一位可靠的将领来领导对西部的征战。查士丁尼的目光落在了拥有1000多名骑兵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身上。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任命。530年，贝利萨留在达拉斯边界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失利了，次年他的表现更为糟糕。当时，他正在卡里尼库姆与一支撤退的波斯军队交战，据称他在交战过程中乘船渡过幼发拉底河逃跑了。尽管如此，贝利萨留的财富很可能是查士丁尼选择他的主要原因，因为查士丁尼不愿在这项计划上付出太多自己的资源：他只提供给贝利萨留15000人的兵力，这只相当于468年遭难军队的一部分兵力。要想取得战役的胜利，这位将军的个人资源将变得至关重要。

最终，这被证实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而关于厄运的预言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贝利萨留在战役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533年，拜占廷军队在利比亚的一个滩头卡普特瓦达（今突尼斯）登陆，这使汪达尔人大吃一惊，之后未遭遇任何抵抗继续行进至迦太基。直到距离城市15千米的地方，盖利莫才带领军队拦截。在随后激烈的遭遇战中，人数占优的拜占廷军队击溃了汪达尔人，几天之后，他们得胜并进军迦太基城。534年年初，国王盖利莫带领汪达尔人投降，帝国恢复了对北非行省的统治。同年夏末，贝利萨留回到君士坦丁堡，参加了盛大的凯旋式，跟在其后的盖利莫在竞技场被迫跪在得胜的查士丁尼脚下。这次在非洲的巨大胜利还被以镶嵌画的形式刻在查士丁尼的新黄铜大门内侧加以纪念。

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如此迅速彻底，以至查士丁尼立即又开始考虑新的征程，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在拉韦纳，奥多亚塞的征服者、伟大的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于526年去世，被埋葬于他生前建造的壮观的陵墓中。其8岁的外孙阿萨拉里克（Athalaric）接替了王位，并由他的母亲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作为摄政者和监护人。不幸的是，对于其耐心且坚忍的母亲来说，阿萨拉里克放荡不羁。随

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与一些坏人为伍，并沉溺于酒精中。阿玛拉逊莎开始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心，不论其顽劣的儿子能否活到法定年龄或者因酗酒而死，她的政治前景看起来都十分暗淡。她与查士丁尼秘密达成协议，希望借助拜占廷军队来对抗自己的政敌。然而事态比她的计划发展得更快。534年10月，阿萨拉里克英年早逝，血缘最近的亲属是其年长博学的堂兄狄奥达哈德（Theodahad）。如果任其选择的话，狄奥达哈德会非常乐于接受之前的安排，只担任名义上的统治者而让阿玛拉逊莎负责实际管理，但事与愿违。有人开始对阿玛拉逊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产生怀疑，狄奥达哈德的一些顾问的亲属曾被阿玛拉逊莎处死，这些顾问敦促他在帝国军队被请进意大利之前赶快发动起义。535年春，阿玛拉逊莎被捕，从拉韦纳被遣送至博赛纳湖湖岸严密囚禁起来。不久之后，她被秘密杀害。

现在，查士丁尼有了发动战争的借口。他做好准备，兵分三路对东哥特人发动袭击。一路人马由蒙杜斯（Mundus）率领，准备北上向达尔马提亚海岸行进；另一舰队在贝利萨留的带领下起航，佯装驶往迦太基，实际上却计划突袭西西里岛；与此同时，他们又与查尔西顿派的法兰克人结盟，准备跨过阿尔卑斯山脉从北部袭击阿里乌派的东哥特人。并非所有计划都取得了成功：法兰克人在对胜利没有确切把握之前不愿与东哥特人对阵；蒙杜斯的军队则在萨洛纳附近受挫；只有贝利萨留的舰队未遇抵抗，在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登陆，到了535年年底，他已经夺取了叙拉古，恢复了帝国对西西里岛的统治。此时，狄奥达哈德试图媾和，打算派教皇作为公使去君士坦丁堡拜访查士丁尼，但不时受到宫廷中反对让步的鹰派的阻挠。536年夏，当和平谈判无法继续进行时，查士丁尼命令贝利萨留穿过墨西拿海峡，向北进军那不勒斯，在那里未遭到任何抵抗。拜占廷军队经过卡拉布里亚时受到当地查尔西顿派居民的热烈欢迎，沿路城镇的居民大开城门迎接前来解放他们的军队。东哥特人中甚至有逃兵加入贝利萨留的队伍。拜占廷军队到那不勒斯城时才遭到了顽强抵抗。东哥特驻军紧闭城门并坚持了几个星期，以期援兵，但是无能的狄奥达哈德没有提供任何援

助，贝利萨留的军队通过一个废弃的、通往要塞的水渠攻陷了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短暂停留并获得补给与增援之后，贝利萨留继续北上。536年12月，贝利萨留一路畅通无阻，带领军队进入了帝国旧都罗马。

迄今为止，对意大利的进攻与北非战场的情况十分相似。537年年初，夺取罗马的消息传到查士丁尼的耳中，他肯定认为另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已唾手可得。然而这次的抵抗强硬得多。东哥特人被狄奥达哈德的无能激怒，军队也开始在雷加塔聚集，怨声载道。此时，一位军功赫赫的将领维蒂吉斯（Vittigis）被推选为国王，狄奥达哈德则逃往拉韦纳的安全地带，然而还未到达就被俘获并杀害。新首领立即着手反击，同年2月，他们包围了拜占廷军队驻扎的罗马城。此刻，贝利萨留只有5000人的兵力，其中一些还在建造长达18千米的防御工事。经过英勇奋战，他坚持了一年零9天，直到东部的援兵最终抵达。538年3月，维蒂吉斯放弃围城，向北撤退，并受到拜占廷军队的追捕。被派往伦巴第的一支拜占廷军队夺取了米兰，而维蒂吉斯则向其最后的堡垒——坚不可摧的拉韦纳撤退。

在此地，维蒂吉斯至少能够继续坚持并迫使查士丁尼达成和平协议。毕竟，5世纪90年代，狄奥多里克曾花了3年时间才引诱奥多亚塞最后投降。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停战条件是要维蒂吉斯让出波河以南的整个意大利，东哥特人也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但是贝利萨留认为胜券在握，没有理由妥协，便拒绝达成协议。最后还是拜占廷人耍心眼才打破僵局。一些被维蒂吉斯的失败激怒的东哥特人送来消息，称只要贝利萨留愿意登上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恢复上一世纪消失的帝国称号，他们就会打开拉韦纳的城门。这位拜占廷将军佯装同意，然而军队一进入城内，马上忠诚地以查士丁尼之名夺取了此城。540年5月，拉韦纳被纳入查士丁尼不断扩张的帝国版图。

即使在这一胜利时刻，也有人感觉到并非一切都顺利。当贝利萨留的随军秘书普罗柯比看着拜占廷军队进入拉韦纳城时，回忆道：

> 我有了一个想法，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出于人们的智慧或是他们的任何其他杰出才能，而是有某种来自神的力量一直在改变它们的目标……

查士丁尼和贝利萨留获得全胜的欲望与分毫不让的态度，导致他们因自不量力而失败。为了向意大利的军队提供补给和援兵，其他边境事实上已完全失防。当维蒂吉斯撤退到拉韦纳时，他曾孤注一掷，想要利用帝国这一致命的弱点。他重金聘请两位意大利教士，让他们带信给波斯国王。这一旅途漫长而危险，且必须经过拜占廷的领土，此外二人进入波斯帝国境内后还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但是他们非常幸运。因为这两位意大利教士不是哥特人，所以没人想着要去质询他们，而且当他们到达色雷斯时遇到了一位会多种语言的翻译，在其陪伴下完成了剩余的旅途。539年秋，他们到达了库斯鲁在泰西封的宫廷，把维蒂吉斯的信交给了他。他们警告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说查士丁尼的野心永远不会满足，一旦东哥特王国被推翻，他必定要将战争矛头指向波斯。从理论上说，库斯鲁受到自己7年前与拜占廷达成的所谓“永久和平”协定的约束，而且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帝国会受到严重威胁。但另一方面，不受干扰地入侵拜占廷又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540年春，库斯鲁率领大军入侵拜占廷叙利亚地区，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包围了叙拉城。当地居民委派以主教为首的代表团去谈判。库斯鲁拒绝了代表团开出的条件，但是坚持让军队护送他们返至城门。城内居民在城墙上看到自己的主教受到如此尊崇的待遇，受宠若惊，便打开大门迎接，但是护送的波斯军队向门下掷出一块大石，城门因而无法关闭。得到信号后的波斯军队全部冲向前去，涌入城内。叙拉城被烧，城中居民被圈为奴隶，一些拜占廷特使赶来提醒库斯鲁“永

久和平”的协定。当他们一同从大屠杀中骑行而过时，得胜的波斯国王指着一个被其士兵拖走的妇女——她仍抓着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小手，孩子无法站直，摔倒在地上，在一片尘土当中也被拉走了——眼中涌出了泪水，他愤怒地吼道，上帝应惩罚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他指的当然是查士丁尼。随后，他遣返了特使：“告诉皇帝查士丁尼，这里就是他抛弃卡瓦德（Kavad）之子库斯鲁的地方。”

从叙拉开始，库斯鲁从容不迫地向西行进，很显然，他现在的目标是伟大的安条克城。查士丁尼派出他的侄子耶尔马诺斯（Germanos）带领一小支300人的军队去支援那里的城防。像罗马一样，安条克也有着非常长的城墙，而且这些城墙维护得很好。不幸的是，它有一个薄弱点，一块高耸的岩石高出了附近相邻的城墙，将给攻击者提供搭建桥梁以获得据点的机会。守军商讨了各种解决办法，譬如在岩石上建一座塔楼将其与城墙连接起来，但是没有一个方案得到实施，因为他们争辩说，这些工作难以在库斯鲁到来之前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事将成为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它恰恰明确地向波斯人揭示了城防的弱点。

此时，库斯鲁已经抵达希拉波里斯，离安条克只有4天的行程。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来自安条克的代表团，其首领贝洛伊城主教请求他饶过安条克城。库斯鲁勉强表示收到10万枚金币才会停止攻击。耶尔马诺斯拒绝了这一条件，因为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公使带来了查士丁尼的禁令，严禁向敌人交付任何钱财。于是库斯鲁冷酷无情地继续行军，洗劫了贝洛伊城。540年6月，贝利萨留夺取拉韦纳后不到一个月，波斯军队就来到能够望见安条克城的奥龙特斯河岸边安营扎寨。卫戍部队现已得到6000人的增援，所以城中居民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他们聚集在城墙之上对库斯鲁大声谩骂，当派来的波斯使节建议他们用金钱来换取安全时，差点儿被他们用乱箭射死。于是库斯鲁下令开始攻城。

他亲自领军，没有借助拜占廷人就轻松找出了城防弱点，并集中兵力攻击。而卫戍部队也将最强的兵力驻防在那里，在蓝绿两党纷争中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城中年轻人也赶来协助。最初波斯人未能取得任何成功，随后一个不幸事件瓦解了城防。为了在这段受到威胁的城墙上部署尽可能多的兵力，防守士兵在各处塔楼与城墙之间所悬绳索上临时搭建了一些木制平台。这大大增加了城垛后面的空间，却促使大量的防守者蜂拥而上向波斯人发动攻击。结果是，太多人登上平台，以致整个框架在巨大的断裂声中坍塌了。听到这声响但无法看清其究竟的人以为坍塌的是城墙，便逃离了哨所。有些人骑上马，从一个城门穿越城市逃向另一城门。而此时，听到巨响的妇孺也都怀着恐惧冲出家门，挤到了街道之上，许多人惨遭逃兵践踏。与此同时，波斯人利用这一防守的间隙沿着梯子登上城垛。他们并未立即入城，因为他们不相信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拿下拜占廷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以为其中肯定有诈。所以，波斯人只是向剩余的拜占廷士兵发出信号，让这些士兵赶快逃跑，而他们将不会追击。许多人听从了这一号令，所以当波斯人从城市一端进入时，拜占廷士兵和平民则从另一端逃离城市。当波斯人确定所有驻军都离开时，他们才开始登上城墙，进入安条克城。在行军过程中，他们受到了袭击，但后来发现袭击并非来自军队的士兵，而是年轻的战车党支持者所投出的石块。他们凶猛的攻击一时击退了波斯人，但是重装的职业士兵最终获胜，战斗变成了一场屠杀。在砍杀了投掷石块的年轻人之后，波斯人将城中的所有人全部屠杀。之后，劫掠便开始了。作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波斯人并未对随意掠取教堂财富的行为感到内疚。库斯鲁在劫掠了一座教堂之后便感到满足了，因为对他而言，这里的黄金、白银和抛光的大理石已经足够多了，他将其余的教堂留给了自己的士兵。在所有可搬移的物品被聚集到一处后，他下令将整座城市烧毁。

库斯鲁在拜占廷叙利亚地区的其余时间就像是皇室出巡。查士丁尼派来一些特使，向他慷慨地支付黄金以保证他同意撤军。由于没有拜占廷军队的威胁，库斯鲁就好似度假一样在这一地区逗留了几个星

期。之后，他又西行至塞琉西亚港口，在那里洗了个海水澡。他造访了安条克郊区以花园和喷泉著称的达夫尼，又在阿帕梅亚短暂停留，还被允许带领一支200人的护卫队进城观看了竞技场的比赛。由于知道查士丁尼喜欢蓝党，库斯鲁便使劲为绿党加油。当蓝党车队就要取胜时，他命令士兵挡住其去路，结果绿党取得胜利，最先到达了终点。

到了这时，这位国王才开始带领军队返乡。由于马车上堆满了战利品，又跟着长列的俘虏，整个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尽管与查士丁尼的特使已达成协议，库斯鲁还是向沿线城市敲诈钱财，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他。

安条克的陷落只是查士丁尼统治后半期拜占廷一系列灾难的开始。540年夺取拉韦纳之后，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地位急转直下。贝利萨留被召回，一是为了派他保全东部边境抵抗库斯鲁，二是他夺取拉韦纳的诈术引发了对其忠诚度的怀疑。在他离开后，拜占廷的意大利军队中再没有无可置疑的全面将领。而且在贝利萨留撤离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一些下属拒绝听从他的命令。现在无人配合各路驻军与分遣队的将领。贝萨斯（Bessas）与约翰（John）领导着野战军，君士坦提安努斯（Constantianus）则负责驻守拉韦纳城。这一安排的不利之处在542年拜占廷决定扫除维罗纳的东哥特人时逐渐显现出来。军队突袭了这座城市，在几乎将其拿下时，将领们为了战利品的分配争执起来。正当他们专注于争吵时，东哥特人重整旗鼓将拜占廷人赶了出去。为了强化团结，查士丁尼也的确指派了一位最高将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但由于某些原因，马克西米努斯只航行到亚得里亚海岸的达尔马提亚，在那儿逗留了几个星期。此时，意大利的局势已逐渐恶化。

分裂的不仅是在意大利的指挥官们，拜占廷同时迅速失去了意大利查尔西顿派教徒的支持。贝利萨留曾努力与当地居民维持良好关系，常常高价购买当地人的农产品为军粮。毕竟他个人非常富裕，可

以用自己的财富支撑着拜占廷军队。他的继任者们既不富有，也没有多么高尚的品德，只是把战争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无耻劫掠当地居民的不仅是拜占廷军队。现在，就连查士丁尼也认为，既然拉韦纳已被占领，成为帝国的一个省，意大利就要支付应承担的费用。他向意大利派去了一位效率最高、绰号为“大剪刀”的审计官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Logothete），人们认为他能够剪下金币的边缘而不破坏金币的形状。他向意大利强加了一项沉重的税赋，同时削减了开支，尤其是军饷。于是他成功地疏远了当地居民，并毁掉了军队的士气。

如果东哥特人不是群龙无首地分化，事情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严重。维蒂吉斯于540年被俘并被贝利萨留带往君士坦丁堡。当贝利萨留并无意图宣称自己为西罗马帝国皇帝的事实渐渐明了时，东哥特人便选举维罗纳的总督伊狄巴德（Ildibad）为国王。伊狄巴德是一位能干的领袖，但是因一次误判的死刑引起了某些下属的愤恨。一天晚上，在宴会上，当伊狄巴德斜靠在沙发上，身体前倾去取食物时，一个卫兵走到他身后砍下了他的头颅，被斩首的尸体仍然保持着手拿食物的坐姿。之后埃拉里克（Eraric）被拥立为王，但不出几个月便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后来，埃拉里克的位子被伊狄巴德的侄子托提拉（Totila）接替。与其短命的前任们不同，这位东哥特新国王很快就向人们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将领。

542年夏，拜占廷人攻打维罗纳失利后不久，托提拉在法恩扎的正面战场上与其相遇。他狡猾地派遣300骑兵从战场高处攻击敌人后方，拜占廷军队陷入恐慌，以为遭到了更强大的军力攻击，四处逃窜。此后，拜占廷将领们便龟缩在安全的拉韦纳城内，而托提拉则在意大利四处攻城略地。543年，那不勒斯陷落；546年，罗马也被攻陷。至此，除了拉韦纳之外，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占领地已所剩无几。托提拉的一个策略是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拜占廷人也许与查尔西顿派教徒拥有共同的信仰，但正如托提拉称呼他们为“希腊人”一样，他们事

实上完全是外国人。构成拜占廷军队绝大部分的赫卢利人、波斯人和摩尔人与当地意大利人的差异就更大了，而托提拉充分利用了“大剪刀”亚历山大无情剥削这一例子的宣传价值。对于那些在拜占廷统治之下的意大利人来说，生活困窘得几乎已无法忍受。罗马在向托提拉投降之前被迫忍受着长达几年的围城，在此期间，城内的居民几乎都被饿死，一些人跳入台伯河自杀。如果意大利的灾难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连对于北非当初看似迅速而轻松的征服，现在也被证明并非如开始时那样彻底。尽管汪达尔人已被全面击败，但内陆的柏柏尔人仍然在坚持抵抗。544年，他们发动叛乱，杀死了拜占廷总督所罗门（Solomon），肆虐于整个省区，将拜占廷人围困于要塞之中。

毁掉查士丁尼统治后半期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源于前所未有的、肆虐的自然灾害。其中最具灾难性的也许就是淋巴腺鼠疫的爆发，据报告，疫情最早于541年夏天出现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从前，瘟疫零星地发作也并非少见，但这次天灾的规模很明显极不寻常。9月，在瘟疫传播到叙利亚之前，亚历山大港首先受到了感染，疫情看上去非常严重，很多村庄被彻底摧毁，玉米烂在地里也无人收割。542年春，瘟疫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在人口密集的城中迅速传播。连查士丁尼也出现了症状，但他很快就痊愈了。疫情在543年减弱，但之后又于558年和573年再次爆发。

6世纪还出现了一系列的地震。540年遭到库斯鲁残酷蹂躏的安条克，在526年、528年和551年接连受到地震的打击，大约5000人在528年的地震中丧生。557年12月，君士坦丁堡也发生了地震，当时正是午夜时分，人们都还在睡梦中。地震开始时，他们都跑到了街上，但是城市贫民聚居地区的伤亡率很高，那里的房屋和出租公寓很容易坍塌。在有些地方，巨大的圆柱被震得连根拔起砸在了附近的房屋上。此后，余震又持续了几天。

以现代的科学观点来看，地震活动是可以预测的，君士坦丁堡位于北安纳托利亚断层上，而安条克位于东安纳托利亚断层上。但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这一地区频繁发生致命的地震，人们只能将其归咎于上帝的愤怒。一性论派当然认为，正因如此，安条克查尔西顿派大教长尤弗拉休斯（Euphrasius）惨死于526年的地震中。当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其官邸的楼上，当时地板开裂，他落入了正在地下室劳作的葡萄酒酒囊工人的一口沥青大锅内。这个不幸的人双脚落入滚烫的沥青中，被发现时头倚靠在大锅边缘，身体的其余部分被烧得只剩下骨头。557年，当一位高级税收官在地震中死去时，查士丁尼苛税政策的批评者也幸灾乐祸地做出了适时的评论。这位税收官叫作安纳托利乌斯（Anatolius），当时，墙上的一块大理石饰板在地震刚发生时松动并掉落下来，砸碎了他的头骨。查士丁尼最杰出的成就——新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命运也具有象征意义。它在557年的地震中幸存下来，但是，在其穹顶底部出现不祥的裂缝。尽管修缮工作很快便开始进行，穹顶仍然在5个月之后塌陷，砖石掉落下来，砸到主祭坛上。穹顶不得不进行小规模的重建，大教堂直到563年才重新开放。

对于瘟疫与地震，查士丁尼除了免除受灾地区的税收之外无能为力。然而，在军事方面，他则不惜花费金钱与人力。一个接一个将领被派去对付北非的柏柏尔人，直到547年，约翰·特洛格利塔（John Troglyta）将他们最终消灭。为了对付托提拉，查士丁尼又把贝利萨留派往意大利，但是这位将军年事已高，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他已无力从东哥特人手中夺回罗马城，据其秘书普罗柯比记载，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从一个设防的沿海城市航行到另一个沿海城市，几乎无法登陆。他最后的确从托提拉手中夺回了罗马，但是549年年初，在他被召回君士坦丁堡之后，这座永恒之城很快便又陷落了。直到另一位新的将领——宦官纳尔西斯带着大队人马和大笔现金来到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唯一据点拉韦纳时，事情才出现转机。也许真正起作用的是后一个因素，钱财使得纳尔西斯在为军队提供给养时不用再压榨意大利当地居民。所以，当552年夏天与托提拉在布斯塔·加洛路姆最后一决

胜负时，纳尔西斯将25000名士兵和来自伦巴第与赫卢利等各日耳曼部落的分遣部队投入战场。那天，托提拉的计策是佯装撤退，一旦拜占廷军队放松警惕就派遣大规模骑兵进行突袭。不幸的是，纳尔西斯对此早有预料，当东哥特人的骑兵冲过来时，他派两翼的骑兵队将其包围。困于陷阱之中的约6000名东哥特人，包括托提拉本人，全部战死沙场。

即使这次压倒性的胜利也未能结束战役。在战后不久罗马就被夺回，这是自536年以来的第5次易手，但东哥特人仍未投降。他们推举了一位新国王特亚斯（Teias)，又新组建了一支军队。纳尔西斯不得不在坎帕尼亚的拉克塔里山又打了一仗，再次全面击溃了敌军。有些城市仍然负隅顽抗。直到561年维罗纳投降，意大利才最终被征服，回到了帝国的怀抱。

经过这些无休止的战争与灾难，查士丁尼的最后岁月与其继位时的生机勃勃截然不同。即便帝国恢复了对北非、西西里岛、意大利甚至西班牙南部部分领土的统治，所耗费的生命与钱财的代价都是无比巨大的。无人知晓其在战争与建筑项目上究竟花了多少钱。据普罗柯比记载，关于国库是否亏空或者大皇宫内是否藏有大量钱财，君士坦丁堡流传着各种传言与猜测。当然，没有人要求查士丁尼公布他的财产。各种怨言和说法都暗示年老的皇帝已经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各种逆反阴谋，不论真假，都充斥着查士丁尼臆想的头脑，他开始盲目打击自己周围的人。562年年底，一场暗杀皇帝的计划被揭发之后，出现了一波抓捕风，嫌疑人当中涉及几位知名人士，连贝利萨留也被列入怀疑对象从而失宠，但563年他重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种厄运来临之感逐渐向拜占廷居民袭来。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未留下任何子嗣，皇位没有明确的继承人。560年9月的一天，皇后已过世数年，街巷中传言皇帝不再接见拜访者，已有几天无人见到他。很快有传言说他已经去世，人们都涌向面包店为即

将来临的动荡局势储存食物。面包当天被一抢而空，城中所有商店都关了门。此时才有消息说，皇帝取消接见只是因为犯了头痛。

恐慌是完全无必要的。当查士丁尼最终于565年11月14日夜间在睡梦中离去时，权力得到了顺利的交接。消息传到了皇帝的侄子查士丁的住所，当破晓的鸟鸣欢畅地迎接初升的太阳时，他穿过奥古斯都广场来到了大皇宫。在那里，他被皇宫护卫队拥立为皇帝，并被大教长加冕为查士丁二世（Justin II）。天大亮之后，他穿过连接皇宫与竞技场皇家包厢的长走廊，接受听闻皇帝死讯而聚集在一起的蓝绿两党大规模人群的欢呼。随后，一支肃穆的葬礼队伍抬着盖着厚重棺罩的查士丁尼的遗体离开了大皇宫，棺罩上绣着击败汪达尔人与东哥特人时的场景。查士丁尼被葬于圣使徒教堂一座巨大的、雕刻精美的大理石石棺中。新皇帝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撤销查士丁尼的一些细微改革，他恢复了执政官职务，并且亲自担任这一官职。

在查士丁尼统治后半期的这些动荡之后，许多人肯定以为形势会一如既往。在查士丁二世的统治之下，帝国西部边缘的拉韦纳的旧秩序似乎已得到重建。东哥特人的统治也已被推翻，狄奥多里克的阿里乌派教堂被改为查尔西顿派礼拜堂。圣维塔利教堂在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就已开始建造，最终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竣工交付使用。皇帝查士丁尼与皇后狄奥多拉的镶嵌像被置于主祭坛两端高傲地俯视着会众。与君士坦丁堡的骑马雕像不同，这些镶嵌像都被保存了下来：对一位为强化拜占廷统治贡献如此之多的人来说，这是应有的纪念，但是他的遗产却使拜占廷处于崩溃的边缘。表面的平静往往具有欺骗性。不久，拜占廷将被泛滥的洪水淹没。

---

1.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2. 此处所记有误，研究证明那是君士坦丁大帝。——审校者注
3. 此处所记有误，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平面图是十字形。——审校者注

第三章 泛滥的洪水

危险并非没有回报，它创造了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上帝将为我们提供帮助，并摧毁我们的敌人。

——希拉克略

亚历山大港，607年的一天正午。大部分人都待在家中避暑，城中几乎空无一人。两位修道士约翰·莫斯霍斯（John Moschos）与索菲罗尼乌斯（Sophronios）正因为一件要紧的事情向诡辩家斯蒂芬（Stephen the Sophist）的住所走去。当他们敲门时，一位女仆从楼上的窗户伸出头来，告诉他们主人还在休息，请他们稍晚一点再来。两位修道士决定先到附近的四柱殿去，那是十字路口由4根圆柱支撑的拱门建筑，此时能够供人纳凉。在令人昏昏欲睡的高温下，那里除了3个盲人外没有别人。

他俩静静地靠着一根圆柱坐下，打开随行带的书籍，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很快被对面的3个盲人吸引，这3个盲人在相互诉说着自己失明的经过。第一个人是做水手时得了眼疾，第二个人是当吹玻璃工时眼睛受了伤，第三个人则被催促了很久才道出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年轻时为了生计曾经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一天，他注意到路过的一个葬礼队伍，被送往圣约翰教堂墓地埋葬的死者身着华服。当天晚上，他便来到墓地，进入坟墓之中，小心翼翼地脱掉死者身上的所有衣物，只留下一件寿衣。原本他已经准备就此离开，却突然想到那件寿衣也许还会有点用处，于是他又返回将其从死者身上拽下来。就在这时，死者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向这个惊恐的闯入者伸出粗糙变形的双

手，挖出了他的眼球。莫斯霍斯与索菲罗尼乌斯听闻，惊骇莫名，以至决定马上离开，将紧急事务留待以后再说。

这两位修道士不是亚历山大港本地人，而是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他们曾在伯利恒附近的圣狄奥多西修道院发下修道的誓愿。自此，他们以拜占廷修道士流行的方式开始了从一个修道院到另一修道院的漫游，其间，参观了埃及的西奈山，并于594年到达耶路撒冷。在这一过程中，莫斯霍斯对一路上听到的逸闻做了记录，如亚历山大港那个盲人的故事也被纳入他的《精神草地》（*The Spiritual Meadow*）一书中，希望为修道士、苦行者与那些苦行崇拜者提供拓展阅读。然而，随着7世纪前20年的逝去，莫斯霍斯与索菲罗尼乌斯不再为了道德教诲四处旅行了，他们在帝国崩溃之时为了活命逃走了。

危机是自查士丁尼565年离世后经过多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就在他被厚葬3年之后，扩张后的帝国边境就出现了最初的裂痕。在多瑙河北岸，阿瓦尔人逐渐对这一地区的日耳曼各部落施加越来越强的压力，伦巴第部落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沿着常规路线，渡过多瑙河，进入拜占廷在意大利的领地。这种事并非首次，拉韦纳的拜占廷总督依然努力安置这些新来者，允许他们在意大利北部霸占城镇。他们先是在569年拿下了米兰，又于571年占领了帕维亚。由于缺乏军力驱逐伦巴第人，拜占廷人只能尝试其他方法。他们将成箱的金币赠予邻近的法兰克人，以引诱他们去袭击伦巴第人，但法兰克人只收钱不干活。渐渐地，阿里乌派的伦巴第人将其势力向南推进，将拜占廷人围困于拉韦纳及意大利沿海一带的城镇之中，夺取了大部分拜占廷花费巨额代价从东哥特人那里取得的土地。

各地迹象都表明，帝国边境正在坍塌。在6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西班牙的狭小飞地中，西哥特人带来的压力正在积聚，他们于572年夺取了科尔多瓦。在东部边界，库斯鲁一世又把曾经订立的和平条约抛之

脑后，在573年夺取了设防的达拉斯城，这一灾难使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几近疯狂。最令人担忧的还是多瑙河边境地区的局势。在其统治伊始，查士丁二世曾认为取消给阿瓦尔人的年金不会带来什么威胁，因为阿瓦尔人当时为了确立自己在多瑙河以北的霸权而卷入一系列的战争。查士丁二世误判了形势。作为快速行进的骑射手，阿瓦尔人以身着索链和头发蓬乱而著称，多瑙河沿岸各部落也像拜占廷人一样对其感到恐惧。567年，阿瓦尔人在伦巴第人的协助下摧毁了格皮德人，继而又转身攻击昔日盟友，将其驱逐至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拜占廷境内。到了580年，阿瓦尔人已经成为多瑙河流域的主要势力，斯拉夫人、库特里古尔人与其他部落都要向其纳贡并承认其霸权。权力基础得到巩固之后，阿瓦尔人便联合盟友进攻拜占廷帝国边境。570年左右，他们曾击溃拜占廷军队；581年，他们夺取了西尔米乌姆。直到皇帝答应每年向他们支付8万枚金币之后，他们才将此城交还拜占廷。阿瓦尔人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夺取西尔米乌姆，和平注定不会持久。其可汗十分清楚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求君士坦丁堡赠予他一个黄金躺椅和一头自己从未见过的大象。皇帝胆怯地照办了，但当躺椅与大象都被送达时，这位可汗宣称对这两件礼物感到格外失望，将其退了回来。袭击在持续，583年夏，阿瓦尔人开始向安恰罗斯进军；584年，又精心安排了其盟友斯拉夫人对拜占廷巴尔干地区的入侵。这些攻击造成的后果比突袭要严重得多，尤其是一拨接一拨的斯拉夫人开始在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尽管帝国统治者已擅长应对这些难以驾驭的部落在边境造成的威胁，但到了6世纪末，仅就其规模和凶猛程度而言，这些攻击着实让拜占廷人大吃一惊。

如今，帝国处于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统治之下。他是通过所谓理性的宪政协议登上皇位的，但拜占廷人并未对这种继承方式寄予足够的信任。先皇提比略二世（TiberiusⅡ，578—582年在位）没有子嗣继承皇位，582年2月，他的医生说，他的时日已所剩无几。莫里斯给予波斯人以重创后，刚刚从东部边境回到君士坦丁堡，于是，提比略二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康斯坦蒂娅

（Constantia）嫁给莫里斯，并封他为共治皇帝。在婚礼和册封典礼同时举行的当天，提比略二世做了纪念讲话，向听众们保证在这一乱世中将有一位拥有超常能力的人来带领他们，而此人就是莫里斯。第二天，提比略二世因食用了一些变质的桑葚而死。莫里斯命中注定要去寻找解决巴尔干地区的阿瓦尔人、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以及波斯人问题的办法。尽管困难重重，他仍差点儿取得了成功。

很明显，帝国并不具备同时对付这些威胁的资源，所以必须确认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不管怎样，北非已基本处于和平状态，而意大利仍陷在僵局之中，帝国军队埋伏于拉韦纳的城墙之内及南部的阿普利亚与卡拉布里亚城。于是，莫里斯决定眼下先搁置这些西部行省，进行行政改革以充分利用当前形势。迦太基与拉韦纳总督都由皇帝任命，拥有军事与行政的全权管辖权力。他们统领军队，同时也负责直接向居民收税。这一广泛的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有效应对地区威胁的必要资金，但自此之后，他们必须自负盈亏，君士坦丁堡不会再向他们提供任何物资。同时，形势变化也给莫里斯提供了一个平息东部萨珊王朝威胁的机会。强大的库斯鲁一世于579年去世，590年2月，波斯国王霍尔米斯达斯四世（HormisdasⅣ）被推翻，皇位被其战功最显赫的将领巴拉姆（Baram）篡夺。但是，霍尔米斯达斯的儿子、继承人库斯鲁二世逃到了拜占廷境内，写信给莫里斯，请求他帮助自己恢复合法王位。莫里斯提供了一支军队，与库斯鲁的追随者一同进入波斯帝国并推翻了巴拉姆。库斯鲁二世与拜占廷签订条约，交还达拉斯和马丁洛波利斯两城，并与其恩主莫里斯达成了永久和平的协议。

于是，591年之后，莫里斯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对付阿瓦尔人。由于外交手段已经失败，他便诉诸不妥协的军事手段。593年春，他派遣将军普里斯库斯（Priscus）带领一支强兵来到多瑙河边界，其目标是将定居此地的斯拉夫人驱逐出去，拥有众多波斯战役老兵的拜占廷军队在所有遭遇战中都取得了胜利。阿瓦尔人抗议拜占廷对其盟友的攻

击，但是拜占廷人现已足够强大，对此并不理会。599年，普里斯库斯取得了一系列对战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胜利，几万人被杀或被俘。

然而，胜利只是错觉。拜占廷人并未能对敌人施以决定性的打击，因为斯拉夫人擅长小规模作战，难以觉察和追捕，军队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无功而返。这些战役的花费渐渐成为帝国财政的沉重负担。自罗马帝国时期，每个行省都被要求缴纳1%的财产税，此外，每个成人还需缴纳人头税。各省主要城市负责管理、收税并将税款送至中央政府。然而，6世纪，连年的战争与自然灾害加速了各个城市与行省的贫困化，它们越来越难以承担管理和收税的职责。税赋的不足导致莫里斯无法装备一支高效率的军队。对于没有把握的胜利与减少的财政收入，莫里斯采取了激进冒险的办法，最终丢掉了皇位与自己的性命。602年秋，他命令自己的兄弟彼得统领的巴尔干部队在战争季节结束之时，不再照常撤退至色雷斯，而是越过多瑙河以北斯拉夫人的领地，在那里过冬，以不断给敌人打击。士兵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结果，他们将靠当地农产生活，以节约政府提供给养的开支。

这一消息在拜占廷军中激起了愤怒。许多士兵在夏季战役中抢夺了值钱的战利品，并打算将其安全带回家乡。他们反对这一命令，发动了叛乱，并推选一位名叫福卡斯的军官为他们的首领。对局势完全失去控制的彼得逃回君士坦丁堡。跟随其后的军队决定推翻遭到大家憎恨的现任皇帝莫里斯。当莫里斯听到叛乱的消息时，首先试图将其掩盖，下令举办赛车比赛，以转移大众的视线。然而，形势很快明朗，首都居民对他的统治也丧失了信心。蓝绿两党聚集在街巷中高声谩骂，鼓动莫里斯的姻亲耶尔马诺斯去夺取皇位。也许因为害怕君士坦丁堡城中福卡斯的支持者将其军队引入，莫里斯在一天夜里带着家眷乘船渡过马尔马拉海，希望和他的朋友——波斯国王库斯鲁二世取得联系。对于首都居民而言，逃跑则意味着退位。第二天，大教长接见驻扎在君士坦丁堡西城墙外不远处的赫伯多蒙的福卡斯，继而加冕

他为皇帝。福卡斯坐着一辆由4匹白马拉着的马车，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街道两旁满是欢呼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权力的移交几乎未造成任何伤亡，如果不是由于一直以来动荡的派系斗争的话，和平也许会保持下去。蓝绿两党在反对莫里斯上保持着团结，但在莫里斯逃走之后，两党之间便就欢迎新皇帝的站位出现争执。当福卡斯派军队去维持秩序时，一些蓝党成员起头唱道“莫里斯并未去世”。由于害怕会有起义恢复其前任的皇位，福卡斯下令将莫里斯处死。他的士兵将莫里斯及其8位家庭成员从避难的教堂中拖出，带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查尔西顿港。莫里斯及其4个儿子，包括其中最小的一个婴儿，都被斩首。他们的头颅被带到君士坦丁堡随着军队沿街游行示众，尸体被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些甚至被冲上沙滩任由过往的行人观看和野狗撕咬。

如果福卡斯认为这样的清洗能巩固自己的皇位，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莫里斯的悲惨结局使他的形象从一个失败的政治家转而变成一位圣徒与殉道者。很快，他临死时的英雄故事便开始四处流传。据说，其小儿子的乳母为保全莫里斯家族的血脉，想要用自己的儿子来顶替，但莫里斯发现之后，坚持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刽子手。此外，在夺取皇位与杀戮的过程中，福卡斯结束了自君士坦丁以来皇权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接的历史。在树立了一个先例之后，他日渐害怕会出现针对自己的反政变，便下令继续屠杀，首先清除的是莫里斯的亲属及其杰出的同僚，之后是其妻子、前皇后康斯坦蒂娅与他们的女儿们。受害者包括一些曾领导阿瓦尔人战役与波斯战役的帝国最杰出的将领。这一点尤为不利，因为不久之后，福卡斯就开始四处寻求优秀的军人。

603年春，福卡斯派大使到波斯向库斯鲁二世宣布他的继位，但并未受到热情的接待。库斯鲁二世要求知道他的朋友与恩人莫里斯的遭遇，并宣称莫里斯有一个儿子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现正在其王宫里。

库斯鲁二世的愤怒与声明都是假的。事实上，库斯鲁二世看到了他长久以来所期待的与拜占廷重新开战的机会。现在他有了借口，并且由于皇帝的注意力都被巩固君士坦丁堡的局面牵引，波斯人定然不会遭遇多大反抗。于是，604年夏，库斯鲁二世的军队越过边境，夺取了曾于591年还给莫里斯的达拉斯城。反抗充其量只是零星的，波斯人又围攻了埃德萨等城市，并且接二连三地夺取了它们。

正当波斯人挑战帝国东部防卫之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也充分利用拜占廷军队撤回君士坦丁堡这一时机。他们强行穿过多瑙河，将边界向南推进至希腊和伯罗奔尼撒。没有拜占廷军队的阻止，他们不再撤退，夏末之时，他们便开始在拜占廷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很明显，福卡斯正带领帝国走向灾难，而在君士坦丁堡，任何抗议与暴动都遭到无情镇压，政变要取得成功只能从外部突围。在帝国少数几个未遭受战争与入侵的北非地区，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反对派人士联系上了当地迦太基总督希拉克略。希拉克略曾作为莫里斯的将领之一参加580年的波斯战争，而且对篡位者福卡斯也没有什么忠诚可言。他派遣自己的侄子尼基塔斯（Niketas）发兵埃及，与其同名的儿子则率领舰队驶向君士坦丁堡。他的想法是，谁最先到达，谁就废黜福卡斯，夺取皇位。最后，他的儿子希拉克略于610年10月3日率领舰队先期到达君士坦丁堡海岸城墙。如果城中有坚定忠诚的抵抗，希拉克略及其舰队便毫无取胜的机会。福卡斯已经采取预防措施，将当时恰巧在首都的希拉克略的母亲与未婚妻当作人质。

然而，希拉克略舰队的出现却激励了城中的反对派。绿党在那几个月对福卡斯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其支持者开始采取直接行动，将囚禁希拉克略母亲与未婚妻的处所捣毁，并释放了她们。进而民众又发动了暴动，10月5日清晨，两个亲近朝臣走进福卡斯在皇宫中的寝殿，把他从床上拖了下来。他们把几乎全裸的皇帝从楼梯上猛推至海岸边，推进一条小艇，划向希拉克略所在的旗舰。面对灾祸，福卡斯也展现出莫里斯在同样境况中的勇气。当希拉克略命他为过去8年来对帝

国的统治进行辩护时，福卡斯反唇相讥：“你当然会统治得更好！”说完这句话，福卡斯的右臂被削掉，随即他就被斩首了。福卡斯的尸体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主广场上被公开焚烧。在这残酷屠杀几小时后，希拉克略在查士丁尼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受到大教长的庄严加冕。在外面的街道上，欢呼的绿党支持者焚烧着福卡斯的画像与蓝党党旗。政治平衡以这种暴力的方式得到恢复。

610年的政变也许终止了首都的暴力，但在边境地区，统治者的更迭使事态更加恶化，福卡斯的遗言似乎应验了。阿瓦尔人与斯拉夫人在彻底摧毁查士丁尼那·普利马城并围困塞萨洛尼基之后，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袭击。尽管城市的坚固设防将他们挡在海湾，但乡村地区已经脱离拜占廷的控制。在意大利，伦巴第人夺取了托斯卡纳地区沿海的拜占廷城镇，不久，拜占廷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也丢掉了。最坏的消息来自帝国东部。库斯鲁二世毫无休战之意，继续进犯叙利亚。614年春，波斯军队转而南下，向巴勒斯坦沿岸的凯撒里亚挺进，随后，又转向内陆地区，进军耶路撒冷。由于邻近没有帝国军队设防，城中的大教长扎卡里亚斯（Zacharias）倾向于与波斯人进行谈判以收买他们。耶路撒冷的蓝绿两党听说了这一计划，开始上街示威，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城市。扎卡里亚斯不情愿地让步了，从附近的杰利科调来一支分遣部队承担起设防工作。不幸的是，在援兵到达之前，波斯人就已将耶路撒冷围困起来，而援兵到达后，看到敌军的规模又吓得逃跑了。4月15日，波斯人开始向城墙发起攻击，他们架起石弩，向防御工事投掷石块。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攻破了一段城墙，军队从豁口涌入城中。波斯人毫无理由、不加区别地屠杀平民，造成了几万人的伤亡。当地犹太人也开始趁火打劫，他们在被基督教统治多年之后也许有许多老账要算。教堂与修道院被洗劫烧毁，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掠夺一空。幸存者，包括大教长在内，都被围捕，带到波斯

囚禁起来。波斯人还夺走了据说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一个似乎预示着帝国与基督教信仰即将坍塌的战利品。

此次灾难不同于540年安条克城的陷落。上次波斯人只是带着战利品回了家，而这一次波斯军队却不打算撤退，因为波斯国王计划着要征服拜占廷帝国，将其并入波斯版图。耶路撒冷被交给犹太人，乡村地区则被占领。615年，波斯军队开始进军埃及，而另一支由沙欣（Sahin）将军率领的分遣部队在小亚细亚则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挺进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查尔西顿，13年前莫里斯就是在此被杀害。在那里，波斯士兵的目光越过水面，可以望到君士坦丁堡穹顶和圆柱的天际线。沙欣很快就撤退了，但在埃及的波斯军队无此打算。好搞派系斗争的亚历山大港于619年6月落入他们手中，这座富裕的拜占廷第二大城市被洗劫一空。巴尔干半岛已几乎全部被斯拉夫人与阿瓦尔人占领，帝国的毁灭看来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帝国并未就此毁灭，不仅是由于希拉克略的个人天赋，还因为那些曾惹恼佐西姆斯的君士坦丁统治以来帝国某些方面的发展。基督教信仰、通过圣像所表达的视觉精神与君士坦丁之城——君士坦丁堡，都在这一最危险的时刻起了作用。

既然希拉克略在帝国反败为胜的过程中将起到领袖作用，有人也许会质疑这位统治者在其即位后前10年中的所作所为。他未能阻止帝国失去如此多的领土的原因何在？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得知道先要对付哪一个敌人。迦太基与拉韦纳可以交给其总督而不用再管，东部各省与巴尔干的颓势只有大规模军队的干预才能挽回，希拉克略缺少同时进攻波斯人与阿瓦尔人的资源。在其统治早期，他曾多次试图通过和谈分化敌人，以便可以专注对付一方的敌人。他先将和谈的目标对准波斯，以便腾出手来对付阿瓦尔人，但是嗅到胜利味道的库斯鲁二世傲慢地拒绝了他。618年，希拉克略终于与阿瓦尔人达成了停战协定，

内容包括向他们缴纳大量贡金，并允许他们拥有所有已经征服的土地。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尽管肯定有不少人指责皇帝将自己的臣民抛给蛮族，但是与阿瓦尔人的休战意味着希拉克略能够将军队从欧洲调往亚洲，以全部军力对抗波斯人。

明智的希拉克略并未立即发动进击。他在7世纪20年代初并未进攻叙利亚的波斯人，而是率军在小亚细亚西部安营扎寨，这里是仍处于拜占廷管辖之下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他在那里引入一种强化训练制度，将军队一分为二，举行模拟作战，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做准备。在此阶段，为了向士兵提供补给，他不得已向教会“贷款”：把金银圣餐器皿与烛台搜集到一起，熔化铸造成钱币。但这并非无信仰的行为。在得到教会权威的完全认可后，希拉克略竭尽全力赋予即将到来的战役以保卫信仰的正义战争的光环。过去，基督教信仰并未如佐西姆斯所担忧的那样，瓦解帝国士兵的战斗热情，但是战争已逐渐成为令人不快的必要事物，在很多教会首领看来尤其如此。希拉克略向军队做的动员讲话中陈述了大量事实，拜占廷人与多神教教徒在为信仰而战，因为波斯人都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他宣布，这是一项宗教义务，要去惩罚波斯人在耶路撒冷对基督徒所犯下的暴行；他许诺说，那些承担起这项虔诚义务的人将会在天堂获得永恒生命的奖赏。

这些激动人心的话常使希拉克略被冠以“第一位十字军将士”之名，但是拜占廷对非基督徒所发动的战争与之后在西欧产生的十字军思想截然不同。最显著的区别是拜占廷神职人员的沉默。在西欧，教皇发动了十字军东侵，神职人员鼓动信徒去参战，而在拜占廷则几乎没出现这种情景。不过，533年，确实曾有一位主教声称在睡梦中听到上帝的讲话，敦促查士丁尼向北非阿里乌派的汪达尔人开战。然而，任何时候，向那些参战的人提供精神奖励的都不是教会。在拜占廷，是皇帝带头允诺其部下，说上帝将会对他们的努力做出奖赏。除此之外，与这种胜利者观念并存的还有一种离奇的实用主义。拜占廷人从不相信死于战场是光荣的，即便是与非基督徒开战。大约编纂于此时

的一本军事战术手册讲道，用计谋与诈术战胜敌人要比仅仅用武力更好，同时要尽量避免阵地战。这本手册中介绍的许多计策都缺乏光荣的十字军魅力。匿名作者敦促道，要在敌营中散布错误情报与谣言，进而瓦解对方的士气；可以通过捏造其他战场的胜利消息来鼓舞部下；如果出现逃兵，则应将暗示他们是间谍的信件送到敌人手中。在拜占廷人眼中，这些并不矛盾。毕竟，保卫基督教帝国的事业是如此正义，为达此目的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拜占廷圣战观念中另一独特之处是圣像的作用。圣像在拜占廷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之前更为突出，希拉克略将其带上了战场。610年，当从迦太基起航去推翻福卡斯时，他就在船头贴了一幅圣母马利亚像。当他准备与波斯人开战时，他把一幅据说是神迹的基督像带上战场，也许就是574年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的那幅卡姆利亚纳的耶稣像。在这方面，希拉克略与教会相互合作。随着危急时刻的到来，大教长塞尔吉乌斯（Sergios）下令将圣母马利亚怀抱年幼基督的画像贴到君士坦丁堡陆墙的所有门上。这些画像的原型也许是“指引者”圣母像，这样命名是因为圣母在向她怀中的婴儿指出救赎之路。人们普遍认为那是福音传道者圣路加（St Luke）所画的圣母马利亚与基督的真实生活场景。画像是在5世纪被从巴勒斯坦带到君士坦丁堡的，现在它被放到了人们设防的城墙之上。

准备就绪后，希拉克略于624年春开始向东挺进。波斯人很可能认为皇帝的军队会首先进军叙利亚，然后试图恢复曾经失去的领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他们的军队将面临一场漫长、没有结果的等待，因为希拉克略一直没有出现。相反，拜占廷军队向东挺进穿过小亚细亚，然后北上亚美尼亚，这一地区长期处于争议之中，被两个帝国一分为二。从亚美尼亚，希拉克略又南下到了波斯未加防卫的北部边境。希拉克略兵临的消息令人震惊，库斯鲁二世绝望地召回自己的军队去保卫国家。在他们回来之前，希拉克略得以在波斯境内畅行无阻地攻城略地。当波斯军队将回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城西兹时，库斯

鲁二世也拥有强大的军力，但他听说希拉克略即将到达，便决定先行撤退。拜占廷军队未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城中，城里的庙宇被熊熊烈火烧毁，他们在对波斯人破坏耶路撒冷教堂的报复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次突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战争季节结束之时，希拉克略决定不让军队撤回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而是在亚美尼亚过冬。625年春，拜占廷军队又开始了攻击。而此时，波斯军队已整装待发，两支大规模军队被派去拦截。希拉克略率军于崎岖的山地中经过漫长的跟踪后，有选择性地进行战斗，并取得接连的胜利，还俘获了一个弃战而逃的敌军将领的金盾牌与盔甲。拜占廷军队得以继续扫荡。

绝望之中，库斯鲁二世与其将领们突然想到一个逼退希拉克略的计谋：模仿拜占廷的策略，直接攻击君士坦丁堡，以迫使皇帝匆忙撤退去保卫都城。于是，他们向阿瓦尔人派出密使，敦促他们打破休战协定，一同攻击拜占廷首都。衰弱的帝国成了诱人的目标，所以曾经多次撕毁协定的阿瓦尔可汗并不需要过多劝说。626年春，库斯鲁二世派遣他的将军沙赫巴拉兹（Shahrbaraz）带领大军进入小亚细亚，阿瓦尔人及其盟友斯拉夫人也同时出兵。6月初，波斯人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不久之后，在海峡的另一端，阿瓦尔人的先遣军也到达了陆地一面的城墙。盟军们以烽火作为信号隔海呼应。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城内的形势日趋严峻。5月，街道上与圣索非亚大教堂就曾出现过暴乱与示威，抗议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紧急信使被派出，告知希拉克略首都所面临的危险。

不论之前库斯鲁二世如何期待，这一消息并未诱使希拉克略结束对波斯的进攻或是向西撤退。相反，皇帝派出1/3的军力以加强君士坦丁堡的防卫，而其余士兵仍然驻扎在东部。君士坦丁堡此时只能自救。希拉克略早就知道对于阿瓦尔人与波斯人而言夺取君士坦丁堡有多困难，否则他绝不会采取这样大胆的行动。他们不得不设法横穿博斯布鲁斯海峡，而一旦成功，就能顺利突破陆地上的城墙。也许阿瓦尔可汗并不清楚君士坦丁堡的防卫，因为他看上去似乎相当自信，认

为自己军队操作攻城器械的技能将会使其快速突破。7月底，阿瓦尔人搭起两座塔楼，架起多台投石机，对城墙进行攻击并展开为时两天的激烈战斗。阿瓦尔人几乎未取得任何胜利，因为他们的投石机所投出的石块未能对城墙巨大的石灰岩造成任何撼动。即使他们在人数上远超城中的防守者，城墙的设计布局对于使用攻城塔楼进行攻击的步兵而言也的确是难以取得成功的。防御工事的设计者巧妙地创造了一种难以靠近或被突破的三层结构。最主要的内墙约12英尺高，间隔着96个塔楼，拜占廷人可以从塔楼上以弩炮和投石机向阿瓦尔人还击。在内墙之外竖立了另一层稍低的外墙，被92座塔楼间隔，拜占廷人也可以从塔楼之上将火力对准阿瓦尔人。在这之外是一条宽阔的砖衬壕沟，宽15—20英尺，深5—7英尺，在城内一侧还用砖和木头垒起了一道栅栏。任何攻击者都需冒着来自外墙与内墙的致命火药的危险跨越这条壕沟与这道栅栏。即使他们真的跨过去并设法夺取了外墙，他们还将被困入内外墙之间的5英尺宽的走廊。

阿瓦尔人的确通过填埋几段壕沟以使一些攻城塔楼接近外墙，但这也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远之处。港口的一些水手弃船加入城防，他们弄到一根桅杆靠在城垛上，把一艘装满燃料的小艇捆在上面。接着他们点着燃料，旋转着桅杆使小艇冲向阿瓦尔人的塔楼，使其陷入熊熊火焰。阿瓦尔可汗遭到如此挫败，不禁咆哮起来，派遣使者威胁城内居民，如果他们想要保命的话，就赶紧投降，否则他将派遣驻守在查尔西顿的波斯人进攻城市。拜占廷人也许愿意恢复停战协议并向阿瓦尔人支付更多的贡金，但绝不会选择投降。谈判破裂，围城在继续。

阿瓦尔可汗不得不实施他的威胁，带领波斯人投入战斗，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两支军队被博斯普鲁斯海峡相隔，没有舰队将波斯人送至陆墙。阿瓦尔人拥有大量的只能称之为独木舟的小船，这些小船做工粗糙，由树干掏空而成，每只小船一次只能从亚洲一岸运送2—3人。8月的一个早晨，这些小船进入波涛汹涌的水域驶向查尔西

顿。小船刚在海上漂浮起来，一支70艘船的拜占廷舰队便从黄金角湾出发，轻而易举地击沉了这些小船，船上的斯拉夫士兵要么被利箭射死，要么落入海中淹死。那些奋力游到岸上的士兵也被因失败而愤怒的可汗下令处死。遭受船只沉没的灾难后，斯拉夫人认为他们在这项计划中承担的责任已经足够，开始撤退，闷闷不乐地与其阿瓦尔首领进行抗争。由于人数减少，尽管阿瓦尔可汗部下的骑兵在撤退过程中对邻近地区实施了抢劫并烧毁了几座教堂，但他除了撤退别无选择。波斯人此时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也开始向东撤退。到了8月中旬，围城结束。

如果君士坦丁堡在626年陷落，希拉克略所有凭借灵感而来的战术与谋略将失去意义。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绝佳，如果其真的陷落，小亚细亚将被帝国其他四散的领土分割开来，再无一个城市能够统领帝国。拜占廷控制之下的东部没有任何一个设防城市可以代替君士坦丁堡成为行政中心。能够替代其地位的城市是西部的拉韦纳、迦太基或叙拉古。之后，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将不复存在，拜占廷人也将失去这一逐渐塑造其文化与世界观的中心城市。在克服626年的险境之后，君士坦丁堡似乎使拜占廷人更加确信帝国受到上帝的眷顾，这座城市在圣母马利亚的保护之下拥有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希拉克略的大冒险有了回报，他对敌人腹地的袭击仍在继续。627年9月，他再次率领军队进入波斯，又一次令库斯鲁二世吃了一惊。波斯国王本以为随着夏季和战争季节的结束，自己已经安全，所以希拉克略的军队一直到了尼尼微古城才遭到一支较大规模的去往泰西封的波斯军队的拦截。627年12月12日清晨，两军在开阔的平原展开战斗，战役持续了一整天。希拉克略本人也加入了激战，还被长矛刺中了嘴唇。这是一场混乱血腥的遭遇战，但是在这一天结束之时，波斯首领战死，拜占廷军队俘获了28面敌军旗帜，并占领了战场。波斯残军撤退，希拉克略随之前行至附近的达斯塔格德，在那里放任军队抢劫并烧毁库斯鲁二世的一处行宫。待在那里的国王本人在希拉克略的部队

到来的9天前，连夜逃到偏僻地带的一座农舍躲避。几天之后，拜占廷人追踪到那座农舍，但库斯鲁二世已经逃走。据说，希拉克略对那个农舍的小门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库斯鲁二世体型庞大，所以惊讶于库斯鲁二世如何设法进入其中。

尼尼微的胜利并非决定性的。被驱逐的波斯军队并未受损，库斯鲁二世又以3000名士兵进行增援，但是国王的突然逃离及其对战争的误判激起了宫廷内部反对的呼声。在其长子西罗埃（Siroy）的带领下，一群反叛者于628年2月23日将国王抓捕起来，随后不久就处死了他。西罗埃一登上王位，就约请希拉克略进行和谈，并许诺归还602年夺取的拜占廷领土，释放在长期战争中抓捕的拜占廷俘虏，包括大教长扎卡里亚斯与其他在614年耶路撒冷陷落中被捕的不幸魂灵。他的使节还交还了耶稣受难十字架与其他劫掠的圣物。希拉克略接受了这些条件，撤退了，他已经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他也十分清楚，626年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将领沙赫巴拉兹与泰西封宫廷意见有分歧，不久波斯将会爆发一场内战。629年，波斯人按约定从叙利亚撤军，巴勒斯坦、埃及与拜占廷东部边界又恢复至602年的局面。

当希拉克略回到君士坦丁堡时，欢迎仪式极其盛大。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大量当地居民在其子君士坦丁与大教长的带领下，手捧橄榄枝与蜡烛在希耶拉迎接他。入城仪式中，希拉克略在俘获的4头大象的带领下，在竞技场举行了凯旋游行。而最动人的庆祝仪式举行于630年春的耶路撒冷，当时希拉克略带着耶稣受难十字架，要把它归还给圣城，但是他还有账目要清算：曾经协助波斯人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城，并被禁止在距城市3英里[注]之内居住；波斯占领期间受到优待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被从城市教会中逐出，他们的教堂被腾给了查尔西顿派基督徒。这些措施具有惩罚的性质，但并非刑罚，毕竟希拉克略有资本表现出他的宽宏大量，他已经取得了少有的战绩和绝对的胜利。尽管其后岁月中，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但很少有将领曾享有这

样的胜利，也几乎无人像希拉克略一样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丢掉了自己的胜利果实。

庆祝活动几乎还未停息，就传来叙利亚边境阿拉伯人入侵的消息。这一消息在君士坦丁堡并未受到重视。阿拉伯人曾经频繁地越过边境进行劫掠，当地总督不得不组织军力对其进行驱逐。529年春的一场袭击中，一支阿拉伯队伍来到安条克城郊外，但拜占廷军队击败了他们，他们便迅速撤退了。总之，阿拉伯人尽管令人厌恶，却非当时的主要威胁。他们分成许多个小部落，所以无法像波斯人或阿瓦尔人那样组织大规模的军队。他们更热衷于争斗与家族仇杀，以至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互相打斗之中。对付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募他们当中的一些部落作为同盟者，用以对付波斯人与其他阿拉伯人。其中有一个加萨尼德部落，与拜占廷人长期结盟，其沿叙利亚边境的领土也成为拜占廷抵御其他阿拉伯部落入侵的缓冲地带。查士丁尼曾于563年欢迎过他们的国王、一性论派基督徒阿哈里斯·伊本·贾巴拉（al-Harith ibn Jabalah）来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在624年进入波斯领地时也曾带领一支大规模的加萨尼德人分遣部队。所以，事实上拜占廷人早已习惯于像对付边境其他恼人的民族那样对付阿拉伯人。无论如何，希拉克略需要处理比边境上小规模入侵事件更重要的事情。

对波斯人的伟大胜利以及叙利亚和埃及的失而复得，意味着拜占廷皇帝不得不再一次正视曾经困扰查士丁尼及其前任们的问题：让一性论派与查尔西顿派教徒团结起来。波斯人在613—619年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东部行省，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居民的分裂，他们认为没有理由为了保护一个将其信仰认作异端的政府去抵抗侵略者，波斯人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当耶路撒冷的查尔西顿教徒被大规模屠杀之时，一性论派教徒则获得了安宁。现在，波斯人返回家乡，拜占廷皇帝又任命了新的亚历山大港与安条克总督，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东部行省服从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拜占廷的问题。尽管君士坦丁堡对于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来说极其重要，但财富、权

力与管理日渐集中于都城还是把周边地区日渐推远，对于周边地区的居民而言，首都看上去既遥远又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尽管皇帝们曾经成功地诱使外国入侵者参与帝国防卫，但帝国臣民中说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的一性论派居民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如同前任皇帝一样，希拉克略决定妥协。630年，他接见安条克一性论派大教长与其他12位主教，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他们提出“单一能量论”，即基督的神性与人性都来自同一个主动力。633年6月，在亚历山大港召开宗教大会，宣布一性论派为正统教义。一性论派教徒看上去准备接受这一决定，教会的分裂似乎一度停止。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新的教义未能取悦查尔西顿派教徒，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抗议呼声如此尖锐以至希拉克略不得不推翻这一决定。638年，又引入一个新的妥协教义“一志论”，即基督尽管拥有神性和人性，但只有一个独立的意志。这一动议的支持者甚至比“单一能量论”的更少，因其既不被一性论派接受，支持它的查尔西顿派教徒也寥寥无几。为推行这一教义，希拉克略不得不诉诸武力，一性论派教士再次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而此时，这一问题又被另一入侵浪潮压倒。

希拉克略及其顾问团不知道，当他们与波斯人征战及纠缠于神学教义之时，在阿拉伯半岛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事态在迅速发酵。627年春，当希拉克略正筹划着对波斯的最后一次进攻时，另一轮无止境的阿拉伯部落战争正渐近结束。麦加的古来氏部落正在围攻麦地那城。穆罕默德作为寡不敌众的守卫者的领袖与古来氏部落的一员，5年前因其一神论的宗教信仰而遭到反对，不得不逃离麦加。围城以失败而告终。防守者通过在城墙周围挖掘网状壕沟挫败攻击者，迫使麦加人撤退。这次胜利标志着穆罕默德在阿拉伯部落中的崛起。这些部落接连与穆罕默德达成和平协议，并接受其日后发展为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诲。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他给整个阿拉伯半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与宗教统一。艾卜·伯克尔（Abu Bakr）作为第一任哈里发，

被选为继承者。因此，君士坦丁堡未加重视的633年的侵犯并非一次部落突袭，而是一场全面入侵的前兆。

事态的严重性逐渐凸显。阿拉伯人在633年年底穿过边境时并未遭到反击，直到634年年初，一个叫作塞尔吉乌斯的当地将领带领一小支部队击退了他们。阿拉伯人没有像往常那样带着战利品逃离，而是留下来坚持抵抗。塞尔吉乌斯与多名将士战死，幸存者被作为俘虏带回阿拉伯。战斗的失败未能在君士坦丁堡敲响警钟。希拉克略决定派遣其兄弟狄奥多尔（Theodore）从叙利亚北部基地埃德萨出发去处理此事。在狄奥多尔于加比沙与阿拉伯人进行激烈的遭遇战之后，皇帝让一个叫作瓦汗（Vahan）的将领替换了他。这一替换带来了转机，阿拉伯人被击退并且损失惨重。希拉克略可能认为威胁已经解除，便准备掉头返回君士坦丁堡。

然而，他的撤退为时过早，一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阿拉伯军队在636年年初越过边境。瓦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入侵而非突袭，便发出紧急情报请求增援。一支帝国军队被派出南下与其会合，两军会师之后，即便没有尼尼微战役胜利者的领军，也对阿拉伯军队的进攻给予强大的回应。两军在雅穆克附近会合，在7—8月的几周内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与演习。拜占廷军队无疑占据优势地位，他们的军力更为强大，并且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但是，几周之后，长期存在的问题开始导致他们无法对阿拉伯军队施以决定性的打击。天气对他们不利，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夹杂着沙尘的盛行风不断吹扫着他们的脸庞。军队中出现了分裂，与往常一样，拜占廷军队中存在大量阿拉伯同盟者的分遣部队。过去，这些阿拉伯人习惯于内斗，但在此刻，同盟者的薪酬遭到拖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逃向了阿拉伯军队。像贝利萨留一样，瓦汗也经历着宫廷与军中的流言蜚语，说他要密谋篡夺皇位。但最终导致拜占廷战败的并非这些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位阿拉伯将领的计策，他先是佯装撤退，引诱拜占廷军队追击，然后于夜里从侧翼包抄，并夺取了一座桥梁，这是拜占廷军队由暴露地带撤

退的必经之路。当拜占廷军队意识到后路被切断时，士兵开始恐慌起来，军心涣散。阿拉伯人看准时机，包围拜占廷人，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正如378年的阿德里安堡之役，拜占廷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设法逃出重围。拜占廷对阿拉伯人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终结。雅穆克战役之后，阿拉伯军队继续向大马士革挺进，迎接他们的是无任何抵抗的大敞的城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年前在征服波斯人方面还表现出巨大能量与勇气的希拉克略，在此刻却冷眼旁观，无动于衷。雅穆克战役期间，他远远地驻守在安条克，未发挥任何作用。大马士革陷落后，他没有尝试扭转局势，而是向西撤退。他一路带着628年从波斯人那里夺回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似乎在公开承认这些地区都已丢失。这次回城与波斯战争结束那次截然不同。当他到达希耶拉时，没有举着火把的崇拜者，只有一艘船等在那里，准备接上他迅速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但希拉克略拒绝登船，而是回到了在希耶拉的行宫。听闻皇帝的怪异行为，官员与身份显赫的民众代表穿过海峡请求他尽快回宫履职。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处，皇帝仍然执拗而冷漠，他派遣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与赫拉克洛纳斯（Heraclonas）穿过海峡代替他主持教会与竞技场的节日，并坚持要他们随后就返回希耶拉。

希拉克略身边的人渐渐意识到其倦怠外表背后的原因：皇帝莫名地极度恐水。如果要他再次回到首都，就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不能用一艘船将其送过海峡，而要聚集一支舰队，将船只连起来架起一座跨海浮桥，上面铺上厚木板以形成一条通道，成百上千株灌木被连根拔起放入通道两旁的花盆中。当一切就绪，皇帝被说服登上马，骑行穿越海峡，植物的枝叶有效地将大海从皇帝的视线中屏蔽。希拉克略这才得以回到君士坦丁堡。

此时，叙利亚的局势已经极度险恶。大部分乡村地区已处于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各个城市看到增援无望，便接连投降。耶路撒冷遭到围困，但由于害怕614年的事态重演，城中的居民坚守了两年。城市大教长通过与哈里发奥马尔（Omar）展开谈判而结束了僵局。638年2月，城门最终被打开，得胜的哈里发骑着一匹白色的骆驼进入城中，作为回报，他许诺基督徒及其教堂将不受骚扰。639年，安条克陷落，之后埃德萨与达拉斯陷落。640年年初，阿拉伯将军阿姆鲁（Amr）入侵埃及，直抵帝国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大教长与总督希鲁斯（Cyrus）也像耶路撒冷大教长那样，期待着拜占廷军队赶来救助，但是希望破灭，他不得不与阿拉伯人进行谈判。641年11月，他与阿拉伯人达成一个一年期的休战协定，答应一年之后拱手交出亚历山大港。随后，他向君士坦丁堡发出紧急求救，恳请皇帝在最后期限之前能够派兵援助。

也许，希拉克略未采取行动来扭转逐渐严重的败势并不奇怪，因为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正遭受着某种导致胃胀气的水肿的折磨，这给他的膀胱带来巨大的痛苦。641年2月，正是这一疾病使66岁的他离开了人世。他的过世本应成为拜占廷复兴的标志，但是希拉克略立下遗诏，坚持让他的两个儿子君士坦丁与赫拉克洛纳斯成为共治皇帝，从而使这一希望破灭。这一安排不得人心。君士坦丁的母亲是希拉克略的第一任妻子欧多西亚，她于612年去世；赫拉克洛纳斯的母亲则是希拉克略的第二任妻子暨侄女马丁娜（Martina）。皇帝与近亲结婚曾成为一时的丑闻，并且马丁娜在君士坦丁堡也不招人喜欢。大家的共识是君士坦丁三世是希拉克略真正的继承者，但是这位29岁的长子在继位时就明显体弱多病了。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希耶拉行宫中，因为他觉得那里的气候对他的健康有益。然而，就在他父亲离世4个月之后，他也死了，有传言说，他是被继母马丁娜下毒致死。

他的死亡并未结束帝国命运的不确定性。君士坦丁三世离世之前，曾写信给军队首领，请求他们保证他9岁的儿子君士坦斯

（Constans）的权利得到尊重。641年夏，拜占廷军队挺进查尔西顿，要求立君士坦斯为赫拉克洛纳斯的继承者。受到警告的赫拉克洛纳斯与马丁娜被迫让年幼的君士坦斯在公开场合露面以证明他仍活着，并对着耶稣受难十字架发誓将保护和珍惜他。尽管做了这些保证，城中还是发生了骚乱，赫拉克洛纳斯与马丁娜被迫同意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封君士坦斯为共治皇帝。此时，驻扎在查尔西顿城外的曾对周围葡萄园造成无尽损害的士兵要求以黄金作为他们的军饷。他们的首领升职，并被允诺豁免于任何惩罚。然而，马丁娜与赫拉克洛纳斯只是在延缓他们的气数。642年年初，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一群密谋者抓住了年幼的皇帝和他的母亲，并残忍地削掉赫拉克洛纳斯的鼻子。这不仅是复仇，但毫无疑问，它起到了复仇的作用。任何身体有残缺的人都会被认为不适于帝王职位，由此，策划者堵住了赫拉克洛纳斯政治复兴的所有机会。他们还割掉了马丁娜的舌头，以这种象征性的方式来宣告其政治影响的结束。两人自此从历史记载中消失，毫无疑问，他们匆忙离开，去往了某个不知名的修道院终老余生。年轻的君士坦斯二世登上皇位，由导演了马丁娜与赫拉克洛纳斯倾覆的顾问小心地辅佐着。

考虑到君士坦丁堡这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亚历山大港的希鲁斯没有获得任何援助也就不足为奇了：大部分拜占廷军队都忙着在查尔西顿郊外的葡萄园中四处践踏。希鲁斯于642年春离世，到了9月，城中的居民发觉再继续坚持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城门大开，阿拉伯人列队而入。交接过程并非和平有序，几座教堂与著名的图书馆在阿拉伯人入城后不久就被烧毁，但是，大多数一性论派教徒对于政府的更迭则报以欢迎态度。他们的大教长本杰明（Benjamin）回到自己的教区，并从阿拉伯将军阿姆鲁那里得到保证，其本人及其信徒可以不受干扰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然而事件并未完全结束。645年，君士坦斯二世及其顾问们派了一支迟到的舰队试图夺回亚历山大港。由于阿姆鲁未能在那里安置大量

阿拉伯卫戍部队，所以拜占廷人得以登陆，并轻松地夺取了城市。阿姆鲁立即响应，带领大批军队向亚历山大港挺进。这次，他发现城门紧闭，城墙得到了防卫，不得不利用围城器械与投石机发起攻击。打开一个豁口，阿拉伯军队得以进入后，拜占廷的抵抗瓦解了。舰队将领曼纽尔（Manuel）被杀，剩余兵力返回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又回到620年的局势，其东部行省全部遭到践踏，并且，自此之后永远失去了这些领土。

几年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阿拉伯人占领叙利亚与埃及海岸后，便开始建造舰队。他们来自沙漠，没有任何自己的航海技术，便利用当地劳工建造船只，并雇用他们作为船员，准备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入海洋。649年，在阿拉伯籍叙利亚总督穆阿维耶（Muawiyah）的领导下，舰队袭击了拜占廷塞浦路斯岛，夺取并摧毁了古称萨拉米斯的君士坦蒂亚城。几年之后，阿拉伯人在罗德岛登陆。尽管只做了短暂停留，但带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战利品：一座32米高的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巨型铜像遗骸。它曾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于公元前228年的地震中倾倒之后便一直躺在那里。铜像被切割、运走并售卖。650年，穆阿维耶袭击君士坦丁堡，他的舰队夺取了查尔西顿，并准备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发起进攻，却遭遇风暴而被驱散。

拜占廷人迟早要与阿拉伯人在海上发生正面冲突。655年，穆阿维耶开始在叙利亚的黎波里另起炉灶，建造舰队。城中监狱里的一批拜占廷俘虏发动暴乱越狱，所以准备工作进展不顺。越狱者冲向码头，点燃仓库与装备，然后征用几条船驶离，加入帝国军队。穆阿维耶并未因此受挫，他继续筹备，并派遣舰船攻击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城镇。君士坦斯二世当时已20岁出头，正与拜占廷舰队一同守候，准备在福尼克斯港外拦截阿拉伯人，但是阿拉伯人从一开始便占据上风。据说，海水被拜占廷人的鲜血染红，曾领导的黎波里暴乱的一个将士请求皇帝赶快逃离。君士坦斯二世把自己的斗篷和长袍给了另一个人，

然后被从旗舰上赶下，登上一条小型单层甲板帆船，快速驶离混战现场。那个穿上皇帝长袍的人站在旗舰之首，指挥着战斗，挥砍着登船的敌军，直到最后被包围杀死。君士坦斯二世安全地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已经失去舰队的他，肯定在思忖着首都作为安全避难所还能坚持多久。626年，波斯人与阿瓦尔人因为缺少船只未能夺取这座城市，而武装的阿拉伯舰队再次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是时间问题。他焦虑的眼神从海岸一侧的城墙向南扫视着地平线，敌人的船只迟早都会出现。

---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第四章 转型的世界

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祖国并被其臣民寄予信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帕夫萨尼亚斯注（约160年）

不论当时多么恐惧，在帝国舰队于福尼克斯港被阿拉伯人击败的100年后，拜占廷依然屹立，尽管此时的帝国与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已不能同日而语。它的版图已急剧缩减，不仅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埃及各东部行省，697年，阿拉伯人还蹂躏了其迦太基总督区，结束了自534年贝利萨留重新征服之后拜占廷在那里的统治。拜占廷保留下来的最大一块领土在小亚细亚，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至托罗斯山脉。克里特岛依然处于拜占廷统治之下，但塞浦路斯已成为共治领土，根据686年的一项条约，拜占廷与阿拉伯同意共同分享当地税收收入。在巴尔干半岛，拜占廷人只是固守几个设防的飞地，如沿海一带可以通过海路获得补给与援兵的城镇塞萨洛尼基、雅典、帕特雷与莫奈姆瓦夏等，其他地方都已被斯拉夫人占领。意大利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帝国已经败退，尤其当伦巴第人于751年最终夺取拉韦纳后，结束了拜占廷在那里的总督统治，并将拜占廷势力控制在南部的阿普里亚、卡拉布里亚与西西里岛。在失去这么多西部领土后，拉丁语在法庭与行政机构中彻底消失，希腊语逐渐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些收缩的边境之外，新的强敌取代了旧敌。波斯萨珊王朝已经消亡，他们应对阿拉伯人进犯的能力还不如拜占廷人。638年，在卡迪西亚遭到灾难性溃败之后，他们再也无法阻挡阿拉伯人在自己国土

上的泛滥与肆虐。652年，萨珊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亚兹德盖尔德三世（Yazdgerd III）在乔装逃亡途中悲惨地死去，据说他是被一个企图抢劫他财宝的磨坊主谋杀的。此时，拜占廷东部边界代替波斯帝国的是倭马亚政权的继承者阿拔斯帝国。它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帝国，领土从阿富汗一直延伸至摩洛哥。其首都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是《一千零一夜》当中许多故事的背景。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阿瓦尔人在626年进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逐渐衰落，他们失去了对斯拉夫人的控制，在多瑙河盆地的统治也被另一个西迁的突厥人部落保加利亚人代替。7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人曾沿着熟悉的路线向南越过多瑙河。拜占廷皇帝试图在其定居下来威胁当时仍属于帝国领土的沿海地区之前将他们赶走，但最终惨败，保加利亚人得以自由地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建立定居点。他们与当地的斯拉夫人通婚，并使用他们的语言，渐渐融入斯拉夫人。之后崛起的保加利亚汗国已不再是各个部落的聚合，而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拥有设防坚固的首都普利斯卡。保加利亚人都是多神教教徒，崇拜着他们祖先的神灵，如同在巴格达的阿拔斯帝国的臣民一样，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政权。

领土的急剧缩减与伴随而来的局势剧变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了痕迹。人口减少了，当时的人口规模只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的一部分。一部分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作用：当受到阿拉伯军队围攻的威胁时，那些对于城防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人被勒令离开，因为埃及已经丢失，向不断膨胀的人口供给粮食已不再是件易事。最终，不断爆发的瘟疫导致了人口的锐减。747年夏，疫情恶化导致墓地极度短缺，幸存者们不得不将尸体埋于果园之中。宏伟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仍高耸于城中，但是，君士坦丁与查士丁尼时期伟大的建筑计划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帝国领土急剧缩减且为强敌所困，但是那些曾经降临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帝国变得更为坚强。毕竟，东部各省的丢失结束了

帝国内部关于基督本性的争议，因为此时的帝国领土只包括那些查尔西顿派教徒所在的地区，而一性论派教徒都生活在阿拉伯统治之下。性格执拗的君士坦斯二世曾坚持“一志论”妥协教义，也许他希望能够恢复对埃及与叙利亚的统治。然而，他的儿子及继任者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在681年一次专门召集的基督教会议上废弃了这一不受欢迎的教义。同样，君士坦丁堡人口的缩减也有助于平息长达两个世纪的分裂。尽管竞技场中的比赛仍在进行，派别分立与群体暴力却早已成为历史。蓝绿两党已成为私人俱乐部，其主要功能是参加帝国的游行和庆典。

失去大量领土的帝国也变得更为紧凑、更易于防守，在小亚细亚尤其如此。与几乎没有自然屏障的东部各省不同，小亚细亚东部有托罗斯山脉作为防守。向西进攻的敌人不得不经过仅有的几个关隘，如西里西亚山口，帝国很容易就能追踪到他们的行迹，并对他们的侵袭目标做出判断。北部的路线更为平坦，但那里的冬季异常寒冷，那里的山口一年之中有好几个月都被冰雪覆盖，这就截断了敌人撤退的路线。所以，任何入侵的敌军都面临着要在阴暗的冬季孤立于荒凉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严峻形势，这足以让他们提早撤退。阿拉伯人更喜欢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回到气候温暖的叙利亚，在来年春季再恢复战斗。

希拉克略之后的拜占廷皇帝寻求通过重新组织防守军队来利用这些天然屏障。他们不是让军队驻扎在边境，而是让他们撤回，分散于整个小亚细亚。与此同时，过去由城市负责向周围地区征税的行政管理体系也被停用，取而代之的制度是小亚细亚被分割为7个称为“塞姆”（军区）的新行政管理区域。在这些区域内部，就像过去的总督区一样，军政合一。每一个军区都有自己的军队，其将领或将军同时也是军区的总督。他既要带领军队参加战斗，也要负责征税和维持治安。由于税收收入自查士丁尼时期以来下降得厉害，他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来供给和装备士兵。士兵们不再受领薪金，而是被赠予

土地，自己为自己提供给养与马匹。为了得到报酬，士兵必须参加战斗，其余时间则耕种农田，以维持自己与家人的生活。

当时，关于这种激进的改革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所以，其时间进程非常模糊。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到685年，军区制已经存在，所以这一制度的创立应归功于君士坦斯二世与君士坦丁四世，尽管这一制度之后仍继续发展。在黑暗绝望的7世纪与8世纪初，这一新制度大受欢迎。军区将军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他们不用等待君士坦丁堡的命令就可以采取行动，并且能够迅速集中自己的军队力量来对抗阿拉伯人的袭击。此外，由于军队遍布于小亚细亚，即便行动迅速的袭击者也无法绕开他们，不论阿拉伯人袭击何处，他们都能够及时进行防守。最后，土地尽管被赠予士兵阶层使用，但仍为帝国所有，帝国并未有任何损失。

军政权力的重新组织在小亚细亚的地貌上也留下了痕迹，以前作为旧行政管理制度支柱的曾经繁华一时的城市消失殆尽。马格尼西亚已经缩减至仅剩300米乘以250米见方的区域。715年被阿拉伯人夺取并毁灭的帕加马，只剩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遗址。此外，随着人们抛弃这些旧的城址，在自己的定居之所建立更加适应形势的城镇，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开始出现。人们围绕着城堡区或设防的山顶建立了一系列规模更小的定居点，以便在阿拉伯人袭击时能够迅速逃离。在色雷斯松军区的萨迪斯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例。人们抛弃平原上不易防守的古代城市，围绕建有要塞的高地建造了新的城市，只有一条非常陡峭的通道能够到达城堡，其他各面都是峭壁，并且沿着通道还建了一座堡垒，在袭击者靠近城墙之前就可以从隐藏的缝隙中放箭。其中最为奇特的可能要属在小亚细亚中部的卡帕多细亚地区所发现的为了防卫而建造的城市。那里的居民从当地柔软的火山岩向下挖掘，在地表之下建造居所、教堂和谷仓，在危险时刻，这些地下场所就可以变为避难所。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帝国的景象，还有人口。拜占廷人十分清楚，人力资源与土地同等重要，他们通过将人口迁至各个需要加强防御的地区，以尽可能地对其加以充分利用。皇帝查士丁尼二世（685—695年、705—711年在位）就曾将小亚细亚东部的边境城市日耳曼尼基亚中即将被阿拉伯人俘虏的许多居民迁至色雷斯地区，在那里，他们可以守卫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以抵御斯拉夫人的进攻。如之前一样，拜占廷人还将他们击败的敌人安置于拜占廷境内。688年，当在色雷斯地区与斯拉夫人交战之时，查士丁尼二世便带走了大批俘虏和斯拉夫逃兵，南下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阿拜多斯，用渡船将他们运到小亚细亚，然后将他们驱逐至北部，授予他们土地，把他们安置于奥普希金军区，无疑，当阿拉伯人袭击时，他们要提供军事防守。同样，一个居住在拜占廷与阿拉伯交界处的基督教部落马代特人，也被迁至帝国的欧洲地区。750年，任何在拜占廷境内旅行的人所看到的都是一个真正的多种族社会。希腊语成为官方与教会语言，但在色雷斯地区人们普遍说的是亚美尼亚语，在小亚细亚地区则流行着斯拉夫语。这一政策对于那些以这种方式得到安置的人而言有时会造成极大的困境。他们常常因长途跋涉而不得不抛弃大量家产，据说有人甚至宁可自缢而死也不愿被驱逐至陌生的异域。因此，那些被迫迁移的人口心怀深深的怨恨，当需要他们投入战斗之时，他们可能并不如期待的那样忠诚。692年，拜占廷人在一次阿拉伯人的袭击中遭遇重创，当时，军队中就有一支大规模斯拉夫人分遣部队叛变投敌。但是，当年轻、健壮的人力成为最宝贵的资源时，还是值得冒此风险的。

阿拉伯人几乎每年都对小亚细亚发动袭击，所以这些紧缩与重组政策不断受到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阿拉伯人获得两处重要的前线基地之后，他们的袭击越来越明目张胆。其中一个是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塔尔苏斯，另一个是托罗斯山脉以西的梅利泰内。对后者的占领使得阿拉伯人在战争季节结束之时获得一个安全的休整场所，而不用撤到山的另一边。他们的军队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全年待在小亚细亚，四处劫掠。726—727年，一支由哈里发亲自率领的军队进军小

亚细亚，夺取了凯撒里亚，另一支袭击部队则深入拜占廷领土攻击了尼西亚。尽管他们最后夺城失利，但撤退时还是满载战利品而归。由于无法完全阻止这些袭击，拜占廷人只能想出一些方法来对付他们。拜占廷人没有采用阵地战，而是使用尾随策略：当阿拉伯军队带着战利品撤退至梅利泰内和托罗斯山脉时，他们尾随其后，拦截掉队的士兵，夺回部分被劫走的物品。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早期的利用山顶烽火的警报制度，以在阿拉伯人通过托罗斯山脉的关隘时向军区将军发出警报，让他做好应对的准备。战略调整获得了回报。740年5月，在一支规模庞大的阿拉伯袭击队伍向东撤退之时，拜占廷将领没有试图阻止阿拉伯主力的撤军，但成功拦截了两支后卫部队，在阿克洛伊农战役中将其几乎全部歼灭。

这些胜利无疑令人振奋，但无法阻止袭击，而且，如果阿拉伯人成功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些胜利也将全部变为徒劳。674年，阿拉伯人从海上发动全面攻击。一支大规模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基齐库斯城；另一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则穿过马尔马拉海，在那里与他们会合。他们在那里驻扎了几年，每到夏季便与海墙之外的拜占廷船只展开持久战。若不是拜占廷人使用一种惊人的策略而占据优势地位，两军相持肯定毫无止境。阿拉伯舰队船员注意到对手船只的船头上安装的奇怪的、突出的管道，但他们定然没有预料到，那些管道会发出巨大的轰鸣，然后喷出流动的火焰。火苗几乎无法扑灭，在水面上燃烧着，触及火苗的任何船只都立即被大火吞没。

这是拜占廷海军首次使用“希腊火”的记载。据说，这是一个名叫卡利尼科斯（Kallinikos）的叙利亚基督徒想出的办法，他曾带着这一发明逃离阿拉伯的统治区来到君士坦丁堡。希腊火的确切配方无人知晓，很明显，秘不可宣。它很可能是由硫黄、沥青、生石灰等混合而成的，甚至加了一些在高加索地表很容易找到的原油。这一混合物如何通过管道被发射出来，以及如何点燃，则是另一个机密。有人怀疑这一武器对于使用它的人来说，就像它所瞄准的目标一样危险。

也许它并非20世纪那种能够扭转战局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超级武器，因为其使用者发现对敌船发动直接打击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如果阿拉伯人之前从未见过它，也许它会有一种打击对手士气的心理作用，并使阿拉伯人最终做出撤退的决定。天气也再一次帮到了拜占廷人：当阿拉伯人沿着小亚细亚海岸向埃及撤退时，一场暴风雨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船只。

真正导致阿拉伯人在7世纪70年代失利的也许并非希腊火，而是他们未能完全包围整个城市。当阿拉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面上与拜占廷人交锋之时，其陆军仍然坚守在亚洲一岸而未采取行动，这便使拜占廷人的补给与援兵能够从陆墙突围入城。40年之后的717年夏，这一疏漏得到弥补，当时阿拉伯人联合发动了一次最危险的进攻。哈里发的兄弟马斯拉马（Maslama）将军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穿越小亚细亚，登上一支舰队北上爱琴海，进入马尔马拉海。这一次，陆军没有继续在亚洲驻留，而是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到达欧洲，然后北上来到君士坦丁堡陆地一面的城墙。在那里，马斯拉马沿着拜占廷的防卫建造了一些土木防御工事，以防止拜占廷人的增援在其舰队忙于海上封锁之时通过。很显然，阿拉伯人想以饥饿迫使君士坦丁堡投降，因为他们也无望突破城墙。

拜占廷人对于陆上的封锁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在等待时机从海上发动攻击。9月1日，机会来了。一支大规模阿拉伯舰队北上马尔马拉海，为驻守在陆墙之外的军队提供补给，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身陷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的逆流之中无法前进，随后又被风向南吹去。拜占廷舰队立即带着希腊火从金角湾出发进行突围。阿拉伯船只由于满载负荷无法逃离，很容易接近并被点燃。一些着了火的船只逃到海墙之下搁浅，另一些则在马尔马拉海上无助地飘荡着，共有20条船被彻底烧毁。这次胜利尽管令人振奋，但未能打破717年冬至718年的持续封锁，最终再无任何超级武器挫败阿拉伯人，只剩下平淡无奇的办法：冒险为几千名船员及围困于城中的人提供足够的食物。

恰逢717年的冬季异常寒冷，地面被积雪覆盖了将近3个月。尽管有阿拉伯人的封锁，拜占廷人在防御工事内仍有许多食物。他们早在几年之前就料到战争在即，便预先储备物资，并要求那些没有3年食物储备的人离开城市。并且，城内有地下储水设施，所以居民们也有足够的饮用水。随着天气日益恶劣，围城者开始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阿拉伯人陷于大雪封锁的色雷斯乡间，不得不吃掉曾为他们驮物的驴和骆驼，吃光了驮兽后，就开始啃食树根和叶子。甚至有传言说，他们当中出现了同类相食的行为。阿拉伯人奋力通过海路为其提供补给。718年春，一支拥有300艘船只的大规模舰队满载着装备与粮食从埃及出发，穿过马尔马拉海到达君士坦丁堡。舰队指挥无法确定附近是否有拜占廷战船，只能谨慎前行，待夜幕降临，才命令船只靠岸下锚。夜里，一支大规模基督教桨手分遣部队看到机会来了，就把舰队上的一些小船偷走，划到君士坦丁堡，一上岸，他们就将阿拉伯补给船的位置上报皇帝。天刚刚破晓，一支拜占廷小型船队便开始发动袭击。困在海湾中的阿拉伯船只成了容易击中的目标，许多船只被希腊火点燃，还有一些被拜占廷士兵登船抢走了货物。之后，局势对阿拉伯人愈加不利。在海峡亚洲一岸着陆的粮草征收队遭到伏击与屠杀，与此同时，及时与保加利亚人结盟并从后方对阿拉伯人发动的袭击又导致几千人丧生。到了718年夏，阿拉伯人显然已失去取得围城胜利的希望，8月，阿拉伯军队与舰队撤离。这是阿拉伯人最后一次试图夺取拜占廷首都与围城失败。之后，拜占廷人又于740年在阿克洛伊农取得胜利，确保了尽管与查士丁尼时代相比贫弱许多的帝国不至于消亡。

君士坦丁堡及其帝国的幸存不仅要归功于天时、地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希腊火，关键时刻的强人执政也是重要原因。717—718年被围城期间，正是皇帝利奥三世（LeoⅢ，717—741年在位）当政时期。出生于小亚细亚日耳曼尼基亚城的利奥及其家族，在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迁移至色雷斯地区。705年，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因贡献500

只羊而受到查士丁尼二世的关注，当时，皇帝正带领军队进军君士坦丁堡，随后成功地从篡位者手中夺回了皇位。他的支持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被调到皇帝身边。713年，利奥已经成为最大的军区安纳托利亚军区的将军，4年后，他发动政变，推翻了皇帝狄奥多西三世，自立为皇帝。尽管是一个篡位者，但是利奥三世上台之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其上台伊始，利奥三世便于马斯拉马围城期间领导了君士坦丁堡的防卫，并在740年领导拜占廷取得了阿克洛伊农战役的胜利。此外，利奥三世不仅是一位军事强人。他十分清楚，由于哈里发帝国太过强大，仅通过地面战场无法取得胜利，所以，如其前任一样，他时常寻觅在地理位置上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的同盟者。717—718年围城期间，他与领土恰恰位于阿拉伯战线之后的保加利亚人结盟，当然也向他们支付了巨额报酬。在制衡阿拉伯人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突厥族哈扎尔人，其领土恰恰位于哈里发帝国以北、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如拜占廷人一样，哈扎尔人也常常受到阿拉伯人的侵扰，因此他们乐于同拜占廷人合作，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曾与哈扎尔汗王的妹妹结婚而开启了结盟，利奥三世则于733年安排其子君士坦丁与哈扎尔公主通婚，从而加强了两国的结盟。

利奥三世既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行政长官。他引入各种内政改革，出版法律手册，并发行一种新的银币米利阿雷西翁。由于他十分清楚军区制的主要缺陷，因此继续推行军区制改革。尽管授予军区将军广泛权力使其在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时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但同时也赋予了军区将领挑战君士坦丁堡皇位的必要资金，利奥本人正是凭借这一优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他将超大的安纳托利亚军区划分为几个小军区，一方面使其资源能够满足军区将领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防止他人步其后尘。这便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自己登顶后堵住后继者上升通道的经典案例。这一措施似乎起了作用，因为利奥三世在位时间很长，最后寿终正寝并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利奥的儿子、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所谓的北叙利亚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可以算是统治拜占廷的最伟大的皇帝之一。遗憾的是，他所生活的动荡危险的时代湮没了他的声名。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很少，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类似于拉韦纳的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镶嵌画的肖像保存下来，只是在其发行的硬币反面有一个程式化的半身像。像中是一个留着短须与长波浪头发的人，举着十字架或一个球体，与硬币上利奥三世的肖像十分相似。现存的记载中有一些关于其性格的暗示。他热衷于在竞技场观看比赛，还命人在奥古斯都广场的著名地标米利翁拱门上画上了纪念赛车比赛的壁画。他饱读诗书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曾创作13本神学著作。他可能也爱好音乐，曾将一架风琴作为外交礼品馈赠给法兰克国王。

关于君士坦丁五世的一个确切信息是，他曾仔细思考衰弱的拜占廷帝国如何在新的充满危险的世界里、在阿拉伯扩张主义及中亚部落迁移浪潮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失去如此多的领土后，保留君士坦丁堡就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但是在利奥三世统治后期，首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地震不仅摧毁了众多教堂、修道院与雕像，还震毁了部分陆墙。君士坦丁五世随即开始并最终完成了修缮工程，在一些塔楼上至今还能看到纪念这一工程的铭文。君士坦丁五世在其整个统治期间谨慎地照看着他的主要资产——帝国的都城。747年瘟疫之后，为了增加缩减的人口，他曾用船只从希腊各岛迁来新居民。当储水设施由于干旱而枯竭时，君士坦丁五世又将整个供水系统进行了彻底检修。他还从各省召集几百个泥瓦匠和泥水匠，以恢复626年阿瓦尔人围城期间切断的瓦伦斯引水渠，最终，清水再一次流入君士坦丁堡。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盛衰，拜占廷一直保存的货币经济却使皇帝拥有财力用以迁移人口，并向他们提供给养与报酬。君士坦丁五世享有运转正常的税入体系，这使他能够调动资金实施这类大型工程。

虽然君士坦丁五世把首都看得非常重要，但他并未像其后的几位皇帝那样认为它是一切的中心。如其前任一样，他常常将人口迁移至

需要防卫的边境地区。人们普遍认为他曾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阿特纳斯河流域安置208000个斯拉夫人，还把同样数量的叙利亚基督徒与亚美尼亚人迁移至色雷斯地区，安置于危险的保加利亚边境的各个要塞。他深知以鹬蚌相争的计策来降低边境威胁的重要性，延续了其父与哈扎尔人的结盟。8世纪60年代，哈扎尔人入侵阿拉伯帝国，分散了阿拉伯人的注意力，使拜占廷大受其益。同样，如其前任一样，君士坦丁五世既看到了军区制在小亚细亚提供防卫与减轻供养常备军负担方面的价值，也十分清楚让军区将军大权集于一身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在其统治伊始，他就差点儿被奥普西金军区将军阿尔塔巴斯杜斯（Artavasdos）的反叛所推翻，而且曾一度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经过3年的战争，在安纳托利亚军区部队的支持之下，他才最终扭转败局。在这之后，他的首要行动就是将奥普西金军区分割为几个小军区，以削弱其将领的权力基础这一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君士坦丁五世还采取了另一项抵消军区兵力的措施，以防止叛乱再次出现：创建塔格玛塔近卫军。这是由皇帝本人直接指挥的小规模精壮兵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仅效忠于皇帝，用以对抗反叛的军区部队。君士坦丁五世常常表现出对下属的关怀，似乎已培养出所需要的忠诚。他公开宣称773年所发动的保加利亚战役因为基督徒的伤亡很小，所以是一场“高贵的战争”。在另一个战场上，在他的一些战船于黑海沿岸被毁后，一直到用渔网捞出尽可能多的士兵尸体，并让他们享有体面的葬礼，皇帝才离开现场。无疑，君士坦丁五世颇受近卫军战士的爱戴，不仅因为他对他们福利的关心，而且因为他本人也骁勇善战，在东西方战场上都取得了众多引人瞩目的胜利。746年，君士坦丁五世利用阿拉伯人内战时机发动军事进攻，率领部队翻越托罗斯山脉，进入叙利亚境内，一个当时的拜占廷军队从未涉足的地区。他重新夺取了父辈们的故乡日耳曼尼基亚城，却无意对其长期占领，因为他正忙于两线作战，还要赶赴其他战场。718年，与其一同抗击阿拉伯人的同盟保加利亚人，则在寻求扩张他们的领土。756年，为争夺君士坦丁建造的给叙利亚人与亚美尼亚人提供住所、守卫

拜占廷领土的要塞，拜占廷与保加利亚之间爆发了战争。当君士坦丁拒绝为这些要塞交付贡金时，保加利亚人侵入拜占廷，几乎攻到君士坦丁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763年6月，君士坦丁发起报复行动。他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沿黑海向北行进，在色雷斯的安恰罗斯持续一整天的战斗中，遭遇并击溃了保加利亚军队。在君士坦丁堡，他以一场自希拉克略之后再未出现的凯旋仪式庆祝自己的得胜。

人们也许认为，取得如此之多战功的君士坦丁五世会受到拜占廷人的尊敬、爱戴与铭记，但事实并非如此。保存下来的历史记载全都对其充满怨恨与敌视，谴责他是撒旦的爪牙与基督的敌人。这些来自修道院的作者都以侮辱性的绰号蔑称他为“臭虫”，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译的诨名，意为君士坦丁五世的名字是人的粪便。他的诋毁者声称，当君士坦丁还是一个婴儿时，在接受洗礼的过程中，他将大便排在了圣水盘中，但在场的教士未能注意到这一晦气行为，继续进行典礼，将受到污染的圣水倒在了这个孩子的头上。这些故事背后愚蠢的愤怒与皇帝的军事或行政管理毫无关系，而只是针对他的神学观点，因为君士坦丁五世反对圣像崇拜。

7世纪，人们认为基督、圣母马利亚与圣徒的画像有助于从敌人手中拯救拜占廷。希拉克略就曾带着一幅基督像参加战斗，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曾在阿瓦尔人兵临城下之时将圣母子像置于城墙之上。圣像已经成为拜占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圣索非亚大教堂到最小的乡村圣祠，每一座教堂都装饰着这类画像，有的以华丽的镶嵌画形式呈现，有的以廉价的壁画或者简陋的木版画形式呈现。它们的功能已不仅仅限于装饰与视觉教诲，其本身正渐渐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并被认为能够施展奇迹。传言遍地，譬如有人曾说，一个寻找水源的妇女挖了一口井，但没有出水，在她将一幅圣徒像放置井中之后，井底就奇迹般地冒出了清水。虽然知道多数传言都是流传的迷信，但政治

当局意识到，可以利用对圣像的崇拜达到自己的目的。查士丁尼二世将基督像刻在所发行的金币以及大皇宫主要入口的黄铜大门之上，以便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上帝保佑的视觉象征。

即使圣像与拜占廷生活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但正如4世纪萨拉米斯主教埃皮法尼乌斯反对将基督像印于窗帘之上一样，仍有一些人对圣像抱有怀疑。在东部边境，诸如日耳曼尼基亚等经常易手于阿拉伯和拜占廷之间的城市中，疑虑尤为强烈。那里的基督徒十分清楚，在伊斯兰哈里发帝国，形势在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起初，对于圣像的政策十分宽松，但到了8世纪初，清真寺内部去除了所有关于活物的画像，相反，伊斯兰艺术越来越聚焦于图案与书法。721年，哈里发耶齐德二世（Yazid II）的政策则更为激进，他下令去除其治下所有教堂内部的圣像。724年耶齐德二世的离世似乎影响了其政令的彻底执行，但毫无疑问，在关于圣像的问题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考虑到阿拉伯人在扩张领土方面靠牺牲基督徒的利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一些拜占廷人开始思索，也许穆斯林是正确的，基督徒也许应为其违反“摩西十诫”中的第二条——禁止制作和膜拜任何雕像——而受到惩罚。

8世纪20年代，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得到报告，小亚细亚的两位主教，即纳克里阿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of Nakoleia）与克劳狄堡的托马斯（Thomas of Klaudioupolis），对于圣像持有一些非正统的观点。君士坦丁拒绝依照习惯向圣像鞠躬，而托马斯则从其教堂中移除了圣像。皇帝利奥三世与这些教士一样对圣像持怀疑态度，但其继位后，并未立即公开表明对圣像崇拜的厌恶，也许当时他的头脑中考虑得最多的是迫在眉睫的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然而，到了724年，其顾问中一位曾作为俘虏在哈里发帝国待了许多年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主教，开始公开反对圣像崇拜。据说，他是受到上帝旨意的鼓动才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726年秋，锡拉岛（今圣托里尼岛）上的火山爆发，喷射出的浓烟直射天空，浮石如阵雨般落在整个爱琴海

及其周围地区。这次火山爆发被利奥三世解读为上帝对于帝国之内圣像崇拜的愤怒的显灵。大概就是在这时，利奥三世下令去除黄铜大门上的基督像，几年之后，他罢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任命一位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担任此职。除此之外，利奥三世再无其他行动。教堂中的圣像并未被去除，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圣像崇拜者也并未受到惩罚。毕竟，几代拜占廷人是伴随着“圣像可以连通神恩，因此应被珍惜和崇拜”的信仰长大的。这一深刻的信念无法通过制定法律被即刻消除。曾发生过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臣民的危险事件，这件事严重警告了反对圣像崇拜者。当一队士兵被派去除掉黄铜大门上的基督像时，一群抗议民众聚集起来。据传，当一名士兵正在剥落圣像之时，一位妇女将其脚下的梯子推倒，导致这名士兵头朝下摔了下来，不幸死去，当天还发生了另外几起伤亡事件。很明显，利奥三世满足于在宫廷之内实施关于圣像的禁令。

君士坦丁五世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惧怕圣像，与其父一样不喜圣像崇拜仪式，还是一位反对圣像崇拜者，准备采取措施彻底消除圣像崇拜。也许这仅仅是个人信仰，但也有其政治上的考虑。741年，奥普金斯军区将军阿尔塔巴斯杜斯发动叛乱反抗君士坦丁五世时，曾蓄意争取圣像崇拜者的支持，宣布只要自己掌控了君士坦丁堡，宫廷就不再反对圣像崇拜。

君士坦丁五世在随后的内战中取胜，也许在他眼中，圣像崇拜者除了犯了神学上的错误之外，还带上了反叛的色彩。他仍然谨慎前行，并不急于获得支持，但是754年，他下令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希耶拉召开一个由338名高级教士参加的大会。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这些主教发布一系列教令，谴责圣像崇拜行为及那些为其辩护的人，并威胁说，此后任何制作圣像的人都将受到可怕的惩罚。此后，破坏圣像不仅是一种观点，而且成了政府的一项政策。

这就意味着，宗教大会并未颁布命令要求销毁所有圣像，也未对艺术品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相反，由于诸多教堂与建筑都需要修缮，破坏圣像的行动似乎只在零星地进行着。圣索非亚大教堂附近的圣伊雷妮教堂成为第一批受攻击的目标之一，它曾毁于740年的地震。曾经悬挂于教堂半圆壁龛上的圣母子像，被一个简朴的十字架代替。布拉赫奈的圣母教堂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也得到恢复。这是一座尤为著名的圣祠，因为那里保存着一件珍贵的圣物——圣母面纱，所以教堂内部装饰着描绘基督生活情景的华丽的镶嵌画。君士坦丁五世下令去除这些装饰，而代之以自然景色（树木、花草和各种鸟类），让这座教堂回到几个世纪之前早期拜占廷教堂的装饰风格。这些行动并非一时之功，与君士坦丁五世持有相同观点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一直到768年才将自己官邸墙上的基督及圣徒的画像刮去。

关于君士坦丁五世统治的记载十分匮乏，以至现在很难判断他当时的确切目的。皇帝之所以不快，不仅因为圣像崇拜，还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基督教其他方面的变化，他希望回到早期的、更为简朴的宗教。所以，不仅是信仰的视觉表现受到冲击，拜占廷的其他宗教现象即圣徒也受到打击。显然，针对君士坦丁五世破坏圣像的最主要的抗议者是那些隐士与教士。皇帝无情地对待他们，而不是按照传统对他们施以尊重。安德鲁·卡里维特（Andrew Kalyvites）公开谴责君士坦丁五世，并把他比作多神教皇帝朱利安和阿里乌派皇帝瓦林斯，结果被鞭笞致死。一位居住在小亚细亚的隐士斯蒂芬·杨格（Stephen Younger）被抓捕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五世的近卫军士兵将一根绳子套在他的脚上，在街巷中拖行直至他死去。君士坦丁之所以将这些圣徒当作打击对象，很可能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自己的破坏圣像观点，而且还因为他不满于他们在拜占廷社会中所起的逐渐显著的作用。据说他曾称呼教士的外袍为“黑暗的僧袍”，这是一种类似多神教教徒佐西姆斯的奇怪反应，其众多惩罚手段的目的似乎就在于羞辱这一特殊群体。766年夏，他将一群教士集中起来，要求他们顶着人们的讥笑，每人手牵一名妇女在竞技场游行。他最喜欢的一种惩

罚方式是剃掉他们的胡子，剥夺他们被认为是拜占廷社会中男性最重要的标志物。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几个修道院被没收，改作他用。地处陆墙附近的霍拉的圣救世主修道院被改作收容所，其余的则被改作近卫军士兵的营房。统治者为了保卫帝国而勤勉地节约人力，当然会看不惯这么多男性选择宗教生活而不服军役。

这些观点对于君士坦丁五世死后的声名是致命的，因为几乎所有关于那一时期的现存记载都出自支持圣像崇拜的教士之手。那些作者在记录他的去世这件事上也都极力添油加醋。775年8月，君士坦丁五世再次出征保加利亚，但在军队到达边境之前，他的腿就开始疼痛。他被送往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塞林布里亚港口，但在到达之前，他已开始发烧。他们将他安置于一条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船上，并在他的要求之下吟唱赞美圣母的圣歌，但在船到达大皇宫码头之前，他便离世了。一位编年史学家愉悦地声称，由于皇帝已经离世，他呼喊道“我曾被抛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继而宣称皇帝就像古代暴君一样无比邪恶。当然，这是之后所写。当时，君士坦丁五世无疑作为一位伟大的君主受到臣民的哀悼，并被置于精致的石棺中，葬于圣使徒教堂。

尽管关于圣像的争执唤起了拜占廷人对持有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所保留的刻薄的蔑视，但其造成的不和并未像一性论派与查尔西顿派之间的争议那样给帝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些年来，帝国坚持抵抗外敌并强化内部改革，以使其继续生存。然而最终，不论君士坦丁五世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与权力，圣像崇拜者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一直有着一个显著的优势。即使圣像崇拜在君士坦丁堡被认定为谬误，偏远地区的基督徒仍拒绝接受改变。在意大利，皇帝的权力即便在最有利的时期也极不稳定，教皇则是坚定的圣像崇拜者。君士坦丁堡黄铜大门上的圣像被去除之后不久，教皇也收到来自皇帝的敕令，要求他去除所有教堂中的画像，但是他拒绝执行这一命令。相反，教皇在自

己组织的宗教大会上召集93位主教，以认同圣像的角色。利奥三世在这一地区的代表——拉韦纳总督，愚蠢地试图通过派刺客去罗马暗杀教皇以表忠诚，但阴谋被识破，刺客被抓了起来。接连几位教皇也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派代表参加754年的希耶拉宗教大会，并且欢迎逃亡的圣像崇拜者来到罗马。皇帝无力强迫教皇顺从，便通过剥夺教皇对西西里岛与南意大利的管辖权，进而削减教皇的税入进行报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够免于反对圣像崇拜的皇帝的迫害，并自由地表达自己崇拜圣像观点的基督徒，都生活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亚历山大、安条克与耶路撒冷的查尔西顿派大教长都倾向于反对破坏圣像，他们也像教皇一样，拒绝参加754年的宗教大会。然而，最具影响力的支持圣像崇拜的呼声，出自大马士革的约翰，他在进入耶路撒冷附近的马萨巴修道院之前曾在阿拉伯宫廷身居高位。他曾于8世纪30年代在那里写了3本捍卫圣像崇拜的小册子，这些作品后来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约翰证明圣像崇拜的正当性基于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来源于柏拉图与新柏拉图主义：圣像是一个象征和中介物。他将圣像本身与圣像上的人区别开来。他声称，崇拜的对象是圣像，这不是盲目崇拜，因为祈祷者并非崇拜雕刻圣像的木头，崇拜的是木头之上的圣徒。第二，反对圣像崇拜者认为，任何对于基督的描绘只能表现出他的人性，却将无疑否认他的神性。针对这一看法，约翰将圣像崇拜与神灵化身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了圣像，才能接受基督道成肉身这一事实。否认基督可以被描绘于木头，就是否认基督的显灵。为了强化他的观点，他提到耶稣在他泊山的变容，当上帝在耶稣身边显灵时，耶稣的使徒正向耶稣鞠躬敬奉。他们并非在敬奉耶稣的肉身，而是在敬奉耶稣肉身之上的神性，对于圣像也是如此。约翰以这种方法说明圣像崇拜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对于正统基督教信仰来说也是必要的。

这些辩论也许鼓舞了圣像崇拜者，但是只要君士坦丁五世依然在世，或者在持有同样观点的其子及继任者利奥四世（775—780年在位）的统治之下，圣像崇拜者就没有任何被接纳的希望。然而，即使在反对圣像崇拜的皇帝的宫廷中，仍有许多支持圣像崇拜的观点。利奥四世发现宫中的一些官员曾秘密向圣像祈祷，而且，更令人烦恼的是，在其妻子卧室的枕头下面还发现了一些小圣像。皇后伊雷妮（Irene）来自支持圣像崇拜的雅典，这座城市尽管已被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占据，但仍处于拜占廷的控制之下。她仅仅受到丈夫的严厉责骂，也许是因为她否认自己私藏这些圣像，说它们肯定是其他人放在那里的。之后，完全出乎意料的是，780年9月，年仅30岁的利奥四世就离世了。

已故皇帝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当时只有10岁。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廷的惯例是，孩子的母亲在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之下摄政。伊雷妮很快便进入角色。考虑到她对圣像崇拜的同情，她肯定曾认为这是一个改变政府对圣像态度的天赐良机，但是在其摄政早期，她还不敢公开行动。反对圣像崇拜依然是一个官方原则，且拥有众多支持者，而且宫中有一派人公开赞成由孩子的叔叔、君士坦丁五世的小儿子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代替伊雷妮与她的儿子。781年春，西西里军区将军为了支持尼基弗鲁斯发动政变，伊雷妮被迫派舰队将其驱逐出西西里岛。

直到4年之后，伊雷妮才感到权力已经稳固，可以采取行动。她写信给教皇，表达她结束因圣像问题所引起的教会分裂的愿望，并呼吁召开宗教大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持赞同态度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塔拉西乌斯（Tarasios）正在任上，众多主教似乎都准备支持官方对圣像崇拜的重新认可。在伊雷妮的号召之下，在君士坦丁堡仅次于圣索非亚大教堂的第二大建筑圣使徒教堂中，宗教大会召开，讨论了这一议题。教皇代表、亚历山大港与安条克的大教长都来到现场，在楼座中皇后与年轻皇帝的注视之下，会议开始了。然而，伊雷妮忘记

了首都警卫部队中皇宫近卫军的存在。不久，他们便听到门外雷声般的重击声，一支近卫军手持刀剑冲入教堂，会议被迫立即终止。近卫军士兵仍效忠于对君士坦丁五世的记忆，威胁将处死大教长及其他干预他们所认定的正统信仰的人。伊雷妮派自己的贴身警卫从楼座上冲下，试图恢复会议秩序，但是近卫军士兵拒绝离开，大教长及随从的主教们撤退了。那些和近卫军士兵站在一起的主教与宗教大会就这样被放弃了。

显然，必须除掉支持破坏圣像的强大势力。有消息称阿拉伯人正在威胁入侵。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近卫军被派往东线，而来自色雷斯军区的支持圣像崇拜的部队则被调来负责首都的防卫。皇宫近卫军随后被解除武装，士兵的家人则被用渡船从君士坦丁堡运到那里与他们相聚，此后，他们又被遣散，因为此时的帝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役。效忠于伊雷妮的官员重新召集了一支精英部队。即便如此，当宗教大会重启时，伊雷妮还是谨慎地选择尼西亚作为会议最初议程的会址，以远离君士坦丁堡可能出现的抗议示威。350名高级教士聚集在那里的主教堂中，讨论重新开始。很明显，伊雷妮安排了众多支持圣像崇拜的主教参会，他们知道参会的目的是恢复对圣像的崇拜，以及达到另一个急切的意图，即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神学理论。他们讨论了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他们的辩论被纳入会议决议。同时，他们还对早期权威著作进行了审查，以证明圣像崇拜并非某种新事物，而是几百年来基督教的通常做法。作为证据的权威作品抄本被仔细审阅和比较，以保证它们没有被其他文本插入篡改。在这一事务处理完毕后，会议又移回君士坦丁堡，在大皇宫内的马格诺拉大厅召开最后议程。787年，被后人称为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或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信令公布，信令斥责那些不尊崇圣像或将圣像称为神像的人。随后不久，黄铜大门之上的基督像也被恢复。

圣像崇拜者的坚定立场并未结束争议。尽管圣像破坏者未能立刻进行强烈抵制，但一代人之后的815年，在与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所遭

遇的一系列失败促使皇帝利奥五世（813—820年在位）废除尼西亚信令，因为他认为这是上帝在因崇拜圣像而惩罚拜占廷人。不愿接受这一变化的修道士与主教遭到流放。有一位支持破坏圣像的皇帝狄奥斐卢斯（Theophilos，829—842年在位）甚至命令在一群修道士的额头上刻字，并警告他们，说他们在宣扬异端。这些修道士不得不头顶这一判决聊度余生。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圣像破坏者的对立者被简单粗暴地运送到马尔马拉海的各个岛屿之上，以防止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没有证据表明，在破坏圣像的第二阶段，当圣像崇拜被宣布为非法行为时有大量圣像遭到破坏。之后，如同历史会重演，钟摆又回到原位。当皇帝狄奥斐卢斯于842年离世时，其子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Ⅲ，842—867年在位）只有两岁，在先皇寡妻的统治之下又组成了摄政机构。与伊雷妮一样，皇后狄奥多拉私下里也是一位圣像崇拜者，据说她也在卧室中悄悄藏有圣像，当宫廷弄臣发现她在向圣像祈祷时，她辩称自己只是当这些圣像为玩偶，从而避免遭到告发。与伊雷妮不同的是，狄奥多拉行动迅速，843年，她召集宗教会议，恢复787年的决议，这一次是永久性的。至此，圣像破坏者的事业似乎已经衰落，也未再出现伊雷妮在圣使徒教堂召集会议时所经历的那种极端反应。这并非由于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与和谐。当拜占廷人同意将圣像崇拜作为正统信条时，关于得胜的圣像崇拜者应保持多大程度的宽容及应如何对待先前的圣像破坏者，尤其是那些主教，就产生了分歧。大教长及温和派认为将他们驱逐出主教教区即可，而激进派则要求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这些争论持续多年，直到出现另一事件。那时的拜占廷总是进行着某些神学争论，这也正是政治进程起作用的方式。

对拜占廷而言，帝国内部关于圣像的长期争议和其所面临的与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的长期斗争并无区别。只有涉及帝国的艺术、文化与自我认知时，争论及其最终决定才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可能的确是事实，因为在恢复圣像崇拜20年后，与100年前相比，帝国已变得更加富裕，也更加安全。816年之后，与保加利亚人便一直保持着

和平；863年，拜占廷军队在泊松大胜阿拉伯人，杀死了梅利泰内的埃米尔，歼灭了他的全部军队，之后，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袭击逐渐消失。在稳定的环境中，税收也得以增加。由于君士坦丁堡地处两条漫长商路——亚洲的丝绸之路与西欧的海上贸易路线的交汇之处，随着世界各地商人的往来，贸易开始繁荣起来。阿拉伯商人带来了香料、香水、地毯、瓷器、珠宝与玻璃器皿；意大利人运来了木材、黄金与羊毛；俄罗斯人也来售卖他们的蜂蜡、蜂蜜、琥珀、刀剑与皮毛；保加利亚人则带来了亚麻与蜂蜜。正如皮毛在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一样，丝绸在西欧的价格极其高昂。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世界各地的商品在那里进行交换。尽管绝大部分商业活动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拜占廷皇帝却通过向进出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而获得了稳定且丰厚的收益。

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拜占廷皇帝第一次拥有了可用于宏大建筑项目的盈余收入。9世纪后半叶，在君士坦丁堡与各个省区，也的确出现了各种壮观的新教堂与新修道院的建筑高潮。在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大皇宫附近还建了一座新的圆顶教堂。由于其与君士坦丁堡海角顶端的灯塔相邻，所以被称为法罗斯圣母教堂，它并不是一座高大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864年，当这座教堂竣工时，参观者都被其花费高昂的丰富的内部装饰震撼。地面上铺着白色大理石，支撑圆顶的柱子则是碧玉与斑岩——一种仅供皇家使用的紫色大理石，所有的门都以银箔包裹。之所以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来装饰这座小建筑是有原因的。这座小教堂被用来贮藏皇帝们最珍贵的财物，即他们收集的各种圣物，包括希拉克略击退入侵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时带回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以及人们真诚地认为的确存在的基督的束腰外衣、基督的荆棘王冠、百夫长用以刺穿基督左肋的长矛、一小瓶基督的血液、一小块圣母面纱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

法罗斯圣母教堂的装饰不仅花费高昂，而且根据新的肖像设计而成。这一圣地有两幅巨大的镶嵌画像：一幅是教堂一端半圆拱殿内伸

展着双臂的圣母，另一幅是穹顶中央俯视着中殿的耶稣基督。这两幅巨大的圣像与周围墙壁上的其他使徒、圣徒和殉道者一同关注并引导着在那里进行的礼拜仪式。然而，对拜占廷的宗教崇拜而言，反映圣像中心地位的不仅是这些装饰。大约80年之后，这里又添加了一件由一位得胜的将军从埃德萨带回的新圣物，即“耶稣面像”，耶稣基督用自己面容印就的一件古老圣物。它正是圣像崇拜者所需要的用以证明圣像崇拜合法性与正统性的证据：显身的上帝本人也创造了一幅圣像。现在，面对伊斯兰教与圣像破坏者的异议，已无必要犹豫。拜占廷人对于自己的信仰以及与信仰密不可分的视觉文化充满了自信。

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另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圣索非亚大教堂半圆拱顶上圣母子镶嵌画的恢复。大概在某一时期，就像圣伊雷妮教堂一样，圣索非亚大教堂的装饰曾被一个简单的十字架代替，但是到了867年春，这座教室的装饰得到恢复，并且还加了一段胜利的铭文：“假冒者在此销毁的圣像被虔敬的皇帝们重新建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佛提乌（Photios）在揭幕仪式上进行布道时，强调圣像与正统信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宣称，一个人只有接受了圣像才能够接受《圣经》的内容与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些圣像破坏者就如同阿拉伯人一样，已被命运抛弃，已经不能被称为“罗马人”，甚至不具备成为基督徒的资格。

这一理念也反映在这一时期所建造的其他教堂中，例如876—880年建造的拥有5个穹顶的新教堂，以及10世纪30年代建造的米雷莱恩修道院。这些建筑的规模无法与圣索非亚大教堂或圣使徒教堂匹敌，其建筑外部也格外朴实，没有任何修饰。但其内部的装饰与众不同，教堂的整个内部空间都覆以视觉肖像，要么是镶嵌画，要么是壁画、木版画或者分隔信众与圣所的屏风画像——一个沉默的信众在俯视着其下的祈祷者。教堂本身事实上已成为某种对天堂的模仿，让真诚的信徒快乐地期待着来世的生活。

君士坦丁五世死后的一个世纪中，其带领臣民远离圣像崇拜的热切尝试被彻底废除，圣像崇拜者竭尽全力在史书中将其描述为一个暴君与多神教教徒。但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关于他的回忆以及他带领拜占廷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功绩并未被全部抹去。786年，近卫军士兵之所以侵入圣使徒教堂，也许并非出于对圣像深深的恐惧，而是不愿看到心目中英雄的努力被毁。到了813年，拜占廷仍在对战曾被君士坦丁五世有效控制的保加利亚人的失败中蹒跚前行。当保加利亚人夺取了色雷斯墨森布里亚城的消息传来时，惊慌之中，人们冲向圣使徒教堂。他们撬开帝王陵墓的大门，跪在反对圣像崇拜的皇帝墓前，祈求他能够重生，再次出发迎击敌人。街巷中甚至有传言说，有人见到过世的皇帝骑在马上，冲向西方去战斗。官方当然不会支持这些游行。城市长官来到陵墓，逮捕了一些带头者。后来，在843年，当圣像崇拜被恢复时，君士坦丁五世的石棺被挪出教堂，他的遗骨也被取出，烧毁于君士坦丁堡的大广场之上。这就是拜占廷对其与正统信仰持有不同观点的最伟大的统治者的回报。

---

1. 帕夫萨尼亚斯（Pausanias），2世纪希腊史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希腊志》一书。—编者注

第五章 对北方的征服

（罗斯人）是上帝所造之物中最为肮脏的……他们进餐之后从不洗手。他们就像四处流浪的驴子。

——阿拉伯旅行者 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922年）

对拜占廷居民来说，860年6月18日这一天，与其他日子没什么不同。皇帝与其主要顾问远在首都之外，他们正带领军队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进军，奔赴小亚细亚去对付来犯的阿拉伯军队。由于没有其他遭到威胁的消息或警告，所以，把城市交给拥有一小支卫戍部队的城市长官看来似乎很安全。黄金角湾的商业如往常一样在繁忙地进行着，码头挤满了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商船。突然，东边的海面上冒起直冲天空的浓烟，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及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上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那些登上城墙一看究竟的人惊恐地发现一支200艘船的舰队正在亚洲一岸巡游，不时有一些重装士兵跳下船涉水上岸，袭击散落在岸边的毫无防备的村落。处于城防包围中的君士坦丁堡看似十分安全，但因缺乏军队及预警，对于抢劫者在郊区的肆虐也无能为力。信使被派去请回皇帝，而后除了祈祷就别无他法了。人群聚集在城市最西端的布拉赫奈的圣母马利亚教堂，这座教堂供奉着圣母面纱，人们相信这件圣物曾经在626年击退阿瓦尔人的战役中起了作用。夜幕降临，远处的火苗依然在发出噼啪之声。第二天，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佛提乌也加入人群。他下令将圣母面纱取出，由沿着城墙游行的队伍携带着，并伴以圣歌和祷告。在这一天即将结束之时，圣物回到教堂，那些船只如同它们突然出现一样，也突然消失了。

各路人群小心翼翼地出城去查看，屠杀的情况渐渐明了。到处都是尸体，佛提乌这样写道：

那儿躺着一头牛，旁边还有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和一匹马被葬在一起，女人和家禽的血流淌在一起……遍布尸体的玉米地正在腐烂，道路被损毁……山涧和沟渠与城市的公墓毫无两样。

究竟是何人制造了这场屠杀？不是宿敌阿拉伯人，因为舰队来自北方，而不是南方。佛提乌声称，这是一个过去无人注意的不知名的民族。在拜占廷，对其的确无人知晓。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却对这些人相当熟悉。君士坦丁堡正是被那些多年来肆虐于不列颠、法兰克与爱尔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所袭击。9世纪初，当丹麦人和挪威人驾着他们的长船向西航行时，他们的瑞典亲戚转而向东，跨过波罗的海，继续向东穿越大陆，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一个永久定居地。他们称自己为“罗斯人”（Rhos），这个词也许派生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桨手”（oarsman）一词，他们的现代名称“俄罗斯人”（Russians）由此而来。从诺夫哥罗德出发，这些罗斯人向西南迁移，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城的山顶，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另一个永久定居地，统治着当地的斯拉夫人，并逐渐与当地人同化，还采纳了他们的语言。正是基辅的罗斯人在860年夏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

拜占廷人并非因对罗斯人的存在一无所知而被攻其不备。几十年来，这些凶猛的武士曾沿着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到黑海，继而到达拜占廷。起初，他们并未怀着恶意，而是想利用君士坦丁堡的商机进行贸易。春天，他们带着蜡、蜂蜜、琥珀和皮毛而来，入秋之后，则满载着昂贵的丝绸与香料归去。至于他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具有侵略性则不得而知。或许在贸易权利与关税税率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议，又或许先前的航程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轻松地侵袭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毫无

设防的村庄。不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袭击，对于受害者来说，它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拜占廷人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北方和来自东方、西方的威胁，也不得不重新制定防御战略。自622年希拉克略决定将其军力集中于对波斯人的防御之后，拜占廷皇帝们就将来自东方的看似更大的危险放在第一位。毕竟，在那个方向，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个强大的帝国，先是波斯萨珊王朝，后是伊斯兰哈里发帝国。674—678年与717—718年的围困也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廷帝国的存亡。而在西方，拜占廷领土与斯拉夫人的土地相邻，斯拉夫人推翻阿瓦尔人的统治之后，便在巴尔干南部定居下来，不再有进一步扩张的意图。北方的保加利亚汗国是一支更为统一并具有侵略性的力量，但其已被备受辱骂却极为高效的皇帝君士坦丁五世所取得的胜利有效抑制。即便斯拉夫人占领了南至伯罗奔尼撒顶端的土地，拜占廷人在一些设防城市，如塞萨洛尼基、雅典和莫奈姆瓦夏，仍然维持着统治。此外，8世纪，拜占廷人看上去似乎能够重新征服他们在巴尔干失去的大部分土地，而这在东部是想都不敢想的。在8世纪末与9世纪初，一些远征部队被派往色雷斯、马其顿与塞萨利，一直推进到远至伯罗奔尼撒。斯拉夫部落未能进行任何协同抵抗，最终同意接受皇帝的统治。到了850年，现代希腊的所有领土都回到拜占廷统治之下，形成君士坦丁堡与伯罗奔尼撒之间一块坚实的领土。说希腊语的定居者从意大利南部迁居至此，渐渐地，希腊语代替斯拉夫语成为这一地区占据优势的语言。在这一几乎未曾流血的重新征服的过程中，隐士和修道士而非士兵充当了先锋者。他们像流动的传教者一样徘徊于伯罗奔尼撒的偏远山区，使那些最后散居的斯拉夫人皈依了基督教。这一成功也许强化了一个观点：西部要比东部安全。

然而，在9世纪，这一关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却被颠覆了。一方面，来自东方的威胁渐渐消失。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自身出现一些内部问题，对于小亚细亚的袭击越来越少。863年在泊松歼灭阿拉伯军队证明

拜占廷人已经有了更好的装备，能够进行有效的回击。到9世纪末，拜占廷与哈里发帝国达成了某种妥协，尽管越境突袭和海盗式的攻击仍不时出现。9世纪20年代，阿拉伯军队登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最终征服了这两座岛屿。904年，一支阿拉伯舰队猛攻并洗劫了塞萨洛尼基。尽管这座城市损失巨大，但这次攻击并未像之前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城那样威胁到拜占廷帝国的存亡。另一方面，在东部形势逐渐安全的背景下，860年的灾难揭示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新的危险。

早在50年前，保加利亚人突袭了拜占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灾难。此时拜占廷人已将巴尔干南部并入帝国版图，他们也许希望在北方也能够取得成功，于是将前线推进至多瑙河。所以，当保加利亚可汗克鲁姆（Krum）侵入边境，夺取拜占廷的塞尔迪卡时，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I，802—811年在位）决定对其进行有力回击。811年5月，他率领由小亚细亚军区将军与士兵组成的大军出发，入侵保加利亚。大敌压境，克鲁姆派出使节请求和谈，但尼基弗鲁斯一世自认为胜券在握，立即回绝了他们的提议。7月，入侵继续深入。拜占廷军队到达普利斯卡，扫荡了一切抵抗，夺取了城市，并屠杀了驻军。克鲁姆的木造宫殿未受损坏，里面的财宝都被尼基弗鲁斯一世分发给了士兵。将宫殿与城市付之一炬后，尼基弗鲁斯一世带领军队南下，企图重新占领塞尔迪卡。然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越过巴尔干山脉，穿过一道十分有利于防守者的山谷。当缓慢行进的军队穿过一道峡谷时，先锋队惊恐地发现峡谷出口已被巨大的树干和木桩挡住，并由一支强大的保加利亚军队驻守。此时，另一支拜占廷分遣部队也已经跟随进入，堵住了撤退的通道。

此时，由于将领们封锁消息，军中许多士兵对战局的进展还一无所知。他们在关隘中等了两天，等着克鲁姆的下一步行动。最后一晚，保加利亚士兵用剑击打盾牌，制造出恐怖的喧嚣声，黑暗中听到这些声音的拜占廷士兵意识到自己已被庞大的敌军包围，顿时，恐惧与死亡的气氛弥漫开来。次日黎明，保加利亚士兵开始发动攻击，目

标直指拜占廷军营。很快，皇帝与许多高级将领都被杀，战斗最后变成一场屠杀，因为此时的拜占廷军队已分崩离析，每个人都在寻求自保。一些人试图突破保加利亚士兵无暇顾及的峡谷两端的屏障，当发现难以逾越成堆的树枝与粗壮的树干时，只能燃火将树木烧掉。当他们穿越大火之后的空隙时，却又坠入隐蔽的壕沟，要么被烧死在壕沟里，要么被随后坠入的士兵踩踏而死。尼基弗鲁斯一世之子斯陶拉基奥斯（Staurakios）尽管得以逃脱，但身负重伤，6个月之后也去世了，他的数以千计的战友则根本没能走出那个山涧。在一切归于沉寂之后，克鲁姆找到了拜占廷皇帝的尸体，并将其头颅砍下，钉在一个竿子上示众。当头颅只剩下头盖骨时，克鲁姆将其制成酒杯，镶上银边，用以在宴会上与贵族们祝酒。

如同378年阿德里安堡战役的失败一样，巴尔干山区中对拜占廷军队的歼灭令人心情沉重，一时间，惊慌失措的皇帝试图平息上帝对拜占廷圣像崇拜的愤怒，反对圣像崇拜第二回合的较量便又开始了。长期来看，这次歼灭如同860年罗斯人的袭击一样，迫使拜占廷人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是一个如何将过去曾多次拯救拜占廷的战略应用于新敌身上的问题。正如从前，战败后的直接反应是撤退到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城防之内。由于拜占廷军队在811年的失败，克鲁姆得以不受限制地进出色雷斯，但是不论何时，当他行至君士坦丁堡难以逾越的城墙时都不得不立即停下，只能在其周围的郊区劫掠一番。最后一次，814年，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用1万头公牛拉他那巨大的攻城器械。他还拥有数以千计的运货马车，载着这些覆上铁皮的器械，用来应对拜占廷人从城墙之上向其投掷的希腊火。然而此次，这些硬件设施未能投入使用。当克鲁姆正在视察这些准备工作时，突然，他的口、鼻和耳朵喷出鲜血，最后因脑出血倒地而死，其群龙无首的军队也立即撤退。

依赖运气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防，拜占廷人在860年免遭罗斯人的毒手，但是他们知道无法永远完全依赖静止的城墙和上帝偶然的眷顾。

为了说服敌人停止进攻，不得不签订条约，而且拜占廷人可以提供两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来促使敌人同意签约：成箱的金币与君士坦丁堡国际市场的贸易优惠。保加利亚商人与罗斯商人都会到拜占廷首都来销售他们的商品，降低其关税税率的许诺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谈判手段。816年，拜占廷与保加利亚新可汗奥穆尔塔格（Omurtag）达成一项协定，以维持长年和平。罗斯人则比较难以坐到谈判桌前。907年左右，他们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在统一了基辅与诺夫哥罗德的基辅大公奥列格（Oleg）的带领下，他们的舰队南下博斯普鲁斯海峡，烧毁了教堂、修道院与沿途郊区的居民定居点。直到911年，拜占廷才以丰厚的条件与罗斯人达成协议：罗斯商人得以豁免所有进出黄金角湾商品的10%的关税；他们还获得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岸黄金角湾北边圣玛马斯郊区的一块土地作为歇脚处，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6个月的免费食宿，并且随时可沐浴。拜占廷人对其贸易伙伴的防范也体现在另一条款之中：罗斯人想进入君士坦丁堡城，必须在50人以下，不带武器，并且由拜占廷的官员带领，从指定的城门进入。

对拜占廷人来说，此类慷慨的协议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总在伺机废除协议以重新商定条件。就罗斯人而言，941年，当罗斯大公伊戈尔（Igor）决定再次在海上发动进攻时，情形的确如此。如同860年与907年一样，罗斯人谨慎地等待时机：拜占廷军队与舰队正远在他乡，海上防卫只剩下停在黄金角湾船坞里的15艘破烂的旧船。拜占廷人被迫迅速修理这些船只并将其投入战斗。当罗斯人的船只停靠岸边，船员大多已登陆之时，拜占廷的舰船才整装出发，从船首与船尾射出数道希腊火。罗斯人的舰船接连被点燃，他们的船员跳上船以奋力逃离火海。伊戈尔下令自己驾驶的船只向北航行，此船吃水很浅，保证其可在没有追兵之时沿着海岸航行。大部分罗斯人发现自己被切断退路，只得逃到亚洲一岸，几个月之后，他们在那里被回撤的拜占廷军队彻底击败。944年，谈判得以重启，理应受罚的罗斯人同意修改条约，放弃了他们的关税豁免权。

如果说不平等条约是一种缓兵之计，拜占廷外交的触手则常常在寻求那些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同盟，以备需要攻击保加利亚人和罗斯人之时使用。对于保加利亚人，那些生活在他们西北部的对其扩张主义心怀恐惧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十分积极；针对罗斯人，可以动员拜占廷人的老朋友哈扎尔人，860年袭击的几个月后，拜占廷便向他们派出使节。对付这两股力量的最佳盟友是由亚洲大草原向西迁移的一支突厥人部落佩切涅格人。他们的领土横跨第聂伯河，使其具备打击北部边界保加利亚人的优势，并可以切断罗斯人通往黑海的贸易路线。为了使其效忠并听候召唤，拜占廷每年都向佩切涅格人的汗王支付贡金。

这些当然也正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用以避开阿拉伯人威胁的计策。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在674—678年与717—718年拯救了城市，哈里发也常常被许诺支付年贡的条约收买。此外，还有贸易优惠，并在君士坦丁堡城中为到访的阿拉伯人建造一座清真寺。几个世代以来，北方的哈扎尔人曾被作为针对哈里发的重要的平衡力量。9世纪50—60年代，君士坦丁堡城中的一群知识分子似乎开始思考是否需要针对东部与西部、北部敌人的本质区别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些修正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当属目睹了罗斯人在860年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佛提乌。

尽管他是那个时代中最有天赋与学问的人之一，佛提乌却不太适于大教长的职位，因为直到快50岁时，他还不是一个授圣职的教士。他是君士坦丁堡城中一个富裕家庭的一员，在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二阶段坚持着自己圣像崇拜的信仰，在843年圣像崇拜被恢复之后，他作为大皇宫管理者中的一员获得了升职。佛提乌就职的宫廷在9世纪50年代是一个有些令人昏乱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它是由米哈伊尔三世领导的，但是皇帝对于政务毫无兴趣，其生活的主要激情都在于赛车比赛，他不是作为观众，而是作为参赛者投入其中。他没有选择君士坦

丁堡的大竞技场，而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小港圣玛马斯追求他的爱好，罗斯人被允许在此地卸货。城中有一座行宫与一个小赛道竞技场，皇帝及其友人可以避开公众的眼光尽情娱乐，皇帝支持的是蓝党一方。只要比赛开始，连阿拉伯人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也不允许打断比赛。入夜之后，各种放荡的聚会便开始了，有传言说米哈伊尔三世与其密友喝醉后甚至上演嘲笑礼拜仪式的滑稽剧。

由于皇帝常常远离宫廷而醉心于自己的娱乐，帝国只能交由他人管理。一开始，皇帝的母亲狄奥多拉从842年起以皇帝的名义担任摄政王，并由一位宫廷宦官塞奥克提斯杜斯（Theoktistos）辅佐。当米哈伊尔三世长到15岁时，他开始不安于母亲的监护，皇后的兄弟巴达斯（Bardas）所领导的一派迅速利用他的这一不满。密谋者在会议厅外等待，塞奥克提斯杜斯一出会场，就被他们推到地牢给弄死了。失去了主要的参谋，狄奥多拉心神不宁，并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几个月之后，856年春，她召集朝臣会议，交出一份账目，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之后便消失于公众视野，退隐于修道院之中。

此次政变之后，米哈伊尔三世授予其舅父巴达斯“恺撒”的称号，并由其承担管理帝国的任务。856年之后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的大部分辉煌成就应该都是巴达斯及其派别的功劳。例如，863年，在泊松痛击梅利泰内埃米尔的拜占廷军队首领就是他的兄弟彼得罗纳斯（Petronas）。此外，尽管巴达斯是以残忍的方式取得权力的，但他是一位艺术的庇护者。正是在他统治之下，法罗斯圣母教堂才得以修缮，圣索非亚大教堂半圆形后殿中圣母子镶嵌画也得以恢复。他同时也是以希腊古典学术为基础的世俗高等教育的支持者。几个世纪之前，凯撒里亚的瓦西里与其他人曾争论说这些作品即使是多神教教徒所写，也应被保存和研究，而在黑暗动荡的7—8世纪，高等教育似乎已几近停顿。巴达斯恢复了君士坦丁堡大学，为其提供大皇宫中的马格诺拉大厅作为校址，并以公共财政支付教师的薪金。作为实际的统

治者，巴达斯不得不负责解决其姐姐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问题之一便是教会中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在如何处置先前反对圣像崇拜的主教这一问题上的长期不和。巴达斯公开支持温和派阵营，他甚至任命一位之前塞萨洛尼基的反对圣像崇拜的大主教在新建大学中教授几何学。大教长伊格内修斯（Ignatios）强烈反对巴达斯，并在公开场合批评他的私生活，因为他与情妇公开同居。巴达斯对这一挑战忍了18个月，最终于858年11月逮捕了伊格内修斯。当然，他无法处死这位主教，但是他命令卫兵将其痛打了一顿并丢入圣使徒教堂外君士坦丁五世的石棺中。伊格内修斯在寒夜中待了一宿，第二天便被送上船流放到莱斯沃斯岛。

随后登上这一职位的就是佛提乌。有一阵子他似乎是巴达斯圈子中的一员，但他有否参与杀害塞奥克提斯杜斯的阴谋还不得而知。他与巴达斯一样对古希腊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可能还担任新学校的教职。他是《书目》（*Biblioteca*）一书的作者，这本著作充其量只能算作一部作品评论集。书中提到的作品都创作于几个世纪之前，佛提乌对其语言风格与词汇很感兴趣，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与古典语言相比，希腊语口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作品中进行了严苛的评述。他指责基齐库斯的基督徒优诺米（Eunomius of Cyzicus）的作品“毫无魅力”，只是“夸大其词，在发出粗鄙的声响”。此外，他热爱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史学家、多神教教徒阿里安（Arrian），以及亚历山大的同代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演讲。他正是巴达斯想委任的替代伊格内修斯管理教会的人，一个与激进派狂热之徒完全不同的人。

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说明佛提乌并不适于大教长这一职位，因为他不是一位神职人员，但这一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858年12月20日，他进入教会，继而在4年内被授以助理牧师、副执事、执事和教士等职位。最终，在4年后的圣诞节这一天，他被任命为大教长。尽管这是出于巴达斯个人友谊的公开政治任命，佛提乌却成为最伟大的主教之

一，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都发挥了作用。他在圣像崇拜者取得胜利之后参与教堂的重新装修，并于867年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圣母子镶嵌画揭幕式上发表演讲。当860年罗斯人攻击君士坦丁堡时，正是他利用圣母面纱鼓舞众人的士气。总之，他是拜占廷宫廷中的重要一员，总在考虑以新的方法来对付北方的威胁。

乍看起来，像佛提乌这样的人，接受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阅读希腊古典文学作品，学习以正式的书面语进行写作，唯独不适合的就是了解周围邻国的事务。在他们现存的作品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癖好，那就是将所有外国人称为“蛮族”。对佛提乌来说，“蛮族”包括860年发动袭击的罗斯人和其他生活在拜占廷边境之外的人，以及根据宗教大会的规定未能皈依基督教信仰的人。这一词语只是简单地沿袭古希腊语的一种书面表达，古希腊人创造这一词语只是用以指代所有不会说希腊语，语言听上去就像无法理解的“吧啦吧啦”的噪声的人。像佛提乌这样受过教育的拜占廷人既没有仇外情绪也非种族主义者，相反，他们对于周边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相当了解。佛提乌具有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第一手经验，因为在他成为大教长之前，曾因外交事务被皇帝派驻那里。据记载，尽管信仰截然不同，他在巴格达期间仍然获得了许多牢固的友谊。毕竟，拜占廷人与阿拉伯人有许多共同之处：相同渊源的一神教信仰、规模巨大的城市、文学氛围，以及对于古希腊文学的崇尚。

另外，对于君士坦丁堡博学的朝臣们而言，对保加利亚人、罗斯人及其他北方民族抱以同情则更为困难。他们的宗教都是多神崇拜，有众多愤怒的神祇需要定期去抚慰。克鲁姆在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陆墙之时就曾向天空之神坦格拉（Tangra）献上活人作为祭品。在基辅有一个供奉6位神祇的巨大神庙，这6位分别是战争之神、天空之神、光神、自然之神和两位丰产之神，每位神祇都以一个木刻雕像来代表。普利斯卡与基辅难以与君士坦丁堡或巴格达媲美，它们都只是木制小屋的聚集地，周围是土方工程与围墙，统治者的木制大殿位于

中央，这也是811年尼基弗鲁斯一世能够轻而易举地烧毁普利斯卡的原因。他们没有文学，因为他们的斯拉夫语没有字母。这些人的外表在拜占廷人与阿拉伯人看来肯定是令人生厌的。一位访问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使节曾被描述成“剃着匈牙利人的头，肮脏、戴着铜链子”。一个更为善良的观察者、阿拉伯旅行者伊本·法德兰将罗斯人描述为“完美的人体标本，像枣椰树一样高大，有着金色的头发，面色红润”，但他批评他们不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对目睹的罗斯人的葬礼感到惊愕。按照风俗，死者及其所有个人物品都要被置于船上进行火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女奴。

值得赞扬的是，佛提乌及其同僚意识到斯拉夫人文明的匮乏事实上正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也是消除其威胁的关键。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在巴尔干地区面对着一拨接一拨迁移而来的民族，当无法战胜这些人时，便允许他们定居于帝国境内，给他们土地作为他们服军役的回报，并且常常诱使他们接受基督教，将其同化。以基辅和普利斯卡为中心的国家过于强大，难以同化其国民，但是可以用拜占廷文明的某些方面将他们吸引过来，尤其是其中经过细致修改并能够反映某些他们自己文化的部分。

862年，一位意料之外的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巴达斯与佛提乌得以将这一洞见付诸实施。这位使节由摩拉维亚大公派来，由于相距遥远，拜占廷过去未曾与这一斯拉夫国家打过交道。他传递了一个请求，希望拜占廷皇帝派遣使者去摩拉维亚，以使那里的人皈依基督教。这一要求并非仅仅出于精神层面的考虑。作为一个小公国，在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Louis）与保加利亚可汗结盟之后，摩拉维亚随时可能有被灭亡的危险。摩拉维亚面临着被他们一分为二的真实危险，因此其王公需要一个同盟者。于是，他便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了请求。巴达斯与佛提乌决定积极回应，同意其请求。他们选择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os）兄弟俩带领这一使团。西里尔是佛提乌之前的一个学生兼同事，也是君士坦丁堡新大学的一位教

师；美多迪乌斯当时正担任小亚细亚一座修道院的院长。二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传教者，都曾参加过派驻哈扎尔人的使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来自塞萨洛尼基，这座城市在7世纪遭到外族入侵之时曾被斯拉夫人的定居点包围，至今还受到斯拉夫人的影响。这对兄弟在希腊语与当地斯拉夫语的双语环境中长大，所以，他们多多少少能够在摩拉维亚与其东道主进行直接的交流。然而，他们又做出决定，仅仅以当地语言向摩拉维亚人传教还不够，须向其提供《圣经》的译本并教授圣餐仪式。一些之前的传教士曾尝试用拉丁字母将斯拉夫语抄录成希腊语，但是进行得不太顺利，因为斯拉夫语中有许多发音在希腊语与拉丁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鉴于这一困难，西里尔着手为斯拉夫语编写字母表，这些字母后来被称为格里高利字母，也许来自某个现成的手抄本。两兄弟到达摩拉维亚后，便开始翻译圣餐仪式的工作，当斯拉夫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时，就利用希腊语词汇填补空白。最后，他们创造了一种文学语言，即整个斯拉夫语世界都能理解的古斯拉夫语。

事实证明，去往摩拉维亚的传教并未取得巨大的成功。拜占廷传教士遭到已在那里工作的法兰克教士的反对，他们强烈反对用当地语言进行礼拜仪式，认为只能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称呼万能的上帝。当日耳曼人路易在864年入侵摩拉维亚时，这些反对者便拥有了军事靠山，拜占廷传教士最终被迫离去。他们一离开，教皇就写信给摩拉维亚的统治者，坚持认为应停止使用斯拉夫语进行圣餐仪式。尽管如此，这些经验却为日后对付近邻保加利亚提供了借鉴。

自从816年签订条约之后，拜占廷与保加利亚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然而，到了9世纪60年代，随着在泊松大胜阿拉伯人，关于811年溃败的记忆正渐渐消退，拜占廷人的自信心逐渐恢复。所以当巴达斯及其幕僚获悉保加利亚可汗鲍里斯（Boris）与日耳曼人路易为了瓜分摩拉维亚正积极结盟时，便采取强硬措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结

盟将使法兰克人的势力侵入原本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864年，他们派遣一支军队北上保加利亚边境，同时派一支舰队沿着黑海巡游以提供支援。这次战役与811年的战役没有太大区别。正如之前的克鲁姆一样，鲍里斯决定不去冒战争的危险，而是请求和谈，因为他的国家正经历着严峻的饥荒，他意识到此时自己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这一次，和谈的请求被接受，拜占廷也未像尼基弗鲁斯一世统治时期那样蹂躏普利斯卡。的确，从形势来看，似乎不会出现任何战争与流血。条约内容也令人惊讶，拜占廷没有提出任何领土或贡金的要求，只是要求鲍里斯宣布放弃与法兰克人的结盟，并接受基督教信仰。865年，根据安排，君士坦丁堡的一名主教被派往普利斯卡为其可汗施洗，并随身携带一封来自佛提乌的长信，信中对这位新皈依者充满屈尊俯就的建议。普利斯卡可汗宫殿附近的一座教堂也开始修建。

所有这一切与拜占廷人为了发动战役所做的军事准备和花费相比似乎回报甚少，但是巴达斯与佛提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自己的受洗仪式上，鲍里斯宣布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成为其教父这一事实，进而承认拜占廷皇帝的霸主地位，保加利亚与君士坦丁堡而非东法兰克人王国结盟。鲍里斯的皈依不是佯装，也并非一个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早在拜占廷迫使他皈依之前，这位可汗对基督教似乎就已产生兴趣，后来，他主动放弃王位，成了一名修道士。不管怎么说，他的受洗既是出于其个人信仰，也是国际强权政治斗争的结果。所以，巴达斯与佛提乌不会天真地认为受洗典礼会消除保加利亚的威胁。一旦眼前的威胁消除，鲍里斯便开始担心他让渡了太多的主权，瓦解了自己在臣民中的威信。尽管保加利亚的一些贵族同他一样皈依了基督教，但还有一些人仍然坚守传统的宗教信仰。对于放弃与法兰克人的结盟，也有各种不利的抱怨之声，来此传教的拜占廷教士也被普遍认为是拜占廷皇帝为了重新吞并保加利亚而派来的奸细。在鲍里斯受洗几个月后，保加利亚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叛乱，直到鲍里斯无情地处死52名罪魁祸首及其子女之后，叛乱才最终被镇压下去。在叛乱中幸存下来的鲍里斯仍然需要向臣民说明，接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并不意味

着承认拜占廷的统治。在其皈依之后不到一年，他便提议新的保加利亚教会不应处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管辖之下，而应该有自己的大教长。在拜占廷教会拒绝这一请求后，他狡猾地派了一些使节前往罗马，请求教皇派遣传教士，以替代那些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教士。

然而，长期以来，拜占廷的影响盛行于保加利亚。部分原因是君士坦丁堡在地理位置上比罗马离保加利亚更近，但总体而言，还是因为与拜占廷这一强邻保持友好关系对保加利亚有利。870年，鲍里斯接受妥协，保加利亚教会不再由大教长而是由享有极大自主权的大主教所领导。更为重要的是，886年，一个新的拜占廷教士团体来到普利斯卡，团体成员就是在日耳曼人路易入侵后被迫离开摩拉维亚的那些传教士。他们都说着斯拉夫语，并随身携带着古斯拉夫语圣餐仪式手稿。鲍里斯十分欣喜，因为这样一来，保加利亚教会便似乎不再需要在文化与政治上臣服于拜占廷皇帝。他与这一团体的首领、拜占廷教士克莱门特（Clement）和瑙姆（Naum）进行商议，并委托他们在保加利亚传教。当瑙姆还在普利斯卡时，克莱门特就被派到马其顿西部城市奥赫里德，在那里，他承担着让当地斯拉夫人皈依并教导他们的艰巨任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通过艰苦的努力与人格的魅力，他最终成功做到了。他向当地的农民传教，还从拜占廷南部行省引进果树新品种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培养了一个当地牧师，可能还发展了简化的斯拉夫字母，即后来的西里尔字母，最终替代了格里高利字母。当克莱门特于916年去世时，奥赫里德的沿湖定居地已经成为斯拉夫基督教的文化中心，在那里，希腊文本被翻译成古斯拉夫语，各种圣像也以拜占廷风格绘制而成。在整个保加利亚，服务于新皈依者的教堂在风格上都类似于同一时期拜占廷境内各处的圆形方顶建筑。教堂内部都装饰着反映圣像崇拜神学理论的壁画，这些作品常常出自拜占廷修道艺术家之手。保加利亚尽管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但已被吸收进拜占廷文化的轨道之内。

当奥赫里德开始发展为当地文化中心时，巴达斯与佛提乌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事实上，在保加利亚汗王鲍里斯受洗后不久，他们就迅速相继失去了权力，因为在他们忙于摩拉维亚与保加利亚的事务之时，出现了一个新竞争者，他以米哈伊尔三世的名义施展权力。与狄奥多拉、塞奥克提斯杜斯、巴达斯不同的是，此人不是出自宫廷，而是一位叫作瓦西里（Basil）的来君士坦丁堡寻找机会的色雷斯农民。他在巴达斯的亲戚西奥菲勒斯（Theophilos）家中务工，后来晋升为马夫长。一天夜里，当巴达斯与西奥菲勒斯招待保加利亚使节时，他也在场。来访的客人在酒精的作用下逐渐放松之后吹嘘说，他们带了一位保加利亚摔跤冠军，西奥菲勒斯回应称他的仆人瓦西里能胜过他。于是，桌子被挪开，两个摔跤手开始较量起来。令旁观者惊讶的是，瓦西里竟然将高大的保加利亚摔跤手举了起来，并将其狠狠地摔在一张桌子上。

瓦西里的这一英勇行为很快便传到米哈伊尔三世的耳中。过了一些日子，当西奥菲勒斯与米哈伊尔三世一同外出打猎时，瓦西里成功地套住了皇帝脱缰的坐骑。米哈伊尔三世对瓦西里的才能印象深刻，便将其纳入麾下，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米哈伊尔三世将这位新保护对象调离马厩，提升他为宫廷大臣，甚至为他在自己先前的情妇中找了一位上层妇女做妻子。结果是，米哈伊尔三世为宫廷中一直仇恨巴达斯与西奥菲勒斯并伺机反叛的一派提供了一个首领。866年春，米哈伊尔三世与巴达斯带领舰队沿着爱琴海南下，想要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克里特岛。一天夜里，当船只停泊靠岸，皇帝与恺撒登陆露营之时，包括瓦西里在内的一群密谋者冲进皇帝的帐篷，砍死了正在仔细研究账目的巴达斯。并非所有的密谋者都希望刚刚升职的马夫长替代巴达斯的位置，但是他们忽略了皇帝的想法。巴达斯死后不到一个月，米哈伊尔三世就将瓦西里收为义子，并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举行盛大的仪式，封他为共治皇帝。他这样做，等于是为自己签下了死刑令。共治皇帝瓦西里与其支持者十分清楚，如果不除掉米哈伊尔三世，自己在这一高位上也不会安全。867年9月的一个夜晚，米哈伊尔

三世喝醉了酒，躺在圣玛马斯寝宫的床上，密谋者闯进他的房间杀死了他。第二天一早，瓦西里被拥立为皇帝，他走出大皇宫，向路过的人群撒金币。作为瓦西里一世，他是马其顿王朝的创立者，这一王朝将直接或间接统治拜占廷直至1056年。

事态的变化使佛提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巴达斯的门徒。在瓦西里获得权力之后，佛提乌勇于公开抨击瓦西里对米哈伊尔三世的谋杀，并拒绝新皇帝领圣餐。瓦西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除掉他，不仅因为他是前朝的遗老遗少，而且因为他的存在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拜占廷教会中的许多人与罗马教皇都因瓦西里不寻常的继位方式而认为他是一个篡位者，所以，867年11月，瓦西里将佛提乌革职，关押于一座修道院中，并恢复前任大教长伊格内修斯的职位。

尽管巴达斯与佛提乌已被剥夺权力，瓦西里一世仍旧沿袭了他们对待拜占廷的斯拉夫邻人的政策，劝说鲍里斯停止向罗马献媚，完全并入拜占廷的势力范围。9世纪70年代，另一支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派遣使节到君士坦丁堡，请求拜占廷皇帝派传教士使其臣民皈依基督教。当然，塞尔维亚人当时正占领着拜占廷的土地，这些土地因在保加利亚汗国之外而被隔绝于帝国，已无收复的希望。因此，瓦西里十分乐意向他们派遣传教士，并接受他们承认君士坦丁堡神学上的宗主地位。这些传教士还带去了西里尔字母和格里高利字母文本的古斯拉夫礼拜仪式的手稿，以及拜占廷风格的教堂建筑与装饰。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不足为奇的是，9世纪70年代，瓦西里恢复了对佛提乌的宠幸，任命他为自己儿子利奥的家庭教师。当伊格内修斯于877年过世时，佛提乌又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直至886年他被瓦西里一世的儿子与继任者利奥四世（886—912年在位）革职，这位学生似乎对自己的家庭教师并无任何感激之情。也许，这对佛提乌而言也是一种解脱，他在893年去世之前一直在流放中度日，此时，巴尔干的局势已趋于稳定，而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平衡并未持续很久。即使保加利亚此时已被并入拜占廷的势力范围之中，并不意味着威胁已被消除。事实上，10世纪初，保加利亚可汗西米恩（Symeon）逐渐成为自717—718年阿拉伯围城以来拜占廷生存的最大威胁。这并非因为西米恩憎恨拜占廷，相反，他热爱并崇拜着拜占廷。他非常熟悉君士坦丁堡，因其父亲鲍里斯曾送他到那里接受教育。他会说希腊语，并对拜占廷宫廷礼仪与场面十分了解。当他回到故乡时，肯定觉得普利斯卡是一个令人沮丧且粗糙的地方。893年，在推翻他的多神教兄弟弗拉迪米尔（Vladimir）成为可汗之后，他便开始着手模仿拜占廷，重新塑造自己的国家。普利斯卡被弃，取而代之的是新首都普雷斯拉夫，它将如同君士坦丁堡一样令人震撼。拜占廷各省的建筑师被请来建造一套防御工事和许多精美的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宏伟的黄金教堂，据说是因其圆顶被覆以金叶而得名。在教堂旁边，还建造了一座高级神职人员的住所，因为西米恩与其父一样，都希望保加利亚能够很快拥有自己的大教长，并希望为此做好准备。

913年，西米恩在先前因贸易权利冲突所征收的年贡被拒之后，与拜占廷展开战争。在向君士坦丁堡陆墙进军的途中，他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因为此时的拜占廷正处于内部政治虚弱时期。皇帝君士坦丁七世还是一个7岁的孩童，一个摄政理事会正统治着君士坦丁堡。与通常的做法不同，君士坦丁七世的母亲佐薇（Zoe）并未领导这一摄政理事会。她与君士坦丁七世的父亲利奥六世的婚姻被教会裁定为无效，因为她是利奥六世的第四任妻子，而四次婚姻是被基督教教规禁止的。因此，她被排除在外，摄政会议由佛提乌的学生、大教长尼古拉斯·米斯提库斯（Nicholas Mystikos）主持。

保加利亚军队在陆墙之外安营扎寨，大教长除了和谈别无选择，于是向西米恩探寻条件。有趣的是，西米恩现在扮演的角色正如864年

巴达斯与佛提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并未索取任何财富或领土，而是提出了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要求：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娶自己的女儿，大教长加冕他为皇帝。前一个请求并非史无前例，早期拜占廷皇帝，例如利奥三世，就曾与哈扎尔人结成同样的联姻，但后一个请求则前所未有。811年，当克鲁姆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时就从未想过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帝国加冕的坚持只能出自一个深受拜占廷价值观影响的人，他希望将自己提升至统治阶层的顶端。由于别无选择，大教长同意了这两个请求。西米恩与其未来女婿君士坦丁七世共同进餐，并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举行了加冕仪式。西米恩理所当然地认为从此自己就是皇帝，他放弃了可汗的称号，而以“沙皇”（Tsar）——恺撒的斯拉夫语翻译取而代之，并在其印章中使用拜占廷对皇帝的称呼巴塞勒斯。

达到目的之后，西米恩便撤回到自己的领地，但是他低估了拜占廷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加冕几个月之后，大教长不明智地允许皇后佐薇回到皇宫，因为君士坦丁七世一直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一进入权力核心，佐薇及其支持者便驱逐大教长，皇后获得了她在摄政理事会的应有地位。君士坦丁七世的婚约也被破坏，佐薇的支持者宣称加冕无效，因为大教长在最后一刻将皇冠放置一边，将一个神职人员的帽子戴在了西米恩的头上，而这位保加利亚统治者当时正虔敬地跪在那里接受荣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君士坦丁堡的态度变得异常强硬，皇后决定用军事上的决胜来彻底结束西米恩的狂妄自大。917年夏，一支由各个军区部队及皇宫近卫军组成的庞大军力向北进军，在黑海沿岸的安恰罗斯迎击西米恩。战争的结果完美地解释了拜占廷人通常避免阵地战的原因。尽管他们最初占上风，但他们的佩切涅格盟军因为运送士兵的舰队将领之间的争吵而未能到达。当传言说他们的将军已经被杀时，拜占廷部队开始恐慌分裂，这便使保加利亚人能够进行反击，正如811年的灾难一样，整个拜占廷军队都被彻底消灭。

这一胜利使得西米恩得以控制远至科林斯湾的整个巴尔干地区，并自由地宣布此后他就是罗马人与保加利亚人的皇帝，保加利亚大主教成为大教长。然而，正如他的许多前任一样，西米恩的野心败于君士坦丁堡的城防与拜占廷狡黠的外交政策上。他很清楚，除非夺取拜占廷首都，否则他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皇帝，安恰罗斯的胜利已使其几乎接近这一目标。西米恩意识到如果要夺取君士坦丁堡，他就需要一支舰队，于是派遣使节去突尼斯的阿拉伯法蒂玛王朝，提议发动联合攻击，但是载有使节的船只在归途中被一艘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船只拦截。身为拜占廷皇帝的臣民，卡拉布里亚人将俘虏带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保加利亚使节被投入监狱，而阿拉伯人则被奉为上宾。受到酒饭款待之后，他们带着拜占廷送给法蒂玛统治者的大量礼物回国了，这些礼物事实上是劝说阿拉伯人按兵不动的贿赂。与此同时，西米恩的北方宿敌——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则受到贿赂而去攻击他，这些策略迫使西米恩不得不接受谈判。

此时，拜占廷宫廷政治又遭遇到其他无尽的波折。皇后佐薇于919年下台，舰队司令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Romanos Lekapenos）成为年轻皇帝的护卫。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看到的，利卡潘努斯并不仅仅满足于成为摄政理事会的领导，而希望封自己为皇帝，与合法的马其顿王朝继承人君士坦丁七世联合统治。924年，利卡潘努斯与西米恩达成协议，将自己的孙女嫁给西米恩的儿子彼得（Peter），并认可西米恩沙皇的称号，但坚持其地位低于罗马人的皇帝。3年之后，西米恩死于心脏病，这一威胁被彻底消除，因为他的儿子彼得远非一个能干的勇士，但拜占廷乐于称呼他为沙皇，并每年向他提供贡金以使他保持顺从。

从拜占廷的立场来看，虽然保加利亚继续占领着本应属于拜占廷的领土，但这是一个对于双方都有益处的妥协。保加利亚人既能通过与这一地区最强大的权力结盟而获得安全保障，同时又能在帝国的直接统治下坚持自己的独立；拜占廷人则能为其政治理论辩护，声称自

己的皇帝是所有罗马人的皇帝，被上帝派到人间看护所有基督教臣民。他们现在所谈及的皇帝已成为所有王公家族的首领。在这一族群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很明显，拜占廷皇帝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在他之下是他的子嗣，其次是友好的并接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信仰的盟国，最后是那些与皇帝有默契的友人，即使他们是多神教教徒、穆斯林或拜占廷势力范围之外的基督徒。并且，有一种观念认为保加利亚人在这一等级制度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当保加利亚使节访问君士坦丁堡时，总是享受着宴会上的荣誉席位，但座位的安排会根据当时亲疏关系的远近进行调整。这一细致的等级制度辅以典礼与外交礼物，在原始的巴尔干北部地区赋予帝国一种神秘的风韵和一种与军事实力一样令人折服的精神上的权威力量。

然而，还有罗斯人的问题。在巴尔干北部，军事威胁有助于将保加利亚纳入拜占廷的势力范围之中，即使发生过两次后果相当严重的威胁。罗斯人则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威胁，因为他们的首都基辅十分偏远。860年袭击之后，拜占廷便努力使其皈依基督教。874年，一位大主教被派往基辅，佛提乌甚至吹嘘说罗斯人已经成为帝国的“臣民与朋友”。事实证明，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的确，有些人皈依了基督教，944年，在基辅还建了一座举行典礼的教堂，但是，只要基辅大公仍保持多神教教徒身份，这一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延迟。957年，拜占廷充分利用当时正代表其子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统治基辅的伊戈尔大公的寡妻奥尔加（Olga）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机会。拜占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奥尔加被邀请与皇室成员在黄金制成的餐桌上用餐，这是拜占廷公开邀请的王室等级中的最高待遇。之后她接受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洗礼，并满载黄金与丝绸等外交赠礼归去。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奥尔加的皈依并未使全部罗斯人改变信仰。正如保加利亚汗王鲍里斯一样，她也在担心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信仰会导致民族独立的丧失，不久之后，她又从德意志邀请了一些传

教士到基辅。但无论如何，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都鄙视基督教，当他成长到能够独立统治时，进一步的皈依似乎失去了希望。

直到下一任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罗斯人才最终皈依基督教。起初，弗拉基米尔看上去对于皈依基督教并不比他的父亲更有希望，也似乎不太像会被追认为圣徒。在他即位之时，他已处死自己的兄弟，并以拥有4个妻子和800个情妇而自豪。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是一位狂热的多神教教徒，为供奉6位神祇在基辅建了大量庙宇。如同保加利亚可汗一样，弗拉基米尔的皈依既有精神因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有一个广为流传但并没有多少真实成分的传说解释了其精神上的动因。据说，987年左右，弗拉基米尔感到有必要为自己及臣民们选择一个更体面的宗教，而不是自己祖先的多神教。听闻这一风声，来了几群传教士敦促他转变信仰，但其中没有一个给弗拉基米尔留下特别的印象。伊斯兰教听上去很吸引人，但禁止饮酒。犹太教因为其信徒已失去自己的土地并散布于世界各地，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教皇派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但他确实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教士进行了长谈。犹豫不决之时，弗拉基米尔派了10位亲信去探访当时世上所流传的主要宗教，以便基于他们的报告做出抉择。他们首先探访了邻近的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认为伊斯兰教不可取。下一站是德意志的一座大教堂，但是那里的基督教礼拜也未打动他们：“我们未能见到神圣的荣光。”最后，这些四处周游的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受到皇帝的欢迎，并被安排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参加礼拜仪式。这一次的感受与众不同。在镶嵌画、壁画与圣像的衬托之下，美丽与壮观的仪式令这些参观者目瞪口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在人间是没有这样壮丽的美景的，一时之间，我们不知该如何描述它。我们所感知的只是上帝在降临人间……”对拜占廷宗教视觉特性的激情反应、圣像崇拜者的胜利果实，最终使弗拉基米尔做出决定，接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信仰。

图2 位于伦敦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雕像



图2 位于伦敦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雕像

也许最终是务实的金融与政治因素在说服弗拉基米尔上起了巨大作用，因为拜占廷能够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物质利益。罗斯人不仅从与君士坦丁堡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他们的剩余兵力在君士坦丁堡被高薪雇佣，与财富和权力中心的结盟也使基辅统治者区别于周围的邻国。987年，出现了提升这些收益的机会。年轻的拜占廷皇帝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正面临一个手下将军巴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的危险的反叛。由于缺乏军力，瓦西里二世向弗拉基米尔求助，绝望之中，他在先前的贡金上又附加上诱人的条件：将自己的妹妹安娜（Anna）嫁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按照要求派了6000名士兵，叛乱被镇压下去。弗拉基米尔得以与安娜结为夫妻，但是婚约还附带一个条件：弗拉基米尔必须与其臣民一同接受洗礼。这是一个硬性条件，但为了与在位的拜占廷皇帝的妹妹结为夫妻的声名是值得的，所以，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洗礼，并按照要求遣散了他的妻子与情妇。在中世纪罗斯这样的专制社会中，一旦统治者接受基督教，其余臣民的皈依就很容易了。传令官被派到基辅各地，宣布任何未于第二天在第聂伯河下水接受洗礼的人将惹怒大公。第二天，河岸上人头攒动，接到命令的人们纷纷涉入水中，特地从拜占廷请来的教士为他们举行集体洗礼。与此同时，城市上方的山丘上，雷电之神霹隆（Perun）雕像的银质头颅和黄金胡须都被拆下，被马拉入河中。12位男子受命用木棍敲击雕像，然后将它随意地倒入河水，水流将它冲下瀑布，让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如同保加利亚一样，罗斯人的皈依并不意味着其与拜占廷人之间所有敌意的消失。1043年，一个罗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斗殴中被杀，于是，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Iaroslav）派舰队袭击君士坦丁堡。100年前的灾难再次重现，罗斯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彻底击败，只有几条船得以逃脱。之后，两国和平相处，罗斯人的宗教文化逐渐朝着拜占廷的方向发展。989年弗拉基米尔皈依后不久，一座新的大教堂便在基辅建起，以纪念圣母马利亚升天。1037年，又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建起另一座圣灵教堂。建造这座教堂大

约花了20年时间，教堂依拜占廷风格而建，其中的镶嵌画与壁画大多出自拜占廷艺术家之手，教士、圣器、圣物和圣像都来自君士坦丁堡，教堂之内的圣餐仪式依照以西里尔字母编写的斯拉夫语进行。

罗斯人成为君士坦丁堡的常客，而不仅仅是作为路过的商人。佩戴具有特色重斧的瓦兰吉士兵作为拜占廷军队中的雇佣兵，逐渐成为皇帝贴身卫队的成员。罗斯人也作为朝圣者而来，渴望向君士坦丁堡城中教堂里众多的圣徒遗物表达崇敬之情。级别较高的罗斯人甚至被允许参观法罗斯圣母教堂中的藏品。对这些朝圣者来说，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历完全像弗拉基米尔的使节在10世纪80年代所经历的一样令人感动和鼓舞人心。一位朝圣者多布雷尼亚·亚得列伊科维奇（Dobrynia Jadrejkovich），即后来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安东尼（Anthony），留下了他在1200年参观君士坦丁堡的记录。他详尽列举了自己看到的所有镶嵌画、圣像、壁画及圣物。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他看到了自己曾深信不疑的摩西（Moses）由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刻着戒律的石碑，以及一些以色列人在沙漠之中得到的上帝所赐的吗哪。但并非所有罗斯朝圣者都对这一圣地表示出应有的尊敬。有一个画廊的大理石栏杆上就刻着这样的句子：“上帝，请您帮助您的奴隶菲利普，米基塔（Mikita）之子，塞浦路斯人、基辅城以及所有罗斯人的仆人。”菲利普造成的伤害也仅限于此，不像他的祖先在870年的所作所为，他来到这里并能写下这个句子，就证明罗斯人已被并入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圈中。最终，拜占廷征服了北方，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耐心，通过其基督教文化的视觉与仪式所创造的奇迹。也许，这才是拜占廷最伟大的成就。

第六章 光荣之路

吾等出于安纳托利亚军区，罗马贵胄之后，吾等之父属基纳玛德斯（Kinnamades）家族，吾等之母属杜卡斯（Doukas）家族，乃君士坦丁大帝之苗裔也……

——《迪杰尼斯·阿克里塔斯》（Digenis Akritas）

904年秋，拜占廷人还深陷于上次夏季大溃败的泥潭之中，一支来势汹汹的阿拉伯舰队却已经从叙利亚驶向塞萨洛尼基。这座帝国第二重要的城市，过去曾多次击败斯拉夫人的进攻，此时也严阵以待。尽管港口已被严密封锁，阿拉伯人还是在拜占廷人的海防中找到了缺口。在将该城洗劫后，他们还俘虏了2万个年轻人，带着他们南下克里特岛，并将他们卖为奴隶。若不是这次失利，皇帝和他的顾问大臣们本可以在大皇宫中庆祝从东部前线传来的小胜利。因为一小支拜占廷军队推进至多次易主的城镇日耳曼尼基亚，在这里他们遭到来自摩普绥提亚和塔尔苏斯的阿拉伯联军的袭击。在人数远逊于敌人的情况下，拜占廷将士英勇奋战，击败了敌军，带着战利品安全地返回了。

这一小支拜占廷军队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的人，他的姓氏是杜卡斯（Doukas）。安德罗尼柯的一位祖先可能曾任过将军（doux）或公爵（duke），这位祖先沿用这一官职作为姓氏以彰显其子孙的血统。10世纪初，越来越多显赫的拜占廷人在称呼自己时将名字和姓氏并用。实际上，杜卡斯家族仅仅是正在小亚细亚成形的若干显赫大家族中的一个，这些家族在小亚细亚拥有大规模的土地，并争相发动对其阿拉伯邻人的突袭。他们越过边境不断征战的精神孕育出讲述这些大家族丰功伟绩的生动的民间传

说，并最终汇聚成一部史诗，名为《迪杰尼斯·阿克里塔斯》（意为“混血的边疆卫士”），歌颂了一位同名英雄在抗击多神教教徒时的英勇壮举。迪杰尼斯是一位穆斯林埃米尔和一位基督徒女子的儿子，他的外祖父是一位拜占廷的将军。他拥有一位圆桌骑士所需具备的一切品质：忠于皇帝，信仰坚定，对朋友忠诚。他还拥有超凡的力量，能够徒手将狮子撕成两半。在击败所有敌人后，他在幼发拉底河畔的豪宅里度过了余生。现实中的迪杰尼斯们可能并没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或如此卓越的品质，但他们的确在叙利亚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突袭。

这支正在兴起的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轻易突袭成功，是因为老对手——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正在步入衰落期。哈里发亲率大军侵入托罗斯山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此时他们内部有更为紧迫的麻烦。阿拉伯内部的竞争派系时常兴起，并不断地废黜哈里发。为保障自己的地位，在位的哈里发依赖从中亚招募而来的突厥奴隶，并将其组建成一支皇宫警卫队。尽管他们完全效忠于哈里发并保护其免于被暗杀或废黜，但他们无法解决派系竞争的问题。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社会中，突厥人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族裔。他们的收入和生计完全取决于哈里发，因此他们必须确保现任哈里发是青睐他们的，并且会关照他们的利益。结果，他们便形成了定期推翻他们不喜欢的哈里发并选择一个他们更能接受的哈里发的传统。在政治不稳定的同时，经济也在衰落。美索不达米亚的富裕是建立在一套精密的灌溉农业系统之上的，然而，869—883年，在此耕作的非洲劳工暴动了。大量的军队被调去镇压暴乱，灌溉系统和依附于灌溉系统的种植业损失惨重。930年，哈里发实际上已经破产，无力负担其军队的开支。

哈里发统治中心区的孱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边境地区的分离趋势，并因宗教分歧而进一步激化。909年，北非一个亲阿拔斯的自治政权被法蒂玛王朝推翻。什叶派穆斯林不接受阿拔斯是先知的后代和信徒的正统领袖的主张。他们的统治者通过与保加利亚的西米恩谈判而震慑了拜占廷人。哈里发统治地区的衰弱也彻底改变了拜占廷东部边

境的局势。该地区的防御和对拜占廷领土的进攻都掌握在由巴格达任命的总督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总督成了事实上独立于哈里发的埃米尔。10世纪20年代，东部对抗拜占廷的主要力量是哈姆丹王朝，其独立的酋长国的主要据点是摩苏尔，后来迁至阿勒颇。哈姆丹王朝富裕且好战，却无法聚集起如哈里发统治巅峰时期那样同等的资源来对抗拜占廷人。

当拜占廷的统治者分心于和保加利亚的西米恩战斗时，小亚细亚的军事领袖们利用了东部的机会。领导反击的是约翰·库库拉斯（John Kourkouas），其家族在亚美尼亚军区的杜基亚周围拥有地产。919年，他帮助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在君士坦丁堡攫取了权力，作为回报，他被任命为新设立的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官。这个新官职反映出在新形势下发展出的一种新军队。随着拜占廷帝国在东部边境从防守转向进攻，老的军区部队越发显得过时。其曾经的任务是抵挡住阿拉伯人向小亚细亚的推进之势，而不是越过托罗斯山脉深入敌军腹地与之交战。军区部队的士兵出自农民，他们的眼界总是囿于家庭生计。相反，由君士坦丁五世建立起来的塔格玛塔近卫军此时则逐步发展壮大。职业军团的士兵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而不是给予土地。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税收的增加使国家能够雇佣更多的军团士兵。越来越多出生于拜占廷帝国之外的人被招募进这支精英军团中来，特别是罗斯人，甚至还有阿拉伯人效力于其中。克里特岛的埃米尔之子阿内马斯（Anemas）就是皇宫近卫军的一员，并于971年在保加利亚的战场上为皇帝捐躯。雇佣兵现象的出现并非帝国式微或衰落的标志，而是其经济复苏的标志，经济复苏使拜占廷人能够购买到最优秀的军队。这也显示出拜占廷人吸纳外来者并将其好战天性为己所用的卓越能力。皇宫近卫军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原本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周围，防备军区将军们的叛变，此时近卫军离开首都，前往东部边境地区，在那里他们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官是这股精英力量的指挥。由此可见，库库拉斯有效地控制着帝国东部的部队，其地位远在军区将军之上。

10世纪20年代，库库拉斯经常对边境地区的阿拉伯城镇发动突袭，而且他特别关注其中的一个城镇——梅利泰内，这个城镇长期是阿拉伯人从托罗斯山脉以西突袭进入小亚细亚的据点。934年5月，库库拉斯入侵并攻占梅利泰内周边地区，随后对该城进行严密的围攻，梅利泰内总督投降并打开城门。库库拉斯把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献给了皇帝罗曼诺斯，后者将其视为皇家地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其划分成小份分给士兵们。如今这片土地因为税收而更有价值，因为这些税收可以被用来雇佣更多的精英部队。在控制梅利泰内之后，库库拉斯率领他的部队越过拜占廷帝国边界进入叙利亚。943年，他围攻了阿拉伯帝国的腹地城市埃德萨。城内居民在意识到短时间内并无援兵到来之后，准备谈判。为换取安全，他们提议交出珍贵的“耶稣面像”，这是一块据说由基督本人留下其面部形象的古老布巾。库库拉斯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这一条件，并马上把部队撤回托罗斯山脉。944年8月，这件圣物被隆重地迎回君士坦丁堡，并安放在法罗斯圣母教堂内。对拜占廷人而言，获得“耶稣面像”是比攻陷梅利泰内还要伟大的胜利。库库拉斯成了风靡一时的英雄，甚至有人为他创作了一部长达8卷的传记。然而，有些人却警觉地观察着库库拉斯的胜利，因为在东部边境捷报频传的同时，君士坦丁堡大皇宫里的好戏也拉开了帷幕。

10世纪初，马其顿王朝被公认为正统皇室，尽管它的建立伴随着血腥和不光彩的事。在君士坦丁七世幼年时期，马其顿王朝平稳地解决了关于君士坦丁七世合法性的争论，也成功地平息了917年保加利亚可汗西米恩在安恰罗斯所带来的那场灾难。这既是因为此时距867年瓦西里一世上台已经有三代之隔，也由于继任皇帝们精心设计的关于世袭权力的政策。像582年莫里斯通过婚姻继承王位那样的体面安排诚然很好，但变数太大。因此，更加保险的做法是在皇帝去世前就指定一位继承者。从君士坦丁五世起，这种指定继承人的做法变得清晰起

来。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内有一个特殊的房间，窗子正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墙壁表面装饰着一种只开采于埃及某个偏远地区的斑岩大理石。这种大理石是深紫色的，这是从罗马时代起就象征皇权的颜色，点缀着白色的水晶。这就是专门用作皇后分娩的房间。这样一来皇帝的儿子就被称为“生于紫色寝宫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君士坦丁堡的民众相信，真正的皇帝必须是第一次睁开眼就看到这间房间的光的人。君士坦丁七世虽然是第四次婚姻的产物，却是“生于紫色寝宫者”。因此，当野心勃勃的舰队司令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于919年发动政变时，他并不能如福卡斯对莫里斯或希拉克略对福卡斯那样直接除掉君士坦丁七世，相反，他非常小心谨慎地步步为营。为了安抚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他把女儿嫁给君士坦丁七世，从而和皇室攀上了姻亲关系。18个月之后，他宣布自己为恺撒，比皇帝低一等级。直到920年12月，罗曼诺斯才在圣索非亚大教堂被加冕为皇帝，并且直到此时他也没有取代君士坦丁七世，而是和他共同统治帝国。毫无疑问，罗曼诺斯并不想一直维持这种局面，待时机成熟，他的利卡潘努斯家族就要取代马其顿家族，为此他还准备让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有朝一日加冕。两位皇帝的形象曾经同时出现在一枚金币上，并排站立，手握十字架，而罗曼诺斯还确保自己的形象比君士坦丁七世的高大。

尽管罗曼诺斯是政治高手，但他还是失算了，他的家族未能取马其顿家族而代之，所有的精心设计都在944年年底崩溃了。罗曼诺斯那些急不可耐的儿子反抗他们的父亲，并将其放逐到一座修道院内。利卡潘努斯兄弟本打算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君士坦丁七世，从而攫取皇位，但是，当宫廷事态的发展传到街头巷尾时，君士坦丁堡民众对马其顿王朝的强烈认同感驱使他们冲出家门干预政治。愤怒的群众集结到大皇宫铜门前，要求面见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确认他安全而未受伤害。直到君士坦丁七世未戴冠帽地出现并被确认后，这些群众才散去。这次受挫后，利卡潘努斯兄弟只能无助地等待，直到君士坦丁七世集结其支持者围捕他们并将他们放逐。此后，从945年直到959年君

士坦丁七世辞世，君士坦丁七世都独自把持着权力，马其顿王朝持续着。君士坦丁七世本人为罗曼诺斯一世题写了墓志铭，称他是一位成功的战士和外交家，抵挡了沙皇西米恩的威胁，理应受到赞扬，但在其他方面，他只是“一个平凡而无知的家伙，不属于那个生长于皇宫中的阶层”。

马其顿王朝的幸存确保了9世纪由佛提乌、巴达斯和他们那个圈子所持有的那种特殊观点和精神气质得以延续。它的支持者通常是受过古典教育的，可能是在大皇宫的马格诺拉大厅内的大学里，但他们绝非超凡脱俗的学者。相反，他们关于保卫帝国的想法相当现实。拜占廷帝国位于蛮族活动频繁的地带，它绝不可能仅凭军事力量获得安全。相反，它需要用一种超然的方式与这些敌人打交道，利用一方攻击另一方，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融入帝国的民族与宗教认同中去。战争是不愉快的必需品，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在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期，由拜占廷宫廷所编录的一些手册中就概述了这一观点。利奥六世统治时期的《战略》（*Taktika*）一书总结了对全面战争深深的不信任，并给出了最智慧的选项：

好的方法是用诈伪、突袭、饥饿来使敌人受损，用长久的频繁进攻和其他行动来伤害他们。绝不要被诱惑而投入激战。因为据我们所观察到的大多数情况，胜利取决于运气而非真正的勇气。只要运用金钱，你就可以经常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在别的地方还有敌人的敌人在伺机而动的话，你只要花钱雇佣这些人为你服务就好。

上述选项在君士坦丁七世所著的《论帝国的治理》（*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一书中阐述得更为清楚。这是一本写给其子罗曼诺斯（Romanos）的外交实践手册。这本手册研究了居住在帝国边境的民族，而且还提供了抑制他们的最好办法。对于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最好的战略就是每年支付给佩切涅格人一笔贡金，这样一旦发生情

况，他们能够被召集起来去攻打越过多瑙河的保加利亚人，或在罗斯人通往黑海的第聂伯河拦截他们。如果佩切涅格人叛变了，就利用他们的邻居于泽斯人攻打他们。同样地，哈扎尔人是拜占廷人的传统盟友，但是一旦他们形成威胁，可以动员于泽斯人与阿兰人攻击他们。这些外交手段只是帝国治理策略的一部分。对于君士坦丁七世和他的圈子而言，鼓励并培养与周边民族的友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邀请他们到君士坦丁堡的奢华国宴上做客。946年，正与其巴格达的对手阿拔斯王朝处于争斗中的西班牙后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的使者受邀，参加了在张灯结彩的马格诺拉大厅举行的招待会。还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奥尔加举办的招待会，她是基辅大公伊戈尔的遗孀。957年，当她到访君士坦丁堡时，正考虑皈依基督教。她被盛情邀请欣赏动听的管风琴音乐，一包包银币被赏赐给她的随从人员。君士坦丁七世在他关于帝国仪式的手册中生动地记载了这些场面。这些慷慨的馈赠在军事行动中同样发挥过作用。君士坦丁提出忠告，军队应该随身携带一些昂贵的丝绸衣服，因为当战争结束，缔结条约时，这些衣服可以作为礼物送出。

帝国首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这种实用的、非英雄主义的观点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它帮助发展了斯拉夫字母和礼拜仪式，使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皈依基督教，扩大了拜占廷文化在其帝国边境的影响范围。另外，它确实有意去宣传一种“君士坦丁堡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由大皇宫里那部分有共同教育背景的小团体所持有并发展。对他们而言，君士坦丁堡是帝国权威、学养和文化的唯一中心，他们总是对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城以外的人投以一种礼貌的蔑视。而与他们同属一个阶层却身处帝国边远地区的人们悲叹自己的命运，并且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到首都。1000年左右，一位被派往小亚细亚的辛纳达小镇的教士在一封写给瓦西里二世的信中强烈地抱怨了他所忍受的清贫环境，并且把缺乏高品质的葡萄酒列在他的抱怨清单的首位：

我们不种橄榄树，在安纳托利亚军区没有人种橄榄树。这儿的人根本就不懂葡萄酒文化，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海拔相当高的地方。我们不用木料，而用扎尔扎孔（zarzakon）——一种特殊发酵的牛粪，一种散发着恶臭的糟糕燃料。至于健康人与患病者所需的用品，我们只能从色雷斯松军区、阿塔雷亚或君士坦丁堡进口。

这样的观点，以及君士坦丁七世手册中博学的实用主义，与史诗《迪杰尼斯·阿克里塔斯》中所表达的边境地区和军事家族的野心勃勃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的差异甚至拓展到语法和词汇领域：君士坦丁七世用马格诺拉皇宫大学教授的那种古老而夸张、做作的成语写作，而史诗却用平凡而日常的希腊语表达。总之，到10世纪中叶，首都与行省之间清晰的隔阂已经开始出现。行省军阀们对有着复杂仪式和严密等级秩序的君士坦丁堡与宫廷十分不信任。一位贵族告诫他的儿子要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它，待在自己省区的权力根据地更好：

如果你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这块设防的地方或地产你是主人和管理者，不要被皇帝的黄金、荣誉头衔和巨大的许诺诱惑……因为只要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占有土地并保持你的权力，在皇帝和所有人的眼里你就是不可小觑的、享有荣誉和值得尊敬的高贵人物。

在君士坦丁堡，马其顿皇室的皇帝们和他们的顾问对小亚细亚的军阀们也心怀深深的不信任，尽管他们在边境捷报频传。正如查士丁尼害怕贝利萨留、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害怕军区的将军一样，10世纪初期，那些成功的将军，如安德罗尼柯·杜卡斯和约翰·库库拉斯就被视为潜在的叛乱者。他们在小亚细亚坐拥大量地产，并且对其掌握的众多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随时都可能选择时机推翻马其顿王朝。这些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这之前不久一位行省的权贵就如此行动了。

913年，7岁的君士坦丁七世继承皇位。安德罗尼柯·杜卡斯的儿子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oukas）就曾把他的部队调往首都。趁着夜色，城内的接应把他们从陆墙带入城内，部队朝竞技场前进，他的部下高呼其为皇帝，当他们到达竞技场入口时，却发现被封锁和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内效忠于马其顿王朝的民众行动起来阻挡了叛变者前进的道路。杜卡斯的御马者确信能够轻易击退民众，领导着一小队人撬起城门。可是，门还没开，一支暗箭让他倒地而亡。受挫的杜卡斯把注意力转移到大铜门，试图突破铜门进入大皇宫，在那里他遇到一支皇宫近卫军的顽强抵抗。杜卡斯骑着马慢跑并鼓励部下，但是他忘了他不是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他的马在鹅卵石上失足，把他摔倒在地上。当他倒下陷入昏迷时，有人砍下了他的脑袋。打滑的地面拯救了王朝，杜卡斯却落得悲惨下场。然而，下一次反叛的尝试只是时间问题。

919年，当政变发生时，获得权力的并非显赫的军事家族成员。尽管反叛者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是舰队司令，但他是一位亚美尼亚农民的儿子。罗曼诺斯掌握权力后，不仅保存了马其顿王朝，而且他还从侵入者变成了看守者。他既不是杜卡斯那样的军事贵族，也并非在首都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因此，他能够冷静地看待首都和行省的关系，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起初，他对在东方取得胜利的约翰·库库拉斯进行了褒奖与提拔，最终却对后者产生怀疑。944年，库库拉斯从埃德萨凯旋后几个月，就被突然罢免了司令官一职。不仅是库库拉斯家族令罗曼诺斯忧心忡忡，罗曼诺斯还注意到小亚细亚许多有权势的家族正在积聚起相当大的地产，部分是从当地农民那里购买的。这些家族的土地越多，他们的权力根据地就越强大，罗曼诺斯对此采取了阻止措施。922年，他颁布阻止小亚细亚贫苦农民的土地落入不法之徒手中的法律，规定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农民希望出售其土地，其亲属或邻居被赋予优先购买权。只有当其亲属与邻居都无意购买时，方才可以将土地出售给第三方。然而，这部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927—928年之交的严冬和饥荒使许多贵族乘机以很低的价格从绝望的

农民手中收购大量的土地。针对此事，罗曼诺斯934年颁布新法律，规定以低于公正价格一半的价格收购的土地将被无偿退还；如果以高于公正价格一半的价格收购，那么土地也将物归原主，且5年后才能拿回原先的购地款。在库库拉斯于934年拿下梅利泰内后，罗曼诺斯将这座城镇及其周边地区都变为皇家地产，此决定的背后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不想让它被地方军阀无声地篡夺。

尽管君士坦丁七世不喜欢他的岳父，但在利卡潘努斯家族倒台后，他仍沿用他岳父的政策。他通过一系列法律强化罗曼诺斯颁布的法律，哀叹道："我们已经听说安纳托利亚军区人民的穷困与贫苦，以及他们被那些有权势的人欺压……"可能也是君士坦丁七世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军区制度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即民事和军事权力的合一。因此，将军只负责统领部队，民事事务被分配给其他人。考虑到有权势的家族总是垄断将军一职，这是断其肢翼的另一种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贯彻这些严苛法令的罗曼诺斯一世和君士坦丁七世十分倚重他们所害怕的家族，依靠他们保卫帝国的边疆，确保自己皇位的安稳。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军事家族不仅没有被抑制，而且他们中的一个还取得了统治地位。

945年1月，当君士坦丁七世镇压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的儿子们时，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支持，在他周围还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其中就有巴达斯·福卡斯。和杜卡斯家族、库库拉斯家族一样，福卡斯来自小亚细亚的富裕家族，在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抗击阿拉伯人的战斗。在危机降临时，福卡斯发挥了作用。941年，挫败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使他一举成名。他率领一支骑兵部队攻向一伙上岸搜索的罗斯人，将他们杀到只剩一人。也是福卡斯和他的部下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君士坦丁七世，他们逮捕了正在大皇宫中用膳的利卡潘努斯兄弟。牢固地掌握了权力后，君士坦丁

七世自然要对他的支持者进行奖励。巴达斯·福卡斯被授予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官一职，而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利奥和君士坦丁分别成为安纳托利亚、卡帕多细亚和西里西亚军区的将军。这些任命的结果是福卡斯家族有效地控制了拜占廷帝国东部的军队。

结果，巴达斯·福卡斯在新职位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在司令官任期内，他于954年在日耳曼尼基亚遭到一次打击。他碰巧与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埃米尔赛义夫·道莱（Sayf al-Dawla）偶遇，却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军队，结果他的大多数部下都作鸟兽散了。若不是他的贴身卫队围绕着他，将他带走，巴达斯都有可能被俘。在混乱中，他的额头被割了一道很深的伤口，他的余生都带着这个额头上的疤痕。而他的儿子、西里西亚军区的将军君士坦丁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但他没能逃脱，被俘后囚禁，并在几年后死于阿勒颇。巴达斯的名声再也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有人嘲弄说，只要在别人的命令下，他就是个好的指挥官。然而，福卡斯家族的命运却被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尼基弗鲁斯和利奥扭转了，二者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军人。在他们的父亲遭到打击的两年后，利奥在获知情报后，截获抢劫归途中的赛义夫·道莱的部队。他把阿拉伯人围困在一条小道上，屠杀了大量士兵。而他的兄弟尼基弗鲁斯同样取得了对哈姆丹王朝的一系列胜利，并代替他们的父亲成为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官，而在他实现了拜占廷军队在一个世纪内所取得的最大的军事胜利后，他的声名更是远播到了帝国的西部。

自10世纪20年代阿拉伯海盗入侵并占领克里特岛以来，拜占廷人就一直渴望收复该岛，不仅因为克里特岛富裕且土地肥沃，而且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对拜占廷帝国的海岸与爱琴海上的岛屿发动进攻的绝佳跳板，而阿拉伯人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拜占廷人已经数次尝试夺回该岛，但都以惨败而告终。所有失败的将军都没能克服后勤运输方面的难题，既要在海上大规模地运输军队和马匹，又要使其安全登陆并能迅速投入战斗。959年，君士坦丁七世逝世，他的儿子和

继承者罗曼诺斯二世（959—963年在位）决定对克里特岛发动新的进攻，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司令官尼基弗鲁斯·福卡斯。

960年春，尼基弗鲁斯在弗吉亚集结部队，前往以弗所以南。军队士气高涨，因为尼基弗鲁斯十分照顾部下，深受部下爱戴。在行军途中，他与士兵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一次，尼基弗鲁斯发出在一座山的山顶上修筑堡垒的命令，然后他身体力行，自己扛着沉重的石块从山坡走上去，并命令所有人跟他一样扛着建材上山。毫无疑问，他的部下十分爱戴他，还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撒拉森人的白色死神”。但尼基弗鲁斯相貌粗鄙，身材矮小，有点儿驼背，眉毛黑而浓密，鹰钩鼻子，被他的一个敌人形容为“不愿意在黑暗中见到的人”。尼基弗鲁斯也不是那种会讲粗俗笑话而在士兵中赢得欢迎的人，相反，即便是在拜占廷这样一个宗教氛围如此浓厚的社会，尼基弗鲁斯的虔诚也是出了名的。据说，他经常整晚站立祷告，而且在领圣餐之前的夜晚，他都在地板上睡觉。他认为，当战士的使命不足为道，他渴望成为一位修道士。事实上，他计划在胜利完成远征克里特岛的任务之后就发誓隐修。当远征克里特岛的准备工作还在进行时，他乘船渡过爱琴海，前往希腊北部阿索斯圣山的海角，在那里寻求隐修道士阿塔纳修斯的精神指导。

尼基弗鲁斯对宗教充满热情，在军事上也不失职。他对战略和战术都深思熟虑，事实上他还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他把他的知识和经验都投入远征克里特岛的准备之中。一切准备就绪，军队登上了停靠着的战船。如此大规模的舰队行动无法保密，阿拉伯人正在沿岸严阵以待，准备在入侵者最易受攻击的上岸时刻进攻。然而，尼基弗鲁斯对战况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给战船装上了坡道，一靠岸就可以放下这些坡道，步兵和骑兵都可以从坡道全副武装地登陆，并立刻投入战斗。阿拉伯人大吃一惊，犹豫不前，居然等着拜占廷人先发起进攻。阿拉伯人被迫退入主城夯达克斯内。在960—961年之交的冬季，拜占廷人占据了岛屿的绝大部分，阿拉伯人被围困在夯达克斯城内。

胜利的消息传回大皇宫，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种解读。自然有人欢欣鼓舞，仿佛克里特岛已被夺回，但是也有谣言说大将军将利用他的胜利觊觎皇位。皇帝的首席大臣、统领行政的宦官约瑟夫·布林加斯（Joseph Bringas）特别不安，他催促罗曼诺斯二世召回这个危险的属下。幸运的是，罗曼诺斯二世并没有按布林加斯的意见行事。961年3月，夯达克斯的城墙在全面进攻下被攻破，克里特岛重新回到拜占廷的统治之下。

尼基弗鲁斯在新攻克的岛屿安排好驻军，确保其安全后，便率领部分舰队回到君士坦丁堡。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并在竞技场展示他的战利品，有盔甲、盾牌、金币、地毯等。其中一部分战利品被捐献，用于在圣山上修建一座新的修道院——大拉弗拉修道院，由隐修道士阿塔纳修斯负责管理。尼基弗鲁斯很有可能准备加入这个修道院的修道士团，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就被罗曼诺斯二世派往东方前线。当拜占廷帝国的大部分部队被调往克里特岛时，赛义夫·道莱乘虚进入小亚细亚地区，尼基弗鲁斯的兄弟利奥拦截并击退了他。尼基弗鲁斯来到这里，并发动了对叙利亚的全面入侵，洗劫了哈姆丹王朝的阿勒颇，然后撤出了该地。

福卡斯兄弟的精力和效率与首都的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其父长期待在家中专注于书籍不同，罗曼诺斯二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寻欢作乐，而他的首席大臣布林加斯也鼓励他这样做，因为皇帝不问政事他就可以独揽大权。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963年的大斋期，罗曼诺斯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乡间狩猎，回来时身体明显非常不适，几天之后他就离世了，死于某种突发疾病。年轻皇帝的突然离世令人震惊，人们对此毫无准备。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波利艾弗克托斯（Polyeuktos）站出来宣布罗曼诺斯二世的儿子们为共治皇帝。然而，他的儿子瓦西里二世只是个孩子，君士坦丁八世还是个婴儿。帝国再次面临与913年相同的局面。皇帝的遗孀塞奥法诺（Theophano）与大教长及布林加斯一起摄政。但是，众所周知，在这

种局面下，某个军事强人控制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事，正如919年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所做的那样。皇后非常不喜欢也不信任布林加斯，并且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发生军事政变，她应该站在胜利的一方。

塞奥法诺很可能给尼基弗鲁斯传递了信息，请求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尼基弗鲁斯在罗曼诺斯二世逝世后的一个月内回到君士坦丁堡，带回洗劫阿勒颇的战利品，并且炫耀地把它们捐给国库。接下来的几周里，风平浪静。皇后塞奥法诺继续摄政，布林加斯管理着行政，尼基弗鲁斯安静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官邸里，而布林加斯严密地监视着他。在初夏的一个夜里，布林加斯正准备坐下来吃晚餐，他家的大门被敲响了，通报说尊贵的将军只带了一名随从前来拜访。布林加斯大吃一惊，但只能把尼基弗鲁斯领进一间偏房和他进行秘密会谈。在这个小房间里，尼基弗鲁斯向这位宦官展示了其短袍内的粗毛衬衣，证明他的意愿是成为一名修道士而非皇帝。布林加斯看上去真的相信这个说法，甚至还为自己对尼基弗鲁斯心怀恶感而道歉。几天之后，这位将军离开首都，重返部队。

尼基弗鲁斯的表态很可能是真诚的，但布林加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布林加斯在得到尼基弗鲁斯的保证后马上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受骗了。于是，布林加斯给尼基弗鲁斯的一些下属送了密信，其中包括尼基弗鲁斯的外甥约翰·基米斯基（John Tzimiskes）。布林加斯许诺，如果他们能够逮捕他们的司令官，将获得奖励和升迁。他没有考虑到他的政敌在军队中所享有的部下的忠诚：基米斯基和其他几位将领立即把信件交给了尼基弗鲁斯。963年7月2日，尼基弗鲁斯不得已被其部下在凯撒里亚拥立为皇帝，然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他进兵的消息引起了骚动。篡位者的父亲巴达斯与其他亲戚一同逃到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避难所里，而利奥则乔装成一名工人，通过一条下水道逃出城，跑去加入他兄弟的阵营。尼基弗鲁斯派出一位主教带着他的信件提前抵达君士坦丁堡，他向大教长和城内有影响力的市民保证，如果接受他做皇帝，那么他将确保马其顿王朝的年轻皇帝们的权力。宫中

的许多人，包括皇后在内，都认为接受尼基弗鲁斯为皇帝是最好的选择。宦官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名叫瓦西里·利卡潘努斯，他是罗曼诺斯一世的私生子，幼年时被阉割以确保他以后不会觊觎皇位。他是大皇宫的宦官管理者之一，也是布林加斯长期以来的竞争者。利卡潘努斯将自己家中的3000人武装起来，向布林加斯的官邸和其支持者发动进攻，这回轮到布林加斯逃往避难所了。8月16日，尼基弗鲁斯乘船抵达君士坦丁堡，在“欢迎神圣的皇帝尼基弗鲁斯”的欢呼声中，从陆墙的金门进入城内。他的支持者抓获了布林加斯，并放逐了他。大将军骑马前往圣索非亚大教堂，被加冕为尼基弗鲁斯二世（963—969年在位）。一个月后，他与皇后塞奥法诺结婚，成为两位年轻皇帝的继父，使自己的皇位合法化。与罗曼诺斯一世时期的安排一样，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瓦西里二世的形象同时出现在钱币上，但年长者是帝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随着军事贵族中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控制了帝国，佛提乌和君士坦丁七世那些小心谨慎的策略再也不合时宜了。东方战事持续不断。965年，塔尔苏斯被攻下，几个世纪以来由拜占廷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统治的塞浦路斯也重新回到拜占廷人的独立统治之下，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埃米尔被迫承认拜占廷皇帝在该地的霸权。969年，沦入阿拉伯人手中300年的伟大城市安条克终于又重新回到拜占廷人的手中。上述战役是在十分狂热的宗教氛围下进行的，让人回想起希拉克略发动的波斯战争，尼基弗鲁斯甚至要求大教长宣布那些与阿拉伯人作战的士兵是信仰的殉道者。胜利的成果巩固了尼基弗鲁斯在军中几近传奇的地位，而小亚细亚的居民们似乎也很尊敬他。在他统治期间，卡帕多细亚的一座教堂中有一幅壁画，展现了他与塞奥法诺、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在一起，上面有“上帝永远保护我们虔诚的统治者……”的文字，并没有提及年轻的瓦西里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兄弟俩。

不过很明显，尼基弗鲁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受尊敬程度远不及他在行省的受尊敬程度，特别是在963年他刚继位的那段时间里。在皇宫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朝臣们看来，新皇帝的边疆政策正如他粗暴和急于行动的行为方式一样危险。他们肯定对他缺乏外交礼节而感到尴尬，因为他具有一种天赋，总能用一些刻薄的话呛到那些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快的外国使节。保加利亚使者听说他们的沙皇被当作一个“穿着皮短上衣而啃着皮的统治者”。一位代表德意志皇帝来访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被告知他主人的部队不知如何作战，因为他们正忙于填饱肚子。这位主教抱怨说，在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期他不曾受过这样的待遇。实际上，他当年确曾获赠许多礼物，满载而归。宫中的官员不得不做出如下解释：

君士坦丁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他总是待在宫中，并且像对待他的朋友那样对待别的国家。尼基弗鲁斯正相反……他是一个好战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逃避皇宫……他不是用金钱换取别国友谊的人，而是用恐吓和刀剑令别国臣服的人。

在宫廷的管理者中，皇帝的确有一位忠实的支持者，他就是瓦西里·利卡潘努斯，他取代布林加斯成为行政官员的首领。利卡潘努斯和他的圈子无疑具有马其顿王朝的君士坦丁堡观念，但他们更看重尼基弗鲁斯军事胜利的价值，而且意识到他的巨大优点在于没有自己的继承人。尼基弗鲁斯唯一的儿子在几年前的一次军事训练中不幸被矛刺中身亡。皇帝如今已经50多岁了，他与塞奥法诺的婚姻看上去也不可能有孩子，因此他的家族取代马其顿王朝的可能性非常小。目前的安排符合所有集团的利益。

而在皇宫外和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人们对这位军人皇帝深恶痛绝，因为他把军队的需求置于其他臣民的需求之上。963年，当他进入君士坦丁堡被加冕为皇帝时，他的许多士兵乘机抢劫市民的家，无论贫富都不放过，新皇帝事后也没有对此行为进行限制或惩罚，只是漫

不经心地评论道："在一大群人中出现一些不当行为是不足为奇的。"为了供养他日益庞大的军队，尼基弗鲁斯随时征用补给并引入新的税种，甚至使用降低金币成色的手段。几个世纪以来，诺米斯玛一直是拜占廷金币的标准，重量为4.55克。尼基弗鲁斯引入一种更轻的货币——特塔尔特隆，它与诺米斯玛一同流通。尼基弗鲁斯立法规定，上交给国库的钱（比如税金）必须用诺米斯玛支付，而他自己的开支则用特塔尔特隆支付，因此，他在每次交易中都能获利。

不稳定的君士坦丁堡民众不久就爆发了情绪。在一次尼基弗鲁斯对首都的巡视途中，当他骑马经过街道时，他被民众起哄，还被扔泥巴和石头。一对母女爬到自家的屋顶上向他扔石头。尼基弗鲁斯目不斜视，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到了晚上，骚乱就被镇压了，冒犯的行为没有逃过惩罚。有人细心地在扔石头的那对母女的住所做下记号，第二天她们就被逮捕并押往城外，立即被烧死了。虽然尼基弗鲁斯看上去若无其事，但他确实担忧。他下令围绕大皇宫修建一圈结实的围墙，可能是对945年利卡潘努斯家族因民众抗议而垮台的事记忆犹新。尽管尼基弗鲁斯用一堵墙将自己与民众隔离开来，但他仍平易近人，并且能经得起开玩笑。有一次，他见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后者想要应征入伍。尼基弗鲁斯对他说，他太老了，已不适合服役。而后者回答他道："不，我比年轻时还要强壮。"并说在过去他需要一头驴子驮价值1枚诺米斯玛的谷物，而现在他自己就可以肩扛价值2枚诺米斯玛的谷物。对于这种对尼基弗鲁斯通货膨胀政策狡猾的挖苦，皇帝一笑了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基弗鲁斯最终并没有栽在君士坦丁堡暴民的手中，而是被自己同阶层的成员推翻了。小亚细亚的军阀们期盼尼基弗鲁斯一登上皇位就废除那些阻碍他们获得地产的法律。这位新皇帝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那些法律大部分纹丝未动。此时他已身居宝座，从他的利益出发，不太可能去鼓励潜在的竞争者扩大势力。于是，一场针对皇帝的阴谋开始筹划，领头者正是他过去忠诚的部下和

外甥约翰·基米斯基。基米斯基长期以来跟随尼基弗鲁斯南征北战，是伟大的约翰·库库拉斯的后代。与他的舅父一样，基米斯基身材矮小，但是勇气可嘉，甚至近乎鲁莽，他曾数次单枪匹马冲向敌军的整个小分队。969年秋，基米斯基接到召他回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消息是尼基弗鲁斯发出的，但这位皇帝是应他的妻子塞奥法诺的请求发出的消息。塞奥法诺对他说，应该给近来丧妻的基米斯基找一位合适的妻子。基米斯基抵达后发现，塞奥法诺另有打算。她请求基米斯基帮她摆脱那个粗鲁而又过分虔诚的丈夫，取而代之成为皇帝。基米斯基马上就答应了，并说他已心怀不满。阴谋酝酿而出。预谋的秘密计划不久便在皇宫中传开了，也有人警告过尼基弗鲁斯。一天晚上，尼基弗鲁斯在他的卧室发现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基米斯基是潜在的暗杀者”。几天之后，在尼基弗鲁斯去教堂参加礼拜时，一位教士递给他一封含义隐晦的信，上面写道：“做好准备吧，皇帝，因为不小的危险正在酝酿……”出于某种原因，他并没有根据这些密报采取行动。12月的一个夜晚，基米斯基和他的同谋者乘船抵达大皇宫的港口，并由皇宫内的支持者从一扇窗户拉入宫中。此时，瓦西里·利卡潘努斯已得知这个阴谋，但他预料到事态发展的方向，就回到自己家中的床上躺着，假装生病。尼基弗鲁斯自己也怀疑那个晚上会有事情发生，于是，他给他的兄弟利奥发出一张便条，要他带一队人马来宫里。但是，利奥此时正与他的赌友们玩骰子，而且赌运正旺。他把这张便条塞到坐垫下，继续赌博。因此，密谋者们畅通无阻地进入尼基弗鲁斯的卧室，发现门没锁。进入房间后，他们发现床上并没有人。他们困惑地撤出，怀疑有人叛变，直到塞奥法诺的一位侍从到来，并向他们一再保证一切进展顺利：尼基弗鲁斯在房间里，但是为了准备他仍渴望的修道生活，他睡在地板上。密谋者们再次涌入卧室，发现熟睡的皇帝躺在床的另一边的地上。他们重重地将他拍醒，其中一人把剑架到他的脖子上。尼基弗鲁斯仍试图呼救，但他们割下了他的脑袋，将其挂在窗口，让那些前来营救他的人一眼能看到为时已晚。在基米斯基的命令下，第二天晚些时候，尼基弗鲁斯的尸体被丢进棺材，运往

圣使徒教堂，埋在了一口石棺中。直到很久以后，一位深悉塞奥法诺在这次阴谋中所扮演角色的人在这个坟墓上加了一段墓志铭：“尼基弗鲁斯，铲除了一切，除了夏娃。”

瓦西里·利卡潘努斯的病在破晓前就奇迹般地康复了，他回到大皇宫后将自己介绍给新的统治者。新皇帝奖赏他，让他继续担任在前政权中的职位。福卡斯家族在城内的所有成员都遭到围捕，捆绑到船上后被分别押送到爱琴海的不同岛屿上去。利奥·福卡斯死在莱斯沃斯岛上，无疑对那场长时间的骰子游戏悔恨不已。之后，基米斯基与他的追随者大步走向圣索非亚大教堂，信心满满地准备登基加冕。他们没有预料到年迈的大教长波利艾弗克托斯的出现与阻拦，大教长宣称一个刚谋杀了自己亲属的人不适合踏进此地，更不用说加冕为皇帝了。谈判开始。约翰抗议说，他不是谋杀者，因为事实上他本人没有杀死他的舅父，他甚至不是阴谋的唆使者——那是皇后塞奥法诺所为。他同意为他所做的那部分罪行忏悔，而且保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穷人捐出他所有的财产。波利艾弗克托斯妥协了，同意为他加冕，但不批准他与塞奥法诺结婚。约翰昔日的盟友如今成了他获得权力的障碍。他逮捕了她，将她像尼基弗鲁斯的亲戚一样送到一座安全的岛屿上去。她没有安静地离开，而是被强行从她祈求庇护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内拖出去的，在扭打中她还朝瓦西里·利卡潘努斯的脑袋上揍了一拳。两个杀死尼基弗鲁斯的人也被放逐了，他们向基米斯基效忠，这算是对他们可怜的奖赏。约翰一世（969—976年在位）于圣诞节正式被加冕为皇帝，同时他接管了前任作为两位法定幼君（瓦西里二世与君士坦丁八世）监护人的角色。

君士坦丁堡的市民接受政变的结果，因为他们从未喜欢过尼基弗鲁斯。约翰一世通过与狄奥多拉结婚来减少篡位的不良影响，狄奥多拉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女儿，约翰一世的受监护人的姑母。这一行动在

君士坦丁堡市民中很受欢迎，因为这样做就使权力留在了马其顿皇室之内。一场奢华的表演在竞技场举行，约翰一世发现自己在首都更受欢迎。在关于塞奥法诺与她奸情的下流歌曲传遍城内的大街小巷后，生活随之趋于正常。在行省，反抗约翰一世占据皇位的行动却出现了。不足为奇，福卡斯家族对其亲属的垮台感到惊恐，此时已制订计划，要夺回权力。约翰政变后的夏季，另一位巴达斯·福卡斯——利奥的儿子，不幸的尼基弗鲁斯二世的侄子，成功地从他的流放地亚美尼亚军区的阿马西亚出逃，跑到福卡斯家族在凯撒里亚的根据地，被那里的军队拥戴为帝。约翰一世无法离开君士坦丁堡，只得委派他人处理此事。他已故的妻子属于另一个军事家族斯克雷罗斯家族，他将东部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妻弟巴达斯·斯克雷罗斯（Bardas Skleros）。斯克雷罗斯很快将福卡斯包围在一座要塞里，迫使他投降，并将他送到更安全的流放地希俄斯岛上去。

福卡斯家族或许已被彻底剥夺权力，但新皇帝和他的同盟者斯克雷罗斯家族的政策与其基本一致。军事贵族们牢牢控制了权力，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然而，一连串无法预料的事件导致约翰一世继位后所发动的第一场战争不是发生在小亚细亚或叙利亚，而是在保加利亚。924年，拜占廷人通过与保加利亚沙皇西米恩签订条约，承认他的头衔，并每年送给他金币。作为对获赠金币的回报，保加利亚人阻止从草原来的突厥人劫掠拜占廷的领土。西米恩的儿子彼得显然没有继续履行职责，因此966年尼基弗鲁斯二世停止向其支付金币。接着，战争爆发了，尼基弗鲁斯二世调动他的军队到前线，占据保加利亚的一些要塞，但他记得811年他的前任与同名者的命运。他不愿意再推进了，再者，东部还有一场对阿拉伯人的战争需要他去关注。尼基弗鲁斯二世转而回到老策略上，而这种策略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喜欢正面对抗的军事贵族们放弃。他决定花钱请别人来教会保加利亚人认清他们的地

位。他派一位特使带着1500磅金币去基辅见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

斯维亚托斯拉夫是伊戈尔与奥尔加的儿子，也是使罗斯人改宗基督教的弗拉基米尔的父亲，但他本人直到逝世都是坚定的多神教教徒。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战士，此前不久他已荡平拜占廷帝国的老盟友哈扎尔人，又于968年夏应尼基弗鲁斯二世的请求率军攻入保加利亚。这次入侵的破坏性是如此巨大，以至沙皇彼得立即与拜占廷人签订条约，甚至自愿退位，由他的儿子鲍里斯二世登基。969年，拜占廷人凭狡黠与外交所取得的貌似极大的成功却以惊人的速度瓦解了。在劫掠期间，斯维亚托斯拉夫并非没有注意到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富饶与肥沃的土地，以及保加利亚人抵抗的微弱程度。夏季又来到时，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再次入侵，这次他带了更多的兵力。罗斯军队未遇抵抗便横渡多瑙河，直奔西米恩的旧都普雷斯拉夫。保加利亚人躲在城墙后面反击进攻者，获得了一些胜利。然而，罗斯人回之以全面进攻，突破防线，攻进城内。普雷斯拉夫一丢失，保加利亚人的抵抗便崩溃了，沙皇鲍里斯二世成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俘虏。罗斯人很快占领了保加利亚其余的国土，只有菲利普波利斯坚守了一阵，当它也沦陷时，报复欲强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将许多抵抗者钉在了尖桩上。在短短几个月内，拜占廷人便目睹一个软弱且不构成威胁的基督教邻国被一个强大的多神教民族取代。

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或许使约翰一世确信，无论外交还是“其他手段”对此都无效。他开始准备全面战争，就像917年摄政时期对抗西米恩那样。在970—971年之交的整个冬季，他在阿德里安堡囤积大量武器与粮食，并准备一支舰队，以便支持黑海与多瑙河的军队。971年4月，他亲自挑选一支5000人的军队，穿越巴尔干山脉，而大部队由瓦西里·利卡潘努斯率领，紧跟其后。这支先头部队行动如此迅速，令罗斯人十分震惊。他们刚得知皇帝的行动时，最新消息已经是他即将抵达普雷斯拉夫的城下了。当拜占廷军队靠近时，大约有8000名罗斯

士兵正在城墙外参加训练，他们很不光彩地逃回要塞内。不久之后，拜占廷军队的主力到达了，对普雷斯拉夫的进攻正式开始。4月13日，拜占廷人攻入城内，但罗斯军队的大批人不愿接受失败，他们躲入沙皇西米恩所建的有防御工事的宫殿内。约翰一世认为，最便捷的应对办法是用烟将他们熏出来。于是，建筑外面被到处点起火来，燃烧的箭不断射进窗子内。这当然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一些罗斯人逃了出来，另一些则被火烧死了。但大火也给西米恩时代的橱窗城市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烧毁了他当年想与君士坦丁堡媲美的金色教堂与许多精美建筑。基米斯基只得在废墟上庆祝复活节。

普雷斯拉夫被攻破时，斯维亚托斯拉夫不在那里。他率大部队奔向那儿，想要扭转困境。在德里斯特拉周围发生了一系列激战，最终拜占廷人获胜。此时，数以千计的罗斯人战死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很不情愿地意识到他必须摆脱保加利亚的困局。因此，他向约翰一世派出一名和谈使者，提出他将放弃德里斯特拉，并从保加利亚撤离。约翰一世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也急于结束这场战役。这给更新旧的贸易条约提供了机会，罗斯人获准像他们先前那样带着货物去君士坦丁堡。之后，罗斯人便离去了，开始了长途跋涉地返回基辅。他们大多未能回国，佩切涅格人埋伏在第聂伯河沿岸，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袭疲惫的罗斯人。斯维亚托斯拉夫于此役中阵亡。

约翰一世在取得罕见的完胜、占领保加利亚全境后，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它。他曾在战役中公开宣称，他是与罗斯人斗争，他要从他们手中解放保加利亚。当普雷斯拉夫被攻克时，拜占廷人释放了鲍里斯二世与他的家人。皇帝善待他们，并释放了所有在战役中俘获的保加利亚人。不过，情况很快明了，他没有打算将保加利亚物归原主。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之间的土地过去曾是拜占廷帝国的领土，现在又是了。自此，普雷斯拉夫以皇帝的名字改称为“扬诺波利斯”（意为“约翰的城市”），并由皇帝指派的一位总督管辖。不幸的鲍里斯二世不得不随皇帝回君士坦丁堡，并参加从城墙的金门一直到圣索非亚

大教堂的胜利游行。他的皇冠与皇家徽章被公开剥夺，并被作为献给上帝的贡品安放在圣索非亚大教堂的祭坛上。这位前沙皇在君士坦丁堡被安排了舒适的退休生活，还享有一个无足轻重的头衔，以便他参加仪式与游行。

紧接着，约翰一世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叙利亚前线，那里的事态发展迅速。969年，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向东推进，占领了埃及，夺取了这个阿拔斯王朝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并设立了其什叶派的哈里发，以对抗巴格达的哈里发。同年的晚些时候，其军队推进至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势力已威胁到拜占廷帝国的边境。50年前，拜占廷皇帝和他的顾问大臣们或许已看到能够挑动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之间彼此相斗而获取利益，可约翰一世不这么认为，他要冒险进攻这个地区的城市。他最大胆的出击开始于975年春，拜占廷部队深入叙利亚，对所到之处进行洗劫与焚毁。赫利奥波利斯（意为“太阳城”）在被围困几日之后，被攻陷并遭洗劫。不过，约翰一世非常喜欢通过勒索来获取相同的成果。不久后，大马士革进入他的视野，这里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见过拜占廷人的军队了，但这里的居民并不想遭受赫利奥波利斯居民那样的噩运。他们出来迎接皇帝，给皇帝送来钱款、马匹和骡子作为礼物。在承认皇帝的霸权和保证每年缴纳贡赋后，这座城市被赦免了，皇帝继续前行。在收到来自贝鲁特、的黎波里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贡赋后，约翰一世在9月时已向南推进至巴勒斯坦，南至凯撒里亚。

约翰一世对保加利亚的强行吞并，以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洗劫性入侵，与拜占廷人先前所追求的那些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标榜战争正义性的氛围也存在于尼基弗鲁斯二世出征期间。971年，当约翰一世从保加利亚凯旋时，他小心翼翼地确保“引导者”圣母像安放在一辆马车内，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而他骑着马紧随其后，谦虚地将胜利的结果归功于上帝。不久之后，约翰一世下令移除铜币上的皇帝肖像，代之以基督的形象。在东部，约翰一世的军事行动总是与

寻找圣物和圣骨联系在一起。基督的凉鞋和施洗者约翰的一些头发被找到。在贝鲁特，一幅基督受难的圣像被找到，它被认为曾在被一个犹太人用矛刺过后流出真血。975年，当军队接近耶路撒冷时，约翰一世甚至闪过一丝念头，想解放自638年起就被穆斯林控制的圣墓。

然而，即使约翰一世所向披靡，拜占廷帝国的本质决定了他必须时常回过头来关注君士坦丁堡的事态发展，那里才是帝国的政治中心。瓦西里·利卡潘努斯在策划着什么？瓦西里二世此时快要成年，他准备好继承皇位了吗？同时，还令这位皇帝心烦意乱的是，当他的部队途经那些近期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的肥沃农田时，他得知这些土地中绝大多数都是利卡潘努斯的地产。全部的军费开支和他的部下所经历的所有的艰难困苦只是为那个能够推翻他的人增加了财富和权力基础。这些顾虑或许能解释约翰一世为何没有尝试夺取耶路撒冷，而这一成就直到1099年才由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完成。因此，975年秋，约翰一世撤回安条克，返回君士坦丁堡。当他的部队到达小亚细亚西部的普鲁萨附近时，这位皇帝停了下来，打算在当地一位贵族的宅子里休息几日。有人递给他一杯葡萄酒，他觉得在这位忠心的臣子家中很安全，便不加留心地喝了下去。第二天，皇帝被发现病重，四肢麻木，医生也无法诊断病因。在凶多吉少的情况下，约翰一世决定不再待在那里，而是赶回首都。因此，在1月初阴冷的天气里，他的卫兵带着他骑马朝着博斯普鲁斯海峡飞奔而去。船只一停靠在大皇宫，他就被立即带往他的卧室，他在病床上焦急地询问他的坟墓是否已经安排妥当。976年1月10日，约翰一世逝世。许多人都认为是利卡潘努斯毒死了约翰。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死于中世纪军队中的一种常见病——痢疾。

约翰一世的突然离世打开了各种不确定性的大门，因为还没有人思考过他去世后将由谁来统治帝国。是另一个军阀代表——法定的君主瓦西里二世与君士坦丁八世统治，还是瓦西里·利卡潘努斯将接管统治大权，即使他是位阉人，抑或是马其顿皇室将于945年后再次确定

自己的地位？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是拜占廷帝国是会继续其激进的边疆战争还是重拾昔日那些维持边境安全的有利政策。

第七章 长长的身影

我敢说，我们的出现终结了（福卡斯家族）长期的优势。

——瓦西里二世的《土地法》（996年）

976年，三个集团展开权力竞争，马其顿皇室看上去一定是最不可能获胜的。此时距一位统治家族出身的强有力的君主实际主掌国事已经很多年了。一些观望者或许会认为，它即将寿终正寝或被排挤掉。他们错了。马其顿王朝在此后的80年中仍将决定拜占廷帝国的命运。其统治者将主导帝国边界的扩张，并维持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他们也将扩大君士坦丁堡与行省之间的鸿沟，这会导致又一轮令人绝望的危机，而这种周期性危机是拜占廷帝国史上的一大特点。存活、扩张、和平、繁荣，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最终危机都是一个统治帝国达50年之久的人的劳作结果，同时他长长的身影还将主宰帝国此后的50年。他就是阴郁的暴君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被称为“保加利亚的屠夫”。

若回到976年，人们（尤其是那些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成员）很容易认为，由约翰一世的逝世造成的权力真空将被另一位军阀或夺取皇帝实权、成为法定统治者瓦西里二世和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保护者的人占据。显而易见的候选人是巴达斯·斯克雷罗斯，已故皇帝约翰一世的妻弟。斯克雷罗斯有卓越的战绩，在约翰一世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军事行动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一次单独对决中，他将一个罗斯人劈成两半。970年，他还平定了小巴达斯·福卡斯争夺皇位的叛乱。

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官的职位被划分后，他得到了东部司令官的官阶，已然成为强人，具备接替约翰一世的全部资格。

但在君士坦丁堡，许多人并不这样想，他们对马其顿王朝忠心耿耿。他们痛恨尼基弗鲁斯二世，而只在约翰一世与马其顿家族通婚后才接受了他。许多宫内大臣都同意这些普遍的意见，并觉得是时候结束军阀统治了。重要的是，宫廷中最有权力的人、两位少年皇帝的舅公瓦西里·利卡潘努斯，与他们看法一致。即使963年他在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他也转而要结束军阀统治了。利卡潘努斯假借年轻皇帝们的名义，解除了斯克雷罗斯的军权，将他派往东部前线去指挥少量的边境部队。18岁的瓦西里二世与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被宣布为帝国的统治者，而利卡潘努斯是宝座背后无可争议的实权派。

利卡潘努斯虽然精明狡猾，但他严重低估了斯克雷罗斯在小亚细亚的支持力量。这位心怀怨恨的前司令官在前往东部的路上，确定自己的近亲都安全地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在随从们的簇拥下于夏佩特城堡称帝。自愿追随他的人蜂拥而至。斯克雷罗斯聚集了当地所有的征税官，降低他们的征税点，减少盘剥，从而保证了他有充足的军费。他在当地的关系意味着他在出入边境时可与邻近的阿拉伯埃米尔们相安无事，而且埃米尔们还派人加入他的军队。君士坦丁堡派军队来阻击他，因此在一年多后他才打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但当斯克雷罗斯行军至尼西亚时，利卡潘努斯陷入了绝望。他不得不找到一个能够有效对付斯克雷罗斯的人，否则就要面临彻底的灭亡，但唯一具备军事才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与那位篡位者一样危险。他必须承担这一风险，于是他决定召回那个被斯克雷罗斯在970年击败的人——巴达斯·福卡斯，此人仍然在希俄斯岛上饱受流放之苦。巴达斯与他声名显赫的伯父一样，明显缺乏个人魅力，性格严厉而阴沉。不过，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身材魁梧。据说，他的吼声可以震慑整支敌军，他能单手发弓射箭杀死敌人。他被一艘快船从希俄斯岛转移到

色雷斯，同时被委以司令官之职，并被派遣到达达尼尔海峡去迎战斯克雷罗斯。

在一年里，两个巨人在小亚细亚的平原上对决争胜，总体上斯克雷罗斯占上风。979年3月，当双方在安卡拉与凯撒里亚之间的路上相遇时，斯克雷罗斯的部队看上去很快就能将福卡斯的部队赶出战场。福卡斯觉得光荣的战死胜过可耻的失败，于是他跃马而出，直接向斯克雷罗斯本人冲去。在短暂的交锋后，斯克雷罗斯削去了福卡斯坐骑的耳朵，但福卡斯在骑马退走前用他的狼牙棒击中了对手的脑袋。斯克雷罗斯的随从将他平放在地上，帮他从脑震荡中恢复过来，但他们没有拴牢他的马。这匹独特的坐骑冲进斯克雷罗斯大军的队伍中，没有主人而又沾满了鲜血。士兵们以此断定，他们的统帅已经阵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战场。当斯克雷罗斯恢复过来，并意识到大势已去时，他只得逃往阿拉伯，最后抵达巴格达，请求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善待。巴达斯·福卡斯几乎在偶然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击垮了斯克雷罗斯。

此时，那位有权势的宦官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已至高无上，而巴达斯·福卡斯作为司令官则主宰着东部前线。依据祖先的传统，福卡斯时常组织突袭，侵入阿拉伯边界，向未设防的城市勒索钱财，使自己和手下人变得富有。这种微妙的平衡直到一位出乎意料的新入局者——年轻的皇帝瓦西里二世参与到斗争中时才被打破。在十几岁与二十岁出头时，瓦西里二世就像他的父亲罗曼诺斯二世一样，过着自由而安逸的生活，对政治没有兴趣，享受着无尽的财富与权力可以提供的美好事物，将帝国交给利卡潘努斯去经营。正如布林加斯对待罗曼努斯二世那样，瓦西里二世的舅公小心翼翼地鼓励瓦西里二世追求那些消遣，使他远离政府。但自从斯克雷罗斯被击败后，瓦西里二世开始对政事有了兴致，并开始要求承担起他应负的职责。980年，当一批巴格达的外交使节前来磋商如何处理巴达斯·斯克雷罗斯时，瓦西里二世坚持要亲自接见他们，但利卡潘努斯仍插手了会谈。985年，在忍

受这种监护几年之后，有一天瓦西里二世突然通知他的舅公：他被免职了，他的庞大地产被充公，他也被放逐了。瓦西里二世甚至下令将一座利卡潘努斯虔诚修建的修道院拆毁，不让他过去所拥有的权力留下丝毫痕迹。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位宦官失去了一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这一行动大胆却冒险。瓦西里二世除去了他最有经验和可依赖的顾问，此时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帝国。不过，他有充足的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在约翰一世死后，保加利亚人已起身反抗拜占廷帝国对他们的吞并。当拜占廷人被斯克雷罗斯的反叛分散注意力时，保加利亚人的领袖萨穆伊尔（Samuel）已经拿下了普雷斯拉夫。到985年时，他已经南下一直攻入了塞萨利的拉里萨。986年夏，瓦西里二世从君士坦丁堡率军出征，力图挽回局面，但他的第一次指挥作战以惨败告终。他在穿越保加利亚山脉的关隘时，遭遇典型的保加利亚式伏击。他的军队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被迫放弃大部分的物资装备。

这一失败正是巴达斯·福卡斯所需要的。帝国正明显在一个不明事理的男孩手中走向毁灭，它需要一位成熟而有经验的男人来接管。987年夏，在凯撒里亚，福卡斯在他的人生中第二次称帝。福卡斯家族的姓氏仍然有它的魔力，许多显赫家族决定与篡位者共命运，连他的老对手巴达斯·斯克雷罗斯都在担任司令官（福卡斯曾在君士坦丁堡得到过此职）的许诺下决定结束流亡，从巴格达来加入叛乱。福卡斯在凯撒里亚欢迎他，但之后很明智地将他关押在一座城堡内。此公要是不被看紧就太危险了。

此时，瓦西里二世获胜的可能性确实很小，大多数小亚细亚的贵族与他们的追随者都合起伙来反对他。但瓦西里二世是一个拜占廷人，他具有在毫无胜算的绝境中对抗无数敌人的天赋基因，而且控制着君士坦丁堡是他的王牌，这使他掌握充足的财源，能够支付那些前

来援救他的盟友。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联系，当时弗拉基米尔正在基辅统治着罗斯人，瓦西里二世提供给他一笔慷慨的补贴，并将自己的妹妹安娜许配给他，以此来作为对军事援助的回报。这一协定使得弗拉基米尔改宗基督教。在6000名强壮的罗斯人的支持下，年轻皇帝瓦西里二世的事业开始兴盛起来。988年，他在克利索波利斯镇压了福卡斯的兄弟所率领的军队。989年春，他在阿拜多斯与反叛者本人正面相遇。正如斯克雷罗斯的失败一样，决定此役胜负的是偶然的运气，而非任何军事实力。福卡斯认为，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杀死或擒获他的对手，因此，他亲率自己的精锐部队进攻瓦西里二世与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所在的斜坡。他几乎就要到那里了，瓦西里二世的士兵无力抵抗。突然，他勒住了马，骑向了一边，然后摇摇晃晃地下了马，缓慢地躺倒在地。当他的部下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杀了他。有人说，他是被某种投射物击中了，君士坦丁八世甚至宣称是自己投掷的；还有谣言说，福卡斯的仆人受贿后对他下了毒；另一些人则将其归于圣母马利亚的介入——瓦西里二世在整场战役中都将她的圣像紧紧抱在胸前。无论何种原因，首领一死，叛乱也就瓦解了，双方都只有很少的伤亡。

瓦西里二世率领他的军队通过小亚细亚，大获全胜。他于989年11月抵达安条克，接受了福卡斯的兄弟利奥的投降。斯克雷罗斯在越狱出逃，试图恢复他的皇位之后不久，也被瓦西里二世抓获。鉴于斯克雷罗斯已经年迈，瓦西里二世在处理他时想表现出仁慈，授予他宫廷总管的头衔，并允许他光荣退休，回到他在小亚细亚的房产去，而他的支持者也没遭受迫害。瓦西里二世坚持要求会面以使协议生效。在约定的那一天，斯克雷罗斯出现在瓦西里二世的军营中，二人在皇帝的营帐中坐下喝酒。瓦西里二世为了以示安全，在递给客人酒杯前自己先呷了一口，他们俩恐怕都不会忘记福卡斯的命运。于是，年轻的获胜者转而求教面前的长者：他如何能使帝国结束自976年以来旷日持久的内战？斯克雷罗斯很坦率地建议皇帝严格控制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权力：

裁撤那些已变得傲慢的总督，不能让那些正在统兵作战的将领拥有太多的资源。采取不公正的苛求使他们心力交瘁，让他们只忙于自己的事务。

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想当皇帝而未成的人离开了，瓦西里二世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斯克雷罗斯提供的建议久久萦绕在皇帝的脑海中。几乎从一开始，拜占廷伟大的都城与外围区域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除非占据君士坦丁堡，否则就无法成为皇帝”的政治理论强烈地诱使统治者驻守在那里，而将防御国境的任务委托给别人。这当然会造成危险：一位受人欢迎而获胜凯旋的将军会率领他的军队，要么推翻他的君主，要么将其变为傀儡，罗曼诺斯一世、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就是这么做的。为了应对这种困境，瓦西里二世似乎发展出了一套独特而专属的统治方式。一方面，他主管了军队，自他的高曾祖父瓦西里一世起，他是第一位这么做的马其顿王朝皇帝，而且他在小亚细亚击败了那里的军阀。他甚至模仿这些军阀的尚武观念和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与仪式的蔑视。当现身于人群中时，他穿着只配有几件首饰的朴素紫袍，而非像他的前任们那样喜欢饰有珠宝的绸质华服。在他统治期间，大皇宫不欢迎像佛提乌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他坚决要求所有的报告都用平白直接的语言起草。另一方面，他毫不妥协地强调他统治的合法性，与他的祖先一样不断宣称他是“生于紫色寝宫者”。这种对统治合法性的强调，以及他对兵权的掌控，使得他为自己全面攻击军事贵族们的权力和种种特权提供了正当性与保障。

对于领导拜占廷军队，瓦西里二世在经历986年最初的惨败后，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过，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发起军事行动时的方式和目标都与军事贵族们非常不同。在叙利亚前线，他停止了对阿拉伯城镇的突袭。此时没有迹象表明他有反对多神教教徒的战争热情，而这在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统治时期是十分显著的。瓦西里二世满足于已经获得的领土，并将注意力侧重于应对来自埃及法蒂

玛王朝的威胁——该王朝要将拜占廷人全部驱逐出叙利亚北部。995年，当瓦西里二世在巴尔干半岛用兵时，他得到消息，法蒂玛王朝正对哈姆丹王朝的旧都阿勒颇造成威胁。他立即率领17000人向东进兵，在所有人预料他出现时间的前几周便抵达了安条克。1001年，在一连串的激烈冲突后，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同意签订和约，双方的敌对状态才大体上结束。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得以东扩，不过获得的领土更多来自基督徒而非穆斯林，而且大部分的扩张依靠的是条约而非征服。邻近的亚美尼亚王国在内战中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土耳其人此时侵入其东部边界，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王们更加仰仗拜占廷皇帝的保护与帮助，其中之一是统治陶公国的戴维（David），该公国位于黑海沿岸，地处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之间。戴维曾帮助瓦西里二世平定巴达斯·斯克雷罗斯的叛乱。而且，由于他没有继承人，990年，他制定了遗嘱，在死后将他的领地献给皇帝。1000年，在他死后，瓦西里二世便将陶公国划入了拜占廷的伊比利亚军区。其余的统治者也依样画葫芦，有时用他们在亚美尼亚的领土去换取小亚细亚的地产与一些拜占廷宫廷里的高级头衔。在瓦西里二世统治结束时，帝国的边界已经推进至凡湖以外，比之前更向东方扩张了。

如果说瓦西里二世在东部的战争是防御性的和有限度的，那么在西部他则全力以赴收复自976年保加利亚反叛后所失去的土地，不过在那里他的战略也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约翰一世仅用了几个月就迅速征服了保加利亚，而瓦西里二世却经年累月地进行了一场剧烈的消耗战。只要东部的情况允许，每年他都会率军深入保加利亚，凡其所经都纵火大掠。后世相信，他击败了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共有15000名战俘，除了一小部分外，他下令将他们全部弄瞎，而那一小部分人每人也都被弄瞎了一只眼睛，之后由这些人领着他们那些全盲的战友回家。这个故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保加利亚劳动人口中若有15000人被弄瞎，这是很大的比例，但当时没有人提及此事。即便如此，这个故事确实证实了瓦西里二世慢慢折磨保加利亚的残酷决心。旷日持

久的传说故事终于在1018年夏结束，保加利亚人的领导者放下了武器，多瑙河以南的土地再次被纳入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之下。

尽管方法与目标大相径庭，但瓦西里二世证明了他能与军事贵族们在战场上一争高下。不过这还不够，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王朝的威胁必须永远消失。待地位稳固之后，皇帝便开始着手实施斯克雷罗斯的建议。995年夏，在远征叙利亚后，瓦西里二世途经小亚细亚返回君士坦丁堡，在路上有一个小村子的代表团找他。他们抱怨一个叫菲洛卡勒斯（Philokales）的人，称他用自己的财产买下了全村和附近地区所有的土地，将其都变为他的私人地产。瓦西里二世立即将那些土地没收并还给村民，还下令拆毁菲洛卡勒斯在乡间的大别墅，一直拆到地基。接着，皇帝与他的随从们在凯撒里亚优斯塔修斯·梅莱诺斯（Eustathios Maleinos）的住宅内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此人是小亚细亚上层阶级中最富有的人之一。瓦西里二世接受了这殷勤的招待，但他同样很清楚地记得，9年前巴达斯·福卡斯就是在这同一所房子里称帝的。在离开时，皇帝向梅莱诺斯提议，问他是否愿意随他一同回首都去。这种措辞的邀请事实上是难以拒绝的。一到君士坦丁堡，梅莱诺斯便发现自己被软禁在一处舒适的房子里，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一死，他的土地就被充公了。

瓦西里二世发起了这场运动，目标不是针对个别人，而是针对整个阶级。995年冬，回到君士坦丁堡后，这位皇帝就煞有其事地引入一部新的法律，名为“虔诚的皇帝小瓦西里的新宪法，据此谴责那些聚敛穷人财富的富人”。996年1月，该法被颁布，扩充了严格限制收购农民土地的原有政策，规定任何自922年以来非法获得的土地此时都应无偿归还。1004年，进一步的立法改变了赋税主要由农民承担的方式，富人为邻近穷人纳税的联保制被推行。过去，任何个人的差额由村社其余的人来补足，而如今这笔差额由该地区的某一大地主来补足。该法律背后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既要在财政上给权贵们以打击，

又要保证皇帝有更稳定的税收。此外，减免农民们的负担，可以降低他们因贫穷而依附于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的可能性。

这种针对帝国内一些最有权势者的激进政策不可能不招致抗议。一个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率领教士与修道士所组成的代表团乞求皇帝宽大为怀，但无效。反抗来得虽慢，却是由福卡斯家族领导的。他们虽然在989年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被打败了，但他们仍然富裕且有影响力。瓦西里二世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甚至在他于996年颁布的法律中特别提到他们，将他们列入最坏的聚敛财富和土地的罪犯。1021年，当瓦西里二世被亚美尼亚的战事分散注意力时，那位不幸的巴达斯·福卡斯的儿子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勾结另一位小亚细亚的权贵尼基弗鲁斯·克西菲亚斯（Nikephoros Xiphias）后，自己称帝了。这位福卡斯家族的成员似乎继承了其家族身体不美观的特征，俗称“歪脖子”，但他的姓氏足以吸引小亚细亚的广泛支持。在这次事件中，他对权力的角逐历时很短，因为他与同谋者克西菲亚斯发生了争吵，在自己的军营中被暗杀了。没有了福卡斯，叛乱迅速瓦解，这给了瓦西里二世以借口没收所有参与叛乱者的地产。

叛乱虽然短暂，而且以失败告终，但它表明即使在瓦西里二世生命即将结束时，他的统治在小亚细亚仍会受到严重挑战，他在帝国的这一地区从未彻底安全过。他的权力基地在君士坦丁堡，作为马其顿王朝的代表人物，他在那里可以信赖民众的忠诚。这并不代表他很受欢迎。他从未屈尊去广泛施舍，像之前与之后的皇帝们那样换取群众的奉承。他在作战中获得的战利品以及没收所得的钱款都进了大皇宫的地窖里。他从未尝试去塑造具有美德的基督教君主的形象，明显更乐于被害怕而非被爱戴。他也没有设法去讨好大皇宫的管理者，他因无视他们的建议、残酷惩罚任何他怀疑的不忠者而著称。据说，他曾亲自斩首一名官员，并将一名试图毒害他的侍从投食给宫内的狮子。马其顿王朝生于紫色寝宫者的神秘性足以让他为所欲为。

瓦西里二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都未遇到挑战，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军事才略和人民的支持。他有一件愿意为之花钱的事，这可能是决定性因素。正如在989年换取罗斯人的帮助以对抗巴达斯·福卡斯那样，若有将军谋划叛乱、获得军队的忠诚，瓦西里二世需要外国雇佣军提供后备部队。他偏爱亚美尼亚人与罗斯人，他们深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当时的军事手册表明他们是帝国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瓦西里二世与先前的君士坦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与君士坦丁五世一样，利用了境外巨大的人力资源。

1025年12月的一天，瓦西里二世在任命完新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后不久逝世。他统治了这么久，以至几乎没有在世者记得他登基前的样子了。最后，他依旧高深莫测。根据他的命令，他没有像绝大多数前任那样葬于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而是葬于城墙外的村庄赫伯多蒙，那里有一座小宫殿和一座献给圣约翰的教堂。与其生前一样，瓦西里二世死后也要疏远那些大皇宫的管理者和行省权贵。他的墓志铭（或许由他自己撰写）宣称，他“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保持警惕，守护着新罗马的子孙”。这并非自夸，他留下了一份混合的遗产：充足的财富与扩大的版图，以及一群郁闷而不满的贵族。

瓦西里二世由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八世接替。理论上，君士坦丁八世自963年其父去世后就已经是皇帝了，他与瓦西里二世共同统治帝国。但是，从一开始他就被排斥，先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约翰·基米斯基，后是他的兄弟，这些人都没有与他分享权力的想法。瓦西里二世保证君士坦丁八世有充足的机会去狩猎、游泳和从事他所喜爱的厨艺，但是不让他发挥任何政治作用，而且只给他少量的荣誉近卫军。君士坦丁八世此时已年逾60岁，却被突然委以统治帝国的重任，这种突然是瓦西里二世巨大疏忽的结果。瓦西里二世这一生都在为确保君士坦丁堡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不被来自小亚细亚的军阀扰乱而努

力。他从未结过婚，也未生育可接替他的继承人。但君士坦丁八世结过婚，与一个叫海伦娜·阿莉匹娅（Helena Alypia）的女人育有3个女儿。为了保证王朝的长存，为她们寻找合适的丈夫成为一件要事。3个女儿中的佐薇与德意志皇帝奥托三世（Otto Ⅲ）订了婚，可就在她前往婚礼的路上，途经意大利时，便传来奥托逝世的消息，她只能立即乘船返回君士坦丁堡。此后，直到1025年都没有关于她们婚事的任何安排，而此时3位女士均已人到中年，都还未婚。老大欧多西亚（Eudokia）事实上已经许下宗教誓言，进入了女修道院。瓦西里二世的这个疏忽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的侄女们与帝国内的某些人结婚，那么对方一定是富裕且地位显赫的，这些人一定来自皇帝最惧怕的那个集团。

1028年秋，继承人问题无法再拖延了。君士坦丁八世病了，他焦虑地向朝臣们求助最好的解决之道，而这是瓦西里二世曾经极力避免的做法。显然，某位显赫的人物必须被引入并继位，就如582年的莫里斯那样。但是，至少权力的交接能够被大皇宫的管理者掌控在手中，这样就能避免他们与马其顿皇室的利益被军方和外省的人物侵害。总之，他们不想让一位成功的将军利用他在军队中的声望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当他们考虑君士坦丁·达拉森诺斯（Constantine Dalassenos）时，这个想法被立即否决了。因为此人就像一个潜在的尼基弗鲁斯，他是一位有才能的军人，在亚美尼亚军区拥有大量地产。最后，他们选取了一个叫罗曼诺斯·阿吉罗斯（Romanos Argyros）的人，他是马其顿皇室的远亲，是君士坦丁堡总督，看上去要少很多威胁性。他成为皇帝的过程仓促而不得体。他被召进宫里，被朝臣们告知必须与他现任的妻子离婚，并与君士坦丁最小的女儿狄奥多拉结婚。野心勃勃的阿吉罗斯甚为开心，欣然顺从。但在他的妻子被安置在一所女修道院，大教长被迫批准婚姻后，狄奥多拉却拒绝出席婚礼仪式。二女儿佐薇不得已被说服了。婚礼三天后，君士坦丁八世离世，阿吉罗斯被宣布为皇帝，即罗曼诺斯三世（1028—1034年在位）。

这场婚礼开启了此后近30年的历史行程，数位皇帝凭借与瓦西里二世的这位侄女的婚姻而获得统治权。佐薇本人通常很少参与政治，当她的丈夫治理帝国时，她正在宫中的套房内忙于提炼各种新奇的香水。为此，她在卧室里放置了木炭火盆，她太沉迷于这个爱好了，全然不顾在夏季这些火盆所导致的闷热。除了查士丁尼外，她是少数几位我们既了解她的真实面貌又有第一手描述的拜占廷人。她的画像是一幅马赛克镶嵌画，至今仍保存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中。这幅画像明显是奉承之作，因为在其创作时这个女人已经60多岁了。不过，这幅画像的真实性被一位很了解佐薇的朝臣米哈伊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所留下的描述给证实了：

她有一双大眼睛，两眼之间的距离大，眉毛浓密。她的鼻子略呈鹰钩状。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全身皮肤洁白发亮。在她身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1034年，罗曼诺斯三世离奇地溺死在他的浴缸里。佐薇马上又结婚了。这一次是她自己选的丈夫，他是一名皇宫近卫军的指挥官，比佐薇年轻几十岁，很可能在罗曼诺斯三世死前两人就有染。新任君主即米哈伊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一生都受癫痫的折磨，最后也死于此病。然后，已故皇帝的外甥米哈伊尔五世（1041—1042年在位）作为佐薇的养子短期统治了帝国。当他试图抛开养母，建立自己的统治时，他的统治便终止了。君士坦丁堡民众对马其顿王朝的忠诚并没有消退，君士坦丁堡的街头巷尾爆发了骚乱。米哈伊尔五世被迫逃离皇宫，佐薇凯旋。1042年夏，在与妹妹狄奥多拉共同统治了几个月后，佐薇与她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Constantine Monomachos）结婚，后者随即成为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

虽然在1028—1055年，4个皇帝来了又去了，但是大皇宫的官僚们保证了统治的延续性。在瓦西里·利卡潘努斯于985年倒台后，瓦西里

二世倾向于基本不听建议独立统治，但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间宝座背后的实权人物又复现了。第一位是一名来自小亚细亚黑海沿岸的宦官，人称“孤儿院院长”约翰（John the Orphanotrophos），因为他的职责之一就是照看君士坦丁堡的孤儿院。他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就在大皇宫任职，而这位皇帝的继任者们都十分倚重他。日常的行政事务都可以委托给他，他的热情和对细节的关注都享有盛名。他能够在第一时间从宫中骑马外出，出现在那时这座城市中最不希望他出现的地方。任何玩忽职守的官员都会得到惩罚，因为这位宦官的眼光实在是太犀利了。他最令人感到畏惧的才能是能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时仍保持警惕，听清他的下属们在觥筹交错间说的每个字。次日，下属们因这位上司提醒昨晚的不当言行而感到不安和尴尬，而这位上司本人显然没有受到前一晚狂欢的影响。约翰的仕途在1034年后更加亨通了，因为这一年米哈伊尔与佐薇结婚，成为米哈伊尔四世，而他正是这位宦官的兄弟。当米哈伊尔四世的健康每况愈下时，约翰便有效地管理着帝国。但是最终这位孤儿院院长还是在拜占廷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他被缺乏经验而短暂执政的米哈伊尔五世罢免了官职，并被送入修道院。1042年，君士坦丁九世成为皇帝后，立即刺瞎了约翰，用这种残忍但有效的办法阻止他东山再起。这位权倾一时的宦官不久便去世了。

不久之后，皇宫被第二位有权势的幕后操纵者控制。米哈伊尔·普塞罗斯不是一名宦官，但他凭借如簧的巧舌进入了帝国的文官系统。他后来称，当他第一次受到君士坦丁九世召见时，这位皇帝“受到某种奇怪的快感影响”，十分渴望拥抱他这个年轻人。这种感情不可能是性方面的，因为这位皇帝有众多的情妇可以满足他这方面的需求，但君士坦丁九世认定普塞罗斯对他会很有用。他让普塞罗斯做他的首席顾问。普塞罗斯起草公函，发表公开演讲阐述与解释君士坦丁九世的政策，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都被“委以最光荣的任务”。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几乎未受动摇，一直维持到1075年左右。在那段时期，他对政策的影响力与皇帝几乎不相上下。他留下了关于自

己生活和工作的一系列回忆录，虽然存在高度偏向性，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窥大皇宫生活的极为细致的材料。

在这种皇帝统治短暂而文官势力强大的体制下，一切又重新回到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期的轨道，政策由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集团所制定，无论集团成员是如罗曼诺斯三世和君士坦丁九世那样的贵族还是如米哈伊尔四世和米哈伊尔·普塞罗斯那样出身低微的人，他们都非常不相信能将公开战争作为政策手段，不久便抛弃了过去那种激进的扩张政策，只发生过几场越过边境的战争。1030年，阿勒颇的埃米尔抛弃与拜占廷帝国的结盟后，罗曼诺斯三世率军进入叙利亚，但是远征并不成功。军队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并被击散，罗曼诺斯三世不光彩地逃回了安条克。11世纪30年代，有一次征服西西里岛的尝试。1045年，拜占廷人吞并亚美尼亚城市阿尼，这座城市曾被它的统治者遗赠给拜占廷皇帝。此后，这个政权的本性是追求巩固，战争都是防御性的，例如1041年镇压保加利亚的起义，1043年击退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一次海上进攻。与潜在的敌人却要签订条约。从1001年起，拜占廷人就与其东部边境主要的穆斯林势力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维持着休战协定。1027年，这种休战协定变成一个正式的条约。1045年，拜占廷人与罗斯人达成和平协定。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谢沃洛德（Vesvolod）与君士坦丁九世在先前婚姻中所生的女儿结婚。这次联姻之后，基辅方面再也没有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

与缩减军事投入同时进行的是对行省的重组，这使首都能够对军区的行政实行更好的控制。起初，将军同时管理军事和民事事务，但是到10世纪时，其职责仅限于军事事务，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民事事务被委托给地方法官。11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堡有一个类似司法部的机构指导这些地方法官的活动。同样，也有对军区军事功能的重新考量。这些抵抗阿拉伯人入侵小亚细亚的军区军队在进攻停止后就显得冗余了，而那些领取薪水的塔格玛塔近卫军正成为拜占廷军队的支

柱。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中期，他决定解散在亚美尼亚的伊比利亚军区的军队，并要求它的5万名农民以货币纳税的形式代替服兵役。此举为财政增加不少收入。

总之，君士坦丁堡的统治集团重新回到了拜占廷人原先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审慎地运用金钱）而非通过战争来获得安全。贵重的外交礼物重新流行起来。那些访问君士坦丁堡的外国要人被赠予大量金银和丝绸长袍，并获得与拜占廷皇帝结盟的建议。瓦西里二世的吝啬以及对仪式和排场的反感如今都被抛弃了。罗曼诺斯三世和君士坦丁九世都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大量新的修道院，并花费大量的公共财富对其内部进行装饰。这不仅仅是恣意挥霍，罗曼诺斯三世和君士坦丁九世还想通过财富、艺术和美来提升拜占廷皇帝的威望，这一策略曾经成功地使罗斯人改信基督教。此时这一策略仍然有效。1045年，一位名叫克根（Kegen）的佩切涅格首领访问君士坦丁堡，并在此受洗。他被授予贵族头衔，并获赠多瑙河边境地区的三座城堡。一位修道士被安排随克根回去，并在河中为克根的2万名追随者施洗。与瓦西里二世一样，新的统治者也十分渴望招募受他们控制、听他们指挥的雇佣兵，但如今他们更多地雇佣的是西欧人，特别是诺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而非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

这一政策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没有先例，只是此时小亚细亚的军事贵族对此持不同意见。这个集团自989年起就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对他们而言，君士坦丁堡那些华而不实的建筑纯属浪费，而与外国势力签署条约完全是懦弱的表现。对于行省行政改革，他们也很清楚效率以外的意图。大皇宫内的官僚们通过君士坦丁堡对地方法官采取更严格的监督，确保他们不会被将军控制。贵族们同样也对从帝国以外招募雇佣军的做法十分不满。他们中的一位如此告诫皇帝：

不要给予那些并非贵族出身的外国人太多的荣誉，也不要委以重任。这样做既于您无任何益处，也不会令您那些罗马血统出身的官员

满意。

事实上，那些在已故的瓦西里二世长长的身影下统治拜占廷帝国的人继承了他对军阀们深深的不信任感，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另一个福卡斯若崛起会给他们带来的危险。君士坦丁八世最终镇压了整个福卡斯家族，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刺瞎了巴达斯·福卡斯的孙子，但瓦西里二世的继承者们也意识到完全疏远这些军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开始做出一些让步。1028年，罗曼诺斯三世登基后便废止了瓦西里二世于1004年颁布的联保法，这部法律规定贵族有补足其区域内不足税款的义务。这并非激进之举，因为瓦西里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都曾考虑过这么做，罗曼诺斯三世此举意在表示他的善意。同时，他还释放了那些由于未履行联保义务而被关进监狱的人，并召回了因1021—1022年反叛而被流放的尼基弗鲁斯·克西菲亚斯。然而，从长期来看，行省和君士坦丁堡间价值观的鸿沟不可能被弥补。密谋和惩罚都在继续。1029年，色雷斯松军区将军君士坦丁·第欧根尼（Constantine Diogenes）因叛国罪而被捕，随后跳塔自杀。到了11世纪40年代，两者可谓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当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像瓦西里二世于995年对待菲洛卡勒斯和梅莱诺斯那样对待一位帝国最成功的将军时，冲突爆发了。虽然乔治·马尼亚克斯（George Maniakes）并非军事贵族出身，但他已跻身此阶层，并且浑身都散发着大将的气息。他与巴达斯·福卡斯一样，身材非常高大，声如洪钟，能够响彻战场。1030年，他开始崭露头角。当时，阿拉伯人打败了罗曼诺斯三世的部队，迫使他逃回了安条克。作为特莱弗赫军区将军，马尼亚克斯伏击了一支凯旋的阿拉伯小分队，俘获了280头满载战利品的骆驼。1031年，他攻下了埃德萨。1038年，他被派往意大利南部，目的是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西西里岛。1039年，他夺回该岛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包括叙拉古城。

这些胜利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得到了不同的反应。马尼亚克斯正在收复丧失的领土，然而约翰一世却不能忘记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征服克里特岛后不久便进军君士坦丁堡并攫取了皇位。当约翰一世收到正在马尼亚克斯军队中服役的妹夫的信，警告他这位将军正打算篡位时，他再也不迟疑了。他马上解除了马尼亚克斯的职务，并将他作为犯人押解回君士坦丁堡。不过马尼亚克斯是幸运的。在约翰一世的家族于1042年的叛乱中失势后，皇后佐薇释放了马尼亚克斯，并把他派往意大利，官复原职。然而，不信任的种子已经播下。当马尼亚克斯听闻他在小亚细亚的地产被一个邻居抢夺且这个邻居因其与宫廷有关系而免于惩罚时，他开始酝酿叛变了。此时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九世，他听到了叛变的风声，于是派遣一位名叫帕尔多斯（Pardos）的官员去再次解除马尼亚克斯的职位，但这次太迟了。当帕尔多斯到达时，马尼亚克斯已经被拥立为皇帝，他的部队狂热地效忠于他。他们在帕尔多斯骑马进入军营时突然攻击他并将他杀死，从此覆水难收。马尼亚克斯带领他的部队行至海边，乘船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军君士坦丁堡。

起初，马尼亚克斯看上去将会赢得像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在963年那样的功绩，但他运气不佳，他的遭遇让人想起989年巴达斯·福卡斯的突然死亡。1043年2月，正当马尼亚克斯的军队朝着东方进军时，他们遭遇到一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部队，堵住了他们前行的道路。皇家部队原本胜算很低，因为光是马尼亚克斯的名字就足以令他们闻风丧胆了，一阵混战后，他们就开始慌乱地撤退。就在他们撤退时，一支流矢刺穿了正在率军乘胜追击的马尼亚克斯的身体右部。马尼亚克斯从马上跌落下来，在援军到来前便失血过多而亡。失去统帅后，起义部队便作鸟兽散了。君士坦丁九世在其统治期间有过类似的经历。1047年，在另一场军事叛乱中，叛军兵临君士坦丁堡的陆墙。君士坦丁九世在城垛上视察防守时，一支箭嗖的一声从他的脑袋边飞过，但这次叛乱也以失败告终。那时叛军在城外挨冻，而城内显然没人愿意让叛军入城。

此时，有两个因素的发展促使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继承者们重回权力的舞台。第一个因素是拜占廷边境上的威胁死灰复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瓦西里二世遗留下的问题。他对保加利亚的吞并使帝国失去了缓冲国，直接与多瑙河边的佩切涅格人为邻。在过去，佩切涅格人是拜占廷人用来进攻保加利亚人或罗斯人的有力盟友，但此时拜占廷帝国的领土成为他们进攻的对象。他们的入侵始于1027年，到11世纪40年代变得越发激烈，以至君士坦丁九世和他的顾问大臣们尝试允许他们住到帝国境内，定居在原先保加利亚人的土地上，以此换取他们来服兵役。不幸的是，佩切涅格人并不中意他们被给予的土地，1048年，他们南下了。他们翻越巴尔干山脉，进入拜占廷人无意授予他们的区域。拉锯战持续了好几年，拜占廷军队在巴尔干地区追击佩切涅格人，毫无结果。君士坦丁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后，不得不在1053年左右根据最不利的条款与佩切涅格人签订了30年停战协定，接受他们在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地区定居。

在巴尔干地区的情况恶化的同时，拜占廷人在其他地区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敌人。1043年，乔治·马尼亚克斯从意大利南部的撤出为诺曼人打开了方便之门。诺曼人中后来征服英格兰的那支族裔于1018年到达意大利南部，作为雇佣兵为拜占廷总督作战。不久，他们便与他们的雇主闹翻了，并开始为自己占领这个地区的部分区域。帝国的另一边，在新吞并的亚美尼亚地区，类似的危险来自塞尔柱突厥人。与佩切涅格人相似，塞尔柱人是起源于亚洲大草原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曾迁徙到波斯的东北部。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于11世纪中期开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1040年，在图格鲁勒（Tughrul）的领导下，塞尔柱人赢得了丹丹坎战役的胜利，赢得了中亚和伊朗的大片土地。这一地区与拜占廷在亚美尼亚地区的领土接壤，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时期，突厥人开始沿着这个边境地区发动对拜占廷领土的破坏性入侵。

在这个防御突然取代扩张的新世界中，行省贵族们从潜在叛变者的形象变为英雄的形象。与君士坦丁堡完全无能的政府相比，他们更擅于应付局面。1048年，塞尔柱人洗劫了亚美尼亚城市埃尔祖鲁姆，随即袭击了被派来援救该城的拜占廷军队。一位名叫李帕利特（Liparit）的格鲁吉亚王子被君士坦丁九世任命为与突厥人作战的指挥官，他被包围和俘虏了。但在右翼，拜占廷人的境遇要好得多。阿尼总督科卡夫曼努斯·卡塔卡隆（Kekavmenos Katakalon）是乔治·马尼亚克斯远征西西里岛时的老部下，他打垮了塞尔柱人，并追击他们直到傍晚。几年之后，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佩切涅格人在巴尔干山区伏击了一支撤退的拜占廷军队。当大部分拜占廷士兵四处逃散、成为容易攻击的目标时，一位拜占廷将军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kephoros Botaneiates）控制了他的分遣队。他们花了11天击退佩切涅格人的进攻，据说没吃也没睡，最终抵达阿德里安堡，并举行了秩序井然的入城仪式。

当卡塔卡隆和伯塔奈亚迪斯这样的将领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英勇时，第二个因素的发展扯下了君士坦丁堡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遮羞布。马其顿王朝正在步入穷途末路。1050年，佐薇逝世，5年后，她的丈夫君士坦丁九世亦离世。皇位归属又掀纷争。一些朝臣倾向于让一位高级官僚来做皇帝，而另一些人对马其顿王朝的忠诚度仍然强烈。瓦西里二世的最后一位侄女狄奥多拉仍健在，在许多人看来，她应当行使继承权来统治帝国。因此，马其顿王朝又延续了18个月，直至狄奥多拉因肠疾离世。几天后，宦官和朝臣们宣布布林加斯家族的一位年长的朝臣将继承皇位，成为米哈伊尔六世（1056—1057年在位）。他们厚颜无耻地从自己的集团中选出代言人，也应该料到他们的选择不会不受到挑战。

1057年的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冲突爆发。按照惯例，这是皇帝向他的官员、顾问和行政人员支付年俸的日子。他坐在大皇宫的某个大厅的长桌前，按照官员的等级高低一一召见他们。官员们收到的俸禄是金币，所以某些高官会带他们的仆人一起来，帮助他们搬运装着金币的重袋。文官名单中的名字数以百计，因此这一仪式会持续好几天。新皇帝米哈伊尔六世按照惯例举行仪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年俸数额上更加慷慨，毕竟他完全是靠这些宫里官员的推举才登上皇位的，他不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然后，轮到对军事功绩进行奖赏了。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已到达首都，准备领取他们应得的奖赏，其中就有1048年击退塞尔柱人进攻的科卡夫曼努斯·卡塔卡隆，代表更为古老的军事贵族家族的约翰·杜卡斯和君士坦丁·杜卡斯，以及在小亚细亚的卡斯塔莫努拥有大片地产的伊萨克·科穆宁（Isaac Komnenos）。当他们进来时，米哈伊尔·普塞罗斯就站在皇帝的后面，因此他见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对宫中官僚们的慷慨赠予并没有发生在军人们身上。不仅没有加封进禄，皇帝还责备这些军事将领抵御塞尔柱人和佩切涅格人不力，谴责他们以权谋私。

将军们既吃惊又感到屈辱地离开了大厅。他们找到了米哈伊尔六世的主要谋臣利奥·帕拉斯彭迪拉斯（Leo Paraspondylas），请求他劝诫皇帝，但是也碰了钉子。他们气愤地离开皇宫，穿过奥古斯都广场来到圣索非亚大教堂，讨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正是在这里他们酝酿了起义的计划，唯一没有达成一致的是由谁来领导起义。卡塔卡隆看上去很适合做候选人，但是他不愿意。最后，他们选定了伊萨克·科穆宁，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大约一个月后，伊萨克在他小亚细亚古纳里亚的庄园内被拥立为帝。

米哈伊尔六世加速了君士坦丁堡统治集团最害怕的事情，如果他希望伊萨克·科穆宁会如巴达斯·福卡斯和乔治·马尼亚克斯那样突

然去世的话，那么他就会失望了。科穆宁和他的军队向西行至尼西亚，将被派往该地对抗他们的部队打跑，然后进军到尼科米底亚。米哈伊尔六世试图谈判，派出一支由普塞罗斯率队的代表团，提出米哈伊尔六世去世后由科穆宁继承皇位。这位起义的领袖本可以欣然接受这些条件，然而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必如此。在大教长的精心策划下，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们走上街头抗议米哈伊尔六世。米哈伊尔六世意识到他连周围顾问大臣们的支持都失去了，只得宣布退位。两天后，伊萨克·科穆宁进入君士坦丁堡，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此时马其顿家族已经不在了，民众欣然将这份热情给予一位来自行省的军人。

为了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伊萨克十分睿智地行动，避免激起如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曾经招致的那种公开谴责。他迅速给士兵支付军饷，以防他们有任何抢劫民居的企图，之后将他们撤回小亚细亚。他也没有对前政权的支持者进行政治迫害。普塞罗斯原本以为会被逮捕，却受到了新皇帝的礼遇，并保留了他的官职。然而，所有人都无法否认，从此之后便事事不同了。伊萨克发出的变革信号是他所发行的第一批金币。与先前的做法不同，这位皇帝被描绘成拔剑站立的形象，新主人要履行职责了。

正如许多长期持反对立场的人一样，皇帝伊萨克及其军事支持者可能也低估了扭转那些前政权政策的困难。工作重点是显而易见的：重建帝国的防御，近期塞尔柱人、诺曼人和佩切涅格人的入侵使防御的薄弱之处暴露无遗。这需要金钱，然而在伊萨克接管帝国时，国库已耗尽。在几周之内，他实施了削减开支的激进政策，以扭转前任们的高开支政策。米哈伊尔六世所给予的奖赏和抚恤金都被废除了，给予教会的礼物被取消了，大型建设工程也停工了。新的紧缩政策下的主要利益受损者是朝臣们与宫里的官员们，然而即便是其中成员的普塞罗斯也承认削减支出是必要的。问题是伊萨克的改革速度太快了，

以至激起了教士和君士坦丁堡市民们的反对，正如曾经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那样。但福卡斯至少受到其部下的拥戴，而伊萨克太公正了，甚至将缩减政策扩展到军饷，结果又激起了军人群体的不满。

如果伊萨克能够获得一场辉煌的胜利，那么一切还可能安好，但就在他登基后的几个月，事情更加糟糕了。1059年春，一支塞尔柱突击队围困了梅利泰内城，这里曾是越境进攻阿拉伯人作战的焦点地区。大多数居民在围城之前就已经明智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而那些仍留在城中的人在几周后城陷之时大多死于刀剑之下。一支拜占廷军队在这些入侵者带着战利品撤退时追踪他们，但是并没有与他们作战，而是让他们安全地退回到了自己的领土上。这种做法与伊萨克拔剑出鞘的许诺形成鲜明的对比。几个月后，伊萨克有机会出击了，此时正逢一支佩切涅格人跨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他像瓦西里二世那样亲自上阵，然而不幸的是，在伊萨克出现的前一刻，入侵者就撤退了。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拜占廷军队遭遇了一场狂风暴雨，在渡过一条暴涨的河流时，许多士兵被冲走了。伊萨克在返回首都几周后，沮丧而郁闷，高烧不退，康复无望。他的死亡很可能会激起任何一个觊觎皇位的拜占廷将领的冲动行为。朝臣们为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劝说伊萨克退位，并青睐1057年起义的另一位密谋者君士坦丁·杜卡斯。

杜卡斯成为君士坦丁十世（1059—1067年在位），他没有采取伊萨克那样正面出击的方式。事实上，尽管他是最古老的军事家族的后代，但他没有给人留下军人皇帝的印象。为了赢得欢迎，他恢复了伊萨克曾经取消的许多奖赏和抚恤金，并且增加了一些新的。他宣称，他十分关心司法公正，并且花了大量时间倾听民事诉讼。当边疆出现危机时，他避免对抗，而且从不亲自领军出征。相反，他诉诸外交，于1063年与法蒂玛王朝重新签订了条约，很清楚开罗政权和他一样惧怕塞尔柱人。然而，灾难仍在发生。1060年，一支塞尔柱突击队洗劫了塞巴斯蒂亚，劫掠持续了八天八夜，没有受到任何抵抗。4年后，塞

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入侵拜占廷的亚美尼亚，洗劫了拜占廷人于20年前接管的城市阿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君士坦丁十世的反应却是有意不提供充足的军费。塞巴斯蒂亚之所以轻易失守正是因为没有守军。突厥人一开始对是否进攻该城犹豫不决，因为教堂的圆顶从远处看上去就像驻军的帐篷，当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没有设防时，便大举进发了。

事实上，尽管君士坦丁十世有军人背景，但此时他是身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看待问题的视角自然就变了。他敏锐地意识到，此时再也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合法王朝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任何一位成功的军人像推翻米哈伊尔六世那样发动政变。若有下一次，君士坦丁十世和他的家族将成为受害者。因此，他有意或无意地遵照了巴达斯·斯克雷罗斯对瓦西里二世的建议——“不要让在外征战的将军们拥有太多的资源”。最终，分歧并不在文臣和武人之间，而在首都这个大都会的需求和那些边远的、新获得的行省的需求之间。正是这样的分歧导致了灾难。

1067年12月，米哈伊尔·普塞罗斯被皇后召见。君士坦丁十世于5月去世了，从那时起帝国就由一个摄政委员会代表他年幼的儿子米哈伊尔七世统治，组成这个摄政委员会的是君士坦丁十世的遗孀欧多西亚、他的兄弟约翰·杜卡斯和普塞罗斯。“你肯定意识到了，”皇后欧多西亚说，“我们正在丧失威望，帝国运势也在衰落。”这是普塞罗斯无法否认的：塞尔柱人最近刚袭击了凯撒里亚，这个城市不在亚美尼亚，而在小亚细亚，远离边境。即便如此，他仍敷衍地说应该对这一情况有所考虑，他担心皇后会提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他的回答只激起了一阵大笑。皇后宣布她已经决定通过再婚把统治权交出去。她选择了罗曼诺斯·第欧根尼（Romanos Diogenes），这是一位卡帕多细亚贵族，是那个在1029年因被指控叛国罪而自杀的

君士坦丁·第欧根尼的儿子。他在军事上的履历是无可挑剔的。在上一任政权里，他作为塞尔迪卡总督几次击败佩切涅格人。因此，欧多西亚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皇帝与法定君主米哈伊尔七世共同统治，如尼基弗鲁斯二世之于瓦西里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那样，而不再像伊萨克一世与君士坦丁十世那样在军事上遭受明显的失败。婚礼在1068年的元旦举行，第欧根尼被宣布成为皇帝，即罗曼诺斯四世（1068—1071年在位）。

新皇帝主导了一些激烈的变革。条约和贡赋再次从议程中撤出，代之以直接的军事对抗。像希拉克略一样，罗曼诺斯四世决定首先对付东部的敌人，目标是给塞尔柱突厥人以致命的一击。他一上台就召集了大部队向小亚细亚东部进发，他的出现确保那一年没有塞尔柱人的劫掠，但是每当他出现时，敌人都会撤走，他无法抓住战机。1069年，他步约翰·基米斯基的后尘入侵叙利亚，可能是为了保证拜占廷帝国能够介入塞尔柱人和法蒂玛王朝对阿勒颇酋长国的争夺，但这并没能阻止突厥人入侵拜占廷领土并洗劫伊科尼乌姆。

至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罗曼诺斯的懊丧，他无法取得全面胜利。他清醒地认识到胜利不仅取决于前线的安全，还取决于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他在君士坦丁堡有许多敌人。当欧多西亚与罗曼诺斯商讨他们的婚姻时，她有意地使她的小叔约翰·杜卡斯和米哈伊尔·普塞罗斯待在暗处，因为她很清楚罗曼诺斯的上升对于年轻的米哈伊尔七世的权力以及杜卡斯和普塞罗斯二人在宫廷里的地位都是威胁。普塞罗斯曾是君士坦丁十世的私人朋友，并且帮助后者登上皇位，因此普塞罗斯的政治前途与杜卡斯家族唇齿相依。如果罗曼诺斯四世失败，那么普塞罗斯和杜卡斯联盟会在后方等待着废黜他。这就是为什么1071年春，皇帝再次出征小亚细亚，准备获得像971年在保加利亚那样的完胜。

起初，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罗曼诺斯四世成功地重新夺回了亚美尼亚城镇曼齐刻尔特。当他的探子报告前方出现由阿尔普·阿尔斯兰亲自率领的突厥军队时，罗曼诺斯四世对他人数更为庞大的军队充满了信心，因此拒绝了苏丹的和平建议，并下达了进攻突厥军的命令。一开始拜占廷军队似乎要获胜了。面对拜占廷军队的进攻，塞尔柱人颤抖了，慌张地撤退。皇帝领兵追击直到黄昏，却发现他和他的贴身卫队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激战后，罗曼诺斯四世的坐骑被杀，他只能用剑抵抗敌人达数小时，最后被俘。夜幕降临，曼齐刻尔特战役在1071年8月26日结束了。这次冲突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然而在当时看来却并没有那么严重，双方既没有对阵交战，伤亡又非常少，相比保加利亚人在811年和917年给拜占廷人造成的严重损失，这场战役简直不值一提。绝大多数拜占廷士兵都逃散了，而罗曼诺斯四世的一个军官安德罗尼柯·杜卡斯，即那位心怀不满的约翰·杜卡斯的儿子，甚至在皇帝被俘前就鼓动他们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罗曼诺斯四世的支持者们自然把安德罗尼柯的做法看成背叛，但这一做法也可以被视为止损的明智之举。皇帝被俘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苏丹在8天后就释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到军队中，因为阿尔普·阿尔斯兰更感兴趣的是重返叙利亚，继续他与法蒂玛王朝的战争。设想中的灾难此时只是一个不幸和令人尴尬的失败。

这场战役后的一系列事件才是灾难的开始，并且激起了首都和行省之间的不和。8月底，信使们开始抵达君士坦丁堡，带回了令人困惑的关于战败的消息，有人说罗曼诺斯四世战死了，有人说他被俘了。在这种情况下，普塞罗斯和杜卡斯家族宣布，米哈伊尔七世已经成年，能够独立行使统治权了，而他们本来就不愿意让罗曼诺斯四世当皇帝。瓦兰吉卫兵们聚集在米哈伊尔七世周围，一起猛敲他们的盾牌，宣布他是唯一的统治者。几天之后，更多信使抵达首都，带来了新的消息：罗曼诺斯四世其实没有死，甚至也不再是俘虏，他又见到了他的部队，正向西方前进。杜卡斯家族当然也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并让米哈伊尔七世再回到从属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因

此，他们马上把命令下发到各行省，宣布罗曼诺斯四世不再被承认为皇帝。尽管罗曼诺斯四世有经验和声望，但他还是很快在接下来的内战中失败了。1072年5月，他的军队在阿达纳附近被安德罗尼柯·杜卡斯击败后逃散。罗曼诺斯四世不想再坚守城池，继续做无望的抵抗，于是他在确保自己人身安全的条件下投降了。杜卡斯立即食言，把已废黜的皇帝刺瞎了。由于行刑时手段十分残忍，罗曼诺斯四世几个月后就死了。

对米哈伊尔七世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场无可争议的胜利，意味着他现在权位稳固了，是君士坦丁堡唯一的皇帝了。要是在过去，这就足够了，但此时，首都和行省几十年的疏离产生了恶果。许多效忠于罗曼诺斯四世的人拒绝接受米哈伊尔七世的统治，并在小亚细亚创立了自己的独立统治。巴约勒的鲁塞尔（Roussel of Bailleul）是一位法国雇佣军人，曾投身于罗曼诺斯四世的军队，参加过曼齐刻尔特战役，此时暴动了，他带领400名士兵在以阿马西亚为中心的亚美尼亚军区建立了独立统治。当地居民对遥远的君士坦丁堡提供有效保护感到绝望，便交税给鲁塞尔，以换取地方武装的保护，免受突厥抢劫者的侵害。同样跟随罗曼诺斯四世参加过曼齐刻尔特战役的亚美尼亚人菲拉莱托斯（Philaretos）接管了埃德萨和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1077年，那位曾在1047年佩切涅格人的伏击中救了自己人的指挥官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称帝，开始朝着君士坦丁堡进军。同年的晚些时候，另一位将军尼基弗鲁斯·布里恩尼奥斯（Nikephoros Bryennios）在阿德里安堡宣布他要角逐皇位。

这些内部动荡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边境防御开始崩溃，突厥人对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的入侵又开始了。这些入侵不是由塞尔柱苏丹本人策划的，而是他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属民，他对他们控制力很弱，或者可以说没有控制力。当发现不会遭到抵抗时，他们在劫掠后便不再撤出了，而是就地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一伙人由一个名叫达尼什曼德（Danishmend）的人领导，控制了塞巴斯蒂

亚及其周边地区。另一伙人由阿尔普·阿尔斯兰的远房兄弟苏莱曼·伊本·库塔尔米什（Suleyman ibn Kutulmush）领导，进入小亚细亚西部，在那里他们被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招募，帮助他夺取皇位。在拿下尼西亚之后，伯塔奈亚迪斯把这座城市交给了苏莱曼管理，允许突厥人在此定居。到1080年，除了一小部分海边飞地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

在如此迅速地丧失领土之后，相互指责和诽谤是不可避免的。罗曼诺斯四世的支持者指责杜卡斯家族奸诈地推翻了英勇的军人皇帝；普塞罗斯和杜卡斯家族谴责罗曼诺斯四世的鲁莽和军事上的无能；有些人翻出更老的账，提起佐薇的第三任丈夫君士坦丁九世，指责他遣散了伊比利亚军区的部队，并把钱用在了修建君士坦丁堡一座宏伟的新修道院上。毫无疑问，所有人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这个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无论瓦西里二世作为军人的品质和他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就如何，确实是他开始将小亚细亚与首都疏离开来，压制那个为这一地区提供防御的阶层，导致他们开始怨恨那个抽干一切资源又不给任何回报的权力中心。拜占廷帝国终究还是展现了它起死回生的传奇力量，但君士坦丁堡与内陆地区的不稳定关系将持续影响它以后的历史行程。

第八章 内部的敌人

在上帝垂爱的曼努埃尔统治时期，拉丁人获得莫大的恩宠。这是他们应得的回报，因为他们忠诚且英勇。

——推罗的威廉（William of Tyre，1130—1186）

在经历了曼齐刻尔特溃败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拜占廷帝国不仅得以存活，而且逐渐走向兴盛。帝国经过漫长的斗争，终于从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收复了西部领土，而此时这些领土已经摆脱颓势。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城镇变成了生产和贸易中心，并迅速扩张。塞萨洛尼基、第拉修姆等港口呈现欣欣向荣的贸易景象。拜占廷帝国还收复了11世纪初丢失的小亚细亚的大部分领土。尼西亚、士麦那、阿莫里乌姆，以及最富庶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的大部分领土，都再次回到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之下。最繁盛的城市当属君士坦丁堡，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为国库带来了稳定的关税收入。黄金角湾熙熙攘攘，停满了商船；街道上琳琅满目，摆满了商品，令游客艳羡不已。拜占廷帝国再一次展现了它绝境逢生的超凡能力。

在11世纪70年代的动乱无序之后，政治稳定性得以重建。拜占廷帝国内出现了新的王朝——科穆宁王朝，其统治者和曾短暂统治的伊萨克一世来自小亚细亚的同一个家族。1081年的复活节，伊萨克一世的侄子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长久的统治，史称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1081—1118年在位）。他的妻子来自杜卡斯家族，除此之外，他夺取皇位的行为毫无合法性。他只是准确地把握了时机，抢在另一位潜在的皇帝人选之前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然后他对后者用高官厚禄加以收买，但篡位者的污名难以清除，因此在阿莱克修斯一

世统治期间，阴谋迭起，叛乱不断。不过在他去世时，科穆宁家族已经被接纳为正统皇室。皇位的传递几乎实现了无缝衔接，其子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顺利掌权，他也是959年之后第一位生于紫色寝宫的皇帝。1143年，约翰二世在远征叙利亚途中去世，他的儿子曼努埃尔（Mannel）继位，不过在这次皇位继承上也存在不同寻常之处：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是最年幼的皇子，所以他不得不囚禁他的大哥，以确保自己的即位。当然，与11世纪末的动荡相比，1118—1180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和安宁，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此时已经接纳了科穆宁家族的合法统治地位，正如他们对马其顿王朝长久的认可一样。当曼努埃尔一世的儿子于1169年出生时，举国欢庆，因为这意味着帝国不会再回到某位军队将军引兵前往君士坦丁堡夺权的混乱岁月。此外，科穆宁王朝的皇帝效仿瓦西里二世，亲自领兵远征，这样便极大地削弱了对重臣的依赖。



图3 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早期的合金币上的他

新的皇室家族在君士坦丁堡中也留下了地标性的建筑，它们分布在圣索非亚大教堂、查士丁尼石柱、圣使徒教堂的附近。在城市中心，他们还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堂和修道院。1136年，约翰二世和他的妻子伊雷妮建造了全能真主修道院，也用于安葬科穆宁家族过世的皇帝。主教堂的旁边是用于停尸的小教堂，它被献给了大天使米哈伊尔，而约翰二世和伊雷妮死后正安葬于此。全能真主修道院没有铺设大理石走道，也没有装饰镶嵌画，但它的建立不仅仅是皇帝爱慕虚荣

之举。和许多拜占廷宗教组织一样，它也履行着社会职能：修道院内设有医院，君士坦丁堡的穷苦民众可以在此接受免费治疗。约翰二世一贯注重细节，他专门起草了修道院建立章程，明确指出医院可以提供哪些治疗，其中特意提到了骨折、眼炎、胃病；一部分病床专门预留给女性患者，配以女医生提供料理。约翰二世的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在城市最东角建立了类似的机构，称为孤儿院，它收留了数千名重度伤残的孤儿，由国家出资提供食物、住宿乃至学校。皇帝的住宅也发生了变化。科穆宁皇帝基本抛弃了大皇宫，选择住在布拉赫奈。后者位于城墙北端，可以俯瞰黄金角湾。这里的居住环境更加宜人，而且也便于皇帝前往色雷斯的乡下狩猎，这是他们最喜爱的休闲活动。曼努埃尔一世对整个建筑群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增加了一间宏伟的御座室和许多有列柱的长廊，墙上装饰有镶嵌画，描绘着皇帝的诸多军事成就。

截至12世纪70年代，君士坦丁堡内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景致和地标，还有人口构成。君士坦丁堡始终是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街道上涌动着阿拉伯的商人、罗斯的朝圣者和佩切涅格的雇佣兵。此时，一个外来群体异军突起，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拜占廷人把他们含糊地统称为“拉丁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人，散布在整个欧洲大陆，从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诺曼底、英格兰和佛兰德斯到南部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他们最常出现在黄金角湾沿岸的狭长地带，因为这里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业中心。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都拥有自己的房屋、码头和仓库。不过他们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布拉赫奈皇宫中，他们构成了皇帝瓦兰吉私人卫队的主体，而此前这是罗斯人的专利。当皇帝出城远征时，拉丁人同样构成了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主要是诺曼人和来自现代法国地区的士兵。拉丁人从多个方面为帝国带来了利益，帝国在11世纪70年代的灾难中能够生存并恢复，拉丁人居功至伟。然而，这些西方的基督徒最终却成了帝国内部的敌人，拜占廷帝国由此遭受的灾难，要远比曾经平安渡过的那些更加深重。

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内声名鹊起、占据优势地位，为此负责的并非只有科穆宁王朝的皇帝。早在数十年前，这一现象就已初露端倪。瓦西里二世借助于罗斯人，成功镇压了军事贵族的叛变。从此之后，其继任者就意识到西方人的战斗力，并开始大规模地将其招募为雇佣军。受益于此，君士坦丁九世得以镇压1047年的重大军事叛乱。到了11世纪70年代，在作战的拜占廷军队中，拉丁雇佣军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作为军队统帅，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发现自己统领着大量拉丁军队，当他在1081年年初准备夺取皇位时，正是这些士兵随之一同奔赴君士坦丁堡。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场景，阿莱克修斯的军队同样受阻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不得不在墙外安营扎寨，同时苦思冥想如何能够进入城中。贿赂是显而易见的方法，但阿莱克修斯获悉，守卫其中两段城墙的分别是拜占廷军分队不朽军和瓦兰吉卫队。二者均以效忠于现任皇帝而闻名，因此难以下手。不过还有一段城墙的守卫者是内米兹，他们是拉丁雇佣军的一支，容易受到钱财的诱惑。一名拉丁士兵奉阿莱克修斯之命，趁着夜色前往与内米兹领袖商谈。他们在城垛下小心翼翼地交换了意见。1081年4月1日，正是此人打开了其中一座塔楼的大门，阿莱克修斯的军队随之涌入城中。之后，阿莱克修斯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拉丁人和拜占廷士兵都忙于洗劫教堂和私人宅院。新任皇帝在执政前40天被迫遵照教会的意愿，实行严格的苦修，以弥补这些暴行带来的伤害。为了苦修，皇帝要在皇袍之下穿着毛衬衣，枕着石头睡在地板上。

尽管这一事件的结局是不幸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阿莱克修斯能够夺取皇位，其中部分原因是得到了拉丁人的帮助。所以在其统治期间，君士坦丁堡内出现了更多的拉丁人不足为奇。一位英格兰修道士在大约1090年游览了君士坦丁堡，当一位皇宫守卫用他的母语和他打招呼时，这位修道士惊讶不已。不仅皇帝的卫兵是拉丁人，他的亲密谋臣中也有拉丁人。在1107年签署的一份协议中，来自宫廷的8位签署

者中，有6位有拉丁名字，比如迈里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ailli）。皇帝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拉丁人的帮助，他才得以执掌大权，并逐渐将帝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

到1081年，帝国几乎丧失了对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西里西亚南部地区已经落入亚美尼亚人之手，而其余地区，西至尼西亚，则被突厥人的各支控制着。帝国的统治仅仅维系在部分孤立的前哨，比如安条克，但这些地区也在1084年沦陷于突厥人之手。在巴尔干半岛，佩切涅格人仍然横行无阻，不断袭击拜占廷的城镇和村庄，而整个意大利南部则已经被诺曼人占领。1081年夏，事态进一步恶化。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统治者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跨过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半岛发动入侵，围攻第拉修姆港口，以期继续向东推进，进而染指君士坦丁堡。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赖拉丁雇佣军就存在风险，因为拜占廷帝国过去经常招募的诺曼雇佣军在对抗吉斯卡尔时存在忠诚冲突的问题。鉴于此，阿莱克修斯一世从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中招募了几千人，将他们用船运送到欧洲。与此同时，他还瞄向了那些憎恶诺曼人的拉丁人，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因1066年诺曼的征服而被迫逃离英格兰。1081年10月，阿莱克修斯一世与吉斯卡尔在第拉修姆交战的军队中，就有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分队。但是，如果这些英格兰雇佣军想要借此为黑斯廷斯战役复仇的话，那么他们要大失所望了。拜占廷军队在战场上溃败，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虽然未像曼齐刻尔特战役中罗曼诺斯四世那样被敌军俘虏，却也在诺曼骑兵的疯狂追击之下狼狈鼠窜。他的英格兰士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躲进一座教堂，但诺曼人对圣所毫无敬重之情，放火将其夷为平地，藏身其中的士兵无一幸免。

躲藏于君士坦丁堡城墙内，皇帝试图与其他拉丁政权建立盟友关系，特别是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因为后者与意大利的

诺曼人也心怀芥蒂。根据协议，如果亨利出兵攻打吉斯卡尔的意大利领土，拜占廷帝国愿意提供14.4万枚诺米斯玛金币。亨利接纳了这些钱财，但此后的事件表明他并非可靠的盟友。直到1084年他才进攻意大利，而且他的目标是罗马，而不是诺曼人。不过亨利的军事行为还是迫使吉斯卡尔越过亚得里亚海，返回意大利，他的儿子博厄蒙德（Bohemond）则留守，继续与阿莱克修斯一世作战。另一位西方盟友则对诺曼人的入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威尼斯海上共和国位于亚得里亚海岸，可以有效地利用舰队切断诺曼人向巴尔干半岛桥头堡输送人力和物资的途径。威尼斯愿意协助拜占廷帝国，是因为它绝不愿看到在亚得里亚海两岸存在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威尼斯人对诺曼舰队的攻击，切断了诺曼人的补给，从而终止了诺曼人的入侵，后者在顽强抵抗之后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在1085年，诺曼人撤退。

拉丁人还协助拜占廷帝国解决了另一个古老的顽疾，即在巴尔干半岛上仍然横行无阻的佩切涅格人。在1090—1091年之交的严冬之中，他们到处抢劫，甚至杀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郊区。首都民众无人敢走出城墙，进入大雪覆盖的乡下。1091年春，阿莱克修斯一世出城迎战，其军队中包括佛兰德斯伯爵派遣来的500名骑士、一支来自罗马的拉丁军分队和来自另一个草原部落的库曼人。4月29日，在色雷斯的雷文农，这支混合部队对佩切涅格人实施了毁灭性打击，使其几千人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战争第二天，胜利者们不得不匆忙离开战场，因为壕沟里堆满了尸体。在君士坦丁堡，获得解放的民众在街道上欢欣雀跃、放声高唱：“皆因这一天，佩切涅格人再未看到5月的天！”

考虑到拉丁人在阿莱克修斯一世夺取皇位、击败诺曼人和佩切涅格人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足为奇，他会继续招募更多的拉丁援军。在此之前，拜占廷皇帝吸引慕名而来的朝圣者，而阿莱克修斯一世则是广泛撒网，不断派遣使团前往更加遥远的西方国家，访问英格兰国王、佛兰德斯伯爵，甚至罗马教皇。此时的招募行为更加紧迫，因为帝国西部的事端已经解决，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谋臣开始

计划收复突厥人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之后占领的帝国东部领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巧妙地变更了传统的招募雇佣军的方式。虽然他还是像往常一样送去大量的金币，但又增加了新的推动力。他开始强调拜占廷人和拉丁人都是基督徒，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并不是。因此，为基督教皇帝打击“多神教分子”变成了正义之举，可以获得精神上、物质上的回报。阿莱克修斯一世的使团可能还提及了耶路撒冷，此地虽然已经不在拜占廷领土之内，但毕竟是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从而为拉丁人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明，因为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拜占廷使者的说辞。不过，如果他们在皇帝授意下做出如此举动，那么阿莱克修斯一世就要对此后的事件负有一定的责任。

1096年春，君士坦丁堡内传来消息，几支庞大的拉丁军队已经集结并准备向东远征，他们将在君士坦丁堡汇合，然后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突厥人作战，并最终解放耶路撒冷。在招募西方士兵时，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虽然刻意提及精神上的回报以及前往圣城的朝圣之旅，但他还是没有预想到回应的规模如此之大。他无法知晓的是，他在1095年春派遣到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身边的使团引发了出乎意料的反响。教皇将拜占廷人请求打击小亚细亚突厥人的夙愿牢记在心。到了秋季，他在法国大量骑士和贵族的集会上做了振奋人心的宣讲。他督促他们发动东征，帮助拜占廷攻占耶路撒冷。他承诺，每一个参加远征的士兵都将洗涤罪责，如果有人死于远征途中，那么他们将无须接受炼狱中的赎罪，而可以直接进入伊甸园。正是由于受到这种诱惑，大量基督徒响应教皇的呼吁，发动了史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对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谋臣而言，大规模十字军的靠近带来的是戒备和不安。一方面，十字军声称是来帮助帝国打击敌人；另一方

面，他们行为可疑，看起来和数百年来越过拜占廷边界的入侵者一样。毕竟在十字军中存在曾经与拜占廷帝国为敌的人，比如吉斯卡尔的儿子塔兰托的博厄蒙德。除此之外，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必然存在巨大的后勤补给问题，因此他们很可能沿路洗劫城镇和村庄，以满足军粮需求。因此，拜占廷皇帝再次采用久经考验的策略，即用一个潜在的敌人去打击另一个敌人。当十字军抵达君士坦丁堡时，皇帝邀请他们的统帅前往布拉赫奈皇宫，并按照惯例赠予他们礼物，表达感激之情，但同时他力求他们之后的军事行为符合拜占廷的利益。他坚持要求十字军宣誓，保证将占领的原本属于拜占廷的城镇归还给他。当十字军要求他一同前往耶路撒冷时，阿莱克修斯一世婉言拒绝。显然皇帝本人认为这次军事行为有勇无谋，必将得到灾难性的结局。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在灾难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从中谋利。

十字军得到补给之后就被运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此后阿莱克修斯一世就竭尽所能为自己谋利。当十字军在1097年春大举围攻尼西亚时，阿莱克修斯一世与土耳其人开启谈判，说服其向他献城。当十字军继续东进，在多利莱恩击溃一支土耳其军队时，阿莱克修斯一世趁机派遣军队向南收复了士麦那和爱琴海沿岸地区。短短几年内，小亚细亚最富庶的地区重新回到拜占廷的统治之下。此时十字军已经越过拜占廷疆域，在1098年攻陷了安条克，并最终在1099年夏攻占了耶路撒冷。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的相继建立，意味着拜占廷在帝国东部、曾经的穆斯林土地上，拥有了基督教邻国。因此，从表面看来，拉丁人的好战再次为拜占廷帝国带来了益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胜利之时，君士坦丁堡内开始滋生质疑的情绪，特别是围绕拉丁人的实际获益问题。尽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帮助拜占廷人收复了小亚细亚西部，但十字军领袖并没有真正遵循誓言，将曾经属于帝国的所有城镇归还拜占廷。十字军花费近一年的时间才从土耳其驻军手中夺回安条克，在此期间他们甚至经历了饥荒。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带领一支军队前去援助，但当获悉土耳其援

军前往时，旋即撤回。因此，当1098年6月最终占领安条克时，十字军领袖认为没必要立刻将其移交给拜占廷皇帝。此后十字军继续前往攻打耶路撒冷，塔兰托的博厄蒙德趁机占领了安条克，并让自己的士兵驻守，建立了一个维系到1268年的公国。阿莱克修斯一世先提出抗议，然后派遣海上军队，试图阻止博厄蒙德占领安条克周围的领土，但他无法将安条克城中的拉丁人驱逐。他的基督教盟友抢走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导致君士坦丁堡中的民众私下里质疑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十字军的掌控能力。

类似的质疑还出现在阿莱克修斯一世带来的另一个拉丁盟友——威尼斯人身上。他们的舰队在11世纪80年代确实帮助帝国击败了诺曼人，但皇帝为此偿付的代价是否太高了呢？除了常规的黄金、丝绸和头衔之外，威尼斯人还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和西方之间进行海上贸易的一些特权。他们的商人获准在拜占廷境内任何地方运送任何商品，而不用支付10%的标准关税。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内黄金角湾还获得了地产，长约500米，足以容纳3个浮桥，从而构成了威尼斯人自己的商业中心基地。在某种程度上，这构成了拉丁人的飞地，其中的居民可以不听命于拜占廷政权。不足为奇，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臣民对这些特权表示愤恨，因为他们必须缴纳威尼斯人不用缴纳的赋税，且不仅限于此。有人抱怨道：“威尼斯人的暴富，使得他们迅速膨胀，到处自吹自擂。”

如果双方之间只存在关税和安条克归属权的问题，那么拜占廷帝国与拉丁人的关系也不会上升到如此具有争议的层面。另一个因素导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拜占廷人和拉丁人都是基督徒，但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误入歧途。1054年，3位教皇代表拜访君士坦丁堡，结果卷入了与大教长的争端之中。双方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教会统治权。罗马教皇声称自己有权统治整个基督教会，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遭到大教长的严词拒绝。双方之间在宗教礼仪方面也存在诸多分歧，比如在圣餐礼上应该使用发面还是死面的面包。最严重的分歧在于对尼

西亚信经的表述上。西方教会在拉丁文版本的信经中增加了“和圣子”一词，表述为“我们信仰圣灵、上帝、生命的创造者，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拜占廷人认为这一添词属于违法甚至异端行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于是3位教皇代表前往圣索非亚大教堂，在神龛上留下书信一封，宣布将大教长逐出教会。

1054年的事件显然并不能表明拜占廷人和西方教会之间完全决裂，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则凸显、强化了这些分歧。博厄蒙德占领安条克之后的举措之一，就是驱逐拜占廷的大教长，取而代之以一位拉丁裔大教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拉丁人扶持了一位自己的大教长。阿莱克修斯一世继续委任两座城市的大教长，但只能让他们暂居在君士坦丁堡。两套教会体系同时存在，标志着拜占廷和西方教会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在中世纪世界，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教会的分裂不仅仅是主教之间的争吵，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之间的对立，进而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1107年，当博厄蒙德为了报复阿莱克修斯一世进攻安条克，发兵入侵拜占廷领土时，他致信教皇，声称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因为拜占廷人是教会的分裂者。博厄蒙德由此为拉丁人入侵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些都促使拜占廷人更加担忧，他们不断质疑拉丁人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

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儿子兼继任者约翰二世同样心怀焦虑，他从政治层面考虑，认为与拉丁人交好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在即位之后，他拒绝继续认可其父给予威尼斯人的免税权。在1137年和1142年，他两次领兵向东，沿着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足迹，试图重新确立拜占廷帝国对安条克的所有权，重申对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公国的至尊权。然而，他的这些举措均以失败告终。威尼斯人不愿失去辛苦得来的免税权。一支前往协助耶路撒冷王国的舰队在途中接到命令，转而开始袭击拜占廷在爱琴海上的港口和岛屿。拜占廷人损失惨重，约翰二世别无选择，只得屈服，重新签署协议，恢复其父给予威尼斯人的特权。在安条克，当约翰二世率领大军抵达城郊时，博厄蒙德的继任

者们愿意接纳约翰二世在理论上的领主权，却百般推辞，不予交付，迫使约翰二世不得不撤退，后来约翰二世又在外出狩猎时遭受严重伤害。此外，约翰二世发现，针对安条克的宗教举措非常危险。当教皇得知约翰二世将拉丁籍主教们从安条克驱逐出去，取而代之以拜占廷主教时，他发布了一封措辞愤怒的通谕书信，呼吁拜占廷军队中的所有拉丁人离开，否则将遭受永久的谴责。

拉丁军队中大量士兵离开，将成为约翰二世极为困扰之事，因为约翰二世虽然对威尼斯和安条克表现强硬，但和阿莱克修斯一世一样，他也完全依赖于拉丁人。和他的父亲一样，拉丁人在约翰二世的即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瓦兰吉卫队接纳约翰而不是他的姐姐安娜（Anna）和姐夫布里恩尼奥斯（Bryennios）作为合法继承人，他才得以进入皇宫，并掌控了局势。约翰二世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军事领袖，不过拉丁军队在他取得的胜利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128年，在击败匈牙利人的战役中，他得益于意大利骑兵的帮助；1122年，在与佩切涅格人交战时，他被一群挥舞重斧的拉丁卫队守护着。此外，不管约翰二世是否意识到，他和拜占廷帝国都因威尼斯人的出现而获益匪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除了在帝国首都内追求国际贸易之外，拉丁人还主导着拜占廷帝国内部的海上贸易，负责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塞萨利将食物、油、酒运送到君士坦丁堡。他们是帝国首都食物供给链上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拉丁人的问题依然存在，他们对帝国帮助很大，但暗藏隐患。数百年来，拜占廷帝国成功地瓦解了一拨又一拨的入侵者，并将他们的能量转变成帝国的利益，但拉丁人截然不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穆宁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于1143年即位。新任皇帝与他的父亲、祖父都不一样。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约翰二世恪尽职守，但缺乏想象力，他们在面对日益强盛的拉丁人时，

采取的仍然是古老的赠予大量礼物的策略，试图用帝国的威严来震慑“蛮族人”。曼努埃尔一世的性格大为不同，他充满求知欲，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他不像前任皇帝们那样将拉丁人视为有用的工具，而是积极地去喜爱他们，仰慕他们的文化。据说他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写信，询问有关其国度和臣民的信息。他喜欢参加西式的比赛。可能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西方服饰，比如宽檐帽和马裤在拜占廷贵族中流行了一段时间。他不仅在军队中依赖拉丁雇佣军，而且吸引西方学者来到自己的宫廷中担任西方事务的助理和谋臣。他对拜占廷和西方教会的分裂极为不满，竭尽所能促使双方和谈，以期能够修复裂痕。由此，在拜占廷和西方，他都获得了“拉丁人之友”的名声。

曼努埃尔一世喜爱拉丁人，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拉丁人的思维方式，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对拉丁邻国的政策。他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策略虽然在过去取得了成功，但在对待西欧基督徒时需要做些巧妙的变动。既然在他们的基督教义中，耶路撒冷和罗马教皇远比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廷皇帝重要，那么对他们而言，就无须将拜占廷帝国塑造成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因此，虽然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坚定捍卫拜占廷对安条克的所有权，但同时他也确保以一种不会激怒罗马教皇的方式行事。他需要等到一个借口。1159年，时机终于来临。安条克王子出兵攻打塞浦路斯岛，然后领兵前往叙利亚。面对西方的反对意见，安条克王子被迫屈从，不仅接受了曼努埃尔一世的领主权，而且重新任命了拜占廷的大教长。曼努埃尔一世还出资修复了伯利恒的耶稣诞生教堂，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事实上，罗马教皇高度认可他的行为，后者一度想要将其加冕为西方的皇帝。

曼努埃尔一世的亲拉丁立场不应过分渲染，他从未热爱、信任所有的拉丁人。1147年，当十字军第二次经过君士坦丁堡前往圣城时，曼努埃尔一世一度担忧，法兰克和日耳曼军队可能会攻击拜占廷首都。此外，他发自内心地痛恨其中一个群体，即威尼斯人。这种憎恨

源自1149年的一个事件。当时拜占廷人和威尼斯人结盟，试图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手中重新夺回科孚岛。他们对主城城堡久攻不下，持续了数个月，导致围城的士兵备受挫折。一天，拜占廷人和威尼斯人在城镇的市场中发生了斗殴。威尼斯人不敌，撤回自己的船上，但为了报复，一并抢走了皇帝的帆船。他们在甲板下发现了紫色的皇袍和皇冠，于是将它们穿戴在一个非洲人身上，愚弄嘲讽地称其为皇帝。所有这些都是当着岸边拜占廷人和曼努埃尔一世的面进行的。曼努埃尔一世认为这些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皇位的极度蔑视，也是在嘲讽自己的黑色皮肤。事件随后得到弥补，但曼努埃尔一世随时准备采纳建议，废除威尼斯人的贸易特权。1171年，曼努埃尔一世突然逮捕了帝国内的所有威尼斯商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此后，在其执政期间，威尼斯人被大规模地排除在君士坦丁堡贸易之外。不过，在曼努埃尔一世死后，其继任者们又将威尼斯人重新请回帝国，并补偿了他们的损失。就像其他拉丁人一样，他们大为有用。

曼努埃尔一世的亲拉丁政策还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只要是他认为对帝国友好、有助于帝国发展的外来者，他都可以接受。塞尔柱突厥人就是一个例证。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他们只能偏安一隅，将伊科尼乌姆设立为小亚细亚苏丹国的中心。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都对他们发动过战争，并将其推回到西部边界，但这并非十字军东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帝和苏丹可以和平共存，在拜占廷军队中，突厥雇佣兵和拉丁雇佣兵一样重要。1161年，当塞尔柱苏丹阿尔斯兰二世出访君士坦丁堡时，得到了热情接待。他逗留了80天，甚至还参加了前往圣索非亚大教堂的游行。苏丹及其朝臣得到的待遇和10世纪罗斯人代表团得到的一样。据说正是由于礼遇甚高，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才接受了拜占廷的基督教。事实上，曼努埃尔一世不久之后就建议，修改接待穆斯林皈依者进入教堂的礼仪，这样他们就不用放弃“穆罕默德的神”。概而言之，曼努埃尔一世坚信可以将各种各样的外来者纳入拜占廷文化和政治理念的范畴中。

然而，随着曼努埃尔一世的统治逐渐深入，帝国内批评他对待外来者方法不当的声音却越发高涨，这令人惊奇。在1161年阿尔斯兰二世出访时，帝国内存在诸多私下的抱怨，声称让多神教教徒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是不当之举。在接待期间，君士坦丁堡内发生了轻微的地震，这更被视为上帝不悦的证据。对于一些西方人所享有的特权，帝国内也存在类似的不满，他们抱怨曼努埃尔一世为了自己的利益，让西方人凌驾于拜占廷人之上。一位朝臣试图为自己的叔叔谋求一个行政职务，他认为与“那些操着蛮族腔调的人”之间存在不公平竞争。过度偏宠外国人，只是拜占廷人对曼努埃尔一世的控诉罪责之一。朝臣兼历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ketas Choniates）记载道，许多民众嘲笑他“满脑子都是非分之想，眼睛总盯着不切实际的地方”。曼努埃尔一世在外交层面显然是野心勃勃的，因为他希望能够夺回意大利南部和埃及，希望能够被认定为东西两方共同的皇帝，但所有这些无一实现。1176年，曼努埃尔一世遭到沉重打击，在与塞尔柱人重新开战之后，他的军队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中被彻底击溃。民众开始公然表达愤恨之情，他们指责为了军事行为而征收的重税，指责负责收税的包税人的无耻行径。拜占廷人还憎恨国库钱财的花销方式，批评皇帝经常给予外国统治者大量礼物以达到结盟的目的。

在统治了长达38年之后，曼努埃尔一世死于1180年9月，帝国确实感受到了损失。他被安葬于他的父亲建造的全能真主修道院的小礼拜堂。这一决定是为了纪念他在同一个礼拜堂中安置了一件极为珍贵的圣迹，即放置耶稣基督遗体的红色大理石板。1169年，曼努埃尔一世下令将其从以弗所带回君士坦丁堡。当船停靠在大皇宫的港口时，皇帝亲自将石板背到了法罗斯圣母教堂中，与其他圣迹收藏在一起。因此，曼努埃尔一世死后能够被安葬在全能真主修道院中，这是史无前例的荣耀。在后世人看来，他理应得到这份荣耀，比如同时代的人侯尼亚迪斯在回顾此事时，便总结道：“当这位睿智的掌舵人被抛出船外时，帝国之船已经沉沦。”

在曼努埃尔一世死后，被科穆宁皇帝们遏制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和地方分裂主义再次死灰复燃，游荡在整个帝国内。动荡的原因之一在于，曼努埃尔一世留下了一位年幼的继承人，他的儿子阿莱克修斯二世此时只有11岁。遵照传统，他的母亲马利亚摄政。由于他出身于紫色寝宫，因此年幼的阿莱克修斯二世希望自己的正统继承身份能够保护自己，避免遭遇1081年其曾祖父所发动的强权军人叛乱。然而可悲的是，这种身份却无法阻止来自同族血亲——安德罗尼柯·科穆宁（Andronicus Komnenos）的伤害。

安德罗尼柯是曼努埃尔一世的表弟，在1143—1180年多次发动叛乱。正因如此，他被关押在大皇宫地下城中9年，直到他偷偷地将蜡制钥匙模型送给监狱外的支持者，才得以逃脱。此后数年他一直在流浪避难，直到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死前数月，才得到宽恕，获准返回首都。即便此时，他在首都仍然不受欢迎，只能安静地居住在黑海的小亚细亚海岸边的城堡中，毕竟他年事已高，可能希望安度晚年。然而，当获悉君士坦丁堡内的摄政统治引发民愤时，安德罗尼柯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他从当地招募了一支军队，奔赴首都。正如他的祖宗伊萨克·科穆宁在1057年一样，安德罗尼柯发现民间起义为他铺平了道路，最终在1182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城门打开，欢迎他的军队进入。

迄今为止，安德罗尼柯的政变都遵循常规的模式，但此后出现了变故。起初，安德罗尼柯效仿10世纪的篡位者，和合法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共同执政。但大约一年后，他认为民众已经接纳他成为皇帝，于是便指使人将幼主及其母亲秘密地掐死，阿莱克修斯二世的尸体被放置在铅制的棺材中，然后被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中，以便掩藏证据。科穆宁家族的其他几位成员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自从602年福卡斯屠杀莫里斯及其家族成员之后，再也没有一位篡位者如此彻底地根除前任统治者的残余势力。没过多久，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便意识到年幼的阿莱克修斯二世已经遭遇不测，不过出于两个因素他们接受了这一现实：其一，安德罗尼柯本人也是皇室家族一员；其二，安德罗尼柯

掌权后，便兑现承诺，打击包税人的可憎行径。显然，当他被加冕为皇帝安德罗尼柯一世（1183—1185年在位）时，没人公开反对。

此外，还有一群人没有那么好骗。当安德罗尼柯于1182年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西方拉丁人对安德罗尼柯的政变持悲观和恐惧的态度。叛乱士兵通过城门，进入首都后，立刻与一群首都暴民一起前往黄金角湾的意大利人聚居区。由于1171年曼努埃尔一世的驱逐令，此时城中鲜有威尼斯人，但其他意大利商人，特别是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由于拥有商业特权，也遭到一样的嫉恨。许多意大利人意识到血雨腥风即将到来，立刻逃回船上，没来得及逃跑的则面临着被屠杀的命运。这群暴民闯进拉丁人的医院，杀死了病床上的病人；当街杀死孕妇和儿童。受难者中还有一位罗马的主教，他因教会事宜出访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柯一世不太可能是幕后主使，因为他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而且他也没有特别的“反拉丁人”情愫。和前任统治者们一样，他也招募拉丁雇佣军，也和意大利人磋谈商业条款。事实上，正是他与威尼斯人签署协议，允许威尼斯人回到首都，并重新获得了被曼努埃尔一世剥夺的特权。但是，即便1182年的暴行并非上层的授意，还是让拜占廷人在西方基督徒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再也没能得到改善。

这只是安德罗尼柯一世短暂统治期间的诸多灾难之一。更具毁灭性的灾难是皇帝与行省贵族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小亚细亚落入敌手，在科穆宁王朝的统治下，经济和军事出现复苏，这在一段时间内遏止了心怀不满的军队统帅经常发动的叛乱行为，但此时他们再度死灰复燃。安德罗尼柯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刚刚即位，立刻就发现小亚细亚大多数城市集结在瓦塔基斯（Vatatzes）家族手下，拒绝接受他的统治。1184年，叛乱遭到血腥镇压，但安德罗尼柯一世变得更加偏执，认为所有有钱有地的显贵都可能阴谋反对他。他比瓦西里二世走得更远，他将自己的一幅巨型肖像画挂在君士坦丁堡中心一座教堂的外墙上。在画中，他是农民打扮，手上拿着镰刀，以此来表明自己是

穷人的朋友，要打击权贵阶层。他对自己的儿子们吹嘘道，他将消灭所有的“巨人”，这样他死后，他们只需要统治“侏儒一族”。恐怖统治随之出现，连安德罗尼柯一世最亲近的拥护者也未能幸免。1184年5月，他下令对协助自己夺权的两位贵族采取石刑，用乱石将其打昏之后再刺穿其身体。他们的罪责是为一位朋友提供品行担保，但这位朋友涉嫌谋反，已经逃离首都。许多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名门望族没有坐以待毙，等待安德罗尼柯一世的卫队去逮捕他们，他们逃往国外，或者寻求西西里岛的诺曼统治者的庇护，或者前往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Saladin）的宫廷，后者推翻了法蒂玛王朝，此时统治着叙利亚和埃及。

在君士坦丁堡之外，安德罗尼柯一世的恐怖统治带来的是更加不幸的影响，催化了地方分裂主义。1184年，安德罗尼柯的一位亲戚、西里西亚前任行政长官伊萨克·科穆宁，带领一队士兵从小亚细亚前往塞浦路斯岛，他伪造了皇帝的手谕，任命自己为塞浦路斯岛的行政长官。在掌控局势之后，他开始公开宣称自己为皇帝。伊萨克的终极目标是入驻君士坦丁堡，但他的叛乱将塞浦路斯岛从帝国割裂出来。他在岛上自治到1191年，然后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前往圣城参加十字军时顺道占领塞浦路斯岛。自此，塞浦路斯岛再也没有回归拜占廷的统治。

安德罗尼柯一世的恐怖统治在1185年9月突然走向完结。他派遣亲信前往一名叫伊萨克·安耶洛斯（Isaac Angelos）的年轻富有贵族家中，以谋反罪将其逮捕。当获悉被捕就意味着死亡时，安耶洛斯立刻骑上骏马，杀死了一名士兵，冲出重围，穿过街道，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在那儿自立为皇帝。在安德罗尼柯一世处死阿莱克修斯二世时沉默不语的君士坦丁堡暴民，此时则集结在一起，拥护安耶洛斯。看到事态的进展，安德罗尼柯一世试图从君士坦丁堡逃离，但被逮捕押回。最终他遭遇到可怕的命运，在大竞技场被愤怒的民众撕成了碎片。

伊萨克二世（1185—1195年在位）的即位标志着一个新王朝的建立，然而这并没有遏止分裂主义和政治动荡。伊萨克二世在失去对保加利亚的控制后不到一年就被推翻了政权。但保加利亚局势的失控并非源于洗刷1018年国家耻辱灾难的民族主义，而是由于当地贵族对于自身在帝国统治阶层中地位的不满和对高额赋税的憎恨。此外，保加利亚叛乱的领导者并非保加利亚人，而是瓦拉几亚人。1186年年初，当伊萨克二世在色雷斯的吉普塞拉时，两位瓦拉几亚兄弟——彼得和阿森前来拜见。他们提出请求，希望拜占廷统治者能够同意他们在拜占廷军队中服役，以换取巴尔干山脉地区的一些地产。当这一请求遭到拒绝时，两兄弟非常生气。在激烈的争吵中，阿森被皇帝的一位亲戚打了脸。他们骑马离去，发誓定要报复。帝国近期为了皇帝的婚礼而征收了额外的税收，于是两兄弟利用民众的不满，集结了一支军队，攻打普雷斯拉夫。拜占廷军队迅速回击，将瓦拉几亚人驱逐至多瑙河以北，但是彼得和阿森在那儿与讲突厥语的库曼人结成了同盟。1187年，他们带着军队重返拜占廷帝国，大肆洗劫，迫使帝国放弃了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领地。阿森控制了曾经的保加利亚汗国的核心区域之后，便立刻宣称自己为保加利亚君主。1202年，拜占廷人被迫屈从于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通过协议认可了保加利亚的独立。

失去保加利亚的背后折射的是更深远的现象。在整个帝国内，地方军阀都将自己立为一方诸侯，在当地收取税收，无视中央政权。在马其顿的斯特鲁米察，一位叫多布罗米尔·克里索斯（Dobromir Chrysos）的雇佣兵，曾经为了拜占廷人而与彼得和阿森作战，此时则占领了这一防御要塞，并将控制权扩张到了周边的乡村。在小亚细亚的菲拉德尔斐亚，狄奥多尔·曼加法斯（Theodore Mangaphas）被拥立为帝，甚至开始铸造带有个人肖像的银币。在希腊，利奥·斯古罗斯（Leo Sgouros）占领了阿尔戈斯和科林斯。这些叛乱毫无新意，都是利用地方民众长期存在的怨恨，而这种怨恨来自遥远都市不断收取的赋税和运转不灵的防御。不同地区叛乱的差别仅仅体现在规模上。

在地方分裂主义盛行的同时，帝国中心也开始出现政治动荡。1187年，帝国最好的将军之一阿莱克修斯·弗拉纳斯（Alexios Vranas）意图挑战伊萨克二世的统治，引兵前往君士坦丁堡。伊萨克二世在此次叛乱中得以幸存，但在1195年被自己的弟弟即后来的阿莱克修斯三世（1195—1203年在位）推翻。阿莱克修斯三世随之不得不面对帝国内此起彼伏的阴谋和叛乱，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200年。当时，皇帝约翰二世的曾孙约翰·科穆宁·阿克苏库斯（John Komnenos Axouchos）带领一群拥护者武力闯进大皇宫，坐到了皇位之上，然后，大批士兵赶到，他在走廊里被抓获并斩首。

在12世纪80—90年代无休止的阴谋和反阴谋的斗争中，安耶洛斯家族的皇帝们始终相信他们有一支可以依赖的力量，即拉丁人，而民众似乎对此表示谅解。在帝国丢失了小亚细亚之后，拉丁人曾经帮助挽救帝国，毫无疑问，他们能再次做到这一点。和曼努埃尔一世一样，安耶洛斯的两位皇帝也会雇佣他们担任大臣，委任他们作为出访西方诸国的使臣，不过他们最欣赏的依然是拉丁人的军事技术。1187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阀阿莱克修斯·弗拉纳斯出兵君士坦丁堡，想要夺取皇位，伊萨克二世的本能反应是躲在城墙之后，等待叛乱者筋疲力尽后自行散去。这时，意大利王室后裔蒙特弗尔拉的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刚刚抵达君士坦丁堡，来迎娶伊萨克二世的妹妹狄奥多拉。得知此事后，他做出了让皇帝羞愧不已、无地自容的举动：他在皇帝用膳时冲了进去，大声指责他未来的姐夫(注)应该多花点时间在军备上，而不是吃饭上。伊萨克二世听从康拉德的建议，派兵出城迎战弗拉纳斯。康拉德统领核心兵力，也就是最优秀的拉丁军队。他身着亮红的束腰外衣，面前也不用盾牌遮挡，显得格外耀眼，带领前锋骑兵冲向弗拉纳斯的大本营。他碾过叛乱者，与弗拉纳斯迎面相遇，将其击落马下。弗拉纳斯头晕目眩，请求宽恕，康拉德

允诺，不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除了砍掉他的人头！叛乱就此终结，弗拉纳斯的一只脚被放在奥古斯都广场陈列示众。

拜占廷的皇帝们一次又一次被类似的行动挽救。当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反对伊萨克二世的大教长人选时，是瓦兰吉卫队护送新任大教长前往圣索非亚大教堂，并平息了事件。1200年，是阿莱克修斯三世的拉丁卫队武力闯入大皇宫，镇压了约翰·科穆宁·阿克苏库斯的叛乱。此时，对拉丁人的依赖变得前所未有的危险。教会分裂问题尚未解决，从而为拉丁人留下了进犯的正当理由，而且拜占廷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在1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遭到严重丑化。1182年安德罗尼柯一世统治时期对君士坦丁堡内意大利商人的大肆屠杀，导致西方人认为拜占廷人内心对所有拉丁人都充满仇恨。1187年，当耶路撒冷落入萨拉丁之手时，大多数人都在错误地指责拜占廷人，认为他们教唆甚至帮助了穆斯林。拜占廷人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形象也就是解放圣墓安置所的不瘟不火的援助者，最坏的则是阴险狡诈的伪君子，经常采用恶毒的手段背叛十字军。一些杰出的十字军将领通常认为，拜占廷帝国应该资助重夺耶路撒冷的宏伟大业，哪怕不情愿。这些观念导致拜占廷人大量雇佣的拉丁军队变得日益危险。

正如拜占廷皇帝们依赖拉丁军队维系自己的政权，试图推翻皇帝的人也极为倚重拉丁军队。1181年，当曼努埃尔一世的女儿即公主马利亚妄图推翻小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的摄政统治时，立刻招募一些意大利人，以图大业。1201年，新的叛乱针对阿莱克修斯三世，参战双方自然而然地都想到招募一些拉丁军人，以壮大声势。叛乱者是被废黜的伊萨克二世，他在1195年被刺瞎双眼，然后被安置在君士坦丁堡北侧、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个港口。囚禁的环境舒适且宽松，这位前朝皇帝仍然可以接待拜访者，其中以拉丁人为主。通过他们，伊萨克二世得以写信给自己嫁给日耳曼的斯瓦比亚公爵的女儿。在他们

的帮助下，伊萨克二世安排他的儿子阿莱克修斯于1201年10月逃离拜占廷，乘一艘比萨的船到了意大利。18个月后，也就是1203年，当小阿莱克修斯回到拜占廷时，随行的是一支威尼斯舰队和一支令人生畏的拉丁军队。

这支军队就是十字军。他们的领袖同意推迟对埃及的远征，因为小皇子阿莱克修斯允诺给予他们大量的钱财和物资。他还承诺，只要攻占耶路撒冷，就在那儿常年驻军；同时，他将终结教会内部的分裂。这一协议合情合理，因为虽然帮助伊萨克二世夺回在君士坦丁堡合法的皇权会浪费一些时间，但十字军可以借此壮大自身，从而更有利于实现目标，而拜占廷人也最终可以在圣城的守卫战中扮演适合自身财富和地位的角色。

正如拜占廷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皇权争夺的双方维持着平衡，于是城墙之外的人试图说服城中的某人打开城门。年轻的阿莱克修斯·安耶洛斯坐着船沿着海墙来回游荡，试图说服首都民众放弃对其叔叔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忠诚。7月，民众无视他的请求，于是拉丁军队毁掉封锁黄金角湾的铁链，威尼斯舰队得以进入海湾，并对海墙发动进攻。这些行为足以威慑阿莱克修斯三世，他对保住皇位感到绝望，趁着夜色逃出了首都。伊萨克二世重登皇位，愉快地与儿子即阿莱克修斯四世一同执政。和1081年的情况一样，拉丁人的干预再次促使一位皇帝的倒台和另一位皇帝的即位。

然而，在伊萨克二世复位之后，拉丁人的危险迅速展现出来。他们提供的军事援助需要金钱的支付。在1180年损失大片领土之后，皇帝的税收收入大幅缩水，与此相应减小的是他利用看似永无止境的黄金诱惑勇士们为其服役的能力。再回到1187年，在蒙特弗尔拉的康拉德帮助伊萨克二世镇压阿莱克修斯·弗拉纳斯的叛乱之后，他的拉丁军队获得的报酬是可以到城墙之外大肆抢劫村庄和农舍，这位意大利王子本人却由于得到的回报太少而大为不快，愤而离开君士坦丁堡。

此时的帝国再度面临同样的难题。阿莱克修斯四世发现拜占廷的国库资源极为有限，能够支付的只是他草率允诺给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的报酬的很小一部分。他竭尽所能，甚至没收了教会的财产，仍有巨大的差额。

此时的十字军舰队本可以减少损失，自行离开，毕竟十字军无权待在君士坦丁堡，而且教皇严令禁止他们前往此地，但他们的补给逐渐消耗殆尽，而此时是冬季，驶向公海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于是他们等待，希望阿莱克修斯四世可以兑现他的承诺，向他们提供援助。然而，在1204年1月，所有的希望都化为泡影，因为阿莱克修斯四世和伊萨克二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一位叫“浓眉”阿莱克修斯（Alexios Mourtzouphlos）的朝臣推翻。新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五世立刻叫停所有向拉丁舰队的支付，转而开始加强防御，应对进攻。

拜占廷人可能希望不会有入侵行动，毕竟十字军和威尼斯人仍然受限于打击多神教教徒、解放圣城的誓言。事实上，许多十字军士兵认为，将武器调转指向一座基督教城市是有悖于誓言的，但这些质疑被随行的主教们打消。他们向普通士兵保证，拜占廷人是教会分裂分子，曾经打击过十字军，所以对拜占廷人发动攻击是完全合乎法律的。威尼斯人的舰队已经在黄金角湾，因而可以确保其他战船驶入，攻击海墙最薄弱的地方。

1204年4月，攻击开始，拜占廷人表现出的仍然是对拉丁人矛盾的心态。虽然许多拜占廷人称他们为“野蛮的教会分裂分子”，但对他们攻击的回应是散漫无序的。许多防御者将这场战役仅仅视为两位皇位争夺者的内讧，而不是一座城市在抵御外敌的入侵，因此他们并没有奋战到底。他们并无斗志，在海墙对十字军进行的最顽强抵抗仍然像往常一样，来自服务于拜占廷帝国的拉丁人，即英格兰和丹麦雇佣军。拜占廷军队只要看到十字军获得了立足点，立刻倾向于退缩。来自皮卡第的一位士兵翻过一扇被斧头毁坏的后门之后，对着另一侧的

守卫挥舞起自己的剑，结果他们全都逃跑了。当胜利的十字军穿过海墙，进入街道时，他们发现有些民众在向他们致意，并高呼“神圣的侯爵皇帝”。显然，他们认为十字军领袖即蒙特弗尔拉的侯爵、康拉德的弟弟卜尼法斯（Boniface）将成为新的拜占廷皇帝。甚至在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开始洗劫他们心仪的东西，连教堂也不放过时，许多人仍然坚持这一信念，毕竟这是他们唯一能期待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军队在963年做过类似的事情，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拉丁雇佣军在1081年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许多人希望，当尘埃落定时，一切都可以回归正常。

然而他们错了，仅仅数天后，十字军的暴行就开始暴露无遗。拜占廷人丢失了首都，这座曾经在过去成功抵御过波斯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的最重要的城市。他们失去了君士坦丁堡，因为入侵并非来自多神教教徒，而是来自“将基督的十字架扛在肩上的人”，是他们视为同一个世界中非常重要的同族。拜占廷人曾经总是能够抵挡外来的打击，但此时的他们被拉丁基督徒狠狠地痛击了。

---

1. 原文笔误，写成了岳父，已更正。——译者注

第九章 新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堡，这座人类居住的中心，罗马人的帝国首都，由于上帝的旨意，暂时交由拉丁人统治。蒙上帝恩宠，它将经由我们之手，再度回归罗马人的怀抱。

——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1204年5月16日，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随后是穿过奥古斯都广场进入大皇宫的游行仪式。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君士坦丁堡曾见证无数这样的仪式，但这一次与众不同。因为新皇帝并不是君士坦丁、利奥或者阿莱克修斯，而是鲍德温（Baldwin）。他并非来自小亚细亚或者巴尔干半岛，而是来自低地国家。在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他曾经是佛兰德斯和埃诺的伯爵。在拜占廷人眼中，他是最纯粹的拉丁人。他的家族有悠久而令人自豪的十字军东征传统。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差异：为鲍德温加冕的并非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而是苏瓦松主教；当然鲍德温也并非出生于紫色寝宫。这位皇帝是由多位法兰克伯爵和威尼斯人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是从十字军的多位领袖中挑选出来的。在某些方面，加冕仪式无异于前朝皇帝们的典礼。鲍德温身着和前朝皇帝们一样的皇袍和一样的紫色靴子，脖子上戴着曼努埃尔一世经常在特殊场合炫耀的红宝石。参加加冕典礼的不仅有拉丁人，还有许多讲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当地人，他们为新皇帝大声欢呼。

在一段时间内，新政权得到了首都民众的认可，而且它似乎就要成功地把统治权拓展到拜占廷行省地区。秋季时，鲍德温与同伴就帝国的领土做了正式的划分，类似于1066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征服英格兰之后的划分，每人都会得到与自己的职衔相对应的土地分量，作为回报，他们在皇帝需要时必须服军役。蒙特弗尔拉的卜尼法斯得到了塞萨洛尼基，布卢瓦的路易（Louis of Blois）伯爵得到了尼西亚，而佩尔什的斯蒂芬（Stephen of Perche）分得菲拉德尔斐亚。这些地区的民众最初认可甚至欢迎这种变化。8月，皇帝鲍德温带领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向西远征，塞萨洛尼基的民众涌出城外，毫无抵抗就投降。在小亚细亚的洛帕迪翁，民众列队欢迎新皇帝任命的新长官，他们带着十字架和福音书欢迎基督徒同伴。困扰拜占廷皇帝多年的地方分裂势力此时在拉丁征服者麾下效忠。特里特的雷尼尔（Renier of Trit）带着120名随从，来到皇帝鲍德温赏赐的封地色雷斯的菲利普波利斯，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地人希望拉丁领主可以提供对抗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的有效防御，这是阿莱克修斯三世及其前任显然没有做到的。少数不满者也对新的统治者表示欢迎。1204年年末，布拉雷的彼得（Peter of Bracieux）和奥尔良的帕扬（Payen of Orléans）抵达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人结成同盟，因为后者对过去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深恶痛绝。因此，1204年年底，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拜占廷帝国将继续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再度繁盛。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君士坦丁堡腐朽无能的政权被另一个充满活力、取得军事胜利的政权取而代之。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次又一次挽救拜占廷帝国的这个族群，此时掌控着它的命运。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拉丁入侵者。那些曾经的掌权者被驱逐了，他们穷困潦倒而又孤立无援。逃难的阿莱克修斯三世被蒙特弗尔拉的卜尼法斯抓获，送至意大利关押起来。短暂统治的阿莱克修斯五世，在1204年4月逃往色雷斯之前，奋力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在被捕之后，他被从君士坦丁堡的制高点即狄奥多西石柱上摔死。安耶洛斯王朝时期的许多朝臣和谋士发现自己在新政权下毫无立足之处，于是在拉丁人入侵几周后开始离开君士坦丁堡，在途经乡村时，他们没有得到丝毫同情。色雷斯的许多农民借机嘲笑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用税收压榨他们的落魄者。

最终，这些官员的落魄被证明只是暂时的。欢迎拉丁人的拜占廷人很快就发现，新的政权不仅和旧的一样贪婪，而且还无法对外来者进行整合、奖赏、驾驭。最先发现这一事实的是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民众。蒙特弗尔拉的卜尼法斯在控制塞萨洛尼基之后，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下令征收重税，没收最好的房子，将其赏赐给自己的骑士。即便如此，一些当地的名门贵族还是希望能够在新秩序中寻得一席之地。其中一个代表团前去拜访卜尼法斯，咨询是否可以应征加入他的军队，结果遭到傲慢的驱逐。同样的请求还被送达皇帝鲍德温处，但也立刻遭到否决。拉丁人不需要柔弱无力的“希腊人”。

另一个因素也导致旧帝国内的大部分民众无法融入新的政权，即拜占廷与天主教会之间长期存在分裂。拉丁军队在1204年4月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的行为，导致这一鸿沟进一步扩大。彼时，这些未来的十字军不仅洗劫了教堂，事实上，他们闯进了圣索非亚大教堂，破坏了圣障后面的圣殿，掠去了圣餐仪式中使用的杯盘。他们还将门上和圣餐围栏上的金银坠饰洗劫一空，然后把驴牵进圣殿，带走战利品。他们对大皇宫中收藏于法罗斯圣母教堂的无与伦比的圣迹藏品大肆洗劫，将其带到西方。最终，荆棘冠落入巴黎，而埃德萨的耶稣面像则消失不见，无迹可寻。这就不再是简单的抢劫行为，而是在亵渎圣物。此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逃离首都，拉丁人便扶植起自己的大教长人选——威尼斯人托马斯·莫罗西尼（Thomas Morosini），然后得意扬扬地宣称教会分裂时代已经结束。一些拜占廷神职人员只能暗自祈求，希望自己的宗教传统能够在拉丁人的统治下得以传承。他们甚至给教皇因诺森特三世（Innocent III）写信，建议召开大公会议，解决教会分裂问题，同时请求能够拥有讲希腊语的大教长。1206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一群人和莫罗西尼及教皇代表在君士坦丁堡会面。他们被直接要求效忠于现任合法大教长莫罗西尼。面对抗议，莫罗西尼怒吼道：“你们应该接纳我。你们如若不服从，则将为此受到惩罚！”他言出必行，立刻关闭了君士坦丁堡内的多座教堂。随后，拜占廷的大量教士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地方行省。

拉丁人维系着战无不胜的神话，因而获得拜占廷民众的忠诚，但仅仅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一年，这一神话就破灭了。1205年年初，一些拜占廷贵族不满于现状，在色雷斯起兵反叛拉丁人的统治，皇帝鲍德温迅速前往攻击他们的据点阿德里安堡。绝望之中，拜占廷人向曾经的死敌、新独立的保加利亚君主卡罗赞（Kalojan）求援。沙皇带着一支库曼骑射兵军队向南进军。双方在阿德里安堡交战时，身披铠甲的西方骑士对库曼人相当蔑视，因为库曼人穿着粗糙的羊皮外衣，唯一的装备就是小型弓箭。尽管有明确的禁令，骑士们还是全力冲刺，对库曼人发动打击。库曼人由此得以施行屡试不爽的假装逃跑的策略，然后出其不意，迂回反击，对追踪者发射箭雨。拉丁军队措手不及，有些士兵仓皇逃走，而皇帝鲍德温和他的骑士们逃跑不及，被相继射中。阵亡名单中包括最近分别获得封地尼西亚和菲拉德尔斐亚的布卢瓦的路易伯爵和佩尔什的斯蒂芬。鲍德温被俘，被带到卡罗赞的首都特尔诺沃，之后再未在世上露面。关于他的悲惨命运，此后数年流传着多个恐怖的版本。据说他被卡罗赞下令砍断四肢，扔到乱石丛生的峡谷中，然后又经历了饱受折磨的三天，身体无法移动，许多鸟儿来啄食他的躯干。

鲍德温的继任者是他精明能干的弟弟亨利（Henry），拉丁帝国得以延续，不过它的威望所受到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拜占廷人始终对拉丁人的作战能力极为仰慕，但此时的拉丁人显得异常软弱，于是反抗来得越发坚决。小亚细亚大部、希腊、巴尔干半岛西部尚未真正归属于拉丁人的统辖范围，在这些地区，西方人不再受到欢迎。当拉丁军队逼近时，普鲁萨城镇已经不再像塞萨洛尼基一样欢迎他们，而是拒绝为其打开城门。首先，曾经无视安耶洛斯王朝政权的地方军阀此时开始公然反抗，比如菲拉德尔斐亚的狄奥多尔·曼加法斯和希腊的利奥·斯古罗斯。不过他们资源匮乏，即便是在阿德里安堡事件之后，他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曼加法斯于1206年被佛兰德斯的亨利在阿德拉米欣镇压，斯古罗斯则被蒙特弗尔拉的卜尼法斯武力围困在高耸于科林斯城外的阿克罗科林斯要塞中。5年后，

在绝望之中，他骑马跃下悬崖，自杀身亡。此后，出现了两位对拉丁政权更强有力的挑战者。在希腊西部的伊庇鲁斯，皇帝伊萨克二世和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外甥米哈伊尔·安耶洛斯（Michael Angelos）在阿尔塔自立为王。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Theodore Laskaris）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封王。从君士坦丁堡逃离的前朝精英纷纷投靠他们。在1204年的浩劫中失去一切的逃难者涌入尼西亚，他们甚至在尼西亚湖边发展起一个小的贫民窟。

阿尔塔和尼西亚成为在军事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挑战拉丁皇帝的中心。两位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合法的拜占廷皇帝，都是受上帝委任前来将分裂教会的拉丁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以恢复帝国从前的荣耀的。作为莫罗西尼竞争对手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逃到了尼西亚，于是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于1208年被加冕为皇帝。伊庇鲁斯的君主则于1225年发动政变，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塞萨洛尼基，才由奥赫里德大主教举行了加冕仪式。阿尔塔和尼西亚的宫廷都以君士坦丁堡为模板，完全模仿其政治制度、行政体系、皇室家族的每一个细节。他们重新推行以古典希腊文化为基础的教育模式，试图重建君士坦丁堡的管理体制。这些行省的城镇由于突然获得首都的身份而获益良多，城中迅速增加了大量新的建筑物。阿尔塔的五穹顶教堂成为地标建筑，而在尼西亚，13世纪期间新建了6座教堂，以及皇帝和大教长各自的宫殿。

对拉丁政权的挑战并非局限于言辞和表象。这些新政权很快就发展起庞大的军队。他们精心发展农业和贸易，呈现繁荣的景象，由此积累了所需的资源。此外，这些流亡的拜占廷人成功地应对了游牧部族对其边境的不断骚扰。13世纪上半叶，面对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扩张的蒙古帝国，基督徒和伊斯兰世界都感到极度恐慌。到1241年，这些行动迅捷的马背上的勇士已经到达匈牙利边界，一支拉丁人的联合军队试图在此阻挡他们的攻势，结果溃败。1243年，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人同样遭到蒙古大军碾压式的大败。伊科尼乌姆的苏丹获准保留

了统治地位，但每年必须向蒙古大汗缴纳贡赋。其他游牧部落则在大屠杀到来之前便已逃离。1237年，一群库曼人跨过多瑙河，翻过巴尔干山脉，到马其顿寻找避难之所，结果在途经的保加利亚领土上造成大量破坏。尼西亚的拜占廷人与蒙古人并无交界，因此能够利用时势发展自己。库曼人被邀请至小亚细亚的迈安德河谷定居，成为尼西亚帝国军队中的重要力量。充当尼西亚和伊庇鲁斯统治者雇佣军的并非只有库曼人这样的草原部落族群，还有大量的拉丁人，一如1204年以前。拜占廷人完全明白，来自诺曼底或者伦巴第的人，并没有把弗兰德皇帝或者控制着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视为同类，因此，只要拜占廷人愿意提供高额的薪金，他们就愿意提供忠诚的服务。在这一方面，拜占廷的流亡君主们从未失望过。

经过开源节流，到13世纪20年代，光复君士坦丁堡的目标似乎近在咫尺。更重要的是，拉丁皇帝亨利于1216年去世，而其后人的统治都是短暂无序的。拉丁人在首都之外的领土大幅缩减，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只能依赖威尼斯人来维系，威尼斯人负责通过海上为君士坦丁堡运送物资。不过，虽然拉丁帝国迟早会崩塌，但没人可以确定两位拜占廷皇帝中的哪一位会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在阿尔塔和尼西亚之间爆发了口水战。尼西亚人宣称，阿尔塔的皇帝是个骗子，因为为他加冕的只是一位大主教。阿尔塔的朝臣则回应称，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加冕是无效的，因为为其加冕的所谓的大教长，同时也是尼西亚的大主教。这样的争论无休无止，并未为事情的进展带来益处。1230年，伊庇鲁斯君主与保加利亚沙皇约翰·阿森二世（John Asen II）发生了争执。他判断失误，对保加利亚发动入侵战争，结果在克洛科特尼察战役中溃败被俘，丧失了大量领土。1241年，伊庇鲁斯君主放弃皇帝称号，改称“专制君主”，意思上仅仅指的是领主，尼西亚皇帝由此获得对抗拉丁人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约翰三世（1221—1254年在位）因为娶了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女儿而成为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尼西亚极大地扩张了领土，塞萨洛尼基也在1246年被收复。在控制了失陷首都周围的大部分领土后，约翰三世静静地等待最终光

复帝国的荣耀时刻，然而此时他却去世了。他的儿子即继承人狄奥多尔二世只统治了4年，便将皇位留给了7岁的约翰四世。光复大业暂时被搁置，拉丁皇帝得以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中继续统治，穷困潦倒，但无忧无虑。

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在执政末期远征色雷斯时，得到密报，称一位年轻的下属正在与保加利亚沙皇和伊庇鲁斯君主进行秘密谈判。当得到报告称这位下属是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Michael Palaiologos）时，皇帝更加困扰，因为这位下属是他在皇宫中亲自培养成才的，视同己出。问题是帕列奥列格确实具备潜在的篡位者的所有特质。他的家族在拉丁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离开首都，与科穆宁家族和安耶洛斯家族通婚，因此从血统上来说他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他也拥有帝王之相，才20岁出头，就已经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官僚和统帅。事实上，约翰三世任命他掌管近期刚收复的城镇塞尔和梅尔尼克。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士兵，在军队中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军事作战中最重要的拉丁雇佣军也对他非常认可。帕列奥列格被逮捕并押解到皇帝面前审问，但证据不足，他被无罪释放。为了表明自己本无恶意，约翰三世将自己的外甥女狄奥多拉许配给帕列奥列格，并任命他为大军事长官，即拉丁雇佣军的指挥官。

尽管再度让他回归仕途，但对帕列奥列格的怀疑依然未能消散，即便是在约翰三世去世，狄奥多尔二世即位后。考虑到此后发生的事情，这些怀疑似乎得到了验证。帕列奥列格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担心被抓捕，害怕皇帝为了以防万一将自己刺瞎。狄奥多尔二世已经证明自己在必要时会变得极为残忍。例如，他安排伊庇鲁斯君主的儿子迎娶自己的女儿，但是当这位年轻人和他母亲抵达塞萨洛尼基参加典礼时，皇帝将他们全部监禁起来，直到获得第拉修姆港口，才将他们释放。因此，帕列奥列格决定不能冒险。1256年秋，当皇帝在巴尔干半

岛上时，他穿过边境，逃到塞尔柱苏丹在伊科尼乌姆的宫廷中。1257年，直到狄奥多尔二世发誓不会追究他的责任，帕列奥列格才返回帝国，并承诺永远不会觊觎皇位。

若不是狄奥多尔二世于1258年病逝，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了。在遗嘱中，狄奥多尔二世指派自己最信任的大臣乔治·穆扎隆（George Mouzalon）担任小皇帝约翰四世的监护人和摄政大臣。但狄奥多尔二世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树敌过多，他的临终安排遭到抵制，因此乔治·穆扎隆的摄政统治仅仅维系了非常短暂的时间。在皇帝葬礼的三天后，安置皇帝遗体的修道院举行了一次追悼仪式。大量民众聚集于修道院外，气势汹汹，其中不乏心怀嫉恨的名流人士。在约定好的信号出现时，他们拔出刀剑，冲进教堂，唱诗班陷入沉寂，主持仪式的修道士谨小慎微，已偷偷溜走。摄政王穆扎隆和他的兄弟们知道自己是入侵者的目标，试图躲藏。一位拉丁雇佣军眼光敏锐，注意到了穆扎隆从神龛中露出的膝盖，将其拖出，按照指示将其劈碎。

在史料记载中，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并非行凶者之一，但很难相信他没有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因为他正是谋杀案背后最大的受益者。他和他的兄弟们立刻将小皇帝约翰四世保护起来，几周后，他被公认为小皇帝的摄政王和监护人。几个月后，他的权势得到巩固，因此更进一步，将自己加冕为皇帝，史称米哈伊尔八世（1259—1282年在位）。这一安排是符合传统的，因为他是作为共治皇帝与合法皇帝约翰四世一起执政的。他可能以拉斯卡里斯家族成员自居，而且他确实重启其岳父约翰三世中断的事业。恢复帝国荣耀、光复君士坦丁堡的诉求越发高涨，他也绝不会错过此等彰显自己是往昔拜占廷皇帝们的合法继任者的机会。1260年，当他出兵远征色雷斯时，机会出现了。他的下属向他报告称，巡逻队已经看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不过拉丁人驻守其中，防御甚好，没有进入的希望，于是军队退至赫伯多蒙郊区。他们穿过一个用作牲畜棚的废弃修道院，当进入破烂不堪的教堂时，他们惊恐地看到一具尸骨撑在一个角落中。它已经失去了

四肢，某个滑稽之人将牧羊人的牧笛放在它的嘴中。尸骨旁边是一具空的石棺，士兵们弯腰去阅读上面的文字：“勇敢警戒，终我一生，守卫着新罗马的子孙后裔”。这时他们意识到，这是“保加利亚的屠夫”瓦西里二世的墓。米哈伊尔八世听闻此事，用丝绸将尸骨恭敬地包裹起来，放进一具华丽的棺材中，然后将其运送至塞林布里亚附近，以完整的皇帝等级的礼遇将其重新下葬，而这是只有拜占廷皇帝才能给予另一位拜占廷皇帝的礼遇。

至此，米哈伊尔八世已经做足了象征性的行为和宣传，但他想要将篡位变得合法化，就必须取得光复君士坦丁堡的胜利。尼西亚皇帝此时已经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周围的所有土地，似乎很快就可以攻陷这座城市，因此伊庇鲁斯君主和西西里国王、其他拉丁统治者很可能联合起来阻止他。1259年秋，米哈伊尔八世的弟弟约翰·帕列奥列格确实在伊庇鲁斯的佩拉格尼亚与敌人的联合部队发生了战争。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尼西亚的拜占廷人仍然取得了胜利，西西里国王派来的400名骑士全军覆没。虽然这场战役很有代表性，但拜占廷人并不是单纯地依靠武力获胜，因为他们还刻意散播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来扰乱敌人。在战役前一晚，约翰·帕列奥列格给伊庇鲁斯君主送去信函，警告他小心拉丁盟友，因为他们可能会背叛他。伊庇鲁斯君主相信了他的话，带着自己的人马逃跑了，从而使交战双方获胜的概率更加接近。

米哈伊尔八世此时就像许多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人如保加利亚沙皇西米恩一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对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城墙无可奈何。1260年春，米哈伊尔八世穿过黄金角湾，对加拉塔发动围攻，但也无法取胜。他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有人能从城里把他的军队放进城中，就像1081年那样，而这也确实是光复君士坦丁堡之战最终的情形。1261年7月，他的一位将军阿莱克修斯·斯特拉特格布鲁斯（Alexios Strategopoulos）带领一支军队出现在首都附近。根据获取的情报，首都实际上并未设防，许多拉丁守卫离开首都去攻击尼西

亚人占领的达芙努西亚岛。情报还称，一位支持者从城中打开了城墙之中一扇小的暗门。他们抓住这一机会，15名士兵穿过这扇门，于7月25日晚上进入了首都。事实证明，他们获得的情报是真的，城中几乎没有任何守卫城墙的士兵。他们遇到了一位哨兵，于是抓住其双脚，将其撞向城垛。主城门都被打开，大军涌入。城中并无抵抗，到了破晓时分，斯特拉特格布鲁斯已经掌控了君士坦丁堡。

当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消息传来时，米哈伊尔八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此时仍是清晨，皇帝还在帐中睡觉，捷报只得呈送给米哈伊尔八世的妹妹欧洛希娅（Eulogia），欧洛希娅进入皇帝的营帐，用一根羽毛挠他的脚心，以此来叫醒他。起初米哈伊尔八世并不相信，但随后一位信使抵达，还带来了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的皇冠和权杖，因为鲍德温二世在逃离大皇宫时太过匆忙，来不及带走这些物件。3周后的8月15日，米哈伊尔八世亲临君士坦丁堡。这个日子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它是君士坦丁堡的守卫者圣母升天的纪念日。皇帝赤脚穿过金门，虔诚地走在指引者圣母像后面，走向圣索非亚大教堂，沿途则是欢呼的民众。拉丁人统治的插曲至此结束。

阿尔塔和尼西亚的统治者们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此时由米哈伊尔八世实现了。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重新变成一位皇帝和一位真正信仰东正教的大教长，而不是拉丁人宣扬的错误版本。因此，米哈伊尔八世宣称自己是新的君士坦丁，他重新建造了君士坦丁大帝所缔造的这座城市。他甚至在官方文件中也使用这一头衔，不过他还想要拥有更多的受众，于是他下令在圣使徒教堂外树立起一根纪念石柱。石柱顶端是圣米哈伊尔的雕像，前面跪着一位皇帝，向这位大天使长呈献这座城市的模型。圣米哈伊尔是皇帝的守护圣徒，这显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在其执政期间，这位大天使长经常出现在铸币上。

因此，皇帝在石柱上描绘的，要么是君士坦丁大帝，要么就是米哈伊尔八世自己。

回归本源的理念还体现在米哈伊尔八世大兴土木上，他在刚刚收复的首都中重建或者翻修建筑物。有些是出于纯粹的现实需要，比如提升黄金角湾一侧海墙的高度，以防止1204年4月拉丁人攻击海墙薄弱环节的悲剧再度发生。皇帝还整修了街道和柱廊，建立了学校和医院。有些则是为了强调米哈伊尔八世对教会的怜悯和关爱，以此来凸显拉丁人任由许多宗教建筑荒废的负面形象。许多教堂新添了瓷砖或者铅做成的新屋顶，之前被偷走的装饰品也有了新的替代品。圣索非亚大教堂新装饰了一幅祈愿主题的镶嵌画：基督位于圣母马利亚和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之间。布拉赫奈皇宫在曼努埃尔一世命人塑造的壁画旁边增加了新的主题，描绘了米哈伊尔八世的丰功伟绩。

既然是新的君士坦丁，那么米哈伊尔八世就不能只是恢复首都，还需要重新把它打造成东正教世界的中心。拜占廷帝国促使许多国家皈依了基督教，但由于帝国在12世纪末的软弱和于1204年被拉丁人攻陷，帝国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和宗教影响力遭到极大的削弱。面对帝国的这些灾难，斯拉夫统治者试图依附新的政权。1204年11月，保加利亚沙皇卡罗赞从教皇代表手中获赠一个皇冠，于是向教皇承诺，保加利亚教会从此将臣服于罗马教皇。1217年，塞尔维亚统治者斯蒂芬·内乌尼奇（Stephen Nemanji）也从罗马得到了国王的头衔和加冕礼。不过文化和情感上的纽带不易断裂，特别是当拉丁帝国的软弱在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面前一览无遗时。他们迅速将尼西亚流亡政权中的大教长视为合法的现任大教长，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大教长。1219年，塞尔维亚代表团出访尼西亚，请求为塞尔维亚大主教祝圣，大教长随即欣然为之。1235年，保加利亚人回归本宗，沙皇正式认可了尼西亚大教长的职位。罗斯人也派遣自己的大主教出访尼西亚，请求祝圣。

此时大教长和皇帝都重新回归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的宗教权威性理应得到更加强有力的宣示。1272年，米哈伊尔八世宣布，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教会从此由奥赫里德大主教管辖。奥赫里德曾经是保加利亚的领土，此时则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个城镇。米哈伊尔八世为此做好了前往巴尔干半岛武力宣示拜占廷影响力的准备。1279年，他派遣一支小型远征军，翻过巴尔干山脉，沿着约翰·基米斯基和瓦西里二世的足迹，前往保加利亚，协助沙皇约翰·阿森三世（John Asen III）镇压叛军伊瓦吉洛（Ivajlo）。不幸的是，尽管拜占廷军队占领了特尔诺沃，却不足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约翰·阿森三世最终只得逃回君士坦丁堡。

此时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处于劣势。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遭遇上述挫折，米哈伊尔八世在维系帝国方面还是取得了斐然的成绩，这种角色是拜占廷皇帝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劫难之后一直扮演的。一如从前，米哈伊尔八世并不具备绝对的军事优势，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诉诸其他方式。此外，相比1204年之前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他能做到的更少。1261年收复的帝国领土急剧缩减，主要包括小亚细亚的1/3、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巴尔干半岛上的一条狭长地带。在希腊，9世纪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回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尽管米哈伊尔八世收复了半岛南部的一些地方，如米斯特拉和莫奈姆瓦夏附近，但大部分仍然处于拉丁人的统治之下。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于961年大张旗鼓地重新攻占的克里特岛，此时只是威尼斯的一个殖民地。塞浦路斯则被法国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统治。在小亚细亚海岸沿岸的特拉比宗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有自己的统治者继承谱系，其统治者还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拜占廷皇帝。伊庇鲁斯的君主虽然放弃了皇帝的称号，但仍然拥有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版图的缩减意味着米哈伊尔八世不同于前任皇帝们，他只能收到很少的税收，而且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也较为有限。

不过米哈伊尔八世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帝国的许多传统敌人已经不再对其造成威胁。保加利亚人的军事力量于1241年沙皇约翰·阿森二世死后一落千丈。阿尔塔虽然仍然存在一个敌对的拜占廷宫廷，但其君主没有资源，只能耍些阴谋诡计。穆斯林也没有任何威胁可言。塞尔柱突厥人于1243年遭到蒙古人的巨大打击之后，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是咄咄逼人的马穆鲁克人，他们正在缓慢地清除十字军在圣城的据点，而且和拜占廷人并无交恶。相反，马穆鲁克人在控制了圣城之后，和米哈伊尔八世签订了协议，允许后者委任耶路撒冷大教长。作为回报，米哈伊尔八世安排库曼雇佣军乘船，从克里米亚前往埃及，在马穆鲁克军队中服役。即便是当时最令人害怕的蒙古勇士，对拜占廷而言也不是威胁。他们的帝国已经一分为二，称为金帐汗国和伊利汗国。1265年，金帐汗国确实和保加利亚人一起入侵过拜占廷的色雷斯，不过米哈伊尔八世成功与双方都缔结了友好关系，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蒙古的统治者们。

另一方面，帝国出现了一个自7世纪阿拉伯人之后最大的威胁。它来自西部，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教皇的作为。回到1203年，时任教皇因诺森特三世听闻十字军计划攻陷君士坦丁堡时，表示非常愤怒。他致信远征军领袖，提醒他们牢记解放圣城的誓言，并公开表示禁止他们前往拜占廷首都。十字军此前忽视教皇的存在，1204年5月，他们小心翼翼地修书一封，谨慎告知教皇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占领了，敦促因诺森特改变先前的态度，将攻陷君士坦丁堡视为上帝的恩赐。6月，因诺森特得到相对真实的报告，其中没有遗漏任何令人厌恶的细节，比如在攻城战中的暴行和亵渎神灵的行为，但他还是决定忽略这些。虽然十字军的手段应该受到谴责，但结局是多任教皇梦寐以求的。因诺森特相信，这次征服将解决东西教会之间长期存在的分裂，让拜占廷再次回归对罗马教会的忠诚。正因如此，因诺森特认可了这一既定事实，并给予赐福，认可鲍德温为合法皇帝、莫罗西尼为大教长。

所以，据说时任教皇乌尔班四世在听闻米哈伊尔八世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时惊呆了。一件看似遵从上帝旨意带来教会统一的事，却半路夭折了。因此乌尔班四世向十字军布道宣讲，要求他们夺回君士坦丁堡，并允诺参与其中的十字军将会与前往圣城的十字军获得一样的精神回报。这一号召起初并未得到回应，因为西方民众并不相信已经不复存在的拉丁帝国值得他们为之战斗。1266年，法国国王的弟弟、昂儒公爵查理（Charles）成为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国王。与此同时，他还继承了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博厄蒙德占领亚得里亚海对岸的野心。这位大权在握、野心勃勃的君主有心想要远征君士坦丁堡。1267年5月，他与被流放的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在维泰博会面，协商征伐事宜。

面对新的危机，米哈伊尔八世给出的回应是一系列非凡的外交举措。查理正在巴勒莫港口集结一支舰队，因此米哈伊尔八世需要海上援助。而威尼斯一直是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坚定支持者，因此米哈伊尔八世前往寻找威尼斯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将黄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交给他们，并提供君士坦丁堡贸易渠道的优先通行权。不久之后，米哈伊尔八世还成功安抚了威尼斯的愤怒。尽管威尼斯人一直是拉丁帝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也担忧亚得里亚海两侧被某一强权控制，进而可以切断威尼斯进出地中海的通道。昂儒的查理因其勃勃野心而变得尤为危险，因此在1268年，威尼斯人与米哈伊尔八世也缔结条约，以中立性换取贸易特权。

在对抗昂儒的查理中，帝国最终并未需要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帮助，因为查理的舰队未能出征，米哈伊尔八世通过其他途径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他遣使出访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Peter III），向其允诺，只要彼得三世愿意入侵昂儒的查理王国的薄弱区域西西里岛，拜占廷帝国将提供6万枚金币。与此同时，拜占廷在西西里岛安插眼线，利用当地民众对其法兰克领主的不满，不断煽风点火。这两大策略都取得了成功。1282年3月30日，西西里岛的民众起义，反对法兰

克统治者，史称“西西里晚祷事件”。数月后，彼得三世也对西西里岛发动入侵。昂儒的查理被迫将注意力从攻击君士坦丁堡转向防御自己的王国。他的入侵计划尚未开始，便已被扼杀。

尽管在挫败昂儒的查理一事上尽显智慧，但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复苏与过去不尽相同。帝国领土的缩减不仅带来了治国理念的不同，同时还带来了治国理念的转变。在皇帝们看来，拜占廷帝国的根基并非其领土，而是一种理念：作为古罗马帝国的延续，拜占廷皇帝具有独特的身份。在流亡政权时期，尽管帝国大肆鼓吹传统的政治理念，但民众乃至统治者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过去，拜占廷帝国不断地驯化、融合一拨又一拨的外来入侵者，经常吸纳他们进入帝国的行政体系，带领他们对抗其他敌人，但是在1204年，这一政策完全走向错误的道路。拜占廷民众的应对是退回到一种更加狭隘的身份认同，寻找用于指代自己的特征。官方上，他们是“罗马人”，但这一词汇并无任何的种族内涵，只是指代基督教罗马皇帝的臣民。到了这一时期，一些拜占廷人开始将自己界定为“希腊人”。“希腊人”并非新词汇，而是拜占廷人对自己所仰慕的创作了古典文学的古希腊人的称呼。早期拜占廷人刻意避免使用这一称呼，因为它意味着是“多神教教徒”，但此时“希腊人”不断被提及，很可能是为了强调拜占廷人与拉丁人的区别，即使用语言的不同。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是安耶洛斯王朝时期的大臣，1204年之后，他在尼西亚城墙外简陋的小镇上度过了凄惨的余生。他在作品中简洁明了地陈述了这一差异。他写道，为拉丁人服务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换句话说，此时的拜占廷人是通过语言和种族对自身进行界定的，而不再依照普世理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拜占廷人对自己的称呼“希腊人”，却是西方拉丁人数百年来一直的用法。不过不难解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战败和沦陷总是会强化种族和民族意识。

这种演变的进行并没有发生在明面上。在官方层面，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人，是统治所有基督徒的普世罗马皇帝。然而，在这背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现象。大约在1255年，尼西亚皇帝狄奥多尔二世·拉斯卡里斯在一封书信中描绘了发展军队的规划，他认为帝国不应该依赖外国雇佣军，而要打造一支由希腊人组成的军队，因为只有希腊人值得信赖。作为治国方针的阐述，这封书信完全是在痴人说梦，因为雇佣军在狄奥多尔二世统治时期一如既往的重要。它所体现的意义在于，它宣称只有讲希腊语的人才是真正的罗马人，这是对尼西亚政权此时仍在宣扬的普世理念的完全颠覆。

在流亡政权时期，拜占廷理念中还有另一个方面与传统的普世理念相悖。由于拜占廷宫廷已经不在君士坦丁堡，而是建立在两个行省级的城镇中，所以帝国官僚体制失去了遥远而神秘的色彩。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件好事。地方行省一直疏远于严苛的首都政府，这种已经存在数百年的疏远感此时被消除。在精心的呵护和培育下，地方民众对安耶洛斯和拉斯卡里斯王朝都极为忠诚。狄奥多尔二世在一次公众演说中，宣称自己是“尼西亚的爱国者”。然而，正因如此，皇帝已经不再是普世的君主，而是地方的国王。

1261年，当米哈伊尔八世重新回归君士坦丁堡时，这两种变化必然会带来问题。地方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并非每个人，哪怕是在讲希腊语的人，都会乐意接纳他为新的君士坦丁。由此，米哈伊尔八世开始遭遇曾经困扰瓦西里二世多年的地方离心势力。这一问题部分体现在米哈伊尔八世处置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的方式上。截至1261年，虽然年幼的约翰四世没有掌握任何决策权，但米哈伊尔八世一直与这位合法皇帝共同执政。君士坦丁堡被收复之后，在朝臣的谄媚之中，米哈伊尔八世认为自己的政权已经足够稳固，自己的成就足以帮自己去除共同执政的枷锁。在他胜利夺回首都5个月后，米哈伊尔八世传下密诏到尼西亚，下令将11岁的约翰四世弄瞎。事后，这个孩子被匆忙

转移到黑海附近幽禁，并在此了却余生。尽管事情是暗中进行的，但这一暴行还是走漏了风声。大教长将皇帝逐出教会，尼西亚附近的边境爆发了叛乱。这一地区的一群农民集结在一位自称约翰四世的盲童身边。叛乱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很快，叛军发现自己被皇家军队包围，于是掩护他们拥立的这位皇帝溜过边界，向塞尔柱突厥人寻求庇护。米哈伊尔八世明智地决定对叛军不予惩罚，因为他们构成了边界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开的叛乱被镇压后，取而代之的是拉斯卡里斯心腹之地潜在的憎恨。皇帝再次成为遥不可及的人物，他对地方行省的唯一兴趣便是向他们征税，却不提供任何回报。在13世纪60—70年代，小亚细亚的边疆地区遭到攻击，地方行省的憎恨变得更加狂热。对于这些攻击行为，直接负责的并非伊科尼乌姆的塞尔柱苏丹，而是来到苏丹领地躲避蒙古人的另一群突厥人。苏丹内战乱不断，国土分裂，苏丹急于将新来的突厥人纳入自己的盟友中，于是将西部边境地区的土地赐予他们。随着苏丹权势的衰颓，他们逐渐成为独立的君主，被称为埃米尔。正是这些自治的埃米尔发动了对近邻拜占廷帝国的入侵。起初他们只是发动突袭，抢走牛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更加危险。受制于西方的威胁，米哈伊尔八世大量消耗小亚细亚的军队和资源，导致小亚细亚的居民对自己的安危越发感到担忧。1265年，在尼西亚发生了一件怪事，导致这种担忧演变成了大众的歇斯底里。

此事发生在一个极为平常的周一早晨。毫无疑问，在帝国宫廷4年前搬离尼西亚之后，当地的生活发生了些许变化，不过城中民众还在继续过日子。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谣言：蒙古先锋军队突袭尼西亚的一座城门，将守卫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继续向尼西亚进军，所到之处，杀得片甲不留。谣言愈演愈烈，甚至有人气喘吁吁地描述着他们看到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城中所有民众都被恐惧和惊慌笼罩着。他们跑回自己的家里，匆忙之中相互碰撞着。有些人躲进地窖中，有些人则爬进古老的墓穴中。还有一些人拿起武器，集结在

城市行政官手下，共同前往东门查探。他们发现城门守卫毫发未伤，对于谣言从何而来感到极其困惑。这些杂牌军担心事件可能发生在其他4个城门，于是依次前往查探，结果发现都一样。蒙古人并没有出现，尼西亚并没有危险。

不过并非所有的预警都是谣言。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厥人的入侵更加肆无忌惮。1280年，一位叫门泰斯（Menteshe）的军阀率领军队一直行至迈安德河谷，这一区域在拉斯卡里斯王朝统治时期一度非常繁盛。突厥人包围了特拉勒斯，城中的居民虽然遭受着饥荒和水荒，但仍然勇敢地抵抗，直到防御城墙遭到破坏、倾塌。在随后的洗劫中，大部分城镇毁于一旦。事件发生时，米哈伊尔八世的儿子安德罗尼柯带领军队驻扎在南部的南菲宏。1279年春，他曾到达这一区域，并宣称将要向外扩张，大规模改造特拉勒斯。但此时的事件说明，他甚至无法有效防御此城。眼看君士坦丁堡政府无力援助，一些民众彻底失去了信念。据史料记载，有些民众加入突厥人的洗劫队伍中，并带领他们穿过乡村，去入侵最富庶的领域。毫无疑问，在遏制了西部的威胁之后，米哈伊尔八世显然希望能够立刻去改善东部的境况，但他从未得到这样的机会。

如果米哈伊尔八世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那么他也许能够遏制地方行省的离心倾向，但帝国民众转变了的理念是难以改变的。流亡政权时期，为了区别于拉丁人，拜占廷人出现了更为狭隘的身份认同，而这种区别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和地方忠诚上。与这种身份认同纠缠不清的是正统的宗教理念，以区别于拉丁异端。尼西亚与伊庇鲁斯的皇帝和朝臣在远征期间都极尽所能地宣扬这一理念，以诋毁拉丁帝国。此时，米哈伊尔八世已经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然而，当他试图用新的方式赎买和平时，却发现这种理念成了一种负担。

鉴于1261年之后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威胁来自西方，米哈伊尔八世试图清除隐患，因此他决定消除拉丁人所标榜的攻击基督教拜占廷帝国的借口。1273年，皇帝致信教皇，迫切希望能够实现教会统一，结束分裂。他的前任们虽然采取过类似的措施，但态度模糊，并没有就教皇权威和尼西亚信经做出任何承诺。米哈伊尔八世拥有典型的偏执性格，决定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一困境。1274年6月，拜占廷代表团抵达法国城市里昂，参加正在召开的西方教会的宗教会议。代表团没有参与任何辩论，便在圣约翰大教堂宣读了米哈伊尔八世的书信。在信中，皇帝同意按照教皇的要求终结分裂。这封信在官方层面认可了“和圣子”的正确性，认可了罗马教会对整个基督教会的最高统治权，认可了西方教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的立场，比如关于炼狱的教义和在圣餐仪式中使用死面面包等。教众为此庆祝，主教们与拜占廷代表团在信经中公开使用“和圣子”的措辞，而且为了确保教众能够听到，他们前后提及三次。当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圣索非亚大教堂内也举行了庆典，皇帝欣然出席。米哈伊尔八世一举终结了拜占廷与西方长期存在的隔阂。教皇立刻取消所有重夺君士坦丁堡、恢复拉丁帝国的计划。既然拜占廷人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教徒，那么任何攻击都是非法的。

对于这一极其武断的决策，米哈伊尔八世知道君士坦丁堡内必然会有反对的声音，他一定回想起了崇拜圣像的殉教者以及他们对破坏圣像皇帝的反抗。毫无疑问，他希望能够像平息刺瞎约翰四世事件一样平息可能到来的暴风雨，但暴风雨该来还是会来的。这其中，米哈伊尔八世的亲妹妹欧洛希娅公然宣称：“我宁愿我哥哥的帝国灭亡，也不愿东正教信仰的纯洁性遭到玷污。”修道士阶层反响最为激烈，他们在阿索斯圣山修道士的带领下，到处宣传，指责里昂统一教会法令是对异端的投降。为了确保这一协议得到认可，皇帝不惜使用暴力，反对者被鞭打之后囚禁起来，一名尤其喧闹的修道士被割掉了舌头，连欧洛希娅也未能幸免，她遭到拘禁，不过后来成功地逃到了保加利亚。所有这一切，与数百年来不断在拜占廷帝国内造成分裂的神

学争议极为相似，但也有所区别，区别体现在宗教问题此时与民族身份相联系。支持并执行帝国政策的人遭到鄙视，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天主教教徒，而是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民众。米哈伊尔八世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乔治・梅托齐特斯（George Metochites）抱怨道，民众狂嘘他已经“变成了法国人”。尽管他反驳称自己是爱国者，并不是外国势力的支持者，但他的抗议徒劳无功。古老的普世主义和宗教问题一样，逐渐日落西山。

尽管有诸多抗议，米哈伊尔依然坚守阵地。1282年春，当昂儒的查理的威胁在西西里晚祷事件中被消除时，他的选择似乎是正确的。1283年11月，他准备出兵塞萨利，因为伊庇鲁斯君主的一个儿子在此地依然统治着一个独立的公国。在发动了一次对突厥人的短时征讨以稳固边境后，他仍然停留在小亚细亚，于是他决定乘船渡过马尔马拉海，进入色雷斯，以节省时间。在途中，他的船只突然遭遇暴风雨，差点儿沉船，但最终还是得以抵达雷德斯图斯码头。米哈伊尔八世与他的儿子安德罗尼柯登岸之后，便骑马与米哈伊尔八世的盟友、金帐汗国的女婿诺盖（Nogai）派来的一支蒙古军汇合。然而到了晚上扎营之时，皇帝由于近期不断遭受折磨的肠胃疼痛而身体严重不适，连骑上马匹对蒙古人发表欢迎致辞都无法做到。他的随从由此感到焦虑，担心蒙古人可能会洗劫附近的村庄，好在皇帝在他们的帮助下出现了。米哈伊尔八世用尽力气，在侍从的扶持下，勉强坐了起来，并对蒙古军的领袖们说了一些致敬之词。待皇帝再次回到床上以后，医生偷偷告诉安德罗尼柯，他的父亲命不久矣。安德罗尼柯回到米哈伊尔八世的床侧，一位主教悄悄进入寝宫。皇帝起初没有注意到这位主教，当他转过脸看到他时，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在得到祝圣之后，他于1282年12月11日离开了尘世，蒙古人和米哈伊尔八世的手下一样，大声恸哭。

安德罗尼柯随即继位。尽管米哈伊尔八世篡位夺权的过程残忍且不合法规，但他凭借光复君士坦丁堡的功绩，成功地将自己的家族树立为统治王朝，直到帝国灭亡。在多数人眼中，安德罗尼柯二世·帕列奥列格（1282—1328年在位）不足以替代其残暴但睿智的父亲，他不过是一位虔诚、善良的君主，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作为。事实上，安德罗尼柯二世是现实主义者，这是米哈伊尔八世所不具备的品质。安德罗尼柯二世既没有宣称自己是新的君士坦丁，也没有致力于恢复帝国的旧秩序，相反，他知道帝国此时的形势，因而其政策与民众的心态更为贴合。他把握住民众对东正教信仰的热情，捕捉到地方民众对当地有效统治的渴望，然后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两大举措。

正常情况下，皇帝如果死在君士坦丁堡之外，其尸身将会被带回首都，安葬在某个重要的教堂内。米哈伊尔八世曾经修复并翻新圣德米特里修道院，很可能是希望自己能够安葬于此。然而，根据安德罗尼柯二世的旨意，米哈伊尔八世的尸身被就近送往修道院下葬。1283年春，它又被迁移到塞林布里亚修道院，即20年前安葬瓦西里二世尸骨的地方。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举行公共葬礼，在此后的忌日，新皇帝也没有遵照传统举行纪念仪式。在米哈伊尔八世去世几天后，安德罗尼柯二世颁布敕令，赦免了那些因反对里昂统一教令而被关押或者流放的犯人，罢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十一世，因为他是米哈伊尔八世为了执行统一教令而特意扶持的人选。1284年4月，所有支持统一教令的主教都被免职、替代。新皇帝极为有效地放弃了这一不受欢迎的协议，即便代价是其父亲的伟岸形象。既然昂儒的查理受困于阿拉贡人对西西里岛的入侵，那么拜占廷帝国从西方受到的进攻威胁也大为削弱，由此也就不再那么需要统一教令了。除此之外，这种放弃毫无疑问是大众所欢迎的，安德罗尼柯二世由此获得民众的忠诚和奉承。反对统一教令的囚徒被释放后，召集喜悦的人群来到首都的大街小巷，为恢复东正教信仰而欢呼。

安德罗尼柯二世还希望能够遏制地方行省的离心倾向，以获得地方民众的认可。他前去视察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仍在居住的城堡，这位不幸的皇帝此时已经40岁左右，仍被一些民众视为合法的皇帝。安德罗尼柯二世请求约翰四世原谅他父亲的罪行，同时请求他认可自己的皇帝身份。从那儿出发，安德罗尼柯二世继续出发前往拉斯卡里斯王朝的首都尼西亚。他在小亚细亚驻留了3年，以强化边疆的防御力量，对抗突厥人。1299年4月，安德罗尼柯二世出现在塞萨洛尼基；1300年，他又前往视察莫奈姆瓦夏，即拜占廷帝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飞地。他在莫奈姆瓦夏建立了圣索非亚大教堂，这座教堂至今仍然危耸于绝壁之巅，俯瞰着大海。甚至在挑选皇后时，他也是出于遏制地方行省分裂趋势的考虑。1284年，他在第二次婚姻中迎娶了意大利人伊雷妮，只因她和蒙特弗尔拉的卜尼法斯来自同一个家族，而后者在1204—1207年间是塞萨洛尼基的国王。作为缔结婚姻的条件之一，伊雷妮的家族同意永久放弃对塞萨洛尼基的所有权。安德罗尼柯二世显然意识到，在1204年，塞萨洛尼基民众对入城的拉丁人持欢迎态度。

安德罗尼柯二世还在思量着，如何确保皇帝不在的时候，皇室能够在这些地区一直保持影响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纳了米哈伊尔八世考虑过但一直未能执行的一项措施。在生命后期，米哈伊尔八世计划让安德罗尼柯统治整个帝国，而把塞萨洛尼基和马其顿交由小儿子君士坦丁实际管辖。这一想法可能是希望通过让皇室成员居住在地方行省，从而避免让当地民众觉得被帝国政府忽视了。安德罗尼柯二世可能很喜欢这一想法，不过它能够变成现实主要源于意外因素。皇帝与他的妻子伊雷妮关系非常紧张，于是在1303年，她离开君士坦丁堡，开始居住在塞萨洛尼基，以此来躲避皇帝。她在那儿建立起属于她自己的宫廷，并在马其顿东部的兹拉马建立了乡间住所，以备撤退之需。自此之后，塞萨洛尼基通常都有皇室成员驻守，并以专制君主的头衔统治着城市。

因此，虽然在漫长的统治期间内败笔不断，但安德罗尼柯二世至少意识到了帝国面临的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们。虽然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但这并非他的责任。拜占廷帝国已经变成一个版图急剧缩减的民族国家。就像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基督教国家一样，当下一波来自东方的入侵狂潮来袭时，它已经不可能再幸存。在整个帝国历史上，拜占廷历经劫难：378年，经历阿德里安堡劫难；此后，波斯人、阿瓦尔人和阿拉伯人相继入侵；917年，经历安恰罗斯战役；1071年，经历曼齐刻尔特战役；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但它在劫难之后都再次复活。而此时，它开始没落，并最终走向湮没。

第十章 一位耄耋老人的回忆

我对这部作品一直心怀感动，但并不是出于憎恨或者情谊，因为通常正是它们将虚伪带到了这个世上……

——约翰·坎塔库镇努斯（John Kantakouzenos）

与君士坦丁堡许多著名的修道院相比，查尔西亚尼提斯修道院渺小且无名。它并非皇室所建的重要建筑，比如罗曼努斯一世建立的米雷莱恩修道院和约翰二世建立的全能真主修道院。它的建立者是14世纪中叶一位名叫约翰·查尔西亚尼提斯（John Charsianites）的虔诚的富裕贵族。在老年时，此人加入了修道行列。14世纪60年代，这座修道院里住着一位名叫约瑟夫（Joseph）的修道士。从外表来看，约瑟夫和其他修道士一样，穿着长长的黑袍和贴身的带有头巾的斗篷。尽管他并非任何修道院的院长，修道士们却对他保持着本能的敬重。当他说话时，其他修道士会站在他周围的柱廊之间，静静地聆听。大皇宫经常会向他传来讯息，宣召他前往讨论紧急事务。因为约瑟夫正是曾经的皇帝约翰六世（1347—1354年在位），他和许多前任们一样，隐退修道院度过余生。

在尚未脱离行政事务时，约瑟夫主要是为自己的女婿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1341—1391年在位）提供谋略，为此他奋笔疾书、伏案写作。这位前任皇帝在忙于书写自己的回忆录，这是紧迫的任务。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望去，拜占廷人目光之所及，几乎全是丧失的领土，连阿德里安堡也已不在他们手中。塞萨洛尼基虽然仍是拜占廷的城市，但其与首都相连的道路被敌人控制着。约瑟夫之所以如此急迫

地书写这部作品，是因为外界普遍认为帝国今时今日的悲惨命运正是源于他的所作所为，他迫切需要为自己洗刷这些罪名。

在修道院中的小屋里，约瑟夫追忆起遥远的年代，那时他的名字叫约翰·坎塔库镇努斯，他出生于帝国内最富裕、最古老的家族之中。在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约翰三世的军队中，有很多坎塔库镇努斯家族中人，他们在色雷斯地区拥有大量地产，牧养着5000头牛和70000只羊。他们过去一直和帕列奥列格家族通婚，因此，他们是当朝皇室的近亲，而他们家族中有许多成员经常出入大皇宫。需要注意的是，约翰·坎塔库镇努斯是皇帝安德罗尼柯二世的孙子小安德罗尼柯的发小，并且在皇位继承中排序第三。事实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两个男孩从小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连灵魂都在一起玩耍”。在他们长大成人后，约翰·坎塔库镇努斯迎娶了小安德罗尼柯的第二个侄女，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对于14世纪初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像坎塔库镇努斯这样的人来说，形势并没有什么变化，城市依旧欣欣向荣，也会出现新的建筑和艺术品。在紧邻城墙的霍拉地区，有一座圣救世主修道院，在安德罗尼柯二世的首席大臣狄奥多尔·梅托齐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的资助下，它在1316—1321年间得到翻新和重新装饰，并配套以当时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图书馆。前来首都参观的游客总是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一名罗斯主教诺夫哥罗德的斯蒂芬（Stephen of Novgorod）带领8名同伴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盯着奥古斯都广场上饰有查士丁尼骑马雕像的高柱，张大了嘴。在黄铜大门处，他们的向导讲述了此处的圣像被一位邪恶的破坏圣像者摘掉的过程。他们亲历了每周二例行的宗教仪式，这一天，指引者圣母像会在大街小巷游行。在圣索非亚大教堂，斯蒂芬和他的同伴在游览时喜极而泣，当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允许他们亲吻自己的手时，他们惊喜莫名，“因为他深受罗斯人的爱戴”。有趣的是，在一座修道院中，斯蒂芬和他的同伴看到了一个封印的铅制棺材，他们被说服，相信其中

装着耶稣受难圣迹：拉丁人统治时期掠走了之前收藏的圣迹，而拜占廷人又获得了一套新的。和所有罗斯朝圣者一样，斯蒂芬对拜占廷向导讲述的一切都全盘接受。而西方游客约翰·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则对此有所怀疑，因为他知道许多耶稣受难圣迹如荆棘冠此时都存放在西方城市中。不过，他也将圣索非亚大教堂描述为世界上最壮观、最美丽的教堂，将大皇宫描述为富丽堂皇的建筑。1332年，阿拉伯游客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参观君士坦丁堡，对这座城市的规模感到惊奇，他回忆道，当所有教堂一起鸣钟的声音混在一起时，天空破晓了。

当然这全都是错觉。君士坦丁堡已经今非昔比，它只是在享受着自己宁静的暮年。此外，不管首都给人带来的印象如何，在帝国东部边疆地区，情形不容乐观。安德罗尼柯二世已经执政近40年，其执政后期完全是一场灾难。米哈伊尔八世曾经努力延缓突厥人对小亚细亚的入侵，但此时突厥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攫取土地，因为他们在入侵之后不再撤退，而是就地安顿，特别是在富庶的迈安德河谷。1302年，拜占廷帝国发动军事远征，试图恢复过往的情形，但最终遭遇惨败。一部分军队在巴菲乌斯遭到埃米尔奥斯曼（Osman）的重创，另一部分则毫无进展，只能从马格尼西亚狼狈撤退。截至1320年，小亚细亚西部大部分乡村已经落入不同族群的突厥人手中，拜占廷的统治仅仅局限于城市。君士坦丁堡居民无法对此视若无睹。城市中到处都是来自东部的避难者，他们无处可去，只能在首都的垃圾堆中过着卑微的生活。大教长组织起流动厨房，以缓解这种苦难，但穷困的避难者与富裕的贵族（比如坎塔库镇努斯）之间的冲突必然十分激烈。1317年的一天，一阵强风吹过，查士丁尼雕像中手上的巨大宝球被吹落，重重地撞击在奥古斯都广场的石板上。虽然最终它被重新放回正确的位置，但后来许多人回顾此事时，都认为这是皇帝将要失去皇权的征兆。

1320年秋季开始，一连串的事件导致拜占廷帝国逐渐沦为无权无势的状态。不管边境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危机，皇帝的孙子小安德罗尼柯和他的狐朋狗友都继续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引起了宫廷中更为年长、更为睿智之人的担忧。小安德罗尼柯迷恋一位君士坦丁堡贵妇，但他发现自己有个情敌，于是他便雇用一群暴徒，要对这位不知名姓的登徒子进行肉体打击。有一天晚上，他们躲在这位贵妇的房子周围，然后扑向目标，对其进行暴打，却发现他们打错了人。这位受害者是小安德罗尼柯的亲弟弟曼努埃尔。这群暴徒下手太狠，导致这位年轻人不治身亡。皇帝安德罗尼柯二世惊骇万分。他宣布自己的孙子不适合继承皇位，于是废除了其继承人身份，取而代之以另一位孙子，尽管这位孙子的血脉并不正统。不足为奇的是，在坎塔库镇努斯的回忆录中，对这桩谋杀案只字未提，他只提到皇帝的行为是受到了恶魔的诱惑。在他的作品中，他经常刻意篡改事实，以利于自己和他的朋友，而这件谋杀案便是诸多例证之一。

为了捍卫小安德罗尼柯的继承权，首都中立刻出现了谋反派，而坎塔库镇努斯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公平而言，这并非单纯的皇室内斗。叛乱者对小亚细亚领土的丧失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坚持认为，在东部行省完全沦陷之前，帝国需要一位年轻的皇帝来阻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于是在1321年4月，小安德罗尼柯趁着夜幕逃出君士坦丁堡，与他的支持者汇合。约翰·坎塔库镇努斯带领着支持者，在前往阿德里安堡的路上等着他。叛军在色雷斯获得了大量支持，因为当地最近正遭受安德罗尼柯二世毁灭性的税收征缴。保加利亚沙皇愿意提供300名骑兵，到了年底，这支叛军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开始进军君士坦丁堡，并最终在城墙前陷入僵局。安德罗尼柯二世坚守不出，而小安德罗尼柯的支持者都已经逃出城外，也就不存在有人从城中为叛军打开城门的危险。另一方面，皇帝也无法解除叛军对乡村的控制。6个月后，老皇帝同意让步，僵局才最终打破。双方在色雷斯的海岸城镇埃毕维台会面。安德罗尼柯二世正式昭告天下，宣布他的孙子再次成为继承人，并从帝国财库中支取一定钱财，以维系小安德鲁罗尼柯适当

的生活需要。数月之后，圣索非亚大教堂内举行加冕典礼，小安德罗尼柯被大教长加冕成为共治皇帝。坎塔库镇努斯也得到了回报，被晋升为拜占廷军队总司令。

双方之间的协议终结了内战，但并没有扭转小亚细亚灾难性的颓势，局势反而进一步恶化。在南部，突厥人于1322年开始封锁菲拉德尔斐城，而在北部，普鲁萨4年后被迫投降。小安德罗尼柯请求带领一支军队前去援助普鲁萨，遭到了皇帝的拒绝。眼看安德罗尼柯二世短期之内既不会去世，也不会退位，1327年夏，小安德罗尼柯在色雷斯狄迪莫提胡斯的府邸开始露出躁动不安的表象。到了秋季，他带领军队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叛军再次在君士坦丁堡外获得大量支持。塞萨洛尼基的民众送来讯息，愿意向他投降献城。最终在1328年5月，一些城墙守卫被说服，将叛军放入城中。小安德罗尼柯骑马奔向大皇宫，发现自己的祖父泪流满面，紧紧地抱着一幅圣母像。这位胜利者被眼前的景象触动，没有加害皇帝。安德罗尼柯二世被迫进入修道院，并于几年后去世，而新的政权就此确立。

权力的交接已经推迟了几年，不过此时安德罗尼柯三世（1328—1341年在位）完全掌控了整个帝国，坎塔库镇努斯成为他的首席大臣和谋士。也许是因为安德罗尼柯三世年轻气盛（当然也可能与此无关），所以他非常看重登上皇位的郑重程度，并随之开始准备扭转数十年来的颓势。1329年6月，仅仅在登基一年多之后，他和坎塔库镇努斯便带着军队驻扎在小亚细亚，向内陆出发，以解救遭到突厥人围攻的尼科米底亚。双方在贝勒卡农村庄附近进行了长期但零散的交战。当夜幕降临时，战况更加混乱。皇帝的脚被飞箭射中，随后谣言四起，称他已经去世。拜占廷人开始撤向海岸，但一路上被突厥人无情地多次袭击，最终他们在一处叫菲洛克林尼的小型要塞城墙后找到了

庇护之所，瘸腿的皇帝在最后的行军途中只能被人抬着。次日，他们浴血奋战，冲回船上，终于得以返回君士坦丁堡。

以这种方式开始执政令人低落和沮丧，两年后帝国又失去了尼西亚。然而，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安德罗尼柯三世和坎塔库镇努斯敢于进行冷静而大胆的探索，值得颂扬。在他们看来，帝国会暂时失去小亚细亚，即便有些城镇如尼科米底亚和菲拉德尔斐亚依然在帝国版图内。因此，这一形势和1081年阿莱克修斯一世夺回政权时基本一样。他没有立刻着手驱逐突厥人，而是与他们签订协议，换取时间来对付西方的敌人。事实证明，突厥雇佣军在击败罗伯特·吉斯卡尔和诺曼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德罗尼柯三世和坎塔库镇努斯决定采取同样的策略。这一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在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时期散兵游勇的突厥人此时已经合并成独立的群体，拥有各自的领袖，他们可以签署并执行条约。在贝勒卡农重创安德罗尼柯三世和坎塔库镇努斯并占领了尼西亚的突厥人被称为奥斯曼人，他们此时的埃米尔是奥尔罕（Orhan）。1333年，安德罗尼柯三世亲自前往小亚细亚，在尼科米底亚附近与奥尔罕会面。皇帝同意每年向埃米尔缴纳贡赋，作为回报，奥尔罕同意不再攻击拜占廷在马尔马拉海一侧的据点。

两年后，在爱琴海上的一场战斗中，皇帝及其首席大臣接触到另一位埃米尔乌穆尔（Umur）。他是艾登突厥人的领袖，在士麦那港口附近建立了政权。这次的协议达成颇为困难。乌穆尔并没有在战争中击败拜占廷人，因此他不需要收买。相反，这一协议旨在为拜占廷帝国军队提供雇佣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外交手段之外，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坎塔库镇努斯和埃米尔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据说这位突厥人从此将坎塔库镇努斯视为亲兄弟。

毫无疑问，在几年后，当突厥人大举侵占巴尔干半岛上的领土时，坎塔库镇努斯与突厥人的关系被挖掘出来，并受到指责。然而，在当时，这一政策合情合理。尽管突厥人将拜占廷人从小亚细亚驱逐

了出去，但他们并没有危及帝国的生存。他们分为几个小的族群，奥斯曼人和艾登突厥人只是其中两个酋长国。在古老的塞尔柱苏丹国烟消云散之后，小亚细亚被分割成了多个酋长国。这些突厥人在宗教上都是穆斯林，不过他们并不是渴望与其他宗教信徒战斗到底的狂热分子。他们在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时期入侵拜占廷边界的原始目标，仅仅是掠夺牛羊；当他们发现遭遇到的反抗微乎其微时，才开始占据土地。他们是对抗其他宗教信徒的勇士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世虚构出来的，是奥斯曼人想要论证自身的优秀、论证吞并其他突厥酋长国的合理性时编造出来的，就像他们在捏造的虚假家谱中将奥斯曼苏丹塑造成先知的直系后裔一样。14世纪30年代，形势并不一样，与一些埃米尔酋长国缔结和约，并利用他们来打击其他人，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因为帝国保留了在后世重新夺回小亚细亚的可能性。这都是拜占廷的优良传统。

这一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虽然安德罗尼柯三世和坎塔库镇努斯没能拯救小亚细亚，但他们在其他看似彻底丧失的领土上重新恢复了拜占廷的统治。1329年，希俄斯岛上的居民反叛他们的热那亚统治者，安德罗尼柯三世带领舰队占领了这一岛屿。7年后，热那亚人被从爱琴海上的另一个岛屿莱斯沃斯岛驱逐。1333年，希腊北部、米哈伊尔八世未能收复的拉里萨周边地区，重新回归帝国怀抱。最后，1338年，在艾登的乌穆尔派遣的2000名突厥士兵的陪同下，安德罗尼柯三世和坎塔库镇努斯发兵西部，镇压了阿尔巴尼亚的一场叛乱。面对拜占廷军队中长相怪异的东方士兵，阿尔巴尼亚人仓皇出逃。皇帝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区域，便利用伊庇鲁斯专制君主近期的死讯，向阿尔塔宫廷发出了最后通牒。新任专制君主只是一个孩童，国家由摄政委员会负责治理。摄政委员会成员决定避免冲突，向拜占廷皇帝投降。当然在接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反抗，但到了1340年年底，伊庇鲁斯君主国已经被纳入拜占廷帝国内。然而，帝国复兴的势头戛然而止。1341年夏，安德罗尼柯三世从塞萨洛尼基返回君士坦丁堡后，感到极其疲惫不适，于6月离世，年仅45岁。

安德罗尼柯三世的去世导致拜占廷帝国出现了曾经多次出现的情形。他的继承人是9岁的儿子约翰五世，于是出现了摄政政权，主要由他的母亲拉丁人萨沃伊的安娜（Anna of Savoy）和大教长组成。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最有声望的士兵很可能接手帝国的管理，不管摄政者是否同意。许多人必然会认为约翰·坎塔库镇努斯就是这一人选。1341年9月，在大皇宫的庭院中，他的拥护者发出请愿，希望他能够得到帝国最重要的官职。坎塔库镇努斯在回忆录中声称，自己对这一事件感到极为痛苦而尴尬，因为他对皇位毫无觊觎之心。无论其所言虚实，谣言已经和他紧密相连。当月，当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去统领狄迪莫提胡斯的军队时，摄政者没收了他的财产，囚禁了他的家人。随后坎塔库镇努斯收到讯息，被要求放弃军权，立刻返回君士坦丁堡。毫无疑问，他并没有就范，而是在10月26日被狄迪莫提胡斯的军队拥立为皇帝。

通常而言，这种争端在数月之内就会解决，要么有人将叛军放进城门，要么摄政政权坚守不出，叛军逐渐消亡。但这一次并非如此，双方的对峙持续了6年。冲突如此激烈，持续时间如此之长，部分原因是在继承权问题中同时混杂着社会矛盾。帝国已经丧失了大量领土，许多民众已经贫困潦倒。小亚细亚的一些民众被突厥人武力夺走了家园和财产，而仍然在皇权统治下的大部分民众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由于纳税人口减少，当权者只能比以往更加苛刻地压榨他们，以便维系军队、供给首都。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在遭受痛苦。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地主们，比如坎塔库镇努斯家族，仍然占据大量土地，而且相对于他们的财富而言，他们对财政的贡献显得微不足道。积压了数十年的怨恨此时终于在内战中找到了宣泄口，因此与之前的内战不尽相同。这一次，大众并没有围观等待内战结果，而是积极参与到冲突之中。

从坎塔库镇努斯宣布染指皇权的那一天起，冲突的性质就已经显而易见。当这一消息传到阿德里安堡的中心广场时，富裕的市民一片欢呼，而那些穷苦民众的心情大不相同，他们当晚便涌上街头，发起暴乱。他们针对已知的坎塔库镇努斯的支持者，洗劫了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强迫他们逃往狄迪莫提胡斯去求生。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塞萨洛尼基，一群自称“激进者”的工人和农民控制了整座城市，向君士坦丁堡的摄政政权宣誓效忠。当坎塔库镇努斯带领大军抵达时，城门紧闭，横亘在他的前进路线上。

此时，坎塔库镇努斯本可以承认失败，放弃叛乱。事实上，他的一些拥护者已经开始退缩。如果他真的这样选择的话，那么这真的是帝国之幸，但这也意味着他会被流放，甚至可能被逮捕、刺瞎乃至处死。所以，他坚持不懈，向帝国外寻求援助。1342年，他与邻国的东正教君主，即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shan）签署了协议，后者提供了一支军队。坎塔库镇努斯还向他的老朋友艾登的乌穆尔求援，后者在1342年年底带领大量军队入驻色雷斯。这些联盟必然增加了坎塔库镇努斯获胜的希望，但并没有帮助他赢得战场上的胜利。塞尔维亚军队人数过少，乌穆尔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迫使他班师回朝，保卫自己的酋长国。威尼斯人却异常警醒，因为乌穆尔在士麦那的基地派遣出来的海盗对他们发动了攻击。他们说服教皇去呼吁、发动针对乌穆尔的十字军，于是在1344年，一支基督徒舰队袭击并占领了这一港口。乌穆尔被迫从色雷斯撤退，并在1348年与十字军的交战中战死。因此，坎塔库镇努斯不可能从中再获得援助。

在色雷斯，内战仍在继续。交战双方来回调动、反击，城镇和村庄在双方之间不断易主。至1345年，坎塔库镇努斯显然占据了上风。他占领了阿德里安堡，也就获得了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前哨。因此，当奥斯曼埃米尔奥尔罕派遣使节从普鲁萨前往阿德里安堡时，坎塔库镇努斯颇感兴趣。奥斯曼使节请求坎塔库镇努斯将妹妹狄奥多拉

（Theodora）嫁给他们的埃米尔。坎塔库镇努斯非常兴奋，因为此时一些奥斯曼军队已经在协助他作战，如果能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必然可以获益更多。1346年夏，婚礼以代理人的形式在塞林布里亚举行。8个月后，坎塔库镇努斯的一些秘密拥护者从城中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洞口，叛乱军随即迅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内战结束。

“现在，”修道士约瑟夫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继续写道，“可以描述一下坎塔库镇努斯作为皇帝的成就了。”他并没有隐瞒一个事实：尽管此时他被认可为约翰六世，但在继承问题上存在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言，长年的内战“将罗马人的伟大帝国变成了往昔的虚影”。帝国实际上已经破产。当坎塔库镇努斯在1347年被加冕时，头上的皇冠所镶坠的都是用玻璃做成的假珠宝。真正的皇冠和权杖已经在内战中被摄政政权作为贷款的抵押交给了威尼斯人。在随后的加冕宴会中，宾客使用的是锡制和陶土的杯盘，因为金银器皿的命运和珠宝一样。国库已经亏空，将其填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曾经为帝国带来大量收入的关税，此时也少得可怜，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商船进入黄金角湾之后，不再停靠在拜占廷一侧，而是在热那亚控制的加拉塔地区抛锚，向该地区支付关税。小亚细亚的丢失意味着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便是向色雷斯、马其顿、伯罗奔尼撒等既有领土内的民众征收更多的赋税。坎塔库镇努斯试图向酒类等奢侈品征税，以此来减轻负担。他用简单的违约方式解决了向威尼斯人贷款的问题，因此，皇冠、珠宝等再也没有被赎回。不过这些措施都未能改善帝国悲惨的财政困境。

这还不是帝国最悲惨的情形。在坎塔库镇努斯胜利后几个月，君士坦丁堡遭遇新的劫难：黑死病汹涌来袭。这一瘟疫源自中亚，在1347年夏季由热那亚商船从克里米亚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它切断了民众之间的联系，所有的商贸和政治活动全部停滞，因为人们要避免与

他人接触，以防传染。瘟疫横行了一年，成千上万人遇害，包括坎塔库镇努斯13岁的小儿子安德罗尼柯。“我们每天都要安葬我们的亲友，”一位幸存者写道，“这座伟大的城市变得日益空旷，死亡的人数依然在增长。”即便如此，由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拥有广阔的街道和空间，因此它的情形还是比1348年经历这一劫难的西欧城市要稍微好一些。

坎塔库镇努斯清醒地意识到，内战及随后发生的事件对帝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正因如此，在经历了所有的残酷和血腥之后，他的执政措施是极其温和、抚慰人心的。对于反对他的人而言，并没有发生“猎巫运动”，年轻的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也没有经历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的厄运。相反，他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埃莱娜（Helena）嫁给约翰五世，并让约翰五世以共治皇帝的身份继续执政。虽然约翰六世在此后10年里是主皇帝，但两位皇帝拥有相同的地位。约翰五世是皇位的继承人，在其岳父死后将继承皇权。起初，这一不同寻常的协议正常运转，许多民众对坎塔库镇努斯的即位抱有极高的期待，希望这意味着安德罗尼柯三世统治时期的帝国复兴可以再度实现。事实上，在坎塔库镇努斯执政中期，拜占廷帝国的形势看起来确实有所改善。虽然帝国的版图确实缩减许多，但坎塔库镇努斯尽力确保已有的领土仍然在帝国的控制之下。遵循安德罗尼柯二世制定的方针，他任命皇室家族成员为相对独立的统治者，即专制君主。他委任小儿子曼努埃尔管辖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曼努埃尔的治理下，这一地区获得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它的主城镇米斯特拉，因为拥有坚不可摧的城堡，逐渐蓬勃发展。塞萨洛尼基被委任给坎塔库镇努斯的女婿约翰五世和他的母亲萨沃伊的安娜。这样，他们既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又可以很好地治理这一城市。

对于坎塔库镇努斯而言，一大利好是拜占廷帝国不再拥有强大的外敌。他与此时最强大穆斯林政权，即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349年夏，他派遣使团前往开罗，请求善待他在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子民。他收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复，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其一字不差地转录。苏丹称他为“基督徒信仰和教义的根基，所有受洗礼者不可动摇的支柱”，并允诺不会破坏耶路撒冷的教堂，允许朝圣者平安无事地拜访圣城。保加利亚和罗斯这两大斯拉夫政权，过去一直威胁着拜占廷帝国，此时也不再构成威胁。经由君士坦丁堡的洗礼而皈依基督教的民族，依然反对天主教，将自己的信仰视为正统信仰，而在他们心中，拜占廷依然拥有很高的声望。罗斯人最为虔诚，派遣新任命的大主教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大教长的认可和祝圣；其教堂的装饰风格也采用拜占廷的艺术。约翰·坎塔库镇努斯向莫斯科大公保证：“罗马帝国是所有仁慈的源泉，是所有法律和神圣事物的导师。”当这位莫斯科大公听闻圣索非亚大教堂在1346年的地震中遭受破坏时，他捐赠钱财，帮助维修。所以，他们不可能会进攻拜占廷帝国。

与拉丁政权的关系在近几十年也有所改善。鲍德温二世的后裔仍在宣称他们被从拉丁帝国内驱逐出去是错误的，不过没人再继续关注他们。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也已经破冰。尽管安德罗尼柯二世因为废除里昂统一诏令而被开除教籍，但在其统治末期，他也重启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并探讨了结束教会分裂的可能性。在安德罗尼柯三世统治时期，拜占廷海军与拉丁人一起参与了在爱琴海上打击突厥人的十字军运动。坎塔库镇努斯在控制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刻借此契机，向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派遣使团，告知自己的继位。教皇亲切地给以回复，表扬这位新皇帝对待政敌的仁慈，并邀请他参加下一次打击多神教教徒的十字军运动。坎塔库镇努斯显然知道，所谓的多神教教徒正是他的老朋友兼盟友艾登的乌穆尔，不过他还是热情地表示同意，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兑现这一誓言。

坎塔库镇努斯甚至成功地掌控着与意大利热那亚海上共和国的微妙关系。热那亚利用拜占廷的内战，重新占领了希俄斯岛，并且借助其在加拉塔的聚居区，主导着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贸易。1348年夏，

热那亚人注意到坎塔库镇努斯在加拉塔对面的造船厂打造着一支舰队，因而深感焦虑。他们担心这支舰队是用来对付自己的，于是先发制人，穿过黄金角湾，发动了进攻，烧毁了许多半成品的帆船。1349年春，坎塔库镇努斯下令反击报复，却遭遇一场惨败。据记载，突然之间，大风狂起，拜占廷的船员失去了对船只的掌控，许多船员在慌乱之中跳海。热那亚人趁机进军，抢走了这些弃船。次日，热那亚船只在大皇宫可见的范围内耀武扬威地来回巡航，在海水中拖拽着俘获的拜占廷军旗。然而，坎塔库镇努斯出其不意，发起攻击。热那亚政府获悉黄金角湾的冲突后，立刻控制住加拉塔内的不相关民众。他们对拜占廷人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并认可如下说法：只有获得拜占廷的允许，热那亚人才能继续控制加拉塔。它的管理者即督政官由热那亚任命，不过在抵达加拉塔之后，他需要立刻出现在皇帝面前，并向皇帝宣誓，如同他是拜占廷官员一样。在加拉塔城墙上展示的器械上，同时刻有拜占廷皇帝和热那亚国王的纹章，以此来表达对拜占廷帝国相应的敬重。因此，导致拜占廷跌入深渊，再也未能复兴的，并非阿拉伯人、拉丁人、罗斯人或者其他古老的敌人，而是昔日的坚定盟友、一个毫不起眼的弱小国家。

当坎塔库镇努斯在内战中招募外国统治者带领军队前来援助时，就已经种下了帝国灭亡的种子。当然，事件本身并无新意，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的皇帝们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举动。这一次的区别在于，坎塔库镇努斯缺乏其先辈们赖以为继的重要利器，即拜占廷帝国曾经可以铸造的似乎永不枯竭的金币，以此来辅助外交活动，确保盟友的忠诚度。在过去，塞尔维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弱小国家，只要拜占廷帝国呼吁，就会顺从地去攻击保加利亚人。可能是这种背景麻痹了坎塔库镇努斯，导致他在1342年7月与斯蒂芬·杜尚磋商时，出现了错误的安全感。塞尔维亚国王认为，拜占廷帝国马其顿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应该割让给塞尔维亚，作为对于他的贡献的比较恰当的补

偿，这遭到了坎塔库镇努斯的严词拒绝。如果是在前几个世纪，拜占廷帝国就会奉上大量的金币，但坎塔库镇努斯对金钱的开销同样十分谨慎。因此，一支塞尔维亚军队在坎塔库镇努斯军队中服役，却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回报，那么不可避免地，他们就会要求得到其他形式的报酬。当拜占廷内战激战正酣时，杜尚根据自己的估量，占领了许多城镇，当作自己的报酬。这看起来似乎是作为盟友的理所应得，但到了1346年春，杜尚将自己加冕为“塞尔维亚和希腊沙皇”，他的野心便一览无遗了。和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他希望能够占领拜占廷帝国的领土，建立一个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新的东正教帝国。坎塔库镇努斯并无阻止塞尔维亚人的锦囊妙计。拜占廷内战刚刚结束，塞尔维亚人立刻发兵，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进入了拜占廷帝国残余的版图内，至1349年11月，他们已经占领了伊庇鲁斯、马其顿和塞萨利的大部分土地。在安德罗尼柯三世统治时期机缘巧合夺回的所有领土，此时再次沦陷。

不过，拜占廷帝国的掘墓人并非塞尔维亚人，而是另一个曾经的盟友、弱小的势力——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只是伊科尼乌姆的塞尔柱苏丹国灭亡后在小亚细亚出现的诸多酋长国之一，显然不是最强大的。西方基督教政权更为关注的是继承古老塞尔柱首都的卡拉曼酋长国和在士麦那有进入爱琴海口岸的艾登的乌穆尔。立足于首都普鲁萨，奥斯曼埃米尔奥尔罕统辖着有限的领域，包括从前隶属于拜占廷的城镇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与君士坦丁堡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但对拜占廷首都并不造成直接的威胁。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坎塔库镇努斯在内战中非常高兴能够得到奥尔罕的援助，因此答应埃米尔迎娶自己的女儿狄奥多拉的请求。

起初，奥斯曼人作为盟友要远比斯蒂芬·杜尚和艾登的乌穆尔更为可靠。在整个内战期间，奥尔罕一直稳定地输出军队，双方的合作在坎塔库镇努斯胜利后也并没有走向终结。1347年，也就是坎塔库镇努斯占领君士坦丁堡几个月后，奥尔罕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穿过博斯

普鲁斯海峡，前往克利索波利斯。皇帝乘船前去接待，随后举行了为期几天的宴会和狩猎。当坎塔库镇努斯返回君士坦丁堡时，狄奥多拉带着奥尔罕的几个孩子和他一起出行。奥尔罕享受着这桩皇室联姻带来的声望，似乎理所当然他会继续为坎塔库镇努斯提供军队。奥尔罕之子苏莱曼（Suleyman）带领的军队在打击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战斗中极为有效。坎塔库镇努斯并没有无视雇佣突厥军队的弊端。他知道，当他成为皇帝之后立刻带着突厥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时，首都民众会为此感到极度恐慌。突厥人喧闹的宴会打扰了圣索非亚大教堂中的信徒，导致民众怨声载道。因此，在加冕演讲中，坎塔库镇努斯被迫为雇佣突厥军队而致歉。

不过，他们带来的最大难题在于，当帝国不再需要他们时，该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最终，当双方交恶时，大部分突厥士兵追随苏莱曼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回到了奥斯曼领域；少数人则驻守后方，洗劫色雷斯的乡村，成为当地的祸害。这些士兵并非伊斯兰征服时的先锋部队，他们的行为是中世纪战场上的常见现象，比如在百年战争休战期，失业的英国士兵继续在法国周围游荡，伺机盗抢任何动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突厥群体由于新援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1348年夏，大约2000名突厥人穿过达达尼尔海峡，不请自来。坎塔库镇努斯拦截了入侵者，在激烈的正面交锋之后，迫使他们放下了武器。他很可能一并解除了突厥人的军役。但一场冲突解决之后，另一场立刻又出现了。随着统治的推行，显然内战又要开始了。在塞萨洛尼基，年轻的约翰五世对其岳父的监控越发失去耐心，而主教也已经集结了一群强大的拥护者。与此同时，坎塔库镇努斯的大儿子马修（Matthew）要求让自己代替约翰五世成为帝国的继承者。皇帝尽力平息这些争论，但他只是延缓了危机的出现时间而已。1352年夏，约翰五世和马修在色雷斯爆发了战争。

普鲁萨的奥斯曼宫廷密切关注着这些事件的进展。埃米尔奥尔罕仍然是坎塔库镇努斯的女婿和盟友，他对色雷斯地区不受管制的突厥

人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行动的。即便如此，他显然也已经意识到，征服拜占廷的色雷斯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约翰五世和马修都在招募突厥军队，苏莱曼奉命带领军队前往援助马修。正是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在色雷斯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1352年夏，苏莱曼悄悄占领了位于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的要塞吉璧小港口，并多次无视坎塔库镇努斯让他撤离该城镇的请求。不管此事是否由其父授意，苏莱曼显然是要把此地确立为桥头堡。不过此时，奥斯曼人仍然无法利用这一优势，因为他们没有舰队，也就没有能力运送大批军队跨过海峡，进而驻扎吉璧来加强这一要塞。

1354年3月1日夜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了多次强烈的地面震动，感到颇为恐慌。根据一位当事人的记载，他无助地看着珍贵的书籍从书架上一本接着一本地掉到地面上，但他无法抬起脚去拯救它们。幸运的是，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很遥远的南部。破晓时分，情况已经全面好转，城市中只是偶尔会有颤动，不再出现结构性的损坏。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港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的大部分已经沦为平地，因为许多房屋直接整体消失在了突然出现的裂缝中。陆地一侧环绕城镇的整个防御墙全部化为碎石。在狭窄海峡的另一侧，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感受到了地面的颤动，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利波利遭受的破坏。日暮时分，一队突厥人登上船只，穿过海峡，占领了这一城镇。加利波利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最窄处，正是奥斯曼人需要的桥头堡。想要将军队运过这一狭窄处，连海军舰队都不需要，因为用小船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无人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当拜占廷人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一艘拜占廷船只载着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前往君士坦丁堡，结果在穿过海峡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他们把这位声名显赫的客人带到尼西亚，索取赎金。随后不久，苏莱曼现身，声称加利波利归奥斯曼埃米尔所有。

此时的明智之举应该是在突厥人修复防御措施、建立防御体系之前，将他们驱逐出加利波利。但是，1354年夏，约翰六世·坎塔库镇

努斯迅速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因为他试图调解他的儿子和女婿之间的矛盾，但徒劳无功。他致信奥尔罕，希望能够当面磋商加利波利和吉璧的归属问题，但奥尔罕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会面。秋季到来时，突厥人仍然在加利波利。11月的一个晚上，坎塔库镇努斯获悉，约翰五世带领着一队武装人员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小码头登陆。坎塔库镇努斯及其拥护者藏身于大皇宫，而约翰五世的支持者则占领了奥古斯都广场。此后几天，双方僵持在各自的据点。后来，坎塔库镇努斯厌倦了权力斗争，宣布退位。他将皇权移交给约翰五世，然后退隐到修道院，改名为约瑟夫。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紧张压力之后，坎塔库镇努斯必然十分享受过着修道士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可能想过到阿索斯圣山去修道，退隐巨石林立的半岛，阿索斯的修道士几乎没有受到14世纪中期战乱和动荡的波及。一位意大利游客克里斯托弗·布翁德蒙提（Cristoforo Buondelmonti）为圣山上的井然有序和平静安详所深深震撼。在橄榄林和无花果树间，修道士们忙于自身被分配的工作，补着网，缝着鞋，织着篮子。布翁德蒙提写道：“在固定的时间点，所有人都在试图赞美上帝。他们一直并将永远沐浴着和平。”

不幸的是，如果坎塔库镇努斯放弃皇权是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生活的话，那他就要失望了。他所在的查尔西亚尼提斯修道院并不在遥远的阿索斯圣山上，而是在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地带，因为即便他已经放弃皇位，也不能撒手不管。突厥人、塞尔维亚人和他躁动的家族，一直不停地打扰他的清修冥想。约翰五世的政权仍然受到坎塔库镇努斯的儿子马修的挑战，1357年，这位刚刚遁入空门的修道士从避难所被宣召，以调解两者之间的冲突。他成功说服马修放弃对皇位的争夺，退隐伯罗奔尼撒半岛，约翰五世获得安稳的政权。坎塔库镇努斯再次回归到与世隔绝的修行中。

与此同时，历史上最安静、最低调的一次征服正在进行之中。从加利波利的桥头堡出发，奥斯曼人采用渗入而非武力的方式占领了拜占廷的色雷斯，没有发生战役，也没有进行围攻。1360年，他们向坎塔库镇努斯曾经的大本营狄迪莫提胡斯进军，并占领了这一城镇。随后不久，他们攻陷了阿德里安堡，但没人费心去记录下日期。这样，奥斯曼人便从陆地上切断了君士坦丁堡与塞萨洛尼基之间的联系。拜占廷的首都就像是驻守在乡村中的一座孤岛，而这些乡村也被奥斯曼人控制着。奥尔罕的继任者穆拉德一世（Murad I）将王朝的未来立足于欧洲，于是将宫廷从普鲁萨迁至阿德里安堡，并在此建立宫殿，这样便有了在此驻守的充分理由。

坎塔库镇努斯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寻找方法阻止奥斯曼人的使命落在了约翰五世身上。长久以来，他一直渴望能够履行天生被赋予的权力成为唯一的皇帝。此时，20多岁的他终于得偿所愿。但他并非应付危机的合适人选，因为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记载，他除了勾搭美艳妇人外一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应对措施就非常有限。他所继承的帝国濒临破产、摇摇欲坠，因此并没有足够多的军队来缓解帝国的危机。相反，他又回到寻求拉丁人救助的古老策略。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拜占廷的大部分民众仍然对拉丁人怀有强烈的厌恶之感，1204年的记忆以及不断被提及的教会分裂意识更强化了这种情感。正如一位生活在加拉塔的多米尼加修道士所抱怨的一样，这种憎恶如此强烈，以至当地人会将拉丁人喝水的杯子摔碎，就像杯子被玷污了一样。然而，随着拜占廷帝国的日益衰落，奥斯曼人带来的威胁日益明了，拜占廷的朝臣之中出现了亲拉丁的元素，其中最著名的是德米特里·基多尼斯（Demetrius Kydones）。他决定学习拉丁语，以便与每天拜访拜占廷宫廷的西方外交使者、商人、雇佣兵等更好地交流。学习拉丁语后，他变成了拉丁文学和神学的痴迷者，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他积极鼓吹、大力倡导一种理念：拉丁人应该被视为盟友、基督教同伴，而不是敌对的教会分裂分子。他

们应该被召集来帮助对抗共同的穆斯林敌人。这些观点说服了约翰五世。

距离最近的天主教政权是匈牙利，一个广袤富裕的王国，非常适合打击奥斯曼人。1365年夏，约翰五世决定向匈牙利国王求助，为了以示重视，他决定亲自前往。于是，1366年秋，这位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离开君士坦丁堡，向北进入匈牙利首都布达。如果他还心存念想，认为曾经尊贵的拜占廷皇帝亲自前来求援，就会融化主人们的心，那么他会大失所望。在他抵达后，受到的接待并不热情，因此他并没有逗留很久。在回程路上，他在边境遭到保加利亚人的拦截，禁止他进入他们的领土。他只能在维丁镇逗留了几个月，然后才得以坐船顺着多瑙河返回故土。虽然旅途波折，但也将一个基本真理带回国内，即要想获得拉丁人的援助，首先要解决教会分裂问题。拜占廷在小亚细亚最后一个城镇菲拉德尔斐亚的居民，已经对此深有感触。他们的城市被突厥人包围、攻击了数年，一直无法从拜占廷皇帝那里得到任何援助，于是他们向教皇求助。他们得到的回函中写道，想要获得援助，先要皈依天主教。

此外，约翰五世深知，任何试图按照拉丁人的条款结束教会分裂的举动，都会遭到本国民众的暴行和反对，一如1274年的里昂统一法令。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至少先表态，希望商谈此事。于是，1367年，教皇代表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约翰·坎塔库镇努斯被从修道院中接出来，在此后数周的讨论中扮演主导角色。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拜占廷人坚持认为应该召开大公会议来解决教会分裂问题，而拉丁人则指出毫无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最终，约翰五世提出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怪异方案。他再次出发，带着德米特里·基多尼斯和其他亲拉丁的朝臣，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罗马。1369年10月，他在圣彼得教堂参加了一场公共礼拜仪式。在亲吻了教皇的手、嘴和脚后，拜占廷皇帝谦卑地跪在教皇面前，宣称自己皈依天主教，接受教皇的权威，接纳西方版本的尼西亚信经。这一举

动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因为约翰五世的屈服是个人行为，他并没有代表自己的臣民做出任何允诺，这与米哈伊尔八世的代表在1274年里昂的行为不同。教皇深知其中动机，但他也知道，这一虚弱的基督教帝国，确实存在被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取代的危险。因此，他发布声明，宣称拜占廷皇帝值得援助。他鼓励天主教国家前去帮助拜占廷对抗奥斯曼人。

可悲的是，倒霉的约翰五世似乎终生要遭遇失望和羞辱。离开罗马后，他准备经由威尼斯乘船返回君士坦丁堡。他被威尼斯当局逮捕，因为他没有偿还罗马之行的贷款。这位拜占廷皇帝发现自己再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受困于异国他乡，无法返回故土。在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带着一支舰队和一些现金抵达威尼斯并偿还了贷款之后，他才得以返回帝国首都。至此，教皇的援助呼吁显然遭到彻底无视，也绝不会有拉丁骑士军团骑行至东方，将奥斯曼人驱逐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另一侧。这趟令人讨厌的旅行又是一无所获。

帝国还存有一个希望。拜占廷帝国可能无力对抗奥斯曼人的军队，但它的东正教邻国们有这个实力。虽然伟大的斯蒂芬·杜尚在1355年去世，他在14世纪40年代吞并的大量领土开始分离，但塞尔维亚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力量。正是塞尔维亚人在1371年发动攻势，将突厥人赶出了巴尔干半岛。在塞尔维亚军队于1371年9月的马里查河战役中全军覆没后，毫无疑问，奥斯曼人将在此驻守。这一区域的基督教君主们接二连三地向埃米尔穆拉德一世臣服，他们不仅同意缔结和约、每年缴纳贡赋，而且允诺在被召唤时，会提供军队为其服务。首先是塞尔维亚人，其次是保加利亚人，最后当没有选择时，便是约翰五世，所有国家都成了奥斯曼人的附属国。约翰五世的儿子曼努埃尔奉命带领一支军队前去服役，在小亚细亚与奥斯曼人一起作战，这样奥斯曼人逐渐确立了对其他突厥酋长国的领导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曼努埃尔参加的行动之一竟是攻打菲拉德尔斐亚，即拜占廷在东

部失陷领地中的最后一个前哨。1390年，当它在猛攻之下沦陷时，攻破城墙的士兵中就有来自拜占廷军队的。

当约翰五世在1372年成为奥斯曼的附属时，修道士约瑟夫已经不再居住在君士坦丁堡，而是南迁至米斯特拉。1383年6月15日，他在一座修道院中去世。至此他已经书写完自己的回忆录，也针对别人对他将突厥人引入欧洲的指责进行了辩护。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被控诉的一样，他有罪，但他也只是效仿前任皇帝们，试图将移民潮为己所用。他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相应的资源可以利用，因而也就无法力挽狂澜，无法阻止这席卷了整个帝国的洪水猛兽。

在坎塔库镇努斯死去时，帝国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皇帝的法令已经无法穿透首都的城墙。他的领主奥斯曼埃米尔驻守在阿德里安堡，统治着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君士坦丁堡则尴尬地被奥斯曼的领土包围着。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部分和一些爱琴海岛屿仍然认可皇帝的权威，但塞萨洛尼基则在1387年向奥斯曼人打开了城门。即便如此，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摇摇欲坠中又坚持了60年。帕列奥列格家族的皇帝们仍然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他们的首都仍然享有和圣城一样的声誉，仍然是东正教信徒的信仰中心，但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在降低。罗斯人在1448年后不再将大主教送到君士坦丁堡接纳祝圣。在最后的岁月里，君士坦丁堡内的生活和之前大相径庭。皇帝和宫廷不再是中心。事实上，大皇宫和布拉赫奈皇宫在逐渐损毁剥落，皇室家族被局限在带有宜居房间的狭小套房中。皇帝的一些臣民显然比他更富裕，他们可以在和威尼斯、热那亚的商贸合作中赚钱。帝国在米斯特拉还有一个宫廷，帕列奥列格家族的成员在此统治着拜占廷的伯罗奔尼撒领土。相比破败的君士坦丁堡，米斯特拉更加繁盛，依然可以从周边的农业土地上获取稳定的收入。

这一摇摇欲坠的帝国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在谨慎的穆拉德一世死后，奥斯曼人迎来了新任统治者巴耶扎德一世（Bayezid I）。他咄咄逼人，帝国的灭亡似乎近在咫尺。他不再自称埃米尔，而自称苏丹，以此来表明奥斯曼人是非常卓越的穆斯林政权之一。他废除了其父接受隶属的政策，而是直接吞并击败的敌人。1393年，巴耶扎德一世入侵并吞并了保加利亚，使其在1187年之后一直独立的地位彻底丧失。他认为一个摇摇欲坠、濒临破产的拜占廷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于他的领土中央。他于1394年围攻君士坦丁堡，试图用饥饿迫使它投降，但此时它的防御依然稳固。巴耶扎德一世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而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也继续通过海上为其提供物资补给。巴耶扎德一世围困了7年，最终放弃，转而向小亚细亚进军，攻击撒马尔罕领主帖木儿（Timur）。1402年，他在安卡拉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导致奥斯曼帝国暂时分裂，也让拜占廷帝国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十年。拜占廷人甚至得以玩起了古老的策略，在奥斯曼争夺皇权的内战中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拜占廷帝国不可能无限期地获得喘息。1450年，奥斯曼帝国得以复兴。年轻而有野心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最终消灭了拜占廷。1453年春，他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8万大军驻扎在城墙之前，超过100艘战船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注]曾经的入侵者从未能够在海陆两个层面同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正如1204年的攻城者一样，穆罕默德二世成功地将他的舰队送入黄金角湾，不过他是使用策略将船只通过陆地送入黄金角湾，从而避开了封锁入口的铁链。此外，他的加农大炮带来了最终的胜利。穆罕默德二世在城墙外驻守军队所拥有的武器规模，是曾经的入侵者从未能够拥有的。尽管在15世纪中叶，火药不是新事物，但能够发射重达600千克石球的超大重物还是给守城者带来了惊慌和害怕。最大的火炮装载火药的程序异常复杂，每天只能发射7次，但在一个月的连续轰击之下，曾经坚不可摧的城墙上还是被打开了一些巨大的豁口。5月28—29日夜晚的大

规模进攻，湮没了寡不敌众的守城者，最终君士坦丁堡落入了奥斯曼人的手中。

在随后的大屠杀受难者中，包括了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他在5月29日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与3000名守卫者[注]一起在城墙上浴血奋战。他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创立者米哈伊尔八世的来孙，也是与皈依基督教、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大帝同名皇帝谱系中的最后一位。他也是拜占廷的末代皇帝，因为尽管米斯特拉和伯罗奔尼撒仍然在拜占廷人手中，但君士坦丁十一世存世的兄弟都没有获得皇帝称号。君士坦丁堡曾是拜占廷政治理念和精神灵魂的中心，因此，没有它的帝国也是难以想象的。再者，在君士坦丁堡取得胜利的7年后，穆罕默德二世入侵伯罗奔尼撒，将其也并入了自己的帝国。这一次，拜占廷再也没有起死回生。

---

1. 此处所记不准确，“8万大军”目前研究证明为20余万大军；“超过100艘战船”则公认为300多艘战船。——审校者注
2. 此处所记不准确，至少有8000名守卫者。——审校者注

尾声

对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土耳其人毁灭了腐朽的希腊帝国更加幸运的了……

——巴肯伯爵 戴维·斯图尔特·厄斯金

在穆罕默德二世胜利后100年左右，皮埃尔·吉勒斯看到君士坦丁堡时，发现拜占廷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消失殆尽，而且其精神世界的痕迹也已经很难被寻觅到。1453年之后，帝国的地标性建筑和物件被接二连三地清除。首先是指引者圣母像。它象征着圣母马利亚的庇佑，是拜占廷人精神世界中核心特征的外在表现。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时，它被收藏于霍拉修道院中，以便保护城墙的守卫者。在城墙被攻破后，奥斯曼军队四处抢劫，为了获得这幅圣像画框上的镶金和珠宝，他们将其毁成碎片。穆罕默德二世决定放弃阿德里安堡，而将君士坦丁堡立为新的首都，许多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因而被毁于一旦。苏丹需要将这座城市重新改造，变成自己感觉舒适的居住场所，许多古老的建筑必须被清除，因为在拜占廷帝国最后的悲惨岁月中，大多数伟大的教堂、修道院和宫殿都已年久失修。圣使徒教堂被拆毁，并于1462—1470年间被征服者清真寺取而代之。16世纪40年代，石柱和查士丁尼骑马雕像被推倒，以取用其中的铁来铸造大炮。吉勒斯在游历君士坦丁堡时，只看到了正准备运往铸造厂的碎片。大皇宫的残迹于1609年被埋藏在蓝色清真寺下面，而布拉赫奈皇宫则完全消失。大竞技场变成开放的广场。当然，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消失。奥斯曼人对于仍然可以使用的建筑，也乐于旧物再利用。圣索非亚大教堂在帝国灭亡之际，仍然保存完好，因此奥斯曼人轻而易举地将其改造成了清真寺：他们在正殿墙上嵌入了一个米哈拉布，以此来

标注麦加的方向，然后在教堂周围增加了4个清真寺尖塔。全能真主修道院和其他较小的教堂，也被重新利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多被抹去了拜占廷的特征，即教堂内部空间中丰富的人物装饰都已消失不见。



图4 拜占廷遗产：圣索非亚大教堂，位于伦敦贝斯沃特，建成于1887年

拜占廷的文献得以幸存，因为君士坦丁堡有大量藏书丰富的图书馆。1453年5月29日早晨，许多书籍葬身火海，但仍有大量被藏匿。类似于皮埃尔·吉勒斯的收藏者后来到君士坦丁堡寻找并购买这些书籍。此外，前往西方寻求避难的人也随身带了很多书。这些书籍中，不仅包括拜占廷文人的作品，比如佐西姆斯、普罗柯比、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约翰·坎塔库镇努斯等人的作品，而且还收藏了希腊古代经典文献的珍贵抄本，它们作为高等教育的教材而得以流传，包括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古典世界中伟大的思想家、演说家、剧作家的著作，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狄摩西尼和琉善的著作，这些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数百年来不可多得的作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抄写、翻译，在16世纪初，出

版了希腊古典作品的最早版本。多亏了拜占廷人，这些文献历经数百年的动荡仍然得以存续，流传至今。

拜占廷教会也被从帝国这艘沉船中抢救出来，因为穆罕默德二世认为保持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分裂对自己有利，因此他尽力打消拜占廷人对西方同宗者前来拯救他们的幻想。在这位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大教长的职位是虚空的。他个人承诺，将在胜利后几个月内填补这一空位。他精心挑选的大教长因为坚决反对与拉丁人妥协而闻名。通过这种方式，穆罕默德二世还可以轻易地说服其基督徒臣民接受新秩序：尽管奥斯曼人对他们而言是异教分子，但起码他们并不像拉丁人一样，试图篡改其先辈们的信仰。而且，尽管皇帝不再存在，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仍然继续统辖着东正教教会，其权势得到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斯的敬重，因为这些地方最初都是通过君士坦丁堡而皈依基督教的。这一情况至今未变，西欧、北非乃至全世界的东正教组织都相信，他们的宗教是拜占廷帝国最显著的遗产。布鲁克林、悉尼、伦敦的东正教教堂经常会采用拜占廷式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装饰。其内部的神圣屏风，即隔开圣殿和主殿的屏风上，遍布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圣徒们的圣像。礼拜仪式的用语采用古希腊语或者古斯拉夫教会语言，因为前者是拜占廷帝国通用的语言，而后者是9世纪西里尔和美赛迪乌斯帮助创造的书面语。最直观的遗产是阿索斯圣山上的修道飞地，在那里，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建立的大拉弗拉修道院依然与其他后世所建的修道院一起发挥着作用。这些修道院是与消逝的拜占廷世界最直接的联系。

除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事物之外，拜占廷帝国的大部分都已经完全消失，因此常被视为某种失败，令人惋惜。相比古罗马帝国，它似乎逊色不少，因为古罗马留下了大量有形可见的遗产，比如语言、法律和建筑，更不用提还有一系列好莱坞大作。前面引述的18世纪苏格兰古董商戴维·厄斯金的话语，便是对拜占廷持负面评价的典型。然而，与古罗马的比较是不公平的。古罗马帝国的壮大，源于它有能力

利用大量人力去一个接一个地征服周边的邻国。它的繁荣昌盛源自：一旦边界确立，鲜有外敌入侵。而拜占廷帝国是暴力和动荡世界的产物。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边界地区几乎始终有外界的压迫与不断的入侵、围攻和战争。在这段历史中，拜占廷帝国幸存下来，并缔造了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而周围的世界则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它变成了狭隘的军事国家，持有进攻的心态，可以扼杀不利的萌芽。相反，它是将不断冲击边界的族群转化成自己的优势，借助一方打击另一方，或者将其中一些族群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体系中。因此，如果说拜占廷帝国有一件伟大的遗产，那么它可能并不是东正教或者古希腊文献的保存，而是一个教训：一个社会的力量体现在，即便是在最不利的情形中，它仍有能力适应并吸收外来者。

大事记

303年，戴克里先开始迫害基督教

306年，君士坦丁在约克称帝

312年，米尔维安桥战役：君士坦丁的幻象

324年，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皇帝

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大公会议

330年，君士坦丁堡落成

337年，君士坦丁去世

378年，阿德里安堡战役

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二次大公会议

391年，亚历山大的塞拉皮雍神庙遭到毁坏

415年，希帕蒂娅在亚历山大港被谋害

451年，在查尔西顿召开第四次大公会议

480年，帝国西部最后一位皇帝尤利乌斯·内波斯被谋杀

527年，查士丁尼一世即位

533年，拜占廷与波斯之间缔结永久和平协议

540年，拜占廷人占领拉韦纳；波斯入侵安条克

562年，拜占廷完全占领意大利

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

568年，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

580年，阿瓦尔人成为多瑙河流域的霸主

582年，莫里斯通过迎娶提比略二世的女儿成为皇帝

602年，莫里斯被推翻、谋杀

610年，希拉克略即位

614年，波斯人占领耶路撒冷

626年，波斯人和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

641年，希拉克略去世

642年，阿拉伯人占领亚历山大港

655年，阿拉伯人在福尼克斯摧毁拜占廷人的舰队

674年，阿拉伯人开始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

681年，第六次大公会议召开，谴责一志论

697年，阿拉伯人占领迦太基

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结束

726年，破坏圣像政策很可能开始实施

740年，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阿克洛伊农溃败

741年，君士坦丁五世即位，人称“臭虫”

751年，伦巴第人占领拉韦纳

754年，希耶拉大公会议

775年，君士坦丁五世去世

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召开，恢复对圣像的崇拜

811年，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被保加利亚可汗克鲁姆击败并杀死

815年，破坏圣像运动死灰复燃

843年，圣像崇拜最终恢复

858年，佛提乌成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

860年，罗斯人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

863年，阿拉伯人在泊松战役中被击败

865年，保加利亚可汗鲍里斯皈依基督教

867年，马其顿王朝第一位皇帝瓦西里一世即位

917年，保加利亚可汗西米恩在安恰罗斯获胜

919年，罗曼诺斯·利卡潘努斯在君士坦丁堡夺取皇位

934年，约翰·库库拉斯占领梅利泰内

945年，利卡潘努斯家族被君士坦丁七世废黜

959年，君士坦丁七世去世

961年，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重新夺回克里特岛

963年，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即位

969年，约翰一世·基米斯基即位

975年，约翰一世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动远征

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受洗

989年，巴达斯·福卡斯的叛乱失败

1018年，完全征服保加利亚

1025年，瓦西里二世去世

1043年，乔治·马尼亚克斯叛乱

1056年，狄奥多拉去世，马其顿王朝结束

1071年，曼齐刻尔特战役

1081年，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即位

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

1143年，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即位

1171年，整个拜占廷帝国内的威尼斯商人遭到逮捕

1176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中击败拜占廷人

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去世

1182年，安德罗尼柯一世篡位

1185年，安德罗尼柯一世被推翻，伊萨克二世·安耶洛斯成为皇帝

1187年，瓦拉几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叛乱

1195年，伊萨克二世被推翻，阿莱克修斯三世成为皇帝

1203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帮助伊萨克二世夺回皇位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

1205年，阿德里安堡战役

1208年，狄奥多尔一世·拉斯卡里斯在尼西亚被加冕为皇帝

1246年，约翰三世·瓦塔基斯占领塞萨洛尼基

1259年，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在尼西亚被加冕为皇帝

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

1274年，里昂教会统一教令颁布

1282年，米哈伊尔八世去世，安德罗尼柯二世即位

1328年，安德罗尼柯三世从其祖父手中夺得皇权

1331年，尼西亚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

1341年，安德罗尼柯三世去世，内战爆发

1347年，约翰六世·坎塔库镇努斯占领君士坦丁堡

135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吉璧，在欧洲获得据点

1354年，约翰六世·坎塔库镇努斯退位

1369年，约翰五世出访罗马

1371年，马里查河战役，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击溃

1383年，约翰六世·坎塔库镇努斯去世

1391年，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去世

1394年，奥斯曼统治者巴耶扎德一世围攻君士坦丁堡

1402年，安卡拉战役：奥斯曼帝国陷入混乱

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穆罕默德统治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1460年，奥斯曼人占领拜占廷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1544年，皮埃尔·吉勒斯抵达君士坦丁堡

拜占廷皇帝年表

方括号中的皇帝仅仅统治着帝国的西部。

306—337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337—361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361—363年，朱利安（Julian）

363—364年，约维安（Jovian）

364—378年，瓦林斯（Valens）［364—375年，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375—383年，格拉提安（Gratian）］

379—395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83—392年，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392—394年，尤金尼厄斯（Eugenius）］

395—408年，阿卡狄乌斯（Arcadius）［395—423年，霍诺留（Honorius）］

408—450年，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450—457年，马尔奇安（Marcian）

457—474年，利奥一世（Leo I）

474年，利奥二世（Leo II）

474—491年，芝诺（Zeno）［474—475年，尤利乌斯·内波斯（Julius Nepos）；475—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476—480年，尤利乌斯·内波斯（在达尔马提亚）］

491—518年，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

518—527年，查士丁一世（Justin I）

527—565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65—578年，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578—582年，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582—602年，莫里斯（Maurice）

602—610年，福卡斯（Phokas）

610—641年，希拉克略（Heraclius）

641年，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

641—642年，赫拉克洛纳斯（Heraclonas）

642—668年，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668—685年，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

685—695年，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

695—698年，利奥提乌斯（Leontios）

698—705年，提比略三世（Tiberius III）

705—711年，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第二次执政）

711—713年，腓力比库斯（Philippikos）

713—715年，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II）

715—717年，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III）

717—741年，利奥三世（Leo III）

741—775年，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75—780年，利奥四世（Leo IV）

780—797年，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

797—802年，伊雷妮（Irene）

802—811年，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I）

811—813年，米哈伊尔一世·琅加贝（Michael I Rangabe）

813—820年，利奥五世（Leo V）

820—829年，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II）

829—842年，狄奥斐卢斯（Theophilos）

842—867年，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67—886年，瓦西里一世（Basil I）

886—912年，利奥六世（Leo VI）

912—913年，亚历山大（Alexander）

913—959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920—944年，罗曼诺斯一世·利卡潘努斯（Romanos I Lekapenos）

959—963年，罗曼诺斯二世（Romanos II）

963—969年，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Nikephoros II Phokas）

969—976年，约翰一世·基米斯基（John I Tzimiskes）

976—1025年，瓦西里二世（Basil II）

1025—1028年，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

1028—1034年，罗曼诺斯三世·阿吉罗斯（Romanos III Argyros）

1034—1041年，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IV）

1041—1042年，米哈伊尔五世（Michael V）

1042—1055年，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1055—1056年，狄奥多拉（Theodora）

1056—1057年，米哈伊尔六世（Michael VI）

1057—1059年，伊萨克一世·科穆宁（Isaac I Komnenos）

1059—1067年，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oukas）

1068—1071年，罗曼诺斯四世·第欧根尼（Romanos IV Diogenes）

1071—1078年，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VII Doukas）

1078—1081年，尼基弗鲁斯三世·伯塔奈亚迪斯（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

1081—1118年，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I Komnenos）

1118—1143年，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II Komnenos）

1143—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Manuel I Komnenos）

1180—1183年，阿莱克修斯二世·科穆宁（Alexios II Komnenos）

1183—1185年，安德罗尼柯一世·科穆宁（Andronicus I Komnenos）

1185—1195年，伊萨克二世·安耶洛斯（Isaac II Angelos）

1195—1203年，阿莱克修斯三世·安耶洛斯（Alexios III Angelos）

1203—1204年，伊萨克二世（Issac II，第二次执政）和阿莱克修斯四世·安耶洛斯（Alexios IV Angelos）

1204年，“浓眉”阿莱克修斯五世（Alexios V Mourtzouphlos）

1208—1221年，狄奥多尔一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e I Laskaris）（在尼西亚）

1221—1254年，约翰三世·瓦塔基斯（John III Vatatzes）（在尼西亚）

1254—1258年，狄奥多尔二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e II Laskaris）（在尼西亚）

1258—1261年，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John IV Laskaris）（在尼西亚）

1259—1282年，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1282—1328年，安德罗尼柯二世·帕列奥列格（Andronicus II Palaiologos）

1328—1341年，安德罗尼柯三世·帕列奥列格（Andronicus III Palaiologos）

1341—1391年，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John V Palaiologos）

1347—1354年，约翰六世·坎塔库镇努斯（John VI Kantakouzenos）

1391—1425年，曼努埃尔二世·帕列奥列格（Manuel II Palaiologos）

1425—1448年，约翰八世·帕列奥列格（John VIII Palaiologos）

1449—1453年，君士坦丁十一世·帕列奥列格（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

专业术语

阿里乌派信徒：阿里乌教义的追随者，认为耶稣基督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地位低于上帝。

小亚细亚：现代土耳其所在的亚洲领域。

苦行者：通过极端的自我节制、自我施加的苦难，来追求接近上帝。

奥古斯都广场：君士坦丁堡内的主广场，位于圣索非亚大教堂和大皇宫之间。

瓦西里乌斯：希腊语中的“王”，拜占廷人用于称呼他们的皇帝。

查尔西顿信徒：遵从尼西亚和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中确立的基督教义的信徒。

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官：10世纪之后拜占廷军队的统帅。

总督：同时兼管内政和军事大权的行省长官。

盟邦：拜占廷早期用于描述帝国盟友的术语。

破坏圣像者：反对圣像崇拜的人。

崇拜圣像者：支持圣像崇拜的人。

一性论：认为耶稣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而没有人性。

一志论：一种折中的教义，认为耶稣基督同时拥有人性和神性，但只有一种意志。

诺米斯玛：拜占廷在1092年之前所使用的金币。

生于紫色寝宫的：用于指代拜占廷统治王朝中的某名家族成员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内的大皇宫中。

斑岩：一种深紫色的大理石，嵌有白色晶体，出自埃及的一处偏远地区。

将军：军区最高长官、军区行省军队的指挥官。

塔格玛塔近卫军：拜占廷军队中的精英部队，由皇帝亲自指挥，君士坦丁五世时创制。

塞姆，又称军区：650年之后拜占廷的基本行政规划单位。

瓦兰吉卫队：皇帝的私人卫队，主要由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组成。

延伸阅读

引言

The quotation from Ogier Ghiselin de Busbeq is in hisTurkish Letters, trans. Edward Seymour Forster (Oxford, 1927), pp. 36－7. For Gilles’s and Gibbon’s views on the downfallof Byzantium, see Pierre Gilles,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John Ball (Ithaca NY, 1988, 2nd edn), p. xliv; 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David Womersley, 3 vols (London, 1994), vol. 3, p. 791. For general surveys of Byzantine political history 306－1453, see Warren 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Stanford CA, 1997), the same author’s less detailed A Concise History ofByzantium(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01),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and Malden MA, 2010, 2nd edn) and Dionysios Stathakopoulos,A Short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 2014). Among more thematic introductions are Averil M. Cameron,The Byzantines (Oxford and Malden MA, 2006) and herByzantine Matters(Princeton NJ, 2014), Jonathan Harris (ed.),Byzantine History (Palgrave Advances seri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05), Cyril Mango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 and New York, 2002), Judith Herrin,Byzantium: The Surprising Life of a Medieval Empire(Harmondsworth, 2007) and Jonathan Shepar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Byzantine Empire c. 500–1492(Cambridge, 2008).

第一章 上帝的曙光

The quotation is from 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David Womersley, 3 vols (London, 1994), vol. 3, p. 1068. The rival pagan and Christian views of Constantine can be read in: Zosimus,New History, trans. R.T. Riley(Canberra, 1982) and 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 trans. Averil Cameron and Stuart G. Hall (Oxford, 1999) with analysis in Warren Treadgold,The Early Byzantine Historians(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07), pp. 23–46, 107–14. For modern accounts of Constantine's reign, see Timothy D. Barnes,Constantine (Oxford, 2014) and Paul Stephenson,Constantine: Unconquered Emperor, Christian Victor(London, 2009). On 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s and Jews: John Boswell,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Chicago, 1980) and Robert L. Wilken,John Chrysostom and the Jews: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Late Fourth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3). On the theological disputes of the period: J. Pelikan,Credo: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Guide to Creeds and Confessions of Faith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 2003). On Byzantine theocracy and political thought: Donald M. Nicol, 'Byzantine political thought', 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 350–c. 1450, ed. J.H. Burns (Cambridge, 1988), pp. 51–79. On the growth of the cult of the holy man:

Peter Brown,Society and the Holy in Late Antiquity(London, 1982). On the charitable work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Demetrios J. Constantelos, Byzantine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Welfare(New Rochelle NY, 1991, 2nd edn); and on its art and architecture: Irmgard Hutter,The Herbert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London, 1988) and John Lowden,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Art (London, 1997). On the role of eunuchs: Shaun Tougher,The Eunuch in Byzantine History and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On policies towards ‘barbarians’: Peter 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Oxford, 1991). In general on the period 284－500: Averil Cameron,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1993), Stephen Mitchell,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641(Oxford, 2007), Peter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New History(London, 2005) and his Empires and Barbarian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London, 2010).

第二章 帝国的前哨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 H.B. Dewing,5 vol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14－28), vol. 1, p. 267. Procopius’s laudatory work is The Buildings, trans. H.B. Dewing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35) and his vitriolic attack on Justinian is hisSecret History, trans. H.B. Dewing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40).The value of Procopius’ testimony is assessed, and very different conclusions reached, by Averil M. 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 (London, 1985) and Anthony Kaldellis, Procopius of Caesarea: Tyrann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Philadelphia, 2004). The story of St Savas' visit to Constantinople can be found in Cyril of Scythopolis,The Lives of the Monks of Palestine, trans. R.M. Price (Kalamazoo MI, 1991), pp. 182–7. Recent assessments of Justinian and his reign can be found in John Moorhead,Justinian (Harlow,1994), J.A.S. Evans,The Age of Justinian: The Circumstances of Imperial Power (London, 1996), Michael Maas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2005) and Peter Sarris,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 2006). On the theological disputes of the period: John Meyendorff,Imperial Unity and Christian Divisions: The Church 450–680(Crestwood NY, 1989). For the military aspects, see John Haldon, TheByzantine Wars(Stroud, 2001). On Justinian's buildings and the cathedral of Hagia Sophia: Robin Cormack,Byzantine Art (Oxford, 2000), pp. 37–75 and John Freely and Ahmet S.Çakmak,The Byzantine Monuments of Istanbul (Cambridge, 2004), pp. 80–153.

第三章 泛滥的洪水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p. 439. The story of the three blind men of Alexandria can be found in John Moschos,The Spiritual Meadow, trans. John Wortley (Kalamazoo MI, 1992), pp. 59–60. For an account of the reign of Maurice: L.M. Whitby,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Oxford, 1988);and of that of Heraclius in Walter E. Kaegi,Heraclius: Emperor of Byzantium (Cambridge, 2003).

On the Arab invasions: Walter E. Kaegi,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Cambridge, 1992). On the calamitous seventh century in general: John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Cambridge, 1997, 2nd edn) and James Howard-Johnston,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Oxford, 2010).

第四章 转型的世界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 Pausanias,Guide to Greece, trans. Peter Levi, 2 vols(Harmondsworth, 1971), vol. 1 p. 28. For a balanced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theme system, see John F. Haldon,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565–1204 (London, 1999), pp. 71–85; and on the policy of transferring populations: Hélène Ahrweiler and Angeliki E. Laiou (eds),Studies on the Internal Diaspora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ashington DC, 1998). The defences and sieges of Constantinople are described in Jonathan Harris,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Byzantium (London, 2007), pp. 40–58. Thewhole period is surveyed in Leslie Brubaker and John 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Iconoclast Era (c. 680–850): A History(Cambridge, 2011); and the later years in Warren Treadgold, TheByzantine Revival, 780–842(Stanford CA, 1988). The possibility that Constantine V was deliberately targeting holy men is explored by Peter Brown, ‘A Dark-Age Crisis: aspects of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 in hisSociety and the Holy in Late Antiquity (London, 1982), pp. 251–301, while Leslie Brubaker,Inventing Byzantine Iconoclasm (London, 2012) stronglyplays down the significance

of iconoclasm and the persecution of monks. On Empresses Irene and Theodora: Judith Herrin,Women in Purple: Rulers of Medieval Byzantium(London, 2001). On the impact of iconoclasm on Byzantine art: Robin Cormack,Byzantine Art(Oxford, 2000), pp. 86–129.

第五章 对北方的征服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Ibn Fadla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 Arab Travellers in the Far North, trans. Paul Lunde and Caroline Stone (London, 2012), p. 46. For the Russian attack of 860 and Photios’s account, seeThe Homilies of Phot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Cyril Mango (Cambridge MA, 1958), pp. 74–110. The classic work on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is Dimitri Obolensky,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London, 1971), though this should now be supplemented with Florin Curtin,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500–1250 (Cambridge, 2006) and Paul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 900–1204 (Cambridge, 2000). On Photios and his career: Nigel Wilson,Scholars of Byzantium(London, 1983), pp. 89–119, and Francis Dvornik,The Photian Schism: History and Legends (London, 1970).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Slavs: Francis Dvornik,Byzantine Missions among the Slavs(New Brunswick NJ, 1970) and S.A. Ivanov, ‘Religious missions’, in The Cambridge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 500–1492, ed. Jonathan Shepard (Cambridge, 2008), pp. 305–32. On the Russian visitors Anthony of Novgorod and Philip: W.R. Lethaby andHarold Swainson,The Church of Sancta Sophia,

Constantinople: A Study of a Byzantine Building(London and New York, 1894) and Cyril Mango, ‘A Russian graffito in St Sophia’, in Cyril Mango,Studies on Constantinople (Aldershot and Brookfield VT, 1993), no. XIX.

第六章 光荣之路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taken fromDigenis Akritas: The Grottaferrata and Escorial Versions, ed. and trans. Elizabeth Jeffreys (Cambridge, 1998), p. 19. The quotation from the disgruntled clergyman is fromThe Correspondence of Leo, Metropolitan of Synada, ed. andtrans. M.P. Vinson (Washington DC, 1985), pp. 198–9; that of the mistrustful nobleman (Kekavmenos) from Deno J. Geanakoplos,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Chicago, 1984), p. 237; and the words of the officials to the bishop Liudprand of Cremona from Liudprand,The Complete Works, trans. Paolo Squadriti(Washington DC, 2007), p. 273. For the handbooks compiled under Leo VI and Constantine VII, seeThe Taktika of Leo VI, trans. G.T. Dennis (Washington DC, 2010), pp. 555, 589;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o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G. Moravcsik, trans. R.J.H.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andThe Book of Ceremonies, trans. A. Moffatt andM. Tell (Canberra, 2012). On the attempts to limit the land held by the Asia Minor warlords: Eric McGeer,The Land Legislation of the Macedonian Emperors (Toronto, 2000). On themilitary developments of the period: 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 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5) and 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and its Army, 284–

1081(Stanford CA, 1995). On John Tzimiskes’ 971 Bulgarian campaign: Paul 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 900–1204(Cambridge, 2000), pp. 51–8.

第七章 长长的身影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taken from Eric McGeer,The Land Legislation of the Macedonian Emperors(Toronto, 2000), p. 117. An account of the 980 Arab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 can be found in H. Amedroz, ‘An embassy from Baghdad to the emperorBasil I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6 (1914), pp. 915–42. The description of Zoe and advice of Bardas Skleros to Basil II are in the memoirs of Michael Psellos,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rans E.R.A. Sewter (Harmondsworth, 1966), pp. 43, 158. The quotation from the resentful aristocrat is in Deno J. Geanakoplos,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Chicago, 1984), p. 105. On the reign of Basil II, see Catherine Holmes,Basil II and the Governance of Empire (976–1025) (Oxford,2005) and Paul Stephenson,The Legend of Basil the Bulgar Slayer (Cambridge, 2003). On the period after Basil’s death: Michael Angold,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Harlow, 1997, 2nd edn). On Zoe: Barbara Hill, Imperial Women in Byzantium,1025–1204(Harlow, 1999). On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John Haldon, The Byzantine Wars: 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Stroud, 2001).

第八章 内部的敌人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 William of Tyre,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trans. E.A. Babcock and A.C. Krey, 2 vols (New York, 1943), vol. 2, p. 461. On the flour- ishing economy of the empi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lan Harvey,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Cambridge, 1989) and in general on the Komnenian period: Michael Angold,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Harlow,1997, 2nd edn). On Alexios I, his relations with the Latins and the First Crusade: Jonathan Harris,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London, 2014, 2nd edn) and Peter Frankopan,The First Crusade: The Call from the East(London, 2012). On the Venetians: Donald M. 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Cambridge, 1988). On ecclesiastical relations and the schism: Henry Chadwick,East and West: The Making of a Rift in the Church(Oxford, 2003); Francis Dvornik, Byzantium and the Roman Primacy(New York, 1979, 2nd edn); Steven Runciman,The Eastern Schism (Oxford, 1955). On Manuel I:Paul Magdalino,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Cambridge, 1993). On the Fourth Crusade: Jonathan Phillips,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London, 2004).

第九章 新君士坦丁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 Michael VIII’s short autobiography in J.P. Thomasand A.C. Hero,Byzantine Monastic Foundation Document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Surviving Founders’ Typika and Testaments, 5 vols (Washington DC, 2000), vol. 3, p. 1245. On the parti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1204: Peter Lock,The Franks in the Aegean, 1204–1500(Harlow, 1995). On the courts in exile at Nicaea and Arta: Michael Angold, A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der the Laskarids of Nicaea, 1204–1261(Oxford, 1975) and Donald M. Nicol, The Despotate of Epiros I, 1204–1267 (Oxford, 1957). On the Latin empire: Filip van Tricht,The Latin Renovatio of Byzantium: The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1204–1228)(Leiden and Boston, 2011). On political and ecclesi- as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Joseph Gill,Byzantium and the Papacy, 1198–1400 (NewBrunswick NJ, 1979), Deno J. Geanakoplos,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 1258–1282: A Study in Byzantine–Latin Relations(Cambridge MA, 1959) and Nikolaos G. Chryssis,Crusading in Frankish Greece: A Study of Byzantine–Western Relations and Attitudes, 1204–1282(Turnhout, 2013). On the reigns of Michael VIII and Andronicus II: Donald M. 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Cambridge, 1993, 2nd edn).

第十章 一位耄耋老人回忆

Kantakouzenos’s words are translated by Robert H. Trone,The History of John Kantakouzenos (Book I):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hD thesi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79), p. 108. On Kantakouzenos’s life and reign: Donald M. Nicol,The Reluctant Emperor: A Biography of John Cantacuzene, Byzantine Emperor and Monk, c. 1295–1383(Cambridge, 1996). O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George P. Majeska,Russian Travelers to Constantinopl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Washington DC, 1984),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trans. C.W.R.D. Mosely (Harmondsworth, 1983),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trans. H.A.R. Gibb, 3 vols (Cambridge, 1958–71). On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Turks: Cemal Kafadar,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Berkeley CA, 1995) and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of Power(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02). On the influence of late Byzantine art in Russia and Italy: Thomas Mathews,Byzantium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98),pp. 151–63, and John Meyendorff,Byzantium and the Rise of Russia (Cambridge, 1981). On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the Balkans: John V.A. Fine,The Late Medieval Balkans: A Critical Survey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Ottoman Conquest(Ann Arbor MI, 1994). On Mistra and Thessalonica: Steven Runciman,Mistra: Byzantine Capital of the Peloponnese(London, 1980) and Eugenia Russell,St Demetrius of Thessalonica: Cult and Devotion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and Bern, 2010). The last decades befor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are examined in: Jonathan Harris,The End of Byzantium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0)and Nevra Necipoğlu,Byzantium between the Ottomans and the Latin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Empire(Cambridge, 2009). On the siege and fall of Constantinople: Steven Runci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Cambridge, 1965), Roger Crowley, Constantinople: The Last Great Siege, 1453(London, 2005) and Marios Philippides and Walter K. Hanak,The Siege and Fall of Constantinople in 1453: Historiography, Topography and Military Studies(Farnham and Burlington VT, 2011).

尾声

The quotation at the beginning is from David Stuart Erskine, Earl of Buchan,Essays on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Fletcher of Salton and the Poet Thomson: Biographical, Critical andPolitical(London, 1792), p. xvii. Byzantium's literary legacy to the Renaissance: L.D. Reynolds and N.G. Wilson,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Oxford, 2013, 4th edn) and N.G. Wilson, From Byzantium to Italy: Greek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London, 1992). On the survival of the Orthodox Church: Steven Runciman,The Great Church in Captivity (Cambridge, 1968) and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Harmondsworth, 1993, 2nd edn). On Mount Athos and other Byzantine monastic survivals: William Dalrymple,From the Holy Mountain: A Journey in the Shadow of Byzantium(London, 1998).